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七卷

1956.10—1958.3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七卷

1956.10—1958.3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20590－3,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10月1日 …… 13
№1381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
1956年10月4日 …… 14
№20551,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
1956年10月5日 …… 14
№20590－4,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10月8日 …… 39
№20552,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与金日成谈话内容
1956年10月15日 …… 41
№23030,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
1956年10月16日 …… 42
№0409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
1956年10月18日 …… 58
№0409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
1956年10月20日 …… 59
№0970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
1956年10月20日 …… 60
№0409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
1956年10月21日 …… 61
№0409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致中、捷、保、德各党中央电文
1956年10月21日 …… 63
№2520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
1956年10月22日 …… 64
№0409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1956年10月23日 …… 65
№25203,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
1956年10月23日 …… 65
№0971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
1956年10月23日 …… 66

№0409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
1956年10月24日 …… 67
№21477，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
1956年10月24日 …… 69
№20585-1，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
1956年10月26日 …… 70
№0409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
1956年10月26日 …… 72
№0972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0月28日 …… 72
№16053，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
1956年10月30日 …… 77
№0973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0月30日 …… 78
№25204，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
1956年10月30日 …… 82
№0973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
1956年10月30日 …… 84
№0975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1月1日 …… 87
№20586-1，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
1956年11月5日 …… 90
№20376，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
1956年11月6日 …… 91
№11453，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
1956年11月10日 …… 92
№2235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6年11月13日 …… 93
№20560-1，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
1956年11月19日 …… 94
№21478，安德罗索夫致苏共中央联络部函：提交中国留学生对苏联印象的信
1956年11月20日 …… 96
№21487，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
1956年11月21日 …… 98
№20560-3，伊万诺夫与朴义琓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

1956 年 11 月 22 日 …… 100
№23062,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6 年 11 月 24 日 …… 102
№16686-3,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观感
1956 年 11 月 26 日 …… 103
№20560-4,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
1956 年 11 月 28 日 …… 106
№20560-5,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问题
1956 年 11 月 28 日 …… 108
№21479,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
1956 年 12 月 4 日 …… 109
№10495,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
1956 年 12 月 12 日 …… 115
№20588,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 8 月事件及目前局势
1956 年 12 月 28 日 …… 116
№16686-4,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
1957 年 …… 126

1957 年

№10181,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
1957 年 1 月 4 日 …… 129
№16683,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
1957 年 1 月 5 日 …… 131
№21485,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
1957 年 1 月 5 日 …… 139
№25205,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7 年 1 月 19 日 …… 153
№1381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
1957 年 2 月 2 日 …… 154
№2076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
1957 年 2 月 2 日 …… 155
№2185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1957 年 2 月 6 日 …… 155
№21481,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
1957 年 2 月 14 日 …… 157

№24932，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7年2月22日 …… 166
№16686，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年3月8日 …… 169
№20593，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
1957年3月9日 …… 178
№1049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经济评估的错误
1957年3月13日 …… 180
№25208，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
1957年3月14日 …… 181
№16686-2，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
1957年3月14日 …… 182
№24024，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
1957年3月20日 …… 183
№24023，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
1957年3月22日 …… 183
№1381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
1957年4月4日 …… 185
№25209，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
1957年4月8日 …… 186
№20596-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1957年4月9日 …… 187
№20596-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4月10日 …… 191
№24933，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1957年贸易协定
1957年4月11日 …… 192
№20597，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
1957年4月13日 …… 193
№16682，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
1957年4月18日 …… 194
№23032，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技术专家
1957年4月23日 …… 260
№1038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
1957年4月24日 …… 263
№24934，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

1957年4月29日……………………………………………… 264
№25210,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1957年5月17日……………………………………………… 267
№20599－1,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5月20日……………………………………………… 268
№20599－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5月22日……………………………………………… 269
№25211,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
1957年5月22日……………………………………………… 271
№20599－3,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5月23日……………………………………………… 275
№20599－4,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年5月26日……………………………………………… 276
№20599－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年5月29日……………………………………………… 276
№20764,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
1957年5月31日……………………………………………… 278
№16686－1,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
1957年6月1日 ……………………………………………… 279
№20600－1,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
1957年6月4日 ……………………………………………… 281
№24936,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
1957年6月5日 ……………………………………………… 282
№11800,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党务代表团
1957年6月7日 ……………………………………………… 284
№20600－2,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年6月11日……………………………………………… 286
№25212,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
1957年6月11日……………………………………………… 287
№09981,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
1957年7月3日 ……………………………………………… 288
№20601－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
1957年7月5日 ……………………………………………… 290
№1381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
1957年7月8日 ……………………………………………… 292

№2186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1957 年 7 月 8 日 …… 293
№20602-1,普扎诺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
1957 年 7 月 12 日 …… 294
№20602-3,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
1957 年 7 月 16 日 …… 296
№20602-4,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
1957 年 7 月 29 日 …… 297
№08851,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
1957 年 7 月 31 日 …… 299
№08850,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
1957 年 8 月 7 日 …… 299
№25213,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
1957 年 8 月 8 日 …… 300
№24937,《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
1957 年 8 月 9 日 …… 301
№20603-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
1957 年 8 月 9 日 …… 308
№20604-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
1957 年 8 月 16 日 …… 309
№20604-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
1957 年 8 月 20 日 …… 311
№20604-3,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联系
1957 年 8 月 23 日 …… 312
№08877,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测绘代表团访华
1957 年 8 月 27 日 …… 313
№20604-4,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7 年 8 月 28—30 日 …… 315
№11455,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
1957 年 9 月 18 日 …… 315
№20608-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
1957 年 10 月 7 日 …… 317
№25215,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
1957 年 10 月 11 日 …… 319
№20608-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1957 年 10 月 16 日 …… 320
№24939,《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
1957 年 10 月 18 日 …… 321
№20607,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 年 10 月 19 日 …… 323
№20608－3,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及中国的援助
1957 年 10 月 23 日 …… 324
№08880,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
1957 年 10 月 28 日 …… 328
№03372,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
1957 年 10 月 30 日 …… 329
№1382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
1957 年 11 月 2 日 …… 333
№2076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
1957 年 11 月 2 日 …… 334
№2000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
1957 年 11 月 9 日 …… 335
№1382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声明草案
1957 年 11 月 10 日 …… 338
№2076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
1957 年 11 月 10 日 …… 339
№1382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的修改
1957 年 11 月 12 日 …… 340
№2076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草案
1957 年 11 月 12 日 …… 340
№20606,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
1957 年 11 月 12 日 …… 341
№08881,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通事故
1957 年 11 月 19 日 …… 344
№26346,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
1957 年 11 月 19 日 …… 344
№24940,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
1957 年 11 月 23 日 …… 356
№20609,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1957 年 11 月 26 日 …… 358

№20422，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
1957 年 11 月 29 日 …… 360
№08873，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
1957 年 12 月 8 日 …… 363
№10497，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
1957 年 12 月 14 日 …… 364
№08876，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
1957 年 12 月 16 日 …… 365
№20611－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1957 年 12 月 17 日 …… 368
№20611－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1957 年 12 月 20 日 …… 369
№23033，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
1957 年 12 月 27 日 …… 370
№23034，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 飞机
1957 年 12 月 29 日以后 …… 376

1958 年

№09843，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
1958 年 1 月 10 日 …… 378
№09890，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
1958 年 1 月 20 日 …… 386
№25081，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
1958 年 1 月 20 日 …… 390
№24030，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
1958 年 1 月 28 日 …… 391
№09889，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
1958 年 2 月 1 日 …… 393
№20423，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
1958 年 2 月 5 日 …… 395
№24943，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
1958 年 2 月 5 日 …… 400
№2186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
1958 年 2 月 13 日 …… 401
№24050，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

1958年2月14日 …… 402
№20614－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15日 …… 404
№2521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事宜
1958年2月16日 …… 405
№20614－2,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
1958年2月20日 …… 406
№20614－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22日 …… 409
№1382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
1958年2月27日 …… 410
№09888,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
1958年2月28日 …… 411
№20379,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
1958年3月1日 …… 416
№23035,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
1958年3月8日 …… 418
№09887,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
1958年3月9日 …… 426
№24035,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
1958年3月13日 …… 429
№24037,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问题
1958年3月21日 …… 430

第七卷(1956. 10—1958. 3)

目　录

No20590－3，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10月1日 …… 13
No1381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
1956年10月4日 …… 14
No20551，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
1956年10月5日 …… 14
No20590－4，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10月8日 …… 39
No20552，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与金日成谈话内容
1956年10月15日 …… 41
No23030，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
1956年10月16日 …… 42
No0409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
1956年10月18日 …… 58
No0409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
1956年10月20日 …… 59
No0970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
1956年10月20日 …… 60
No0409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
1956年10月21日 …… 61
No0409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致中、捷、保、德各党中央电文
1956年10月21日 …… 63
No2520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
1956年10月22日 …… 64
No0409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1956年10月23日 …… 65
No25203，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
1956年10月23日 …… 65
No0971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
1956年10月23日 …… 66

№0409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
1956年10月24日 …… 67
№21477，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
1956年10月24日 …… 69
№20585-1，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
1956年10月26日 …… 70
№0409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
1956年10月26日 …… 72
№0972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0月28日 …… 72
№16053，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
1956年10月30日 …… 77
№0973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0月30日 …… 78
№25204，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
1956年10月30日 …… 82
№0973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
1956年10月30日 …… 84
№0975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1月1日 …… 87
№20586-1，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
1956年11月5日 …… 90
№20376，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
1956年11月6日 …… 91
№11453，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
1956年11月10日 …… 92
№2235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6年11月13日 …… 93
№20560-1，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
1956年11月19日 …… 94
№21478，安德罗索夫致苏共中央联络部函：提交中国留学生对苏联印象的信
1956年11月20日 …… 96
№21487，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
1956年11月21日 …… 98
№20560-3，伊万诺夫与朴义琓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

1956 年 11 月 22 日 …… 100
№23062,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6 年 11 月 24 日 …… 102
№16686-3,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观感
1956 年 11 月 26 日 …… 103
№20560-4,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
1956 年 11 月 28 日 …… 106
№20560-5,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问题
1956 年 11 月 28 日 …… 108
№21479,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
1956 年 12 月 4 日 …… 109
№10495,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
1956 年 12 月 12 日 …… 115
№20588,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 8 月事件及目前局势
1956 年 12 月 28 日 …… 116
№16686-4,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
1957 年 …… 126

1957 年

№10181,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
1957 年 1 月 4 日 …… 129
№16683,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
1957 年 1 月 5 日 …… 131
№21485,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
1957 年 1 月 5 日 …… 139
№25205,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7 年 1 月 19 日 …… 153
№1381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
1957 年 2 月 2 日 …… 154
№2076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
1957 年 2 月 2 日 …… 155
№2185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1957 年 2 月 6 日 …… 155
№21481,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
1957 年 2 月 14 日 …… 157

№24932，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7 年 2 月 22 日 …… 166
№16686，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 年 3 月 8 日 …… 169
№20593，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
1957 年 3 月 9 日 …… 178
№1049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经济评估的错误
1957 年 3 月 13 日 …… 180
№25208，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
1957 年 3 月 14 日 …… 181
№16686－2，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
1957 年 3 月 14 日 …… 182
№24024，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
1957 年 3 月 20 日 …… 183
№24023，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
1957 年 3 月 22 日 …… 183
№1381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
1957 年 4 月 4 日 …… 185
№25209，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
1957 年 4 月 8 日 …… 186
№20596－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1957 年 4 月 9 日 …… 187
№20596－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 年 4 月 10 日 …… 191
№24933，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 1957 年贸易协定
1957 年 4 月 11 日 …… 192
№20597，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
1957 年 4 月 13 日 …… 193
№16682，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
1957 年 4 月 18 日 …… 194
№23032，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技术专家
1957 年 4 月 23 日 …… 260
№1038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
1957 年 4 月 24 日 …… 263
№24934，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

1957 年 4 月 29 日 …… 264
No25210,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1957 年 5 月 17 日 …… 267
No20599－1,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 年 5 月 20 日 …… 268
No20599－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 年 5 月 22 日 …… 269
No25211,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
1957 年 5 月 22 日 …… 271
No20599－3,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 年 5 月 23 日 …… 275
No20599－4,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 年 5 月 26 日 …… 276
No20599－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 年 5 月 29 日 …… 276
No20764,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
1957 年 5 月 31 日 …… 278
No16686－1,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
1957 年 6 月 1 日 …… 279
No20600－1,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
1957 年 6 月 4 日 …… 281
No24936,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
1957 年 6 月 5 日 …… 282
No11800,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党务代表团
1957 年 6 月 7 日 …… 284
No20600－2,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 年 6 月 11 日 …… 286
No25212,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
1957 年 6 月 11 日 …… 287
No09981,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
1957 年 7 月 3 日 …… 288
No20601－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
1957 年 7 月 5 日 …… 290
No1381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
1957 年 7 月 8 日 …… 292

№2186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1957 年 7 月 8 日 …………………………………………………… 293
№20602－1，普扎诺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
1957 年 7 月 12 日 …………………………………………………… 294
№20602－3，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
1957 年 7 月 16 日 …………………………………………………… 296
№20602－4，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
1957 年 7 月 29 日 …………………………………………………… 297
№08851，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
1957 年 7 月 31 日 …………………………………………………… 299
№08850，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
1957 年 8 月 7 日 …………………………………………………… 299
№25213，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
1957 年 8 月 8 日 …………………………………………………… 300
№24937，《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
1957 年 8 月 9 日 …………………………………………………… 301
№20603－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
1957 年 8 月 9 日 …………………………………………………… 308
№20604－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
1957 年 8 月 16 日 …………………………………………………… 309
№20604－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
1957 年 8 月 20 日 …………………………………………………… 311
№20604－3，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联系
1957 年 8 月 23 日 …………………………………………………… 312
№08877，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测绘代表团访华
1957 年 8 月 27 日 …………………………………………………… 313
№20604－4，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7 年 8 月 28—30 日 …………………………………………………… 315
№11455，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
1957 年 9 月 18 日 …………………………………………………… 315
№20608－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
1957 年 10 月 7 日 …………………………………………………… 317
№25215，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
1957 年 10 月 11 日 …………………………………………………… 319
№20608－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1957 年 10 月 16 日 …… 320
№24939,《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
1957 年 10 月 18 日 …… 321
№20607,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 年 10 月 19 日 …… 323
№20608－3,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及中国的援助
1957 年 10 月 23 日 …… 324
№08880,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
1957 年 10 月 28 日 …… 328
№03372,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
1957 年 10 月 30 日 …… 329
№1382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
1957 年 11 月 2 日 …… 333
№2076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
1957 年 11 月 2 日 …… 334
№2000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
1957 年 11 月 9 日 …… 335
№1382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声明草案
1957 年 11 月 10 日 …… 338
№2076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
1957 年 11 月 10 日 …… 339
№1382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的修改
1957 年 11 月 12 日 …… 340
№2076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草案
1957 年 11 月 12 日 …… 340
№20606,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
1957 年 11 月 12 日 …… 341
№08881,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通事故
1957 年 11 月 19 日 …… 344
№26346,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
1957 年 11 月 19 日 …… 344
№24940,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
1957 年 11 月 23 日 …… 356
№20609,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1957 年 11 月 26 日 …… 358

№20422，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
1957年11月29日 …… 360
№08873，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
1957年12月8日 …… 363
№10497，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
1957年12月14日 …… 364
№08876，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
1957年12月16日 …… 365
№20611-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1957年12月17日 …… 368
№20611-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1957年12月20日 …… 369
№23033，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
1957年12月27日 …… 370
№23034，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飞机
1957年12月29日以后 …… 376

1958年

№09843，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
1958年1月10日 …… 378
№09890，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
1958年1月20日 …… 386
№25081，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
1958年1月20日 …… 390
№24030，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
1958年1月28日 …… 391
№09889，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
1958年2月1日 …… 393
№20423，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
1958年2月5日 …… 395
№24943，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
1958年2月5日 …… 400
№2186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
1958年2月13日 …… 401
№24050，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

1958年2月14日 …… 402
№20614-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15日 …… 404
№2521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事宜
1958年2月16日 …… 405
№20614-2,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
1958年2月20日 …… 406
№20614-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22日 …… 409
№1382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
1958年2月27日 …… 410
№09888,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
1958年2月28日 …… 411
№20379,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
1958年3月1日 …… 416
№23035,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
1958年3月8日 …… 418
№09887,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
1958年3月9日 …… 426
№24035,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
1958年3月13日 …… 429
№24037,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问题
1958年3月21日 …… 430

№20590-3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10月1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1日

……①

10月1日拜访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克强对我说，根据北京9月29日的指示，他拜访了朴金喆并说，对于长时间拖延公布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北京表示关切。

朴金喆回答说，《劳动新闻》报于9月29日已经刊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而且是头版。

预计不会公布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以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因为他们将发行单独的小册子并分送给各级党组织。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6

---

① 此段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138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

(1956 年 10 月 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4 日会议第 44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М. 卡冈诺维奇、Г. М. 马林科夫、В. М. 莫洛托夫、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这次会议由 А. И. 米高扬主持。

第 38 项 《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针对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陈楚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说明。①

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②、萨布罗夫、维什涅夫斯基、苏斯洛夫。

知悉，犯了错误。

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处罚犯错误的人。

关于塔斯社方面——书记处应该审理所犯的错误。

塔斯社的说明——不真诚。

宣布对维什涅夫斯基同志的警告处分。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5，л. 33 - 40

№2055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

(1956 年 10 月 5 日)

致苏共中央：

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同志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同志将自己给朝鲜劳动党中

---

① 1956 年 9 月 29 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根据塔斯社提供的材料发表了陈楚同志的讲话，而在这些材料中存在着“粗暴的歪曲和擅自的删减”现象。为此，塔斯社领导人 А. А. 维什涅夫斯基受到了处分(РГАНИ，ф. 3，оп. 14，д. 63，л. 18 - 19；оп. 12，д. 119，л. 126 - 128)。——原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央所写的信件译成俄文,并将译文转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李相朝还通报,关于这封信的原文,他打算于十月十几号左右发往平壤。

这里是发往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李相朝同志所写信件的俄语译文。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6 年 10 月 5 日

第 25 - c - 2136 号

手写批注:

阅。

И. 谢尔巴科夫

1956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相朝同志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的简要内容

在自己的信中李相朝同志叙述了苏共中央已经基本了解了的朝鲜劳动党内部的有关情况,并补充了一些新事实。

李相朝同志表示,自己不同意 1956 年 8 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他认为,此次中央全会本应解决以下问题:

1. 关于重新研究以往的(朝鲜)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以便以此为基础制定用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切实措施。

2. 关于清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以确保党内真正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

3. 关于恢复在金日成个人崇拜影响下被篡改了的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

4. 关于消除党在宣传领域的错误,因为后者如今已背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

5. 关于免除那些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人的领导职务。

但是,上述问题在 8 月中央全会上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那些试图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志却遭到了镇压。

李相朝同志说,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中,多数所谓金日成撰写的"著作"都不是他本人,而是由其他同志撰写的。由于个人崇拜的普及和传播,金日成同志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并将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李相朝同志的结论是:如果党内民主得不到保障和不能彻底地恢复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那么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将成为专横和违法乱纪的牺牲品。

李相朝同志认为,在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等人没有向全体与会者传达苏共中央向他们提出的那些有价值的建议,那些在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同志则被污蔑为

企图推翻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密谋者"。与此同时，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却谣传，仿佛苏共中央已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发了信并表示不希望对金日成同志提出批评性的意见。

还在此次全会开幕以前，一些同志在与金日成的私人会谈中便谈了自己对他的批评性意见，而他也向前者表示已诚恳地接受了他们的同志式的意见。可与此同时却制造了关于这些同志从事派别活动的所谓案件。很多领导干部遭到了暗中的跟踪，因而他们害怕彼此往来，并担心有朝一日被指责为"密谋者"。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金承化同志曾打算在8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于是便被紧急派往莫斯科学习。

500多名在机关和部委等部门担任骨干领导工作的同志被指责为"延安派"。所有当年在朝鲜战斗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都被以各种名目定性为派别集团，扣上反党的帽子。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共产党员被称为"裙带派"，而那些从中国返回的则是"延安派"。而似乎只有那些由金日成领导过的游击队员和"祖国光复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派别并形成了党的主要力量。

总之，李相朝写道，所有与金日成没有关系的革命者都应当给自己带上派别活动者的标签。

李相朝接着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宣称，劳动党内不存在普遍的个人崇拜。然而，在8月中央全会上很多共产党员表示不满。于是，在关于金日成报告的决议中便写道："……在党的队伍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个人崇拜。其表现首先在于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在这一工作中过度拔高了个人的作用。不过，个人崇拜并不能对中央一贯坚持的最高领导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制和劳动党的路线、政策产生影响。"

李相朝同志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违反党章和社会主义规律的事实。例如违反党章的要求、不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便增选一些人进入党中央，而其中一些人随后便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这其中就包括成为民主党中央主席的崔庸健。

劳动党被金日成所制造的压制和专横氛围所控制。甚至连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也被迫在恐惧和不自信的环境中工作。任何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的发言稿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便确保发言者所说的都是"需要"的话，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党代会代表们。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所有发言稿都事先经过了详细的审查，并在不经代表同意的情况下胡乱修改。

李相朝写道，国家内部经常出现违反宪法的事。多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各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而根据宪法相关条款，前者都应当是经过选举方可产生的。

由于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3万多人被关进了监狱。仅军人被逮捕者便超过了一个师的编制。8 000人被定罪为反革命，约1万人因其他犯罪遭到审判。总之，在北朝鲜平均300人中便有一个犯人。

关于所谓"反革命分子"，涉及这样一个事实。8月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共有2 000人被解除监禁，其中被判刑5年的"罪犯"，只是由于他们用了印有金日成肖像的杂志封面来作包书皮。

根据金日成所发布的指令，如果有两个证人便足以给一个人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任意年限的徒刑。

李相朝同志继续写道,朴一禹同志(前政治局委员)被逮捕,其家属也被从平壤强制迁移,理由是朴一禹竟敢在实物税和党对待反对派的政策等问题上与金日成唱反调,并声称,(党)不应该不加选择地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

李相朝的信还谈到关于朝鲜当代文学中对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的歪曲问题。其中包括:过分夸大实际上早在1940年便已停止存在的由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的历史作用;吹嘘金日成的贡献,当年他在普天堡一带所发动的一场很平常的游击奇袭活动,竟被吹捧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夸大"祖国光复会"的作用,实际上该组织的人数还不到100人。

但与此同时,却对与中国人并肩战斗反抗日本人、蒋介石和美国侵略者的朝鲜共产党的活动避而不谈。

(朝鲜现领导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问题上犯了巨大错误。例如国内居民在饮食、住房和生活必需品等方面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便计划兴建汽车厂、平壤肉联厂和罐头厂等,却没有考虑到国内并没有可以为上述工厂从事生产所需要的原料。

李相朝同志在信中还写了关于当朝鲜战争进行到第一阶段时,他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会谈的情况。他说,当时(朝鲜)人民军已顺利地推进到了朝鲜南部,可毛泽东同志仍然预计到存在美国大部队入侵朝鲜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李相朝同志向金日成作了汇报。而后者却答,我们不打算后撤,因此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建议。

在信的末尾李相朝说,他并不反对金日成同志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但是请求朝鲜劳动党中央把他的这份书面声明告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为他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在8月中央全会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

译自朝鲜文

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前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引起了朝鲜共产党员、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普遍关注。在这次全会上人们期待讨论的问题有:关于我们政府代表团对兄弟国家的访问;关于其他一些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未获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我们清除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不足。人们尤其期待讨论并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的问题是关于克服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依靠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历史性决议和其他一些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的决议。在依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的基础上,所有兄弟党都广泛地展开了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思想斗争。

为了对那些将要在全会上解决的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可对之作出如下归纳:

1. 重新审查以往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可以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状况的实际措施。

2. 消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以便确保真正的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

3. 恢复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影响下被篡改的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因为在这样的

历史叙述中金日成的贡献被过分地夸大了。

4. 清除党的宣传领域中的不足，因为截至目前此类宣传已背离了人民的实际生活。

5. 撤销阿谀奉承者的领导职务，因为这些人损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上述问题无疑会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很多共产党员的意见可能会与党内个别阿谀奉承者和一心想往上爬的人的意见发生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当采取行政命令和限制性的措施，而且还必须允许所有人都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我们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只要通过全面的集体讨论的方式便可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从而实现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

我提出上述所有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想抹杀我们党、个别领导者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在战争年代领导全国人民反抗外部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我们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朝鲜人民为了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我也不否认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

问题的实质在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是为了揭露我们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及扩大我国劳动者所取得的无可争辩的成绩。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消除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而不是为已有的成绩所陶醉并把这些成绩仅仅归功于某个人。

可是，这次全会的结果不仅辜负了朝鲜共产党员和其他兄弟党的期望，而且完全与这一期望发生了背离。

所有那些以列宁的组织原则为指导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对我党所造成的损害提出了原则性批评意见的同志均被定性为企图推翻政府和党的领导的“反党集团”。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同志提出批评性意见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党内民主、确保党的集体领导、恢复被个人崇拜的影响所篡改了的我们党史的本来面目，将阿谀奉承者和一心只想升官发财者从党的领导岗位清除掉，制定具体措施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粗暴的压制下那些曾在讨论会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同志被剥夺了发言权，导致他们不能在中央全会上完整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一些诚实的敢于公开批评金日成个人崇拜的中央委员也受到欺骗并威胁可能被开除党籍。

难道这一切不令人感到可怕吗？

所有遭到镇压的同志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担负着重大职责的领导干部。其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其案件移交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贸易相尹公钦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弼奎等被开除了党籍。这样，上述同志便无法在全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一些也打算在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言的同志均被剥夺了话语权。

总之，这种粗暴和专横的做法是对我党党章的严重背离。

据说，曾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和私下批评过金日成的同志有朝鲜劳动党最高人民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朴义琓、前建设相金承化和通讯相金昌海(Ким Чан Хэп)等。金日成及其亲信践踏了党章所维护的党内民主,并通过肆无忌惮的压制方式将所有这些对金日成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定性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反党"分子和"罪犯"。

在了解了上述事实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昧着良心认可金日成及其同伙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稍后所作出的结论,即我党内部不存在个人崇拜和党内具体的个人崇拜对象只是朴宪永呢?

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只有朝鲜劳动党可以避免国际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严重错误呢?很明显,就像其他兄弟党一样,朝鲜劳动党也是无法避免这些错误的。然而,尽管这样,我们的代表团在参加了苏共二十大返回祖国之后竟在自己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声称,个人崇拜在苏共的活动中非常普遍,但在朝鲜劳动党——这样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中是不可能存在个人崇拜的;由于在朝鲜劳动党的活动中不存在个人崇拜,因此她也就避免了由于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错误。可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声明并不符合事实,应当认为是对共产党人的欺骗。上述言论无疑是对绝大多数(朝鲜)共产党员意见的蔑视。

一、在朝鲜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及其表现已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种情形下,难道我们还能苟同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所作出的结论:在朝鲜已形成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允许劳动党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并避免了在自身队伍中出现个人崇拜现象?如果我们苟同了类似这样的结论,那么就是承认其他兄弟党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这难道不是滑稽可笑的理论吗?

实际上,就朝鲜的历史条件而言,它是有利于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的。更别说,我们没有适合的条件,从而可以避免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朝鲜曾长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整个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民主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日本殖民者极力用无条件服从手中掌握着权力的日本官吏的思想来"教育"朝鲜民众。久而久之,无限地服从上级对朝鲜人而言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苏联军队帮助朝鲜解放以后,政府回到了人民手中。

当时在国家缺乏经受过解放斗争的革命考验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下,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一些没有经过足够的革命培养的新干部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促成官僚主义、阿谀奉承和个人崇拜在朝鲜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而根植在朝鲜民众思想意识深处的封建教育残余又为个人崇拜的繁荣准备了肥沃的土壤。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封建教育是无条件服从国王及其偶像的基础。在封建教育中国王是国家的化身,谁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的罪犯。而所有这些旧思想残余至今仍在朝鲜人的行为中有切实的反映。例如,根据阿谀奉承者所总结出的"理论",谁批评金日成,谁就是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由此来看,上述"国王便是国家的化身"与金日成的拥护者们所坚信的"理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阿谀奉承者所提出的"理论"目前在我们党内得到普及。难道这一"理论"不就是在我们

封建和殖民统治时期所形成和建立的那些旧思想的残余吗？换言之，该“理论”就是应当受到诅咒的封建和日本殖民统治思想的延续。其思想基础就是“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官僚政权”。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个人崇拜在朝鲜的形成和发展。在这方面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苏联军队解放朝鲜之际，国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被公认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共产党组织。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警察式镇压的情况下，国内所有共产党组织都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固定的联系。每个共产党组织都拥有自己的领导人，金日成只是其中之一。而当金日成同志与我们的解放者——苏联军队返回祖国之时，他便受到了全国民众的支持。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朝鲜的共产党员们都毫无例外地相信苏联同志，因而也就热烈地欢迎和拥护得到苏联同志支持的金日成。

如果我们对当时从属于不同革命组织的领导干部们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人基本可分为如下四个类别：第一类——在朝鲜本土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第二类——分布在苏联并接受苏共领导的朝鲜人；第三类——在东北从事游击运动的共产党员，其活动截止于1940年；第四类——在中国坚持斗争并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在朝鲜解放之际朝鲜共产党的内部基本情况。虽然那些坚持在朝鲜从事斗争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人曾反对由金日成担任党的领袖，但当时朝鲜大多数社会力量还是支持金日成的，他们还通过制定一系列举措以加强和提高他在党内的威信。人们在各处都将他的肖像与斯大林的肖像并列挂在一起，当时很多文件，其中包括国家复兴纲领20条等，都是以金日成的名义对外公布的。

而如今当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使全世界都感到振奋之时，竟然有人极力将朝鲜人民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一个领袖的身上。以上所述都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列宁的组织原则遭到违背的同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一个人手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当干涉朝鲜战争的外国侵略者扩大了战争行动的规模之时，更是所有权力都由金日成一人把持。

如果说，在战争环境下党和国家内部的民主原则受到限制还有几分理由的话，那么当国家步入和平发展阶段，类似的限制必然对党和国家造成负面的影响。可是，和平发展时期在我们国家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人试图进一步强化之。其结果便导致金日成同志将自己置于党、政府和人民之上，而他本人则成为了神圣不可冒犯的人。

通过阐明上述事实，我们是否可以断定朝鲜拥有绝无仅有的良好历史条件，从而使朝鲜劳动党可以避免因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错误呢？我们应当承认，朝鲜不仅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正相反，我们国家中的所有客观条件都比其他兄弟国家更有利于个人崇拜的形成和普及。在这种情况下，自高自大的金日成同志不是去尊重那些当年曾工作在各个共产党组织中的同志们的意见以确保和加强党的统一，而是完全不再考虑同志们的意见。

随着个人崇拜的出现，就像月影随形一样，在金日成的周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谋取权力的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这些人运用各种手段抬举金日成。一方面，如果说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有这些阿谀奉承之徒的存在，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也是领导人对这些阿谀奉承之徒的行为不断鼓励的结果。而当从

上述两方面来对个人崇拜现象加以分析之时,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党内是存在着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而作为领导人的金日成同志则鼓励了这些人的活动,从而促成了个人崇拜的产生。我们不难推测,如果金日成不知道和不经过他的允许,类似"伟大的领袖"、"天才的统帅"和"卓越的领导者"等讴歌之词是否会在报刊上出现?

我们是否可以相信,有人在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所说的那些话呢?

这些话是:在劳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存在个人崇拜。

否认劳动党内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就意味着有意欺骗党和人民,意味着对广大共产党员意见的歪曲。

如果全面分析报纸、杂志、中学教科书、文学著作和艺术创作,我们便显而易见随处可见、无时不在的个人崇拜现象,即金日成的名字被抬举得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王。在很多歌曲中都在歌颂着金日成的名字。朝鲜的民主教育也在告诉人们,似乎只是由于金日成的意志,人民才获得了自由,农民才得到了土地。尚处年轻力壮时期的金日成,其名字已被用来为平壤大学、各个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等命名。还有不少这样的称谓:年轻的金日成被称作朝鲜青年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不谦虚地极力试图将金日成比作"朝鲜的"列宁或"朝鲜的"毛泽东的说法。

难道将金日成与伟大的列宁或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只有那些完全陷入了自高自大的泥淖或丧失了所有廉耻之心的人,才可能将自己与伟大的列宁或毛泽东相比。

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在金日成文选中所发表的那些作品。任何人都晓得这样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即金日成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其他同志——个人崇拜的积极信徒——代写的。试问,究竟有多少文章完全是出自金日成本人的手笔呢?

我甚至不打算对这些著作的质量加以评价。任何仔细和系统地研究过党和政府的文件的人都知道,很多文件都是在金日成的报告或发言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根本不考虑事物近期的发展前景。因此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编制补充性报告,以便修正基础性报告中的错误。而自认为高人一筹并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的金日成便是这样做的。我们会发现此类国家文件在有关形势方面的叙述往往大都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仍被那些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以金日成著作及其卓越的创造的名义发表。我建议党的高级专家和科研工作者对金日成的著作加以重新研究,以便对其中正面的、积极的内容与负面的、消极的内容加以正确的区分。然后再将它们作为党的报告集,而不是金日成的著作予以发表。其他材料则可作为党的政策研究的参考资料。

关于个人崇拜,我们在此不能不列举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实,以便说明个人崇拜在朝鲜的普及程度。还在不久前曾存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将金日成的所有讲话都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而这些讲话都只是涉及一些琐碎的小事。凡是金日成在发言中就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所说的话都立即成为了党的政治口号并被悬挂在每个大街上。例如金日成曾说过"大米就是社会主义"或"纺织是艺术",便成为了党的口号。为了将这些口号以更形象的图画形式

反映出来，有关部门还动员了大量的艺术家。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思维健康的人们感到好笑。不但城市大街上挂满了这样的口号，而且有人还让剧作家以“纺织就是艺术”的口号为基础写了一部戏并在平壤上演。类似这样的事实不仅让人感到可笑，而且也使人感到痛心。

由于个人崇拜的普及，金日成同志将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威望凌驾于党、政府和人民之上。他在任何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与是否反映了多数共产党员的意见无关，而且均被认为是“最高指示”。即使他的最终决定违反了党章和既定法律，也无人敢表示反对。正如刚刚结束的8月中央全会所显示的那样，党章和其他党内民主规范遭到了金日成及其拥护者的粗暴践踏。而当时所出现的这样一个事实也绝非偶然，即中央副主席公开声称：“谁反对金日成，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等着他们的只有那些关押着人民敌人的监狱。”难道所有这一切不会引起党的严重恐慌?！难道这一切不会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吗?！

我们都依然非常清楚地记得，金日成是如何在每次会议上都提到的一个同志的名字，该同志以当年曾积极从事派别活动而闻名。但正是此人由于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称，金日成同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而被立刻任命为内阁相。这里哪还有党的原则可言？对于金日成同志来说，违反党章、国家法律和共产党的原则都不是难事。他从来都不曾把共产党员们的意见放在眼里，更别说去认真考虑绝大多数党员的意见。如果我们说，金日成同志所信奉的信条是“力量便是真理”的话，那么他的观点的权威性则胜过所有国家法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前人们已被类似的思想观念所控制了的话，那么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明白，金日成的做法并不是党的工作作风。盲目相信金日成同志并将之比作上帝的民众已逐渐开始从个人崇拜的意识中清醒过来。而一些捍卫党的原则性立场的领导同志则向金日成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可金日成，不是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那样，虚心接受这些同志式的批评，而是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那些敢于公开批评个人崇拜的人。对于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们而言，苏共二十大出台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的文件是比老虎还可怕的威胁，因此他们对后者充满了仇恨。

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否能够这样对待意义如此巨大的苏共二十大文件呢？如果我们不清除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类似错误现象，不能完整地捍卫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那么最终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都将成为专横和违法乱纪的牺牲品。

二、8月中央全会并没有解决克服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消极影响等原则性问题

众所周知，8月中央全会本应成为坚决反对金日成个人崇拜和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全会，但此次会议最终并未达到目的。

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兄弟国家期间，我们完全有可能了解这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情况。我们的代表团多次与受访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后者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通报了使所有诚实的共产党员都为之激动的问题，即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

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苏联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向我们党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同志式的意见。这些意见涉及如下问题:关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克服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等等。苏联领导人指出,需要对那些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提出警告,不应将党的历史与金日成个人的历史画等号。最后,他们还谈了关于脱离实际的党的宣传的危害性的问题。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上述意见无疑具有重大价值。每当发现兄弟党内存在不足和缺陷时,其他兄弟党都会从共产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批评以便对其纠正错误有所帮助。苏联领导人所提出的这些有价值的同志式的意见是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说的,并非针对金日成本人。很显然,对于了解苏联方面这些希望的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而言,本来应当顺理成章地将所有情况向中央全会作出汇报,以便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清除我们党和国家内部所存在的那些严重不足。然而,金日成等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向党中央隐瞒苏共的上述期望。这里我们将以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同志的实际活动为例。作为例子,我们将举出这样一个事实。

在苏联当H.C.赫鲁晓夫和H.A.布尔加宁同志结束了对外访问回国之后,其与英国领导人所签署的协议性报告都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作了传达。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苏共同志的愿望向我们的党组织作出通报呢?

这表明,苏联领导人都是极力向广大党员通报与党和国家生活密切相关的最重大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了解谈判过程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和英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领导人的活动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意见为基础,而前者的意愿也能得到党员群众所给予的应有评价。与此类似的工作作风只是列宁原则在党的组织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之一。然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党的工作中向与此类似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看齐?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归结为一点,即或者我们的领导人公开忽视党的利益,或者他们害怕把苏联同志所提出的具有价值的意见让广大党员群众都知道。

另外,我们还应当明确一个问题,即苏共的愿望是针对我们党中央提出的。然而我们有些人却认为,劳动党中央就是指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等,或者后者已将自己看作了整个党的化身。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每个诚实的共产党员都不能不同意这样一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苏联领导人所表达的愿望都是针对我们中央的。

前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犯有严重的错误,因为它是在苏共以同志式的方式对我们提出了意见之后,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兄弟国家之后召开的。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我们的同志曾向苏共中央承诺将把苏共的同志式意见向党中央汇报并认真考虑其中所提问题。可是,正如中央全会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人欺骗了苏共中央:他们不仅没有采取切实措施来纠正所犯错误,而且对那些敢于批评个人崇拜的人实施了镇压。

难道我们可以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吗?针对那些以苏共所提出的意见为指导敢于对金日成及其周围的各类型拥护者提出批评的同志,对于这种健康的党内批评方式,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实施了镇压,所有提出批评性意见的人都被指责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反党的延安派”和“密谋者”。

以这种方式伪造的所谓“延安派”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员。但此举的结果却是更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和团结。

众所周知，一些同志在私下里已对金日成同志提出了批评，而后者也允诺接受其同志式的批评意见。但时隔不久，金日成便在上述同志的背后下了手——制造了所谓关于他们派别活动的臆造的“案件”，这些提意见的同志被称作“延安派”。而在中央全会上也以公开的党内政治斗争替代了对党内各种错误问题的讨论。

可是，即使在这种党内民主基本规范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一些同志仍采取了真正的勇敢举动——公开对金日成及其周围的阿谀奉承者提出了批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自身命运所受到的威胁，这些同志勇敢地公开批评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这些同志的举动绝不应认为是试图取得内阁相首相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虽然也有一些昧了良心的人说这些同志的举动存在这样的企图。

这些公开对金日成提出批评的同志很清楚自己所选择的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由于这一举动自己将被吓怕了的只知道机械地服从的全会多数开除出党。因为还在全会开幕前夕，金日成的拥护者们便已公开扬言：批评党的“领导人”的人将被开除党籍。由此一来，难道还可以继续说这些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是在关心自身的利益吗？事实上，他们批评个人崇拜只是考虑到党的利益，只是想恢复历史的真实。

金日成及其少数拥护者们所采取的这些镇压措施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记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闻的可耻的一笔。类似这样的镇压是否可以看作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与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关系而采取的预防性举措呢？

应当直接承认的是，类似这样的举措既不会促进党的团结，也不会有利于加强朝鲜劳动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国际关系。它们只会削弱与其他兄弟党派的联系并背离马列主义的真理。

金日成及其拥护者以自己史无前例的镇压活动忽视了苏共以同志式的方式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意见。除此之外，他们还制造谣言，仿佛是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发了一封信，其中希望不要对金日成同志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我们应当认真地读一下这封信。究竟苏共中央在哪说过，不应当反对个人崇拜的话？事实正相反，在这封信中苏共明确地肯定了与个人崇拜作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所有兄弟党派都已取得巨大的成绩。放出此类谣言的是南日，而对他的这一可耻活动提出支持的有金昌满等人。

难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应被认为是胆小鬼和骗子手的把戏吗？金日成及其拥护者断言，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共产党员组建了自己的“派别”，即所谓“延安派”。很显然，类似这样的判断都是荒诞不经的，根本不值得去驳斥。

人们只是对他们的政治近视感到惊奇，即他们竟然将朝鲜劳动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与深受6万万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员们热爱着的革命圣地延安联系起来了。这里，让我们对其在指责诚实的共产党员从事派别活动时所使用的那些理由作一下分析。金日成同志的拥护者们断定，那些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还在全会开幕之前便早已背着中央讨论过关于党的政策的问题。他们所作的这样一些类似的判断根本经不起推敲。大家都晓得，如今遭

到镇压的同志还在全会召开前便已在私下与金日成的会谈中向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性意见,然后才在中央全会上发了言。在中央全会上,由于党内民主的缺失,那些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都被剥夺了话语权。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由于这方面原因无法参加讨论会。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哪里可以看到"密谋"反对党和政府的痕迹?而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怎么还可以断言在我们党内还遵守着党内民主的基本规范呢?

至于其他一些他们惯用的理论是:对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批评必然导致旨在"推翻"党和政府的"密谋"。难道共产党员提出批评意见以消除领导同志活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就是"犯罪"吗?

我们的党章为党内民主提供了保障,即允许任何一位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只要他的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没有一个共产党或工人党会承认自己党内有这样一条规定,即个别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可以置身于党的批评之外。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认为个别共产党员对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便是"犯了罪"。在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在哪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即要求构成一个党派的共产党员可以拜倒在个别领导者的权力面前?如今甚至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内部都不允许开展同志式的批评,而在中央常务委员会里——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即使在封建时代,个别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讨好社会舆论和防止个别官僚做出极端的反人民举动,也会在自己的宫廷中成立一个国务院,其成员则有权指出国王的错误行为。

由此试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开展针对个别领导人的批评活动?

那些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实施调查跟踪的领导人,极力希望借助于权力压服所有共产党员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但显而易见的是,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还没有能够使全党和整个政府都屈从于他们。

我们可以假设,某人公开地反对金日成和个别国家领导人,我们是否可以判定,此人的这一举动就是旨在推翻党和政府的行为呢?真正意义上的推翻党和政府的行为意味着将改变现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可如果按照我们劳动党内一些人的逻辑和他们的观点来看,那么是否应将一系列兄弟党派中领导人的变化也视作推翻党和政府的举动呢?如果认为,金日成在有生之年都应当担任内阁首相和中央主席的职务,那么他与国王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可究竟是谁任命他终身担任内阁首相和中央主席的职务的呢?如果有人建议解除金日成同志的职务以纠正他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及其负面影响,纠正被篡改了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确保党和国家的真正的集体领导,按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反党和犯罪的企图。而那些被开除党籍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上述类似要求,他们只是建议解除几个阿谀奉承者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因为后者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犯罪和反党活动可言呢?

金日成的拥护者们说,不应当在私下里从事有关政治话题的交谈。难道这不是一个荒谬的要求吗?难道有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不在私人圈子内就政治话题进行交流?这样的活动家是没有的。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竟然会在自己的队伍中禁止人们私

下里从事政治问题的谈话？事实上这样的政治也是不存在的。难道金日成本人不在私下里从事政治问题的谈话？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饭桌旁私下与他就政治问题进行过交谈。难道类似这样的行为就可以被认定是从事派别活动？每个感到自己对党肩负着责任的共产党员都不可能同意类似这样的对派别活动的定义。要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除了金日成同志及其几个拥护者，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在一起吃饭或者举行某些庆祝活动，因为任何此类“聚会”都可能被找到“密谋”的蛛丝马迹。难道暗地里对领导干部实施跟踪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吗？还在8月中央全会开幕前夕，李弼奎便在私下里向金日成同志谈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而当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副部长金英柱(金日成的兄弟)得知此事后，便要求李弼奎同志所在部门的基层党组织主席对该同志实施毫不放松的监视，并在稍后建议将其开除党籍，虽然李弼奎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而只有中央全会根据相关章程才有权开除其党籍。那么，类似这样的随意开除党员党籍的要求是否可认为是公正的呢？人们在中央全会开幕前夕便已知道，中央委员金承化同志将在全会上就个人崇拜问题发言。可是还未等到时候，该同志便被迅速地派往莫斯科学习。

让我们列举另一个事实。

还在全会开幕前，金日成同志召见了曾向自己提出过批评性意见的副首相、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朴义琓同志。金日成对后者恐吓性地说，自己手中似乎掌握了会损害其名誉的经济方面的材料。难道金日成同志这样做是在依照党的原则办事吗？如果他手中真的掌握着有损于朴义琓同志声誉的材料，未必需要如此处心积虑，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作为实施恐吓的手段。这可真是朝鲜劳动党的悲剧。

而当全世界都在普遍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之时，为何在朝鲜却出现了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虽然，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金昌满曾在公开场合说，很希望随处见到共产党员毫不担心地讲任何事情。可是在由于最微不足道的批评就可能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又有谁敢开口说话？在这种情形下又如何能够巩固党的团结呢？

有谣传说，已经有500多名厅、局和部级领导干部因被指责属于“延安派”而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在全国上下都在高喊要根除“延安派”的情况下，还有谁敢当面说实话。可是，我敢说在我们党内远远不止500人是真心反对个人崇拜的。终归有一天，所有共产党员将摆脱个人崇拜的束缚，到那时我们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都会起来坚定地反对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我们整个党(超过100万党员)都被指责为“派别集团”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前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进步思想与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反映。而其斗争的结果又被人为地利用，从而形成了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所谓“延安派”。而这必然会削弱我们党的队伍的组织团结和思想统一。

我们为何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封住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共产党员的嘴巴、耳朵和眼睛呢？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是不怜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个性自由、消灭

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奋斗的。这也是人民参与革命的主要目的。如果我们党内有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国王,歪曲真理并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而让其他人都跪倒在他的权力面前,那么我敢说,一定有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会不顾及自己生命地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那时,这样的斗争将不会仅仅局限在劳动党内部,它将作为思想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扩展到国际范围。

金日成的拥护者反对共产党员私下里与苏联和中国同志会面。他们还放出谣言,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同志给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难道朝鲜共产党员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在私下里会面可以被判定为从事反党活动吗?难道个别共产党员向兄弟党的领导人写封信可以被认定是犯罪吗?

我们还不知道有类似这样的事实,即国外共产党员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便被指责犯了反党和反国家罪。

金日成同志必须想到,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都是非常了解我们中央的不足和错误的,他们忧心如焚,却害怕把这些都说出来,因为这样做必然受到镇压。

为了压制敢于提意见的同志而人为地蓄意制造出来的虚假案件,如所谓"延安派"案件等,其结果导致所有当年曾在朝鲜舍生忘死斗争过的共产党组织被定性为各种名称的派别集团,其中包括:"火曜派"(对日战争初期在上海活动的朝鲜共产党组织)、马列派(在南朝鲜活动的共产主义组织)、北方派、共产主义派、咸南派,等等。

从苏联回国的朝鲜族共产党员被称作宗派集团,从中国回国的朝鲜族共产党员被称作"延安派"。

总之,只有曾由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和"祖国光复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派别,并构成了我们党的基础。

我们是否能够同意类似上述的判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的结论是:所有与金日成有关的革命者都应给自己打上派别主义者的标签。我认为,这一问题应当按照原则性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有必要将诚实的共产党员与真正的宗派主义者区分开来,以便根据党的原则对他们的革命功绩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朝鲜这种无法保证党内民主、共产党员的权利遭到践踏和个别党员可以为所欲为等条件下,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意见和愿望虽然也在那些阿谀奉承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后者表面性地接受了这些愿望,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些愿望付诸实现。

众所周知,在有一系列兄弟党代表参加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及其拥护者声称,在劳动党内部并不存在普遍的个人崇拜。

可是,在8月中央全会上他们又承认说,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活动中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禁要发问:难道这不是在欺骗党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而在全会上又那样说。如此这般,还让人如何能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

在8月中央全会上为了压制多数共产党员的不满情绪,他们被迫在中央决议中写下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公开在全党面前所说的一些话。下面在自己所写的信中,我不妨重复他

们在8月中央全会决议中所写的一段文字，以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党的欺骗。

“正如我们党中央3月中央全会(指全党听取了关于苏共二十大报告的那一次中央全会)所承认的，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队伍中有了一定的小范围的普及。这主要反映在我们党的思想工作方面，即过分地吹捧一个人。不过，个人崇拜并不能对中央始终坚守的党的最高领导原则　　集体领导原则，劳动党的路线和政策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被写入我们党中央8月中央全会决议中的那一段文字。

根据上述决议得出的结论，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据普遍意义，因而个人崇拜的后果也就不存在。这样，在表面上承认存在个人崇拜之后，实际上却拒绝清除其后果。

我们在上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事实，已完全可以证明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兄弟党，而其对我党活动的影响也是尤其深刻的。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不顾威胁和恐吓而敢于在8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是反党的，旨在“推翻”党和政府以及组建反党集团呢？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在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性决议和兄弟党所采取的清除个人崇拜这一举措的推动下进行的，目的只是为了克服个人崇拜对我们党队伍的恶劣影响。

金日成的拥护者们用自己的粗暴的专横践踏了列宁的党内生活基本原则——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我们是否能容忍类似专横做法在我们党内存在呢?

下面我们将尝试展示个人崇拜对我党活动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三、关于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

阿谀奉承者断言，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我们党并未受到其影响。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我下面将举几个实例，以证明个人崇拜对党章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背。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违反党章规定、不经党代会的批准便让某人进入中央、而随后该同志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的情形，虽然他并不曾是中央候补委员。

这里我仅举一个实例。其实这个例子对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

所有朝鲜人都知道崔庸健是民主党中央主席。但他继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不久又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在朝鲜目前仍处于分裂状态和我们党正在推行所有爱国力量统一战线政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将该同志选为中央委员。而所有这些非法的决定都是根据手中掌握了一切权力的金日成同志的建议和在他的坚持下被通过的。所有共产党员在递交的报告中均指出，类似这样的决定违反了党章的相关规定。上述决定的通过并非由于我们的中央委员们无知，而是因为我们党已完全被金日成的压制和专横氛围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政治局委员、副首相内阁相和各道内阁相都是根据金日成的意愿任命的和免职的。因而甚至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被迫终日在恐惧和不自信的环境中工作。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断定说我们党内并不存在个人崇拜的影响吗?

我们在这里是无法完整地列举违反国家宪法相关规定的事实的。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列举一个事实。

目前绝大多数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可是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人民委员会主席只能由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担任。对于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而言，经中央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大会只是某种“民主的装饰品”。据他们声称，中央委员依照党章积极参与党的工作并监督党的组织机关的活动或人民代表——最高人民大会代表根据宪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等等。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一派胡言。

在第三次党代会期间，代表们的发言稿都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后者可以不经作者允许擅自对文章进行删改。当年曾为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朴昌玉曾打算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但当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之后，便取消了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这样干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公正的做法呢？

如果准备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人，其发言稿都是别人代写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央委员和代表只能说“需要”的话，那这样的发言还有什么创造积极性可言。甚至有人的发言稿是自己写的，可该稿件都要事先经过中央工作人员的仔细审查和修改。经常会听到有同志这样的半开玩笑式地抱怨自己总是在扮演代表的角色。

在党内民主的基本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任何违背领导同志观点的发言都被认为是派别活动和“反国家”罪。这里哪还有普通共产党员的创造积极性可言？难道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还可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过去在党的机关领导会议上只有领导者一人说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只是听，然后表示支持。

苏共二十大以后当开始强调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原则时，金日成同志曾说：“集体领导没办法搞，因为总是没有人发言。”而实际情况是又有谁敢对金日成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反对性的建议呢？每个人都清楚，在经过这样的批评性发言之后，自己将很难保住目前所担任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同志自然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高那么一筹，只有自己有主见并日益自高自大起来。

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同志开始断言，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便可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可是，在无法确保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即使形式性地开上几千次会也是无法表明党是真正处于集体领导之下的。

朝鲜的个人崇拜还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破坏，其结果是数千人遭到了非法逮捕和囚禁。目前在朝鲜监狱中关押的各类犯人超过 3 万人。其中仅军人被逮捕者便超过一个师的编制。还有 8 000 人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被控犯有各种罪行，而依照该法相关规定很多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除了上述被逮捕的人外，还有约 1 万人被控犯有其他罪行。如果将北朝鲜的人口总量(900 万人)与被指控的人数相比，我们便可得出：朝鲜每 300 人中便有一个人犯了罪。难道这个事实还不具有代表性吗？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以便我们来进一步看清所谓的这些“反革命”都是些什么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全会开幕前夕，一些不久前被开除党籍的人共计 2 000 人被解除了监禁。

这些人中包括有这样的犯人，即由于用印有金日成肖像的杂志做了包书皮而被判5年监禁。还存在这样的情形：有一个诚实的同志出于良好的动机用铅笔对没有画好的金日成肖像作了修改便被判剥夺人身自由5年。难道这一案件不让人感到气愤吗？

上述案件无论如何都不应属于常规刑事案件的追究范围之列。我列举的上述所有事实都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并在与一位负责领导干部的会谈中向司法省副相作了汇报(关于这个问题，金枓奉同志向司法省副相金京根(Ким Тды Ген)作了报告)。金日成曾发布了一个指令，根据该指令，如果有两位证人便足以给某人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不关注案件的性质和证人供词的可信度。可是，如果从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立场来看，难道可以说金日成所发布的上述指令是正确的吗？

在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我们难道还可以再相信金日成、金昌满、朴金喆、韩相斗和李一卿等人所说的关于朝鲜劳动党内并不存在个人崇拜影响的话吗？

这里，我不能不再举一个令人感到愤慨的违法乱纪的事实。

1954—1955年粮食采购期间，当局使用威胁强制手段剥夺农民的粮食。一个被剥夺了最后一粒粮食的农民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便来到乡人民委员会。那里挂着一幅金日成的肖像。这位农民用手指着肖像大声喊道："您不了解人民的状况，只知道折磨人。"但正是因此，该农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被判处剥夺人身自由7年。在经过此事之后，我们如何可以说自己遵守了社会主义法制呢？现在所有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了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相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的朴一禹同志为何遭到了镇压。他的所有"犯罪"活动都归结为一点，即他敢于在关于实物税和党对反革命的政策等问题上反对金日成。他说，在对待反革命的问题上，如果没有经过调查分析便不应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可是正是因此，他便被开除了党籍，并被指控参加了反党集团。但有关部门通过对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仔细的核查，却无法证明其犯有反党罪行。于是便有人伪造了关于他侵占国家财物的案件，如今该同志便因此受到追究。相关部门还根据所谓该同志企图攫取内阁首相职务的传闻，针对他准备提出新的司法案件审理程序。他的家属也遭到镇压，被迫从平壤迁往一个煤矿区。战前和战争期间，朴一禹同志曾担任金日成的得力助手。1950年当我军撤退期间，我被迫与金日成和朴一禹等同志一起后撤。在途中休息时，我们曾一起午餐和交谈。当时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可如今当朴一禹同志向金日成提出批评意见时，却被立刻逮捕，并投入原归他领导的机关所设的监狱。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朝鲜当局是如何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又作如何解释呢？

依照我们当代历史书籍中所写，只是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祖国光复会"的活动构成了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朝鲜还未出现金日成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以前便已产生了抗日武装。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朝鲜的工人、农民和大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农民发动的三·一运动浪潮——在潭州(Танчон)、汶州(Менчон)、安澜(Елын)、万源(Хвонвон)、涂州(Тукчон)等爆发的起义——尚未结束之时，工人的罢工运动(分布在元山、兴南、汉城、平壤等地)又蓬勃兴起，并成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

成长壮大的标志。

众所周知,上述这些运动均与金日成的名字无关。至于武装斗争,则是在"正义军"和"独立军"运动之后在中国东北兴起的。这些武装斗争都是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开始的,而武装反日斗争的主体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朝鲜游击运动领导人才逐渐成长起来。

金日成的名字以后之所以比较有名气,原因在于他所领导的部队与朝鲜联系密切。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如果把这一斗争运动仅仅与金日成一人的名字相提并论,就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从而也就歪曲了事物的历史本来面目。

大家都很清楚,截至1940年,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当从革命者的原则性立场出发对整个运动以及整个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在指出这场运动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还应强调其不足和缺陷。

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其中之一便是截至1940年朝鲜游击队的作战行动实际上便停止了。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导致无法继续从事这场斗争的客观因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占领了中国东北,从广大战线上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准备发动针对苏联的更大战争。为了"巩固"后方,日本帝国主义者便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从而对朝鲜游击队的存在构成了威胁。所有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否认。

但与此同时却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当时的游击队领导人是否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利用了一切可能以加强和开展游击运动呢。我个人认为,其并未充分利用这方面的可能性。

要探究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就需要了解为何截至1940年游击队的作战行动都停止了,以及游击队的组织本身和该运动的领导等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的东北地区不同,那里没有高山和森林地带,因而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条件理应更为困难,可即使这样,中国同志仍是坚持了下来,并与日本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当时为何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却停止了活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这样的,即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运动没有建立与群众运动的紧密联系,其游击队运动没有在人民中扎下深刻的根基。而与此相反,中国的游击队运动由于与人民联系密切,因而得到了后者的支持。

于是,当中国东北地区的爱国力量仍继续展开地下斗争之时,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却停止了活动。

不过,当时仍有很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地下斗争直到解放。

从1942年起,我便根据党的指示在中国东北工作。其他在朝鲜参加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朝鲜存在有地下党组织。

我们绝不应歪曲历史。为此,我们便有必要简要地研究一下在保青浦(Почонбо)地区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以及祖国光复会的活动。因为这些事件和事实的经过都在朴金喆、韩相斗、

李一卿、何安权(Ха Ан Чен)和李天源(Ли Чен Вон)等的描述中被蓄意篡改了。

在保青浦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实际是游击队发动的攻击警察分局的战斗，结果是3名警察被打死。从事实来看，这不过是游击队与警察部队所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接触战。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撤退时又打死了10名日本士兵。可是，正是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却被上述历史伪造者们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在朝鲜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虽然我们不应否认朝鲜游击队发动的这场奇袭战的所有政治意义，但却不敢苟同上述伪造者们对这场战斗所作出的评价，因为我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的。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一点，即有人是想刻意吹嘘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功绩并企图人为地创造金日成的个人历史。

这里，我们还可以用平壤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中的资料来作为例证。

根据这里的资料，似乎所有朝鲜东北和中国东北地区都是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的作战区域。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关于“祖国光复会”再说几句。以往说法的问题在于，该协会似乎在朝鲜革命中发挥了全面的领导作用，而这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该协会的纲领通常被称作金日成的纲领性原则。可历史事实表明，协会的纲领是以共产国际关于人民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以及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为基础编制的。这样，又怎么可以说这些文件的缔造者是金日成同志呢？

由此可以断定，有关这方面的历史都是被篡改了的。金日成的拥护者们企图把历史描绘成这样，即似乎“祖国光复会”在朝鲜各地都拥有自己的地方组织。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谁不知道，参加该协会的革命者人数很少呢？而按照那些金日成的拥护者所说，那么该协会所团结的革命者咋会有上万人之多。可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数字明显是被夸大了。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真正按照该协会的指示在农村和郡城开展活动的人数最多不超过100人。

在朝鲜真实的革命运动史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能够将上万名革命者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组织。另外我们还应考虑到，在当时地下斗争条件下，革命组织的任务并非仅仅是扩大自己的成员人数，而且还包括提高组织的战斗力。

每一个希望阐述关于“祖国光复会”问题的历史学家，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从这样一些问题入手，例如该协会存在的时间、人数，开展了哪些活动及其持续的时间，等等。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历史学家才可能对该协会的活动给予应有的评价。在提起这些与朝鲜人民民主解放斗争史有关的问题时，我们认为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游击运动理应成为朝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然而，如果我们把金日成同志所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的全部，那就有失水准了。在谈到关于朝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人所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这些朝鲜军队不仅与日本人

英勇作战,而且还参加了反对蒋介石和美国侵略者的斗争。在这些朝鲜人中最后共有5个师参加了朝鲜战争,更别说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在朝鲜和中国各重要岗位上坚持斗争的同志。

关于来自中国的朝鲜师军人的英雄事迹,这是所有朝鲜人民都很清楚的。有这样一些证明材料:上述5个师中的几乎所有指挥员都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国家最高勋章,更不用说那些集团军指挥员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国家奖励。然而,在战后这些当年功名显赫的军人中只有少量人留在了人民军中。即使有人留下来,也只是担任一些并非重要的职务。

对于篡改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歪曲众多在朝鲜本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的历史的做法,我们怎么能承认其正确性呢?要知道,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巩固党的组织的统一,而且只能起到涣散和削弱党组织的作用。为了蓄意突出金日成个人,他的阿谀奉承者们建立了所谓长白山开山战役展示图,根据该图所示:金日成的游击队和"祖国光复会"在北朝鲜地区积极开展活动。而在参加"祖国光复会"的人中,竟包括了那些根本与它没有任何关系的同志。

一场发生在开山附近的只具有地方意义的小规模战斗,却被说成是具有全朝鲜意义的重大事件。由此导致一些同志瞬间便被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原因只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关于长白山开山战役的显示板上。

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关于国家领导人有意篡改历史的事。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不支持,而且表示无比的憎恶。

在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我曾专门去看了一下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博物馆。在参观期间我问博物馆馆长:"是谁编制了长白山开山战役的显示图,而金日成同志本人是否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东西?"馆长答,该图是由中央编制的,至于金日成同志,前不久还亲自参观了博物馆,并对馆中的展品和资料表示满意。当我听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气愤。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该显示图被从博物馆的墙上拆除了。

如此不知羞耻地伪造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其中原因自然要问这样一些人:如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朴金喆、中央组织部部长韩相斗、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卿、中央社科部部长何安权和李天源等同志,因为正是他们有计划地歪曲了我们的历史。

我建议,由一些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组建一个权威性的委员会,以便从科学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恢复我党真实的解放斗争的历史。

由于受到个人崇拜的控制,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均被取消,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泛滥,进而导致我们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问题上都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下面我将举几个实例。

近两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而关于以前所犯错误,这里暂且不提。让我们以粮食采购问题为例。由于缺乏应有的科学统计和对各地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导致我们编制了官僚主义式的粮食采购计划,并犯了严重错误。强制性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的结果是300名农民自杀。而这一结果在我国农民中又引起了何等巨大的反响啊!

这难道不是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吗？而在这场错误的运动中，当局曾预计要采购300万吨粮食。

在这场历时两个月的事件之后，金日成同志曾自夸式地向一位外国同志宣布，我们已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了。

可任何一个对政治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化肥、劳动力严重匮乏和播种面积缩减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收获相当于战前最高收获量的300万吨粮食的。再加上这一年朝鲜北部省份和咸镜南部均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地农民几乎颗粒无收。

在忽视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同时，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当局发动了强制性的粮食采购运动。情况不久便清楚了，农民坚决抵制这一采购运动。他们使用了各种抗拒方式：自杀，散发号召抵制采购运动的传单，等等。尽管这样，强制粮食采购运动仍在继续，结果共收购粮食2万吨。这场粮食采购运动的结局是：导致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粮种都被剥夺了；农民所饲养的家畜也由于缺乏饲料而大量死亡。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这场令人发指的运动中有"功"，那些金日成的阿谀奉承者们仍继续进行这场反人民的强制采购运动。

而当政府已了解到此事的性质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又开始被迫从国家储备中向农民发放救济粮。那么，究竟应如何对类似这样的事件进行评价呢？应当承认，这些举措直接破坏了我们制度的根本基础——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

其结果是：许多农民家庭已濒临饥饿的边缘。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农民提供了帮助。每个志愿军战士将自己每天节约下来的口粮集中起来去帮助朝鲜农民。关于中国志愿军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举动，朝鲜人民永远也不会遗忘。

我们知道，正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志愿军总部向部队发出命令，要求每个部队的指挥员在朝鲜农民饥寒交迫之际要承担所驻防地区的救济工作。可是，即使在如此悲惨的时刻，我们党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继续断言说："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歪曲了我们的正确路线。"

因此那些在地方执行了这一错误指示的工作人员就必须承担本应由党来承担的责任。在停战委员会工作期间，我曾对开城地区农民的生活困难情况有所了解。我对这一地区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调查。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和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结算了饮食和实物税之后，农民手中所剩余的商品粮仅占所收获粮食的0.5%。

根据这些数据性资料，我作了一个大致的推算，结果表明：在粮食采购过程中，朝鲜农民只能交纳15万吨粮食(而不是国家计划预计的300万吨粮食)。

关于农民的困难情况，我亲自向金日成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意见，即如果要在开城地区推行粮食采购运动，那么只能采取强制方式才可能保证这一运动的实施。另外我补充道，在新解放地区强制实施粮食采购运动将极大削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我的意见得到了金日成的赞同，因而在开城地区未推行粮食采购运动。粮食采购是否可以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即使如此，金日成同志及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仍继续断言，"这一政策本身是正确的"。

尽管在这方面已存在有十分明显的事实,可金日成同志从未就这一问题作过自我批评。他依然忽视党和国家的利益,以便证明身为共产党员的自己总是比所有人都站得高、看得远,因而不应受到党内的批评。

前不久,我曾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省副相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年中农民究竟有多少天需要无偿地服徭役?"他答,农民每年平均需服役50—60天。而今年他们将需服役40多天。如果根据这一数据来推算,那么就可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每星期需要服徭役一次。这都是战争刚刚结束后朝鲜农民的服役情况。至于现在一些朝鲜领导干部所说,如今的农民都是自愿去服这些徭役的。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这里,我还想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国家的税务政策。在没有经过周密准备和对国内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国家便实施了旨在消灭私有贸易和工业企业的税务政策。难道在国内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情况下,人民和国家的日子会比从前好起来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国家仍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样的政策只能在全面深入地对所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实施。由于这样的决策并不符合国内的实际状况,因此在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内阁被迫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在公开与上述类似的事实时,我绝对不是想将我们所推行的政策定性为左倾主义。这里我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即我们政府所通过的一切决策都应当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在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再将政府的决定付诸实践。上述事实表明,这些决策都是经金日成个人提出并由少数几个领导人同意便通过和实施的。而这些决策本来是应当经中央政治局和内阁会议讨论后才可获得通过的。

不过,由于整天处于为自己的命运而提心吊胆的环境中,谁又敢在此类会议上以自己的意见来对抗金日成呢?

所有这一切悲剧性的结果都与党内的个人崇拜、阿谀奉承和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密切相关。在这种恐惧和无条件服从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这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呢?

个人崇拜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之后,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无偿给予朝鲜人民1亿卢布援助的决议。于是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朝鲜领导人在没有与专家进行应有的商议的情形下便以在内阁所作出的主观判断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建设和重建一系列工厂和工场的决定。根据金日成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者的倡议,国家计划建设汽车厂、平壤肉联厂和罐头厂等多个大型企业。当然,上述工厂对朝鲜而言也是需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大家都知道,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计划。

所有人都清楚,目前在朝鲜工业部门欠发达。如果要建设汽车工业,就必须为该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否则超前性地建设此类工厂就只能是白白耗费劳动力。而在这种条件下建成的工厂则可能长期无法生产产品。因而在建设此类工厂时就首先要考虑此类产品的成本,如果其产品成本根本不适合我们的经济需要,那么这种建设是否还应当进行呢?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关部门计划在朝鲜兴建肉联厂和罐头厂，等等。然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在朝鲜畜牧业不发达的条件下便投建上述工厂也只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结果，在平壤修建的肉联厂根本无法保证生产所需的原料，一个月的生产都无法维持，因为整个朝鲜也没有如此数量的肉。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市场上每公斤肉价格为400 500元，而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00—1 000元。由此可以推算出该肉联厂所生产的香肠肉制品的价格应达到多少钱1公斤。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国家领导者欠思考的、没有认真考虑国内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国家的客观实际而做出的决策将对国民经济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啊！

上述事实也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崇拜的恶果，在个人崇拜的控制下党内民主缺失，进而促使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泛滥。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怎么还能否认个人崇拜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存在呢？

所有人都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连续三年的由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残酷战争摧毁了国家的大部分工业，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创。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关心得不够。这里，已不必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公务人员在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所经受的巨大困难。但我们知道，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返回祖国之后，正如苏共中央向我们党所提出的愿望那样，我们国家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努力。

在住宅问题上我们也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关于这方面我们已说得够多了。如相当多的居民仍住板棚、仓库和地窖等根本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企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如下：平均每个3人家庭只拥有住房面积7.5平方米，换言之每人平均2.5平方米。至于居民的物质供应状况，我不得不指出，目前朝鲜每人平均只拥有5.4米布，每年2.1双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急需我们去解决的。因为在目前国家处于分裂的状况下，这些问题均具有特别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此，苏共中央就这方面问题而提出的意见和愿望都完全是正确和必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尽快地落实和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绝不是想贬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重工业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首先重视重工业，但在解决这一问题之时，我们还必须理性地看待其实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重工业建设领域，从而破坏了各工业部门的按比例协调发展。金日成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说，我们将有计划地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可这些都只是纸上谈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家在轻、重工业部门的资金和工人等的数量投入情况，便会清楚地发现其比例分配上的严重失调。

按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应参考以下情况：朝鲜经济是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须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建立了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联系。这使得我们自己的经济计划有可能与其他国家的计划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看来，我们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所坚持的所谓“独立的”立场是否正确就很值得商榷。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从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出发来加以解决。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不重视兄弟共产党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有参考价值的意见。苏共中央曾通过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等同志及时向我们党提出了同志式的批评性意见。这些意见和愿望均涉及关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关于克服我们党内对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崇拜,关于清除阿谀奉承和一心追求名利者以及关于我们党的历史和党的宣传等一系列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论证这些问题的严重危害了。只有迅速地清除在我们党工作中存在的所有上述不足,才有利于巩固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加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只是形式性地接受了苏共的这些意见,而实际上却对之抱忽视态度。

据我所知,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对我们党提出过自己的愿望。可这些有价值的愿望却被人以党的机密为借口完全隐藏了起来,并未落实到实际。或者关于此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整个党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当战争刚刚爆发之时,我根据金日成同志的指示去了北京,并与毛泽东同志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其间,毛泽东同志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一些有价值的愿望。

我认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有责任把这一事实向中央作汇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我们人民军已将敌人驱逐到了洛东江一线。一切似乎都表明,我们胜利的日子只有几天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同志就朝鲜人民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谈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我向他通报了我军前线的整个作战形势之后,他说了如下一些话:首先,他强调,朝鲜人民所要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对此我们时刻都要牢记。关于朝鲜军事行动的前景他谈了三种可能性。在谈话期间,他问我,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是否会同意让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撤退?

其一,朝鲜人民军有可能将侵略者从釜山港赶下海,并彻底解放整个朝鲜,但这种可能性非常有限。

其二,毛泽东同志说的意思是:敌人可能集中强大力量在釜山地区实施大反攻。

其三,他说,在人民军后方存在敌人实施直接登陆作战的威胁。这样,与继续在釜山港实施进攻的同时,敌人会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以便包围人民军部队。对此,他指出,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应建立在最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全党进行相应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同志具体地谈了希望我们在以下方面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所有党的领导人、军官和士兵在思想上都要牢记可能实施战略性撤退的情况。

为此,毛泽东说,就需要朝鲜劳动党正确地、全面地向人民群众解释可能存在的危险。

在现有条件下,当人民军部队已实在无法在洛东江地区向前推进之时,就必须实施战略后撤,以便造成敌人在前进时力量的分散。要知道,打击握紧的拳头,总比打击张开的拳头要难,因为当出现后一种情况时,我们便可以对其每个指头实施打击。面对敌人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就像一个拳头时,那我们的打击就很难奏效。如果敌人张开了自己的拳头,即分散了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对每一部分敌人实施攻击也就要容易得多。毛泽东继续道,

我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应当采取这种经过考验的战术。

事隔不久，毛泽东同志的话便应验了。的确，朝鲜的军事行动进程完全符合了他的预测，尤其是关于敌人在仁川采取的作战行动。对此，我国驻中国前大使李周渊也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内容，我均详细地向金日成同志作了汇报。可后者答道，我们不准备实施战略后撤，因为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建议。随后，金日成同志又警告我，不要将这一情况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过，现在我们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的价值所在。

我怀疑，关于这方面事实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是否都是知道的，更别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们了。

在战争进行当中，尤其是在我军后撤期间，我们均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忽视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结果导致我们对战略性撤退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侵略者直接插入我军后方，并立即切断了人民军的交通线。我们的部队陷入敌军重围，丧失了战斗力，并开始溃散。敌人对我军实施了沉重的打击。除来自中国的朝鲜师外，当时朝鲜人民军部队中均没有建立党组织。

而这一点对陷入重围的人民军部队的溃散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为了阻滞敌人的进攻，我们向前线派出了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甚至连军服都没有的师，有些部队甚至没有装备武器。所有这些师都在敌人发动的首轮进攻中便溃散了，大部分伤病员成了敌人的俘虏。这期间被敌人俘虏的人民军战士共计1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被我军俘虏的敌军数量。

导致我军蒙受如此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便是金日成同志不顾前线实际情况独断专行，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愿望。从金日成同志能够如此轻易地、不负责任地否决有威望的兄弟党及其著名活动家的意见和愿望来判断，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遭到镇压的同志为何敢于公开地对金日成提出批评性意见了。

如果能将所有上述问题与那些列宁组织原则的捍卫者和扩大党内民主的拥护者们的原则性立场一起来加以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其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

也正是因此，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对朝鲜劳动党，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我们是否能够允许这种状况——共产党的自身活动与实际背离和拒绝清除党的活动中的严重错误等等继续在我们党内存在呢？当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那些违反列宁的党的生活原则的人，无论是在我们党内，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都必定受到谴责。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始终坚持列宁的党的生活规范、扩大党内民主、坚定不移地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清除国家内部的官僚主义的同时，纠正和清除自身的所有错误和不足。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些遭到镇压的同志予以支持。

为了确保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我坚决反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我坚信，对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共产党员们将赢得我们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同情。鉴此，我提请中央研究我的如下建议：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上述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我请求中央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我的书面声明。

我提出这一建议的依据是我党党章第2节(第2、第3、第5诸条)第3款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我本人,我已准备以一个党员的全部责任感,随时接受同志们对我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当然,如果我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33-295

№2059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10月8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8日

按照金日成事先的邀请拜访了他,并在他的别墅住了几天,这座别墅在平壤市外250公里。

10月8日拜访了金日成,当时南日也在场,我口头向他阐述了葛罗米柯10月5日指示来电的全部内容。

金日成作了如下答复:报纸上刊登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通报的时候,他(金日成)当时不在平壤,这份通报的材料是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准备的。他同米高扬和彭德怀之间没有关于公布这些决议完整文本的特别协议,对于他们关于在报刊上公布这些决议的意见,他(金日成)当时对他们的答复是,常务委员会成员将考虑这些建议。

常务委员会认为不应公布这份决议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承认,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做得过于匆忙,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不公布这个章节将会避免广大群众和北朝鲜的其他政党,特别是避免南朝鲜过度渲染这个决议。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将发送各级党组织进行广泛的讨论,这已经足够了。此外,中央委员会在工作实践中

还没有在报刊公布组织问题决议完整文本的情况，而通常只是简短地通报信息。今后我们将公布党的所有重要决议，然而应当从公布好的决议开始。

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劳动党开展正确的组织工作的转折点，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他当时不在平壤，报纸上没有刊登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那个章节，而这个章节的内容是号召党员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准则。

我提出看法说，这个失误可以弥补，可以在报纸上刊登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金日成回答说，现在就不必要了，何况所有党员将了解这个决议的完整文本。他说，各级党组织马上将对9月中央全会决议展开广泛的讨论，除了这个决议以外，还将向各级党组织分发金日成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然而，常务委员会认为，应该删除他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建议。在金日成看来，删除这些内容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将给党员们留下一种印象，即兄弟共产党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重新审查就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压力。第二，是因为不愿过分渲染中苏共产党代表对朝鲜的这次非正式访问。因此，决议的完整文本可能会被敌人利用而给我们的利益造成损失。

现在，各道党委正在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总结报告。参加道委全体会议的同志严厉谴责了党派集团的活动并要求给予他们严厉的处分。我们也知道一些党员的看法，这些党员不同意9月中央全会关于减轻对这些党派集体分子处分的决定。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可以正确组织工作，来执行9月中央全会决议。金日成答复说，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将贯彻9月中央全会决议并组织相应的解释工作。

我问道，那些出逃到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是否知道9月中央全会决议，这个决议直接涉及了这些人。金日成回答说，中央委员会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的居住地。关于这一点金日成提出建议说，中国同志可以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告诉他们。

我也提出建议说，现在必须巩固劳动党，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党员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将极大地促进对党员的教育工作。

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朝鲜劳动党才存在10年时间，其成员组成有当地的朝鲜人，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同志，也有南方人。因此我们对党员干部的了解不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问题。在提拔干部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推荐，根据侧面材料。最近发生的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在我的坚持下，崔昌益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尽管常务委员会许多成员都反对这一点，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在过去从事的党派活动。然而，我认为，崔昌益将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最近发生的这次事件之前我对徐辉的看法不错，但他受到了崔昌益的强烈影响。我们党内还有许多人不同意中央在个别问题上的决定，比如，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朴勋一，他利用兄弟党代表出席9月中央全会的机会发言攻击个别领导

同志。事情发展的地步是，朴勋一和其他一些人要求免除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郑一龙等同志的领导职务。

参加这次会谈的南日说，在他看来，朴勋一是在没收富农的财产和土地时逃出苏联的。金日成对此回答说，目前知道的只是他在东北参加游击斗争时期之后的情况。

金日成接着说，劳动党以前对出逃到中国的尹公钦的了解不够。现在才知道，他过去曾向日本人签名保证不再从事革命活动。

在党内有一些人，他们有着不光彩的过去，还企图败坏领导人的名声。党同他们作了斗争并且仍在同他们斗争，但是，他们对党的影响众所周知。现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都采取措施来巩固劳动党。前不久关于9月中央全会决议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必须在思想上巩固我们党并加强教育工作的问题。

金日成表示，他对朝鲜劳动党地方权力机构即将进行的选举能够圆满完成充满信心，但是让人担心的只是平壤市的一些居民。金日成说，最近党和政府建议减低商品价格，并且在今后采取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而且，今年的粮食收成不错。

金日成请求我转告米高扬同志，由于上述情况，没有必要公布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86，л. 28－33

№20552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与金日成谈话内容

（1956年10月1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伊万诺夫同志报告，他于今年10月8日就公开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

从伊万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可明显看出，金日成实际上拒绝了关于全文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建议。金日成请伊万诺夫转告米高扬同志关于没有必要全文公开9月中央全会决议，因为该决议将散发各党组织进行讨论。另外朝鲜劳动党领导还认为将全会决议广泛地公之于众也有些不妥当。金日成援引说，似乎自己与米高扬和彭德怀等同志事先并未专门约定要全文公开全会决议。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同志建议让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了解他于10月8日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

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同志的意见很对，并表示同意。

兹附上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稿。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6年10月15日

第25-С-2236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给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电报已发出。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17日

附件：

平壤
苏联大使

678-685 您可以简要地向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介绍一下您10月8日与金日成的会谈情况，期间不要提此举是受莫斯科的委托。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96-297

№23030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

(1956年10月16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呈递给您(我们)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的两

次会谈记录。

1.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 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情况。

П. 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附件一: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会谈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落实情况

(1956年10月5日)

1956年10月5日,苏联记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此次会谈的与会者除苏联记者外,还有现驻北京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负责人和苏联无线电广播工作组成员。会谈伊始,陆定一同志首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宣称在本次会谈期间他主要想讲一个问题,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陆定一同志还事先声明道,他认为此次会谈内容属于内部通报,不宜在报刊上公开。

以下便是陆定一同志的谈话记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工作领域的新方针的问题——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问题是与毛泽东同志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所提出的十点意见紧密相关的。

当前,思想工作问题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在这方面并不具备充足的经验,经常会遇到与思想工作和执行新方针有关的许多问题。如果同志们感兴趣的话,我将谈几个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请大家就今天会谈的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谈最初,陆定一同志简要谈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问题,并强调后者的力量如今已不是很强大。虽然关于此陆定一同志也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比重仍占到约20%,在贸易方面——控制着大部分的商品流转零售网络。

陆定一同志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我们并不可怕。原因在于,如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已是相当的强大,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1 000万,而在1949年时——只有约700万人。在当今的中国已没有一个党派能跟中国共产党在力量上相提并论。以前,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组织,但如今它已被摧毁。中国现存的一些民主党派规模都不大。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军队归中国共产党领导,而非资产阶级各党派。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和我们所执行

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拥有一个好邻居——苏联，后者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原因，虽然不应在报纸上公开，但我们应当指出来，以便大家能够正确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形势。

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对我们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也并不可怕。因此，我们允许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们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我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思想工作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我们不害怕民族资产阶级，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我们极力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以便将之转变为人民中国中的劳动者。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再教育)是否具有可能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有可能。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

1. 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财产，使之成为贫穷阶级；

2. 逐步地改造资产阶级，循序渐进地对之进行改造。

我们认为，可以实行逐步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式。

实行这些教育方式对于正确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其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来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如今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其中多数——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们均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拥有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国家的无产者虽然也拥有一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仍无法满足我们当前的需要。中国农民有知识的很少。地主们虽然也拥有一些知识，但他们的知识往往都不契合实际的需要。

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都拥有广泛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当然，拥有大量知识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能够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目前拥有约600万知识分子，其中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约有100万人。正如你们所看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党派人士，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中国过去是一个殖民地和封建国家，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怀有爱国情结，并参与过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当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发表的反对殖民压迫的言论会得到先进的革命工人的支持——这都不是偶然的。

针对知识分子，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侧重以下两个方面：

1. 思想改造；

2. 建立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一个统战部。起初，一些同志曾对该部抱有轻视态度，认为该部的领导干部与资本家交往过密。而如今，他们已深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建立统战部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党很早便开始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认为，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理解了资产阶级，理解了知识分子；我们详细地了解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阶层主要活动家的人生经历，细致地研究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

思想。因此,我们知道,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所有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之发生关系便无法生存。因而他们与国民党联系紧密,甚至许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知道,几乎所有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年都坚持过反动观点,许多人还反对过共产党,与劳动者的革命斗争作对过。

在了解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著名代表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他们当年反对共产党的言行的同时,我们党采取了吸引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著名代表参与国家领导机关的工作的方针。众所周知,李济深便在我们的政府里工作。他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党的八大上作了祝辞。他的这一发言受到了大会热烈的欢迎。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晓得,李济深曾在1927年4月参加了广州镇压共产党和革命工人的活动,是当时白色恐怖的积极参与者。1927年,他组织杀害了多名共产党人,而如今他也参加了政府的管理。这并不是偶然的。1927年以后,他脱离了蒋介石,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前,他曾是一名著名的反革命者,而后来他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立场,并开始支持共产党。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他彻底转到了我们一边。有这样的民主人士在人民政府里工作,当知道李济深也是政府组成中的一员之时,其他民主人士便不会害怕我们——共产党,这将有助于我们开展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中很少有资本家逃到国外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国家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开展建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非常重视针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北京刚一解放,我们便开始大规模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以之为依据来解释所有社会财富都由劳动人民创造而来的原理。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从1953年起,我们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而此前,我们已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和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公安部长罗瑞卿已在党的八大上作过详细的介绍。应当说,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有70万人,230万人被监押或处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和强大威力。

我们在反抗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动中所赢得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胜利打消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特别强大的迷信。以前,他们都相信美帝国主义拥有特别强大的实力,可如今这一信念被打破了。这(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的美国已不复存在。此前,所有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对我们是否能够在与美国的冲突中获胜持怀疑态度,可如今残酷的事实表明,他们失算了。我们在朝鲜赢得反对美国侵略斗争的胜利。

甚至在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开展思想改造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将自己的主要打击目标瞄准那些以前曾与反革命分子保持了极其密切关系的人,而不是那些拥有不良思想者。我

们首先对那些赞成与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保持联系的人施压。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使这部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们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在西安一所大学工作的教授——张东荪。他年龄有60多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该教授经常发表虚伪的民主言论。可实际上他是个美国间谍。他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广泛尊重，自以为自己是位专业的哲学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观点，宣扬直觉主义哲学。他一度参加了最高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可是，随后他被群众揭发：向美国情报机关传递国家重大机密。因此，他被清除出国家领导机关，但与此同时，该教授并没有被逮捕。他依然是大学里的教授，但由于他的犯罪活动被揭露，大学生们都不愿意上他的课。起先，他还有四个学生，随后剩了两个，直到最后他连一个学生都没有了。但国家仍继续给他发薪水。我们不会枪毙他的，也不会让他蹲监狱。因为他现在已没有危险了，他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类似例子我们还可以举许多。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我们还在学者和各高校中以向苏联学习为口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于是，人们开始了大量研究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各高校工作的活动；开始输入大量(苏联)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为了扩大高等教育和培养国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骨干，我们在高校改组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间一些高校得到加强，新建了一批高校，还有一些被停办。

只有在前几次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等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才可能得以成功开展。否则，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便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因为知识分子可能会起来反抗。

随后，我们又开展了反对胡风和胡适的运动，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虽然是一场在思想领域开展的运动。但我们的主攻目标是一些政治反动分子。胡适——反动学者、思想家，现居住在美国。他宣扬实用主义。其学说曾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教育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被揭露的还有另一位反动思想鼓吹家——胡风。此人为资产阶级学者，自1932年起以左派言论为掩护开始活动。这一时期，他精心掩盖自己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近期，我们找到了他在国民党开始向共产党疯狂进攻时期所写的近10篇反动文章。如今可以确定的是，胡风的这些文章帮助了这些反动活动，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辩护。

胡风在留居日本时曾钻入日本共产党队伍。随后经确认，由于他的挑拨离间活动，因而遭到了日本共产党一位积极活动家的枪击。

稍后，从日本返回中国之后，胡风整天围着鲁迅转，极力试图利用鲁迅的名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风一直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最近，他仍在从事破坏活动，并在中国许多地区拥有自己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反对党的政策，而胡风本人也一贯以文学辩论为掩护进行着(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斗争)。他撰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近30万字)，以反对党的政策。我们的一些同志曾认为，不应当公开胡风的这篇文章，但我们决定采用另一种做法。对此，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要改造资产阶级，后者就会反抗我们。而上述胡风的文章便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表

现之一。我们决定把他的这篇文章发行7万册。我们认为,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表胡风的这篇文章,已是我们赢得这场运动胜利的一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就无法批判他的观点,我们也就不可能取信于人,有人就会说我们是宗派主义者,说我们害怕向其他人提供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发表胡风的这篇文章,只会有助于在大量的知识分子中间加强胡风的立场。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决定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表胡风这篇文章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揭露其反动观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胡风组织的参与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对该组织中胡风的最亲密助手之一施加了影响。经过我们做工作,此人开始揭露胡风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我们公开了所有这些揭露胡风犯罪活动的资料。此后,我们逮捕了胡风及其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活动的走卒。我们还在报刊上公开了三个资料选集,彻底揭露了胡风的嘴脸。

揭露公开的反革命的运动取得了重大的结果。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大量的社会组织都参加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的范围包括500万在中央和省的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经过运动之后,在这500万人中共发现了约1%的公开反革命分子或异己分子。

我前面已经指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详细谈了关于肃清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运动)的问题。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广大群众参与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我们的居民中拥有不同的阶层,其中也包括一些落后的群众。有时,这些落后群众却知道许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了解一些先进阶层不了解的、关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在对待这些落后群众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曾犯过一些错误——采取过压制的手段。初看起来,这些落后阶层与反革命分子很相似:他们对社会不满,有时说起话来跟反革命分子一个样。但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是落后,而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虽然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个人经历),但在统一战线的帮助下,我们还是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并参加了反对反革命和争取再教育的斗争运动。这场斗争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虽然其间可能难免犯有个别错误和不足。可以说,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知识分子,并与此相应大致明确了今后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工作的途径。以上简要叙述便是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方针呢?这一方针又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在开展了各种前期的运动之后,(国内)开始出现宗派主义倾向的苗头。许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自认为自己已是非常强大了,可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他们而言,这种自高自大的情绪才是极其有害和极其危险的。

列宁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及其在共青团三大的讲话等中都谈到关于不容许自高自大,关于必须正确地利用知识分子,关于唯物主义者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论断。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领导。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就会手中拿一根大棒来敲打非马克思主义者们。这种领导方法无疑是错误的。还有另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把所有唯物主义者和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团结起来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而针对其他唯心主义-爱国者则通过以改造为目的的批评方式，而不是镇压。上述方式也适用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工作。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在反对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时，动辄便手里拿一根大棒，那就不太好。更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应使所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以及那些是爱国者但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得到好处。我们在这些人中开展批评工作，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种批评方式在我们党内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都知道郭沫若。众所周知，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许多著作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其中很多作品均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性质。我们当然不应当镇压郭沫若，而应当尽量亲近他，并与之一道以团结所有知识分子先进力量的精神去开展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也适用于其他大艺术家们。我们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叫齐白石，还有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叫梅兰芳。他们现在都拥护社会主义，但仍不是社会主义者。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郭沫若在科学院和文学创作领域承担着大量的工作。梅兰芳——中国的无价之宝，著名的艺术家。我们绝不应对这些人实施镇压的手段。

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在为团结社会所有力量而斗争的同时，我们党和人民还应当从事针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的斗争。而宗派主义的表现则是对这些人实施镇压和打击。

我们的许多同志由于胜利而变得骄傲起来，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并开始攻击其他人。在我们许多部门都出现了此类宗派主义的苗头。例如，一些人曾说，中医是封建主义的医学。但他们遗忘了一点，即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正是借助于这种医术治好了许多疾病。我们中国的多数医生都是在利用中医在看病，而对西医知之甚少，或很少使用西医。的确，我们的许多(懂中医的)医生还不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自己的医疗做出正确的解释，但了解现代西医的医生们的责任便是帮助搞清楚这一点。在中国还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中国医生不学自己的中医，而苏联一些学者和医生却开始努力研究中医并广泛运用于实践。这时，我们学习西医的医生们才开始广泛地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再比如，针灸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可我们学习西医的医生们已停止使用针灸治病并称之为一种落后的、卑俗的、低级的治疗方法。可实际上，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最好的治病方式之一，虽然它并不能医治所有疾病。

我再举一个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例子。一些自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人有时会用大棒来对付其他不同意其观点的人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电影艺术仍相当落后。其主要原因在于，该艺术的领导者都是些持宗派主义观点的人。比如，他们认为银幕上只能出现工、农、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由于我们赢得了许多胜利和成就，宗派主义者们便常常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而也就变得更加自高自大了。但宗派主义者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

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承诺给予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自由，但这是一种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如果要更精确地翻译这一方针，大概应当是这样："让百花一齐开放。"但在这一百朵花中也会有一些不好的花。比如胡风便是朵坏花，因此我们不允许他完全开放。该方针的另一句更精确的翻译是："让所有学者争论。"意思就是说："让百位学者争论。"胡适是一个坏的反动学者，我们当然也不允许他参与这场争论。

胡风和胡适不是普通的坏人，而是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那么我们将给予他们言论的自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何要给予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呢？因为那些发表不正确观点的人们并不是反革命，因而他们的言论对我们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1. 可以教育群众；

2. 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们正在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往往带有表面性。因为我们的人对这样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康德、杜威、罗素等——的学问了解得不够。而为了顺利地开展这场斗争，就必须研究唯心主义。否则，便无法真正地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我们已摧毁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此学习唯心主义并不会对我们的制度和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当然，在学习黑格尔和康德的过程中，我们中间也可能会出现此类观点的拥护者。但也要看到，每出现一个此类唯心主义观点的拥护者，我们中间就会同时涌现出十个已成功武装起来并能够与唯心主义者战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些非常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能够更成功地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只局限于高喊一些一般性的口号。

我们并不害怕唯心主义哲学，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拥有强大的共产党，我们拥有稳固的、得到了群众拥护的人民政权，我们拥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还拥有苏联的强有力支持。

学习唯心主义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危害，而且会带来好处。我们将能够更加成功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运用它去从事反对异己思想的斗争。这对我们从事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在自己数十年的历史上，我们党被迫与陈独秀、王明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执行着非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主观主义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斗争。即使至今，此类人仍有不少。所有这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实质上都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不害怕公开的唯心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与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的唯心主义者展开斗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会有益于我们的建设事业。当年在为摧毁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革命时期，我们曾采用过一些方法。如今当我们已步入另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应采用其他一些工作方式。如今的中国已赢得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封建主义已被消灭，并正实施一系列改造资本主义的重大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工作也应相应采用其他一些方式。

为了文学和艺术的顺利发展，我们应当实现多样化的目标。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的舞台上可以而且应当排演出最丰富的、各种不同题目的戏剧。(而事实上)在这方

面我们目前已大大落后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应在思想和科学方面具备更多的知识，而不能忽视马列主义——这一最先进理论的学习；与此同时还应当更多、更深入地研究思想问题。当前，相对一些旧知识分子而言，我们的许多共产党员书读得比较少，还无法在所有思想斗争和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复杂问题中达到能够很清晰地辨明方向的程度。这正是为何我们认为应当让那些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们有机会继续在高校中执教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人所教的学生——大学生中有人能站出来驳斥他们。如今，我们在一系列自己的高校中都安排了唯心主义哲学课，因为这对我们并没有威胁。例如，还在童年时我便学过儒学。可是，我最后并没有信仰这一思想，而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而与此同时，我也能够以所学到的大量知识来驳斥儒家学说。在旧社会，我们没有机会去大学深入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如今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了我们的最高理论。在涉及关于唯心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问题时，应当说，我们并不想让唯心主义者立刻便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言论或拥有许多的大学生。

在我们的北京大学有一位罗素的学生。我们决定允许他上课，并在课堂上讲述罗素的观点。在其课堂听课的人员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兼教师，以便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判断：即如何能够更好地组织以罗素观点为内容的课的讲授工作以及其中哪些内容是大学生们需要了解的，而哪些是需要我们予以驳斥和批判的。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即应当把罗素的主要著作都译成中文，以便能够编制关于如何授课的教学大纲。只有在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之后才可以开始讲课，而且听课的学生只能是那些已在社会学领域具备了相当修养的高年级大学生。我们还建议在高校中更深入地研究法国18世纪的资料，并开设德国古典哲学课程。

把一些大学者、学派和流派的最新著作译成中文，编写基本的教学大纲，然后在大学的一些高年级讲授。

如果允许唯心主义的所有拥护者都立刻开始在许多大学的大量学生中讲授自己的课程，就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与之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现在对其理论还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让学生们逐渐地、小范围地学习这些课程，那就没有危害。那时，我们可以派遣骨干人员，在批驳唯心主义的同时还可从各种哲学流派和学派中挑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如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

由于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们的科学将发展得更快，并可以避免产生教条主义。当然，在此类工作中仍存在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逐渐地、谨慎地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我还想就党的教育和党内培养问题简单说几句。我们认为在组织党的教育工作之时应当更全面地展示两条路线：一方面是积极而正确的路线，而另一方面是消极而错误的路线，就是说要展示正、反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只宣传一条正确的路线，那么同志们就可能只简单地接受一些现象，而不能理解整个斗争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以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可能导致我们滑向教条主义立场——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简单和轻而易举。这就是为何我们认为在党的教育中应加入学习正确和错误路线的内容的原因。为达此目的，我

们必须出版一些能够准确描述关于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书籍。当然,关于错误路线的书籍不应在公开的书店里销售,而应放到图书馆、办公室和教研室等地方。例如,我们决定出版蒋介石文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人们会逐渐地遗忘与国民党的活动相关的一些事。但所出版的蒋介石的书我们不会拿去销售,而只会放到图书馆和教研室里。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方便人们记住国民党所做的那些事,从而与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及其表现作斗争。

我们中的资产阶级学者们都持观望的立场。我们会逐渐地为其敞开大门,而不是一下子。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我们不会枪毙,也很少将其关进监狱。因为把他们都枪毙或关进监狱,对我们并没有好处。让他们都活着,但要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要让群众了解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们仍会给资产阶级学者们发工资,以便他们能够活下去。我们不担心他们的思想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因为我们不害怕他们,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应当将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区分开来,应当在政治斗争中把反革命分子与那些带有错误政治观点的人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在思想工作中更广泛地采用辩论的方法。我们前不久曾就遗传学问题开展了一场重要的辩论。众所周知,遗传学有两个流派——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我们的这两个不同流派的学者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米丘林派的学者将摩尔根派的学者称作是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而摩尔根派的学者也相应地宣称,米丘林派的学者们如此说法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一些人认为,应当(在高校中)开设米丘林遗传学或摩尔根遗传学课程。于是,这年夏天,40位中国遗传学家在青岛开了一个辩论会,与会者中既有米丘林派,也有摩尔根派。人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拥护一方并反对另一方。不过,最终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流派都具有自己积极的一面,因为遗传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总共才只有50年的历史,其中许多内容仍需要依据各种不同的结论加以澄清、分析和解释。辩论结束时,所有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既有米丘林派学者,也有摩尔根派学者;他们将携手解决一系列科学问题;再过10—12年,中国遗传学将达到这一学科的先进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我们为各个流派的学者们都提供了自由发表见解和自由交流意见的机会,而辩论的最终,他们决定将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中国科学的顺利发展。

如今,一些中国学者希望发表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一些文学界想发行自己的杂志。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赞成还是否定。

近期,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发现了某些倾向,出现一些观点,对之我们并不能总是同意。我们认为让其他人来批评我们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功和胜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担心的是,这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所有人都高喊:“万岁!乌拉!”,而不再批评我们了。如果我们对报刊上所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和倾向实施打击,那么以后就不会有人批评我们了。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仔细地、逐个地研究;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我们会作出答复,而对于其他一些问题——即使不作答复,但也不会对之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予以回应,而不会随便给人扣帽子,不会给人贴标签。针对一些言论,我们可能答复得快一点,而另一些——晚

一点。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千万不能压制批评。

П. 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附件二：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组织情况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谈话

(1956年10月10日)

10月10日，(我)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其间，他谈了关于宣传部的组织工作、该部的结构及其主要工作方式等情况。

据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具体如下：

1. 宣传处；
2. 鼓动处；
3. 干部处(负责管理各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各高校教师干部，等等)；
4. 科学处；
5. 高教处；
6. 人民(民族)教育处；
7. 文学和艺术处；
8. 出版和杂志处；
9. 报刊处；
10. 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政策宣传和中国内部的族际生活问题)；
11. 体育和卫生处。

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各省党委和其他基层党的机关所属宣传部是如何建构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宣称，各地方党委所属宣传机构的构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他说，例如在上海的党委会中便有四个处——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宣传部职能范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据陆定一同志说，在上海市党委中，共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高校部、中学部、文学和艺术部。上述4个部的全部活动均由一个隶属于市党委领导层的委员会统筹负责。

在北京市委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中学部和高等院校委员会。问题在于，在各省和其他地方委员会中难道不能建立一个结构统一的宣传部体系和组织吗？据陆定一说，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机构的建立将取决于各省的具体条件，并由各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自己决断。在各区党委中也设有宣传鼓动部，据陆定一说，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有3—4人。陆定一同志说，各地方宣传鼓动部工作的特点是：我们的县级党委

暂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执行上级党委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在区、县党委机关中工作人员不多,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群众工作。陆定一说,各基层党委主要是执行上级党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其在工作组织方面都基本类似,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必需的。但现在我们也已经感觉到在此类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无法使各基层党的机关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实践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以便使各基层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能力(自主权)。

针对我提出的如下问题——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是以何种方式与基层机关的宣传部保持联系的;他们是否经常去基层组织,陆定一同志作了如下答复:党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经常下到地方上去,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要求,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每年要在地方党组织体验生活至少1—2个月,以研究地方上所发生的事务。在不了解地方情况和不作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向其他人提出建议和发出指示的权力。

陆定一同志详细谈了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对此,他强调道,他们对思想工作的正确组织以及如何正确地协调宣传部和国家各机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拥有高教部、科学院,以及一些以联合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创造性组织。中央宣传部不干涉国家机关和管理文化问题的各部委的日常事务,但掌握着拟定一些最重大思想问题的动议权,并时常开展对这样或那样一个问题的研究,推动各国家机关在思想领域的实践活动。

陆定一同志说,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实践,即我们经常会干预各部委的内部事务,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负面结果,因而我们决定加以改变。

中央宣传部极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中央在思想战线上的助手。党中央领导着所有战线的工作。我们宣传部理应成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总司令部;应当及时领会中央在思想工作战线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并将之落实到实际。思想问题的范围是很难确定的,在这条战线上的活动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要讲究工作的效率。其他机关的任务可以用数据指标来体现,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性质则往往无法用数字指标来衡量。

中央宣传部极力去发现那些业已成熟的思想问题,然后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思想战线的工作与我们党在其他战线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因而,我们总是极力以自己的全部活动来促进党的路线在其他战线的顺利实施。

根据总的政治任务——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我们在思想战线发动了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但这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兼顾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我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我们的任务是使自己的工作与党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协调一致。如果我们过早地提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口号——不好,而过晚在思想战线上提出这一问题——也不好。因此,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发动思想领域的进攻,以便与党在全线发起进攻期间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保持同步。

在去年和前年，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反对胡风集团和胡适——此人也曾鼓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反对过共产党——的斗争之中。

在医学领域，我们广泛开展了反对一些共产党员和专家对中医及其治疗方法的错误观点的运动。这次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能否正确看待民族遗产的大问题。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在哲学领域我们组织了反对胡适反动学派的斗争。

在建筑领域我们开展了针对机械式地恢复古代风格建筑的批判。

在上述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我们均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其间，我们对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根据思想问题在不同领域活动的具体条件来制定相应的策略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详细研究了各领域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思想战线各领域应当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从事反对与反革命有关的胡风的斗争是一回事；而在建筑领域反对梁思成所坚持的错误观点——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位资产阶级专家，但并非反革命。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批判其错误的思想观点。这里就需要采用谨慎的、灵活的策略。例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整理了一批建筑学专家们所撰写的文章——内容以尖锐批判梁思成的错误观点为主。当然，其间我们并没有直接点梁思成的名字。这些文章均被刊登在报纸上。我们就是让梁思成看看，并直接对他说，虽然报纸上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这些文章都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的。梁思成一度很长时间不同意在报纸上反对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在这些文章发表前，我们曾在大学里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其间梁思成也参加了。在对他做了一番工作之后，他本人决定对文章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回应。梁思成所写的文章包含了一定的自我批评的内容，并被我们提前发表。随后，我们才刊登了那些事先已经过讨论的批判性文章。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打击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其所持观点和观念。我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持有错误观点的学者在遭到批判后首先是感到害怕，只有在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后，他才能在报刊上表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解释工作对梁思成帮助很大。在开展反对该学者的错误观点的斗争的同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涉及他的公职，没有撤消他所担任的职务。不论是在遭到批判之前还是之后，梁思成一直都担当着大学建筑系领导的职务。他所写的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其他一些专家所写的批判他以前所持错误观点的文章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为了顺利开展这场反对建筑领域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召集了十几位著名专家——这些人以前都曾是梁思成的学生。有了这些专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搞清楚该学者错误观点的原因，从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要求和参考建筑学的一些特点对这些错误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最终正确地解决在这一领域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每篇批判性文章都是由一些大学者撰写并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要知道，梁思成——作为一名建筑师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知名的地位，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经过在报纸上广泛讨论建筑学的一系列问题，梁思成在(今年7月)全国人大一次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无疑是一次真诚的自我批评。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开展的反对梁漱溟所持错误观点的斗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此

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哲学家,思想反动,但他并不是反革命。针对此人,我们采取了另一个斗争方式。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尖锐批判梁漱溟在哲学上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其中有一批判文章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无党派学者撰写的。当这批文章发表后,梁漱溟也在政协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虽然他对文章中批判自己错误的那些指责在态度上表现得并不够真诚。

针对我提出的究竟是谁具体负责这些文章的编写和组织,而这一切是否事先与学者们讨论过等问题,陆定一答道: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是由中央作出决断。至于就一些哲学问题发表言论以及这一言论的起草工作都是由科学院事先作准备,并由郭沫若直接负责。针对建筑学领域所出现的那些错误观点,所有工作都是由北京市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经大学领导层亲自领导的。

在谈及关于制定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策略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强调,我们都是极力避免由自己来写这些文章,而是尽量把发言的机会留给那些学者们。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门学科,文笔方面也比我们好,并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应当广泛地利用他们的经验来为思想斗争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在起草关于思想问题的文章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当然,在工作过程中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干部们也要与各科学和社会组织以及组织负责人一起做一定的工作。只是在事先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全面地把自己的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审议,以最终确定斗争的方式、策略,并形成必须在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坚持的那些主要原则性条款和结论之后,中央宣传部才开始实施这一工作。这种斗争方法是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制定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极其关注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团体对我们所采取举措的反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对检验我们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及时纠正我们自身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政治任务的提出,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在思想领域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当国内开始掀起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之时,我们在思想战线的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整天手里拿一根大棒,只是采取打击的方式当然是不行的。而必须以团结的精神为指导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可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党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起先,我们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建议得到了加强、完善并形成了一个体系,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思想领域的实际工作中落实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我们极力以这样的方式来协助宣传部的工作,即不纠缠于日常繁琐的小事。我们的主要任务——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各思想工作领域的情况,为各个不同的思想领域制定出不同的工作方法。为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大量的资料,以便很好地了解知识分子各个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我们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工作与落实国家的主要政治举措紧密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党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当合作化基本完成之后,一些工作人员便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即如今在思想工作方面似乎已

不用再做什么了。他们说，以前仍需要解释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并揭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而如今在合作化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似乎思想工作的任务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这种情绪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思想工作要做，以便有助于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正确地教育已被联合到合作社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中间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即似乎一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出来，那么宣传思想工作的事务便自然而然地告一段落了。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党组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这一方针得以正确地落实。他们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大力帮助各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思想工作部门的党组织。

在开展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只能够解决1—2个大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集中自己的主要精力。当然，其间也会碰到其他一些宣传方面的日常小问题，但这些都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解决。

针对我提出的——谁在宣传部中负责挑选这些工作人员和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等问题，陆定一同志答道：这些宣传部的干部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经验方面也有些欠缺。对此，陆定一同志强调，针对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仍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以便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主要的、头等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引导的同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应当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并对之进行细致的研究。陆定一同志通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有300多人，其中没有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者其工作效率仍不太高。

为机关工作及其工作人员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其中，一些人断言，不应当给工作人员下达某种固定的任务，而只向其指明工作的目标，并建议其搜集和研究各种资料，研究思想战线各领域的情况；而另一些人认为，应当给工作人员提出非常具体的任务，如指出应当设立多少所学校，出版多少家报刊，等等。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没有对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及其内容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起初，我们曾采用过提出具体任务，明确固定任务的工作方式。可后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这样：使我们自己从一些繁琐的小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研究一个实际的问题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达到一定的思想水平。例如，在关于党的教育和关于党校的组建等问题上，我们认为，不应当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建设这些学校的数量上，而应当集中在如下方面：如何使这些学校研究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应当制定出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使其能够主动地去研究一些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关键在于——确保对这些学校的思想指导，而不是沉迷于此类学校的建设数量方面。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实际组织党的干部的理论培训和党校的理论学习等问题，陆定一同志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在中共中央所属的高级党校里学习。在该校内设有两类学制的课程：

1. 一年学制：学员200—300人。在此类学制学习的都是各省、市和区党委书记，部长

和其他国家机关领导干部。

2. 二年学制：学员500人左右。这里主要为各党校、高校和马列主义夜大培养社会学教师以及宣传部骨干。

在为党的领导干部设定理论学习任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精确地计算这些同志学习各门课程的时间，不能让干部们的学习负担过重。我们领导干部离任学习的实际期限一般为一年。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在我们党内从区党委书记及以上约有1万名现任领导干部。通过对这一范围内的干部们进行研究，我们了解到，约50%的此类干部可不必系统而深入地学习，因为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其他一些原因均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至于另一部分干部，则必须通过相应的学习课程。我们可以为他们制定一个多年的、轮流式的、在高级党校各年级的学习计划。在实际中我们也常采用这样的办法：向其提供几个月的假期，以便其就一些确定的问题从事学习。

在各省党委也有一些中等类型的党校，学制为6个月(半年)。此类党校在国内有10所，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各县党委和区党委的书记们。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如何组织干部和党员们学习中共八大决议——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前不久中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作出了两个重要规定。而根据该规定，我们需要组织学习会议决议的工作，具体做法如下：1. 必须深入学习主要文件——党的八大就中央的政治报告所作出的决议。其他文件将由干部和党员们自己阅读和学习。2. 学习会议资料的期限和组织方式由各省委和市委自己决定。他们有权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各省党组织的态度并不一样。有的把学习文件的期限定为3个月，有的6个月，还有的2个月。一些地方的党委认为有必要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以便能够更经常和精确地核查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这项工作的组织方面，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各地方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更大的独立性，以便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些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陆定一同志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思想工作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大家都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与此同时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和民主，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内团结一切能够被用来反对反动派阴谋的有利因素。

陆定一同志说，苏联在思想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以成功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工作。他还说，苏联及其科学干部在各类国际科学组织和各种文化协会中设有大量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训练有素的干部比较少，也较少有机会在各国际科学和社会组织中发言。如果苏联学者们能够更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自己的大量代表机构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发起进攻，这将对我们非常有益，也是对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思想工作的巨大帮助。当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积极发动针对各反动流派的进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要顺利地开展这方面工作，我们就首先必须拥有很高的科学水平，深入而精确地了解自然科学知识。为了成功在思想领域发起进攻，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和不断地研

究敌人，必须回击敌人的阴谋诡计，捍卫正确的马列主义原则。其中，我们认为，自己首先必须去学习资产阶级哲学，以便能够成功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但为了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就应当用正确的知识来很好地武装自己。

会谈最后，陆定一同志说，中国同志对学习苏联的思想工作经验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明年能去苏联一趟。陆定一同志还通报，毛泽东同志已告诉他们，他打算去苏联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П. 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40，л. 259－275

№0409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

(1956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18日会议第47/59号记录

绝 密

第59项　关于去波兰的苏共代表团。

1. 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层出现的严重局势，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代表团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组成。

2. 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见附件)。[1]

附件：

绝 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① 本决定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原注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法国大使口头通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罗马大使口头通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口头通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认为有责任将以下情况通报给你们：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就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问题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

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

以后的情况我们将向你们通报。

苏共中央

ЦХСД，ф. 3，оп. 14，д. 67，л. 25，104

№0409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

（1956 年 10 月 2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20 日会议

机　密

出席会议者：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罗夫。

第 1 项　关于苏共代表团华沙之行的情况（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科涅夫、朱可夫)。

1. 一个结论——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如果罗科索夫斯基留下来，那得忍耐些时日。

大演习。①

准备文件。②

成立一个委员会。

2. 波诺马连科大使同志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

3. 邀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也会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去中国通报情况。

4. 发出信息。

接收信息并通知。

思考所提出的问题。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5, л. 49

№0970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

(1956 年 10 月 2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20 日会议

机　密

出席会议者：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罗夫。

第 2 项　匈牙利问题③。

考虑是否派米高扬去。

由米高扬和朱可夫研究将士兵召回部队的问题。④

---

① 指在波兰的苏联坦克师团向华沙开动。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上，罗科索夫斯基声明，这是苏军在波兰领土上进行的“计划中的演习”。波兰领导人要求苏军停止行进，并返回自己的营地。——原注

② 可能是指就召回在波兰的苏联顾问一事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回信。——原注

③ 1956 年 10 月 12 日和 14 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先后发出关于匈牙利国内政治危机加剧的通报和紧急报告。——编注

④ 此时苏军的大部分官兵正在支援秋收。——原注

由米高扬起草对兄弟党的通报。①

召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②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49-50

№0409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

(1956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1日会议第47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波兰问题(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朱可夫、科涅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

一、关于全会报道的第1页送去发表。

二、采取什么方针：

1. 影响并注视事件的发展；

2. 要么我们加以干涉。

召集兄弟党领导人。

时间——10月22日决定。

认为召开一次由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

鉴于波兰事件和波兰的局势，我们希望进行协商。

---

① 关于匈牙利形势的通报未成稿。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把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执政党的代表召集到莫斯科，主要与他们讨论波兰局势问题。由于布达佩斯爆发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成了10月24日两次磋商(主席团成员与中国代表团单独进行了会晤)的议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没有参加磋商。——原注

② 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像波兰领导人那样要求苏共领导人召回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之所以提出这一动议，可能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军队人数众多的顾问机构使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原注

我们希望开会。

其他党的代表也有同感。

10月23日即星期二开会。

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受到打击。

星期二、星期三，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将参加。

波兰问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谢罗夫、朱可夫、米高扬、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马林科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心(大家赞同)。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哥穆尔卡同志关于克格勃顾问问题的信。

采纳修正意见：如果他们愿意接触，想要顾问，让他们先说，我们再讨论。

关于将领和军官，我们请你方准备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同意召回。

不要波兰的煤越早越好。

对形势的评价和我们的方针。

为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同志准备会见兄弟党代表材料(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说还是不写这种材料好)。

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说要对形势作出评价。

莫洛托夫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不写材料。

准备一封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为自己暂拟一份提纲——对形势的评价(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准备)。

布尔加宁同志：期待中央全会作出决议。

暂时不公布任何消息(摘自讲话)。

关于顾问的信件。

经米高扬、朱可夫、谢罗夫、科涅夫、谢皮洛夫同志审阅。

对波兰的高频通信问题要自己提出来。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1-3

№040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致中、捷、保、德各党中央电文

（1956 年 10 月 21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21 日会议第 47/1 号记录

绝 密

第 1 项 波兰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科涅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谢罗夫、伏罗希洛夫、福尔采娃、马林科夫同志）

1. 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的意见，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电报全文(电文附后)。

2.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意见的情况，委托米高扬同志、朱可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谢罗夫同志和科涅夫同志审阅苏共中央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在波兰的顾问问题的信函草稿，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

附件一：

绝 密

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诺沃提尼同志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尤哥夫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乌布利希同志：

鉴于波兰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

我们建议在星期二，至少在星期三在莫斯科举行高级会晤。其他兄弟党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请告你们的意见。

苏共中央

附件二：

绝　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鉴于波兰形势，我们想交换意见。

我们想请你们，如果这样可以，请贵方代表于星期二、星期三来此，为此我们将派图-104专机一架。

苏共中央

ЦХСД，ф. 3，оп. 14，д. 67，л. 1，4－5

№252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

（1956年10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2日
第868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2日

今天我根据中央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

对波兰事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讨论。我通过密电将谈话全文发给了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Н.Г.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д. 9，п. 410，л. 200

№0409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1956 年 10 月 2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23 日会议

第 1 项　波兰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琴科、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布尔加宁）

哥穆尔卡请求于 11 月 8 日会晤。

10 月 24 日 11 时同中国人会晤。

还同其他人单独会晤。

然后大家聚会。

全体委员会见中国人。

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萨布罗夫一起会见匈牙利人。

大使通报了上层的真实情况。物色大使人选。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了同哥穆尔卡谈话的情况。

不发表哥穆尔卡的讲话。

准备进行接触。

致各级党组织的信没有写。

哥穆尔卡的报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决议和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分别送出。

由米高扬、波斯佩洛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同志负责起草信。期限 3 天。信传达到区委员会(文件不留在区委员会,而由州委员会的代表传达后带回)。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5 - 5об

№25203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

（1956 年 10 月 23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3日
第869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3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我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波兰局势进行了讨论。对于该问题的详细谈话记录那天已通过密电发给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胡乔木、师哲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 Н.Г.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д.9，п.410，л.201

№097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

（1956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3日会议

出席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波洛夫。

关于布达佩斯和全匈牙利的形势。

（朱可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三同志）

朱可夫同志通报情况：

布达佩斯10万人游行。

广播电台被烧。

在德布勒森市,州委大楼和内务机关大楼被占领。①

赫鲁晓夫同志主张出兵布达佩斯。

布尔加宁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出兵的建议是正确的。

米高扬同志:没有纳吉就控制不了运动,控制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对出兵表示担心。用匈牙利人自己的手整顿好秩序。我们有什么损失?我们出兵会自找麻烦。先尝试政治措施,然后再出兵。

莫洛托夫同志:匈牙利已经让纳吉搞得动荡不安。同意出兵。

卡冈诺维奇同志:正在推翻政府。不能和波兰相比。同意出兵。

别尔乌辛同志:必须出兵。

朱可夫同志:与波兰有差别。必须出兵。派一名中央主席团委员去。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实行宵禁。

苏斯洛夫同志:形势与波兰不同。必须出兵。

萨布罗夫:为了维持秩序必须出兵。

谢皮洛夫:同意出兵。

基里琴科:同意出兵。

派马利宁同志和谢罗夫同志去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吸收纳吉参加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总理。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乘飞机去布达佩斯。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4－4об

№0409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

(1956 年 10 月 2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24 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基里琴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

---

① 根据该情况判断,会议是在莫斯科时间 22—23 时之间召开的。此时在布达佩斯发生了冲击广播电台大楼事件。至 23 时整,根据苏联国防部长的命令,苏军驻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军区的 5 个师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原注

晓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刘少奇同志[①]。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问题交换意见(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同志和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

通报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

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

有时是强加于人。

有时候(对待决议)的方法和方式过于仓促。

批评的形式(第 4 点)。

立即发表。

应当预先修改。

关于日本的文章(在《争取持久和平》[②]上)已经发表(没有给毛泽东同志看)，斯大林没有寄出。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日本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到现在情况仍未得到改善。在国际组织内工作方式的方向不正确。

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

关于援助……[③]

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的观点。

谈话将继续进行。

B. H. 马林的亲笔记录，铅笔所写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2

---

① 受苏联邀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 10 月 23 日到达莫斯科，协助处理波匈事件。——编注

② 原文如此，指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注

③ 原文如此。——原注

№21477

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

（1956 年 10 月 24 日）

今年 10 月 22 日白天，莫斯科到北京的 2 次特别快车在开赴途中，在还没到达第一站亚历山德罗夫站的时候，在 1 号车厢 5 号包厢内发现了一具乘客尸体悬吊在绳带上，该乘客在莫斯科乘坐本次列车去北京。

按规定进行了初步调查，死者是中国公民陈国富（Чэнь Го-фу），生于 1927 年，在莫斯科柳别尔齐炼油厂实习。

5 号包厢的一位乘客朱应举（Чжу-Ин-Чжу）在被问询时说，在莫斯科一名中国驻苏联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把陈国富送上了火车，并请求他和同包厢的其他乘客帮助同胞陈国富到达北京，并说陈国富是一名精神病人，因此在实习还没结束的情况下不得不让他回国。

朱应举解释说，他和他的旅伴在火车离开莫斯科后去了餐车，并邀请过陈国富同去，陈国富拒绝了，并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提到，他不想回中国。

陈国富一个人留在了包厢里，自杀了，用裤带上吊了，裤带固定在墙上的把手上。

在陈国富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用中文写的便条，是寄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便条说，他由于在苏联犯了某种过失，才迫使他走向悲剧的结局。

在包厢的小餐桌上发现了一本用中文写的笔记，其中一部分提到，陈国富入党时隐瞒了一个事实，他妻子的父亲是一名土匪，因此被枪毙了。笔记的第二部分写得很潦草，还没翻译完。

中国大使馆已经通过苏联外交部知悉了陈国富的死讯。

总检察院交通分院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苏联总检察长

Р. 鲁坚科（签名）

1956 年 10 月 24 日

手写批注：

归档。根据这些资料，苏联外交部和总检察院已经采取了措施。

И. 谢尔巴科夫

1956 年 10 月 31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235－236

№20585－1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

（1956年10月26日）

1956年10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В.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0月11—29日
第317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26日

拜访了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曹克强同志，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为了向他通报同金日成同志谈论的关于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非正式访问的问题。我对曹克强说，尽管朝鲜领导人向米高扬和彭德怀许诺公布朝鲜劳动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朝鲜同志只是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5天之后，即9月28日才简短地公布了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通报。在这份通报中有两个重要章节。第一个重要章节涉及朝鲜劳动党的自我批评问题，其中指出，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过于仓促，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过于简单。第二个重要章节的内容是号召全党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原则。

金日成解释说，对第一个章节要有意识地进行删改，因为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还没有发表，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让报纸知道这些仓促的决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自己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因此应该从公布好的决议开始，而不是从公布不好的决议开始。关于第二个涉及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问题，金日成说，9月中央全会的通报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公布的，当时他已经外出休假，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章节被删掉了。

对于我的看法，即关于公布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上的疏忽是可以改正的，金日成回答说，这两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以及他在9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将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并要分发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而且报告中将删除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建议内容，按照他们的建议重新审议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用金日成的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把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这件事泄露出去，同时也不使广大党员认为9月中

央全会决议是在兄弟党的压力下通过的,也不使他们认为兄弟党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

我还把金日成说的以下的话通报给了曹克强,金日成说,好像我们并没有向米高扬和彭德怀承诺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只是向他们承诺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金日成还说,在各道党的积极分子讨论9月中央全会结论材料的会议上,许多党员干部怀疑减轻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处分是否合适。

曹克强很想知道,朴昌玉和崔昌益目前在什么地方。我回答他说,朴昌玉现在是一个锯木加工厂的副厂长,而崔昌益现在好像生病了。

曹克强说,他没有同朝鲜领导人特别地谈论这个问题,然而中国大使馆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情况,但是他不能确认这些事实情况的可信性。比如,在平壤市委党的积极分子讨论9月中央全会结果的会议上,平壤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发言批评了破坏党内民主的现象,并支持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恢复党内民主。在这次发言之后,这名副部长就被开除出了劳动党。平壤市党委委员长李松云在这次会议上也做了错误的发言,他说,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到平壤是为了找出劳动党的缺点和错误,但我们使他们相信,情况完全相反。曹克强又说,有消息传到中国大使馆说,金昌满针对反对派强硬地声明说,无论他们怎样努力,我们都有内务省和军队。

我问曹克强,彭德怀曾请求把囚禁在狱中的朴一禹放出监狱并送往中国学习,对这个请求朝鲜同志采取了什么措施?曹克强回答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中国大使馆什么也不知道。彭德怀同志将拜见金日成,并转告他说,如果朝鲜同志不需要他们,而相反,限制朴一禹和方虎山回朝鲜,那么中国同志同意他们到中国。对于方虎山目前在哪里的问题,曹克强回答说,方虎山和朴一禹一样,都是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同志,他对中国东北的革命活动有很大贡献,后来他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并领导了一支部队。现在他只是一个矿厂的普通工人。

曹克强也通报说,跑往中国的尹公钦、徐辉、金刚和李弼奎的家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口粮供应。金刚的夫人到文化宣传部部长那儿请求帮助,但是这名部长没有接见她,并把她送往总务处处长那儿,这名处长骂了她一顿,并拒绝给她口粮。

我对曹克强的会谈表示感谢。

苏联驻朝鲜大使

B. 伊万诺夫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2,л. 336-358

№0409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

(1956年10月2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6日会议

到会的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朱可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共中央的刘少奇……[1]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交换意见：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刘少奇同志语)。

哥穆尔卡太过分了。

10月26日20时继续开会。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3

№097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年10月28日[2])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8日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佐林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同志——事情正在复杂化。初步拟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

① 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未记姓名。——原注

② 会议是在莫斯科时间大约13点钟开始的。没有形成记录文本。第54—60页是以错误的顺序订在档案卷宗里的。在公布时，将文件按顺序进行了调整。——原注

卡达尔的意向：与抵抗中心进行谈判。

纠正索博列夫在联合国所说的话。[①]

工人支持起义(因此希望重新考虑“反革命暴动”的叫法)。

朱可夫同志——通报信息。暂时放弃对一个抵抗据点的镇压。[②]

已经下达命令：不准许进行游行示威。

朱可夫同志——一些地区的铁路被毁坏了。

在德布勒森，政权已经移交给我们的军队了。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信息。局势已经复杂化。苏斯洛夫同志应该飞回莫斯科。

执政内阁还没有公布。建议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4 人赞成，6 人反对)。[③]目前正在召开全体会议。[④]

伏罗希洛夫同志——缺乏信息通报。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表现得很冷静，缺乏信息通报。

我们的处境很糟。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匈牙利同志也同意的方针。

米高扬同志不适合继续这项工作。已经拟定的那件事，应该进行(派出一组同志)。我们将不撤出军队——应该以坚决的方式进行镇压。纳吉是取消派分子。

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不好。局势正在恶化。

事情在许多方面正在向投降的方向发展。

纳吉马上就要反对我们了。我们的同志表现得缺乏信心。

对于我们让步到什么界限应该达成一致。

话题谈到了政府的组成，还谈到执政内阁。排除赫格居斯，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考虑我们了。关于与苏联的友谊问题，我们军队的援助问题——这是最起码的，米高扬同志安慰道。如果不同意，那么，就要讨论，将如何对待军队。

卡冈诺维奇同志——反革命活动活跃起来了。匈牙利共产党员们优柔寡断。对工人和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应该向卡达尔指明方向，也就是制止(运动)。对于反革命中心行动要果断，我们不应该后退。

布尔加宁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行动不明确。卡达尔摇摆不定。重要的是：要求卡达尔更坚定一些。

应该这样做：与米高扬通电话并告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的行动应该更坚

---

① 根据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的倡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拟定于 10 月 28 日 23 时(莫斯科时间)，就匈牙利局势问题举行会议。该草案是考虑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 A. A. 索博列夫的建议，由 Д. Т. 谢皮洛夫为主席团会议起草的，根据该指示草案，向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提出建议，着重强调匈牙利的起义具有法西斯的、反民主的性质(АВПРФ，ф. 0536，оп. 1，п. 5，д. 65，л. 24－28)。显然，赫鲁晓夫所说的意思是：必须将布达佩斯的新局势通告索博列夫。——原注

② 此处指的是在消灭科尔文影剧院区的一批起义者时的不成功的行动。——原注

③ 这里指的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组成时，对确定赫格居斯候选人资格的投票情况。——原注

④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召开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布达佩斯时间的 11 点钟。——原注

决；否则，我们将不经过他们而采取行动。莫斯科的政治局将不得不亲自任命政府。

马林科夫同志——我们的同志们对目前的局势不能忍受。坚决实施镇压的方针。要求纳吉代表政府发表纲领。

朱可夫同志——关于米高扬同志的作用，现在对他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按另一种说法，当我们决定撤军时，局势就复杂化了。应表现政治灵活性，使中央采取更加灵活的行动。组织武装工人义勇队。准备支持我们的军队。对主要的抵抗中心进行镇压。

萨布罗夫同志——同意朱可夫同志的意见，在重大工厂占领自己的阵地。需要纲领。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要对许多事情负责。应该尊重事实。我们是否能拥有一个与我们一致的政府，或者是一个与我们不一致的政府，他们将请求撤出军队。到那时将怎么办？纳吉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他将放弃一切权力。那时，联盟将会垮台。[①]那里没有坚定的领导，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里。起义已经波及省里。军队可能会转向起义者一边。赫格居斯不再坚持。两种方案：政府行动起来，我们援助。这能够很快结束，或者是纳吉转而反对我们。

赫鲁晓夫同志——要求停火并撤出军队，然后是投降。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方案？

1. 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好的方案)，到时我们……[②]

2. 控制这个政府，派政府代表前往各省。需要行动纲领。莫斯科政治局(起草)我们致居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呼吁书，否则，我们只有开枪。

3. 是否应该要求中国人、保加利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4. 坚决镇压暴动分子的武装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应该起草文件。

达成一致：各兄弟党应该向匈牙利人发出呼吁。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③]

(苏斯洛夫同志)

苏斯洛夫同志——局势复杂化。10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介入。10月25日，还剩一个抵抗点，10月26日才知道这一点。在科尔文剧院区，以霍尔蒂军队的一名上校为首的匪帮。零星的射击(经常性的)。枪击军官。3 000名伤员。350人被击毙(匈牙利人)。我方损失600人被击毙。[④] 目前对于我们军队的态度不好(已经恶化)。原因是：1956年10月24日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⑤]开枪射击。居民中有70人被击毙。挂出许多黑色旗子。

工人们离开了企业。

在各个企业(自发性地)出现了委员会(每个城市都在谈论着)。游行示威具有反苏联的

---

① 指的是10月27日被改组的部长内阁，1945—1948年期间的执政联盟的原党的某些代表，这次被以个人身份列入这个改组过的部长内阁里。——原注

② 原文句子未完。——原注

③ 显然，在10月28日晚，M. A. 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之后，会议继续进行。——原注

④ 可能是记录中的错误。10月28日大约损失600人，死亡的是匈牙利居民，大约350人是苏联军人。——原注

⑤ 正确的是10月25日。此处指的是在科苏特广场上的议会大厦附近向游行示威队伍开枪射击事件。——原注

倾向。

如何控制局势？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

苏斯洛夫同志 ——我们的路线：不反对吸收一些民主主义者。昨天形成了政府。

10 月 28 日晨 5 时，卡达尔同志前来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组织要求重新考虑对起义者的评价问题——应评定为民族民主起义。他们希望以波兹南事件为例进行评价。

卡达尔通报说，已经与工会工作人员就取消民族民主运动的提法以及有关国家安全机构事宜达成一致。①

在呼吁书中，纳吉塞入了撤出苏联军队这一论题。②关于停火问题（一直在坚持这一观点）。

目前我们的方针是：既然政府建议停火，指挥部制定将部队从布达佩斯撤出的命令。

纳吉和桑托提出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的问题。

选举不应该进行。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是否发表公开宣言支持该政府？③支持。没有其他出路。

布尔加宁同志——(……④)

伏罗希洛夫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紧要的不是撤军。美国情报机关的活动比苏斯洛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还要积极。需要的是一组同志尽快前往。在达成协议、组织政府之后，就撤出军队。再派你们（指 A. И. 米高扬和 M. A. 苏斯洛夫）前往那里就徒劳无益了。（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表示反对）

布尔加宁同志 ——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同意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看法。赞成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做法。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应该作出结论：在布达佩斯存在着这样的力量，他们希望摆脱纳吉和卡达尔政府。持有支持现政府的立场。否则，应该实行占领。这对我们来说很冒险。

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派军队问题：派出军队的做法是正确的。责难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不应该)——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把一切都推到他们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支持，就得占领这个国家。这将会使我们走得更远。还是支持政府。关于撤军问题宣言不进行改动。让他们提到友谊。关于加强党的问题。不再增派人员。

马林科夫同志——行动是正确的。指责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没有任何根据。对于该政府应该支持。经政府同意保留军队。

马林科夫同志——那里卷入了这样一些同志，必须保证赦免他们。

---

① 实际上，与工会代表就取消这一提法以及要求解散国家安全机构事宜，并没有达成一致。——原注

② 显然指的是纳吉在 10 月 25 日进行的广播讲话。——原注

③ 布达佩斯时间 10 月 28 日 17 点 25 分，纳吉进行了广播讲话，发表新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成为十月事件发展的转折点。政府指责，以前曾将事件评定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认为事件是“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宣布停战以及拟定与苏联就从匈牙利撤军事宜进行谈判。此处多半指的是这个宣言或是它的草案，10 月 28 日上午苏斯洛夫参加了这个草案的讨论。显然，他将这份文稿带回了莫斯科。——原注

④ 对布尔加宁的发言没作记录。——原注

莫洛托夫同志——派出军队，这是正确的做法。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最初的就对待政府态度的通报是镇静的。党对群众的影响很弱。关于该政府，应该支持。但是，他们的关于与苏联的友谊——谈论时提到撤军——应该谨慎行事。

朱可夫同志——支持该政府。关于从匈牙利撤军问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威信。对各兄弟党提出要求，让他们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朱可夫同志——在布达佩斯，将军队从街道撤到一定的地区。也可能代表指挥部发表声明。关于对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评价问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萨布罗夫同志——支持这个政府。应该在人民中提高政府的威信。不反对他们对于事件所作的评价。不反对撤军，但无须立即。

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支持这个政府。研究制定策略。同卡达尔和纳吉谈话：我们支持，宣言——显然，更多的你们(指卡达尔和纳吉)没有能力承受。我们停火。我们准备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约定条件，使抵抗中心停火。

莫洛托夫同志——第二，我们应该关心匈牙利的共产党员们。

布尔加宁同志——国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垮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存在了。(……[①])掌握了政权。

卡冈诺维奇同志——话题谈的不是让步，而是为人民进行的战争。接受宣言。从首都撤出军队。

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哪怕是建立一个小组，也可以保留军队。不能指望任何人。否则就会有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我表示支持宣言。政治上对我们是有益的。[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埃及制造了麻烦。[③]不要陷入同一境地。不要抱幻想。人员我们保留。基本接受宣言。接受带有修改的(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安排好城市里的生活。来自各兄弟党的呼吁书。给南斯拉夫发出密码电报。[④]波斯佩洛夫同志在1956年11月6日前着手准备报告。如果指挥部的传单……[⑤]

赫格居斯、格罗、皮罗什，派他们前往保加利亚。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5, л. 54 - 61об

---

① 原文如此。——原注

② 大概，赫鲁晓夫所指的政治益处是：在布达佩斯宣布停战以及苏联军队撤到城市里有助于提高苏联的威望。——原注

③ 近东的军事行动始于10月29日夜间到30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英国和法国于10月31日参与进来，当时他们的联合海军力量从海上封锁了埃及，而空军对埃及的城市进行了轰炸。——原注

④ 显然，10月29日，正是由于这个决定，铁托以及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给匈牙利发来了函电，支持党和国家的新领导以及纳吉10月28日的宣言。——原注

⑤ 原文如此。——原注

№1605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

（1956年10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2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10月30日

今天，(我)与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有关会谈内容的完整纪要我已发送给苏共中央主席团。

对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的宣言，刘少奇说他本人表示欢迎，并特别提及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有许多苏联专家的问题。他说，这些专家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他们对所在国的特殊国情不甚了解，一些专家就政治问题开出的药方往往引发了消极后果"。依据当时苏联专家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指出，经验表明，当地那些在各自工作中曾犯了某种错误或过失的干部，总会一股脑地把所有罪责推到苏联专家的身上。有鉴于此，中国已从越南召回了除技术专家之外的所有专家。

在谈及苏联专家时，刘少奇指出，他们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表示，这些专家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协助各国培养起了自己的干部队伍，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苏联专家(不包括技术专家)回国的问题。刘少奇特别指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小心谨慎，并与当事国共同协商解决，要避免像以前在南斯拉夫那样不加区分地召回所有专家。

刘少奇说，的确，一些国家会坚持提议撤走苏联专家，因为"他们在受援国待的日子已超出时限"。不过，有鉴于此，苏联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一贯立场。

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请刘少奇谈谈他对于从中国召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构中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的看法，并提及此前曾与周恩来谈过这一问题。刘少奇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说中共中央需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并进行充分研究。

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刘少奇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应被视作是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刘少奇说，我们共产党人，需要从理论上总结出经验教训，"就像马克思当时总结和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列宁概括和阐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样"。

会谈时，使馆二等秘书 О.Б.罗满宁也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202－203

№097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 年 10 月 3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0 月 30 日会议

第 49 号记录 第 1 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米高扬同志和谢罗夫同志的情报被列入其中。

朱可夫同志：

关于在维也纳地区[①]集中军用运输飞机事宜的情况通报。

纳吉在耍两面派（按照马利宁的意见）。

派科涅夫同志前往布达佩斯。

关于与中国同志的会谈情况。[②]

赫鲁晓夫：

考虑到我们部队驻在国的意见，通过宣言，今天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这些问题是在华沙条约会议上讨论的）。

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都是这个立场。

---

① 在匈牙利事件时间，维也纳的机场已经成为西方向匈牙利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转运基地，由此地沿着建立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空中桥梁将援助物资送达目的地。根据报纸的资料，仅 10 月 29 日这一天，抵达维也纳的就有 24 架英国空军的运输飞机。——原注

② 会议继续进行时，赫鲁晓夫参加了。——原注

一份文件给匈牙利人,另一份给华沙条约的成员国。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的问题,对哥穆尔卡说,这是你们的问题(波兰人的)。

布尔加宁同志:

对于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国同志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准备我们给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准备宣言。

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就给匈牙利人民的呼吁书,以便立即开始关于撤军的谈判。

还存在着华沙条约。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我们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的关系。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基础上;党之间的关系,则在另一种基础上。

伏罗希洛夫同志:

应该向前看。宣言的制定,不应该将我们置于困境。可以批评自己,但要做到公平合理。

卡冈诺维奇同志:

关于五项原则,我认为,他们不会建议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

两份文件: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和宣言。

在这份文件中不需要进行自我批评。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差别。

谢皮洛夫同志:

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

谢皮洛夫同志:

基础是牢固的。消灭操纵者,不让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起作用,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方面仔细考虑一系列措施。

宣言,这是第一步。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就不应该再发了。

关于武装力量,我们坚持不干涉的原则。

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我们准备撤军。

应该同民族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

朱可夫同志:

同意谢皮洛夫同志所表述的意见。重要的是,在匈牙利解决问题。

反苏的情绪在扩大。

从布达佩斯撤军。如果要求,就从匈牙利撤军。

在军事政策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朱可夫同志:

关于驻在德国和波兰的军队,问题更加严重。

在协商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简短的决定，今天公布重要的内容。

福尔采娃同志：

通过共同的宣言，而不是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

（宣言的呼声）并不高。

第二点，对于内部局势非常重要。

应该从其他方面看待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关于与人民民主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有关相互关系问题)。

召开中央全会(通报信息)。

萨布罗夫同志：

赞同宣言和撤军事宜。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事后对群众的创造精神缺乏领导。

领导是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愿的。

没有奋起保卫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我们将落后于形势。

同意福尔采娃同志的意见。向各位部长、中央委员询问。

关于罗马尼亚，他们欠我们50亿卢布，依靠这笔钱那里的人民建立了公有制。[①]

应该重新考虑相互关系。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相互关系。

赫鲁晓夫同志：

表达的意见一致。第一阶段应该发表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

通报与米高扬同志交谈的情况。

卡达尔表现得很好。6个人中有5个人态度坚定。[②]

关于撤军问题，主席团内部正在进行斗争。

国防部长将下达命令，用武装力量镇压戏院区的暴动分子。（看来，马利宁很紧张，离开了会议。）

(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我们军队里。[③]

讨论宣言草案[④]

(谢皮洛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同志：

根据宣言的有关问题来谈。第2页的第2段，不应该减轻自我批评、所犯的错误。更多

---

① 大概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苏联运到罗马尼亚的物资的欠款。对于有罗马尼亚参加的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的战争赔款，依据苏联政府的倡议，对其减少了三分之一，而1948年又减少了剩余数目的50%。——原注

② 此处指的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成员。即除了“摇摆不定的人”纳吉之外，其余的所有人。——原注

③ 在国家机关宣布解散之后，匈牙利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到苏联军队管辖的区域内避难，11月4日，他们积极参加了在匈牙利进行的“整顿秩序”的活动。——原注

④ 1956年10月30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地运用“列宁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同志：

表示赞同，并说，我们遵循的是列宁主义原则。

第2页的第5段，所作的是声明，不是解释。

第3页，谈到经济权利平等，应该使其成为重要的一条。

说明，在大部分国家里没有军队。

说明，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领土上。

赫鲁晓夫同志：

这样做是经过他们政府的同意，并为了这些政府和人民的利益。

表明对匈牙利政府的态度。支持他们采取的措施。

关于党、匈牙利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召见纳吉和卡达尔。

卡冈诺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朱可夫同志：

应该谈一谈与每个国家签署的波茨坦协定和条约。

朱可夫同志：

对于人民应该表示同情。我们呼吁停止流血事件。

第2页的第2段：应该说，二十大批评了缺乏权利平等。

尤金同志关于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报告①

局势如何：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

是否可以信任他？关于专家问题。

朱可夫同志：②

谈关于经济问题。二十大之后的改革被拖延了。

（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向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讨论关于专家的问题——准备召回专家。

应该让一些同志进行校订。③

通过高频电话转告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

---

① 1956年10月30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② 苏联政府宣言草案讨论的继续。——原注

③ 这里指的是会议决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草案。——原注

中国同志。

关于匈牙利局势。

（赫鲁晓夫同志，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

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达，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

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

发表宣言。说明我们的立场。明确对新政府的态度。

我们开始撤军的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纳吉——总理。

卡达尔——为国务部长。

蒂尔迪·佐尔坦——

科瓦奇·贝拉

洛松奇——共产党员，纳吉的支持者。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6－14

№25204

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

（1956 年 10 月 30 日）

第 1457/ДВ 号

1956 年 11 月 23 日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① 10 月 30 日布达佩斯时间的 14 点 30 分，纳吉在自己的广播讲话中宣布取消匈牙利的一党制，恢复战后初期的联合管理体制。接着，在政府范围内建立了由共产党代表、小农党的代表和国家农民党的代表组成的所谓的小范围内阁。——原注

远东司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①]

1956年10月30日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国不是经互会的成员国，因而有必要就设立机构、经济合作框架和周期性的年度计划达成协议。

二、有来自苏联的30个组织和10多万名苏联人在中国。应考虑取消部分机构，将其职能移交其他机构行使。

1. 取消经济合作总局的驻华代表处。技术援助与成套设备供应的执行工作交给商务代表处，在华专家的管理工作交给大使馆。

2. 取消“苏联电影出口公司”与“苏联新闻社”的驻华代表处。

……

7. 召回负责亚洲各国工会工作的机构驻北京的代表处。

8. 与中国政府就保留和方便苏联红十字医院活动达成协议。若达成协议，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部分医生转为苏联在华专家顾问。

9. 讨论关于进一步保留苏联在华巡视员机构的问题。中国在苏联尚无自己的巡视员。

三、每年有关商业和经济问题的谈判均在莫斯科进行。考虑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此类谈判可在莫斯科和北京分别进行。

四、苏联专家对华援助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和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来管理的。应考虑仔细研究这些协议，统一专家的工作条件，并争取出台一个单独的协议，要涉及6年前就已确立的以外汇结算苏联专家公差的补偿金问题。

五、在中国，苏联大使可以定期拜见中国领导人并举行会谈，他们有广阔的途径可以获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我们应该考虑，应极大地扩展中国大使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及外交政策措施的了解层面。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委员曾会见驻华的苏联大使，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会谈。我们也应组织驻苏的中国大使与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开展此类会谈。

六、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改进苏联与中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协作。

七、应采取措施扩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及科学家与中国重要人物的接触(非正式访问，共同组织休假、短途旅行、会议等)。

八、一般而言，中国赴苏联的代表团要由一名部长或副部长带队。我们应考虑派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或代表组成赴中国的代表团。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九、苏联的报刊只是以简短的形式刊登领导人的文件和报告，而一些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报告和决定(例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6年9月1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甚至都没有被提及。我们的报纸和杂志在编辑时应注意，不容许忽视中国领导人声明的重要文件。

十、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有大批苏联侨民聚居，也有一些是没有苏联国籍的人(来自帝俄时期)。我们应考虑将苏联侨民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可以委托大使和中国朋友研究这个问题，请他们就遣返和接纳这些人中的中国公民提出具体的建议。

十一、苏联在中国有7个领事馆，而同时中国在苏联只有两个总领事馆。我们应考虑关闭苏联驻沈阳市和伊宁市的领事馆。

十二、苏联在中国有7所学校，超过1 300名学生和100名教师。我们应考虑削减在华学校的班次，取消8—10个左右，并严令禁止超过学龄的儿童到这里就读。

……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д. 37，п. 414，л. 8－10

№097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

(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0日会议第49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成员：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Г. М. 马林科夫、В. М. 莫洛托夫、М. З. 萨布罗夫；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К. 朱可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Д. Т. 谢皮洛夫；中央委员会书记：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①

绝　密

第1项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① 在所形成的会议记录中，错误地把М. А. 苏斯洛夫列入出席和就此问题进行发言的人员之列，而苏斯洛夫只参加了10月28日关于匈牙利局势问题的讨论，此后一直到10月31日，他一直逗留在布达佩斯。——原注

(苏斯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萨布罗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朱可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

通过经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修改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文本。

宣言文本于10月30日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转播,1956年10月31日在报刊上发表。

附件:

关于第49号记录第1项

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

苏联对外关系的牢固基础,过去是和今后仍然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这个政策获得了最深刻和最连贯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使社会主义各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的友好大家庭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不仅不排除,而且正好相反,要求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和互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被粉碎之后,人民民主制度在欧亚一系列国家里,在这一基础上表现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制度生成和社会关系深刻的革命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困难,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任务和直接的错误,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方面以及一系列降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原则的意义的一系列错误。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坚决地谴责了这些错误,并提出了任务,即苏联在自己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列宁主义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

苏联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在尊重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主权的这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创造条件。

正如最近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苏联有必要就其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首先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方面自己的立场作出相应的声明。

苏联政府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起,共同讨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的措施,以便消除破坏经济关系中的国家主权、互利和平等原则的任何

可能性。

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顾问人员。大家知道，在新的社会制度形成初期，苏联根据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请求，向这些国家派出了自己的专家人员——工程师、农艺师、科学工作者、军事顾问。在最近时期里，苏联政府多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关于召回自己的顾问人员的问题。

鉴于目前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已经在国民经济和军事建设的一切领域里，形成了本国专业干部队伍。苏联政府认为审理关于苏联顾问人员继续逗留在这些国家的适宜性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在军事领域里，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华沙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其参加国应该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包括接受"为加强其防御能力、使其国家人民的和平劳动免受破坏、确保其边界和领土不受侵犯和对抗一切可能的侵略行动所必须的协商一致的措施"的义务。

大家知道，根据华沙条约和政府协议，苏联军队驻扎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和国里。在波兰共和国里驻扎的苏联军队，是以四大国波茨坦条约和华沙条约为依据的。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没有苏联军队。

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安全，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的参加国，共同讨论关于驻扎在上述国家的苏联军队的问题。同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那个共同原则，即某个国家——华沙条约的参加国——在另一个国家境内——华沙条约的参加国——部署军队，是根据其全体参加国相互间的协议和只有在那个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并按照它提出的请求布置军队或者指已经部署的这些军队。

苏联政府认为正值匈牙利事件发生之际必须作出声明。事件进程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了巨大进步的匈牙利劳动者，提出关于必须消除经济建设领域的严重缺点、继续提高居民的物质福利水平、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不久，反动的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就加入了劳动者这个合理和进步的运动，他们企图利用部分劳动者的不满情绪，颠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在那里恢复旧的地主-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政府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对于匈牙利事件发展导致的流血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

根据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军和匈牙利政权机关整顿城内秩序。

考虑到苏联军队继续停留在匈牙利，可能会成为局势更加尖锐化的借口，苏联政府已经向自己的军事指挥部下达命令：当匈牙利政府确认这是必须的，苏联军队立即从布达佩斯市撤出。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准备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联军队在匈牙利境内逗留问题举行相关的谈判。

捍卫人民民主主义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重要和神圣的义务。

苏联政府表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允许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动摇

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的,这是每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建立和巩固的制度。他们将付诸一切努力,消除在继续加强民主主义基础、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继续发展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经济和文化,以便不断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他们将为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与互助。

1956 年 10 月 30 日

ЦХСД,ф. 3,оп. 14,д. 69,л. 1,4－8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5,л. 25,26－30

№097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

(1956 年 11 月 1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1 月 1 日会议

第 50 号记录第 1 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和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米高扬等同志)

撤出军队的要求已经变成全国性的。

反苏情绪高涨。

(米高扬同志)

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

现在任何力量也无济于事。

参加谈判。(再等)10—15 天。

如果当局将逐渐堕落,到时再决定怎样行动。

绝不能让匈牙利脱离自己(我们)的阵营。

目前不要与军队闹翻。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再作决定,我们是否撤出军队。

再等 10—15 天,支持这个政府。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到时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
苏斯洛夫同志：
政治局势不稳定。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已经紧紧逼近。
近日局势将会明朗化。事件在很平静地发展着，但是没有党的监督。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出现了分裂——党内斗争转入公开化。
我不认为纳吉组织了暴动，但他的名字却被利用了。
这个政府能否保存下来，没有保证。
只有借助于占领行动才能拥有支持我们的政府。
谢罗夫同志：
发言稿是经过认真准备的。纳吉与暴动者有关系。
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应该占领这个国家。
布尔加宁同志：
通报 195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决议以及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
布尔加宁同志：
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将失去匈牙利。
科涅夫同志：
布达佩斯处于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无政府主义蔓延，反动派获得了胜利。
决定：实施占领。
卡冈诺维奇同志：
讨论是复杂的。中国人表明了意见：我们不能撤军。
从客观上讲，极端反动的运动。
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应该等待太久。
反动势力在进攻，而我们却(不)进攻。
福尔采娃同志：
对宣言的反应。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将匈牙利拱手相让。
(朱可夫同志)
没有理由重新考虑 1956 年 10 月 31 日决议。
不同意米高扬同志关于(应该)支持现政府的意见。
行动应该坚决果断。取消一切废话。解除反革命的武装。
阻止前往法国的议会代表团。
使驻布达佩斯大使的家人前往布达佩斯。
议会代表团前往泰国的事应重新审议。
布尔加宁同志：
根据 10 月 31 日决议精神采取一切行动。

朱可夫同志：

一切都会就绪。我们在宣言的基础上行动——

调动军队——使一切就绪。

苏斯洛夫同志：

现在局势已经变得更加清楚了。

摆脱诚实的人。

(措施计划)分送：朱可夫、苏斯洛夫、科涅夫、谢罗夫、勃列日涅夫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1]

(米高扬)

关于我们驻在匈牙利大使馆的情况。

(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朱可夫、谢皮洛夫)

大使馆暂时保留。关于主要问题。

谢皮洛夫同志：

两条路：考虑运动的群众性不去干涉；另一条路：动用武力。

还有第三个结果：加以干涉，但反动派胜利了。

谢皮洛夫同志：

目前的局势：反革命叛乱结束了，国体改变了。

主要的方向是反苏的，主要方向的力量来自外部。

如果再不采取坚决的行动，那么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也会崩溃的。

利用武力恢复秩序。

米高扬同志：

如果匈牙利变成帝国主义的基地，那么就无话可说了。

话题指的是对今天局势的评价。

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应该太死板。

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主意。

策略是：与他们保持接触。

苏斯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匈牙利同志——

研究制定措施(依靠什么样的干部，今后我们将如何行动)。[2]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19 - 22

---

① 1956年11月1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② 在这个阶段会议所通过的决定，没有形成记录。——原注

№20586－1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

（1956年11月5日）

1956年11月1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0月30日至11月14日
第330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5日

……[1]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的请求接见了他。

在简短的礼节性谈话之后乔晓光问我，是否知道在执行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上朝鲜同志采取了什么新的措施。乔晓光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我说，在我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曹克强谈论过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朝鲜同志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消息说，朝鲜领导人预计将批准崔昌益为保护国家物质文化遗迹的国家委员会主席，而朴昌玉预计被批准为建设马顿(Мадон)水泥厂的领导人。通过从非正式渠道得到消息我们还得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前不久召开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

乔晓光请我谈谈朝鲜同志是怎样看待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的那次访问的。我回答他说，如果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进程来判断，那么朝鲜同志的回应应该说是积极的，但是，绝对地肯定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我也请乔晓光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乔晓光回答说，关于朝鲜同志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访问的反映他目前还没有得出一定的结论。

我问乔晓光，现在在中国的尹公钦、李弼奎、徐辉和金刚是否知道他们已经被恢复了朝鲜劳动党党籍，他们是否考虑返回朝鲜。

---

① 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乔晓光说，这些同志都知道这些决定。他们还是不愿返回朝鲜，他们想请求朝鲜政府允许他们的家人到中国去，因为他们也知道朝鲜政府不会坚持让他们返回朝鲜。乔晓光接着说，尹公钦、徐辉、金刚和李弼奎在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朝鲜领导人说，朝鲜领导人在朝鲜获得解放之后这段时间以及在战争年代清除了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使用反民主的方法领导国家和劳动党；不能正确地使用和教育领导干部。他们认为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和韩相斗这些人不能胜任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朝鲜领导人还被指责没有为反对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

乔晓光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其他的材料来证明上述这些人在信中所说的内容，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理解并谨慎地看待这封信的内容。

我通报乔晓光说，朝鲜领导人免除了李相朝朝鲜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并请求苏联政府同意李新八为朝鲜驻苏联大使，李新八现在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职务。从朝鲜同志那儿得到消息说，李相朝拒绝返回朝鲜，并且，他大概是想留在中国。

我问道，中国大使馆是否有朝鲜劳动党 8 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乔晓光回答说，他们没有这个决议，但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把这个决议转给了毛泽东。

大使馆一等秘书 Г. Е. 萨姆索诺夫参加了这次会谈。

这次谈话由中国大使馆翻译员王保民翻译。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 伊万诺夫(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2，л. 367－369

№20376

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

(1956 年 11 月 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市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9 周年——苏联人民的盛大节日之际，请接受我的诚挚祝愿。

我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在未来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取得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

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刘晓(签名)

1956 年 11 月 6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H. C. 赫鲁晓夫同志(收)

莫斯科。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64, л. 80

№11453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

(1956 年 11 月 10 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年 8 月 27 日在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实现 1956 年国家计划过程中，遇到了居民日用品不足的困难，请求在今年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 4 000 万卢布的长期贷款。越南政府原来打算将这笔贷款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筹措资金项目在 1957 年向苏联政府提出。越南政府建议在政府间今后的长期贷款谈判中讨论结算的期限和方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拟将上述 4 000 万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棉布、面粉、食糖、医药、化肥、黑色和有色金属等)。同时还使用其中的 500 万—600 万卢布，为军队购买物资(汽车及汽车零配件等)。

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商务处的代表支持越南政府的请求。

我们在讨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上述请求之后特报告如下：

1955 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 4 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和 3 000 万卢布的贷款。贷款用于支付向越南军队购买设备和材料，只偿还一半的价格。

此外，根据苏联政府 1956 年 6 月 6 日的决定，苏联已经无偿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军队提供了总价值 2 400 万卢布的汽车和其他物资。

在提供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4 亿卢布无偿援助中，已经有 1.93 亿卢布用于供应设备，在 28 个工业企业的恢复和建设中给予技术援助。截至 1956 年年底，已经提供了约 6 500 万卢

布的设备和技术援助,这笔资金的剩余部分除了从前已经拨出用于建设鱼类罐头厂,而越南政府又认为不宜建设的500万卢布外,将留作1957—1958年使用。

2.02亿卢布用于提供商品,其中食品、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原料占了65%。在无偿援助账号内提供的商品,除了原定于1957年提供的价格1 100万卢布的挖泥船之外,其余的已经在今年结束提供贷款。

今年内,依据贷款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无偿向军队提供的物资也将全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提供了1.5亿卢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朋友提供的资金中,截至今年9月1日仅使用了1.4亿卢布。

据范文同同志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力向居民提供足够的消费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手工业原料。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又无外汇从国外进口商品。由于商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从今年年初以来工业消费品上涨了20%—25%。由于完不成商品的销售计划,对国家预算和货币流通也造成威胁。

我们认为,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三年计划尚未结束,目前考虑向其财政提供信贷问题为时尚早。如果在制定三年计划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那么这个问题宜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议为妥。

苏联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认为,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前遇到经济困难,可以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3 000万卢布的商品贷款,供其在1956年第四季度和1957年用于购买日用品。此外,还可以提供500万卢布的日用品,从在宜安没有建设的鱼类罐头工厂经费中支付。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大部分尚未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还可以从中国得到所需的人民生活必需品。

АВПРФ,ф.022,оп.9,п.134,д.56,л.19－21

№223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6年11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3日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Л.И.勃列日涅

夫、Г. К. 朱可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 7 项　发自布达佩斯的密码电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别尔乌辛、伏罗希洛夫、朱可夫、萨布罗夫。

同意会晤。[①]

派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哪些国家(参加)？不包括南斯拉夫。

中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华沙条约国家。

委托马林科夫准备给匈牙利人的信："同意你们的建议，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会有益处的。

"我方的代表团成员为：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同意召开兄弟共产党会议。代表团将阐述我们的立场。"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6，л. 49

№20560－1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

（1956 年 11 月 19 日）

1956 年 12 月 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В.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11 月 14—28 日
第 343 号

绝　密

---

① 在 1956 年 11 月 12 日通过 Ю. В. 安德罗波夫转交给苏共中央的卡达尔的信中通报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它提议在近期在合适的地点，召开苏联共产党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建议在会议上，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相互关系，包括民族的问题。"（РГАНИ，ф. 3，оп. 14，д. 76，л. 3，6.）——原注

平壤市

1956 年 11 月 19 日

拜访了南日,并转告他说,根据金日成请求苏联相关机构采取措施尽快为兴南化工联合加工厂运送建设设备的请求,11 月 7 日运出了 2 台混凝土搅拌机,每台容量为 425 升,最近还将运出泡沫混凝土搅拌机以及深度混凝土探捣器。

会谈中南日说,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马顿水泥厂的总指挥。朴昌玉请求把他派往最艰苦的工地,以便证明他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根据南日的意见,他可以这样做。在 11 月 8 日的会谈中,金日成也这样说了。他说,就让朴昌玉担任建设总指挥一年时间,以表现自己。

关于崔昌益,南日说,他被委任为历史物质文化纪念碑管理局的局长,这一部门将从文化部中分离出来并隶属于内阁办公室。然而崔昌益拒绝了这一职务,并请求让他作为院士从事科学工作。南日的意见是不适合让这样重要的领导人担任自己的下属。

在谈到党内的局势时,南日说,不能认为 8 月中央全会上的反对派已经放下了武器,因为朝鲜朋友知道,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别是来自科学工作者圈子的一些人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工作者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

南日说,9 月中央全会之后跑到中国的那些工作人员,看起来是不打算回到朝鲜了,朝鲜朋友们认为,他们将不会放弃攻击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打算。如果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家人也带入中国,他们将不会反对。

接下来南日说,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写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他被解除了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诬蔑我们,同时他也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或者把他转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学习。

在谈到同波兰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谈判过程时,南日说,在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时候,哥穆尔卡担心苏联领导人不会同意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但是在谈判中这些疑虑都被打消了。

然后他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把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请去并向他们通报了匈牙利事件,当时说,我们的苏联同志把哥穆尔卡错误地看作右派民族主义者,而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他的错误看法。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1,л. 287－295

№21478

安德罗索夫致苏共中央联络部函：提交中国留学生对苏联印象的信

（1956 年 11 月 20 日）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现把在莫斯科地质学院二年级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彭瑞桑(Пэн жуй-сан)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信件发送给您，以便了解情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党委书记

H.安德罗索夫

1956 年 11 月 20 日

附件：

莫斯科地质学院大学生彭瑞桑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

（1956 年 10 月 4 日）

亲爱的《人民日报》主编同志：

首先，请原谅我在您非常繁忙的时候打扰您。我是在苏联学习的一名中国大学生，是一名党员，在莫斯科地质学院学习。今年夏天暑假期间我同一些苏联大学生一起到了北高加索，帮助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割庄稼，我在那里待了半个月，并且在那里对苏联有了更多的了解。现在我想把我的见闻告诉给您，同时也想谈论一些关于我国宣传工作的意见。

我们的国内总是在宣称说，苏联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在谈论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高尚的品质。我们刚到达苏联的时候，充满了在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但是后来，特别是在集体农庄工作之后，我开始觉得，事实上情况恰巧相反，因此现在我想依次谈论所有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所有苏联人都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观念，他们都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一些工人的家庭过得不错，他们的钱够花，因此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漫不经心：如果有人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工作一会，而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开始休息。一些人甚至进行欺骗，抬高自己的成绩。比如，一名司机跑了 12 趟车，他却说跑了 20 趟。前来帮助收割庄稼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工作都不卖力，他们需要有人来驱使他们。如果在他们后面没有人监督，

他们就在原地躺下来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仍然要因为微薄的报酬而谩骂领导,而有时候甚至要组织罢工。这种现象绝不是个案。他们也不用心学习,为了不得到“两分”,他们只在考试期间突击背死书,考试期间抄袭现象非常盛行,对于那些不抄袭的人,他们感到不能理解,也感到奇怪。他们经常说:“我们要多休息,我们有吃有穿,还担心什么?”

他们中很少有人珍惜同学间的友谊。没有两个能够相互关心的好朋友,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分享给其他人。在半个月的集体生活和工作期间不得不多次请求,让他们帮助洗衣服、值班、挑水或者洗盘子。总的来说,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像我们的同学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理解,相反,他们经常会暗地里相互怀疑,在他们之间很少能够看到像在我们的同学们之间能够看到的集体主义的温暖。

苏联人的纪律观念非常差,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纪律。需要保密的东西通常都不能保密,他们总是说:“我们能够对自己在学习上的同学和在工作上的同事保守秘密,但是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难道能够对家人也保守秘密吗?”

至于共青团的工作,他们做得也不够好。没有发现他们开展任何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哪位基层组织和支部的领导人非常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绪,很少有人在组织生活中对思想上的不足展开批评。

苏联集体农庄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应受到强烈的怀疑,他们在工作中很少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他们就没有这样做),有一些管理干部跑来跑去,当他们跑到一个地方,发现不好的情况之后,就开始大骂起来。他们不去弄明白事情的真实情况,通常他们谩骂的都不是那些需要被谩骂的人,而是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人们不听领导同志的话。没有看到哪位领导人能够耐心地开展工作,去说服和动员群众,所有工作都是自上而下地开展。而另一些领导人只是在使用干部,而没有表现出对群众的关切。比如,有一次他们派出了一批年龄为10多岁的一群孩子到10公里之外的地方挖土豆。结果孩子们浑身都湿透了,冻坏了,一直到了晚上10点才回来。

苏联的工资制度也不合理:经常存在的情况是,干了重活得到的很少,而干了轻活却得到了很多。因此,同我们一起前来的大学生经常组织罢工。

苏联的社会秩序也很差,酒鬼和骗子非常多,即使在节日的晚上,姑娘们也不能一个人上街,但是人民和社会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苏联,不良的情绪要比健康的情绪严重(当然,也有一些健康的情绪,但是在此我就不谈论了)。

相比而言,上面所述都是在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不得不进行观察,并就我们的宣传工作产生了一些想法。

首先,现在我们的民族是非常好的、令人满意的、不断发展的和健康的,我非常担心的是,在今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我们的民族也开始逐步变质。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汲取苏联的教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并且一直贯彻下去。

第二,在报纸上发表和广泛宣传的只是一些非深层次的问题或者宣传的只是一些好的东西,对此我不同意。这会引起人们对我国宣传工作的不信任,并且他们会证明说,事情不是这

样的。有宣传说，苏联的这好，那好，一切都好，但是当我们在苏联生活的时候却看到的是这样不良的现象(当然，事实上也有好的现象)。因此，我们怀疑，我们的宣传是否脱离了实际，对于报纸上的宣传：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积极地参加生产工作，我们怀疑这是否符合事实？

第三，我不能同意某些领导干部的做法，他们不能区分黑白是非，大肆吹嘘说，苏联的某些东西是好的，把一些缺点看作是好的东西，把个别人的优点看作是整个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和看法。或许，其中有许多错误，因此我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如果我的上面所述有一些正确的东西，那么请提请相关部门予以注意。

此致

敬礼！

莫斯科地质学院二年级大学生

彭瑞桑

1956 年 10 月 4 日

(来自《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22 日第 2028 期)

什利亚普尼科夫翻译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237－241

№21487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

(1956 年 11 月 21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6 年 11 月 23 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 Т. 费德林同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Ф. 库尔久科夫同志

情报委员会：

兹呈交中共中央就苏共党史教学问题召开的会议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主要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秘密资料拟定。

附件共3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附件:

呈交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资料

今年6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鼓动与宣传部理论宣传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党校召开了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以及那些开设了中级党校课程的初级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负责人。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高等教育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师范学院的负责人。

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关于苏共党史研究的问题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创建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会议发表了对未来这一课程研究前景的基本看法,批评了苏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善这一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会议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尽管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着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指出的不足,其中包括与个人崇拜相联系的不足,还是应该继续在中国党校研究苏共党史。这是必要的,因为苏共党的历史经验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地位问题、革命斗争的战略问题、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会议指出,研究苏共党的目标是研究苏共党的主要经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原则。至于一些历史琐事,个人功过的大小,即便是不了解这些内容也不会对苏共历史主要内容的讲授产生障碍。此外,在会议上提到,我们不需要将苏共党史授课方面的工作深化到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对个别人物的评价。

会议指出了苏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主要不足,比如: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死板。这表现在,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科书的每一个句子都被看作是经典结论,认为这本书是完全正确的,是对苏共党史的完美概括。这导致了掩盖历史,文过饰非,并偏离了一些根本的切合实际的政治方针。在党校中和其他学校中的苏共党史教研室过分关注教学方法,这有损于对课程主要内容的创造性研究。学生把主要时间花在了写提纲、死记提纲上面,没有深入关注问题的实质。在教学中缺少创造和创新,或者教学大纲和讲义被视作是公式化的、不变的东西,教师和学生的观点实际上被"一条绳子连接起来"。

会议同意中共中央的如下观点:为了改善今后苏共党史教学工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将有极大的意义。必须研究苏共党史,从这一文件的精神出发,在教学过

程中特别关注无产阶级专政。每一个教研室都应该像研究历史科学一样研究苏共党史，积极地、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正确地向学生们叙述苏共党史。为了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需要向教师和学生们提供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进行论战的机会。考虑到时间不足和中级党校的大量课程，必须缩短苏共党史的授课时间，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等主要科目。今后苏共党史的授课时间占到中级党校所有授课时间的8%～10%。会议委托高级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在1956年10月前制定与新的教学方法相适应的教学大纲，并与中级党校苏共党史教研室的负责人讨论该教学大纲。中级党校苏共历史教研室自己应该积极地制定新的教学大纲。

关于第二个问题，会议决定，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所有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都应该进行这项工作。准备的方法是：要逐渐把苏共党史课程扩充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今后打算首先把第一和第二国际的篇章补充进苏共党史课程，然后把第三国际之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篇章补充进来。

最后，会议指出了成功教授苏共党史对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基础的重要性。

Г.什利亚普尼科夫

文件5份，送：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ЦХСД，ф. 5，оп. 28，д. 485，л. 52－55

№20560－3

伊万诺夫与朴义琓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

（1956年11月22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 年 11 月 22 日

参加了在朴义琓那儿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审理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会后应朴义琓的请求同他进行了会谈。

朴义琓说，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还没有完全缓和，党内气氛仍然紧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像 8 月中央全会前一样变得复杂化。

朴义琓对此解释说，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朝鲜朋友们还没有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在工作中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生活准则应用得还不够。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次会议上金日成说，他同意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建议，只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访问变得复杂些，而实际上他是不会同意关于 8 月中央全会决议操之过急和决议不正确这种意见的。朴义琓强调说，他和南日坚持必须贯彻实施朝鲜劳动党 9 月中央全会决议，在此之后，金日成同意了这些意见。

然而，在此之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继续犯错误，这让人想起了波兰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 9 月中央全会之后平壤市委许多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以及个别同情崔昌益的内阁相、或是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更换了职务，他们或者被派往僻远的省份工作或者被开除出党。金日成说，因为参与崔昌益集团并应该负责任的个别人，也应该为朴义琓、金承化以及其他领导人有这样的看法负责。

朴义琓从他在朝鲜 11 年的工作经验中得出结论，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早晚会被迫跑往苏联。去年为反对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而发动的运动带有反对苏联的性质，这类似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朴义琓说，他打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作到 1957 年 5 月，然后应该会到苏联去，因为他不能在得不到信任的环境中工作。

我认为关于朴义琓到国外去的问题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管理的事情，对此朴义琓引用了罗科索夫斯基的例子，他说，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在朝鲜的情况同他完全相似。当他提出这一问题时，他请求被接受为苏联公民并回归到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中。

在谈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 9 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讨论问题时，朴义琓说，这些材料在各道、各郡以及党的基层组织都被讨论。各级内阁相级别的党组织把朝鲜劳动党 9 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决议的最后文本。参与这次会议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佩利申科。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11, л. 295 - 296

№23062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6 年 11 月 24 日)

摘自 H. T. 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11 月 24 日

机 密

第 165/НФ 号

接待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1956 年 11 月 24 日)

今天 12 点正，我接待了刘晓。

1. 刘晓谈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苏的情况。据刘晓说，在指出代表团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和服务之后，鉴于在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彭真在自己的发言中又强调了如下内容：1. 中国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的道路；2.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唯一中心；3.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堡垒。

在此，彭真还特别指出了进一步巩固苏联与中国的团结和友谊的必要性问题。

我本人也表示，请中方及时向我们通报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下一步安排情况以及代表团成员关于代表团的工作问题可能存在的各种意见和针对苏方可能存在的各种要求。

2. 刘晓请求我们协助中国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八大获得签证。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彭真(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刘长胜，随行人员——代表团秘书张蓓飞(Чжан Пын-фэй)、翻译齐宗华和李茹华(Ли Жуй-хуа)。刘晓说，他们已向意大利使馆提出了签证申请。但考虑到意大利使馆可能会对此进行阻挠和拖延，刘晓请求(我们)与意大利的意共中央取得联系以加速签证的办理。

我承诺将给予协助，并说我们会把中方的这一请求向苏共中央通报。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和三等秘书 K. Л. 克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 费德林(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382，л. 181

№16686－3

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观感

（1956年11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我有幸同苏联作家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了25天。我们走遍了中国的主要省份。我们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中国人、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普通老百姓，谈了很多、很久，而且正如我们感到的，谈得很亲切。在我们的交谈者中，有著名的作家、院士、省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地方中苏友好协会的负责人、投产及在建工厂的厂长和工人以及农民和农业合作社社员。

有鉴于此，我认为把在我看来同中国进行社会性联系的我们的组织工作中存在很严重的缺点告知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作为党员的义务。

正如我感到的，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老化了，妨碍了这种交流的进一步巩固。

1．中国早已存在中苏友好协会，由极有威望的新中国活动家之一宋庆龄同志领导。我们在中国旅行时到处（在大城市和小乡村）接触了该协会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到处看到的普及推广苏联成就的展览会，在工厂甚至在遥远的乡村经常举行的关于苏联的报告，普及苏联文学、苏联电影等等。这个协会有数以百计的会员，是个很活跃的、有战斗力的组织。在同该协会领导人的座谈或我们在作报告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好像是授意的："苏联有类似的协会吗？有多少会员？"如此等等。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同所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中国的朋友在我们那里有两亿。——回答不太令人信服。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协会。这就在相互推广成就方面，造成了某种不平等，并且正如感受的，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社会舆论。我想，已经到了赶快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时候，并至少在共和国首府建立分支机构，使这种组织变成社会驰名的，安排著名社会活动家当领导，并开展相应的工作。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按章程应该同时造福于所有的人，但看来，这个协会的角色是不能完成的。我想，应当出版苏联报纸《友好》的中文版本，以便让中国人获得第一手的最有意义的苏联新闻。正像我感到的，作家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即在北京和莫斯科出版相应的书目参考手册，它关注那里和这里最有意义的苏联文献和中国文献，并且推荐所有文化和科学问题的最重要文章，并加内容简介以用于阅读和翻译。这样做有助于把翻译事业引向精确和正确的方向，以便两国根据相互推荐而翻译最优秀的文献。

2．对所有来中国的苏联活动家，中国同志都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他们的部长和国家头面人物，甚至把接待次要代表团，并同他们座谈当作自己的职责。可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

给予同样的回报。在我们这里，所有代表团被一刀切。再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对苏联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礼貌，正像我感觉到的，中国人有权指望我方的充分回报。这也涉及代表团的接见和对代表团的招待，尤其是中国同志与领导人员的会见。特别是与此相关的社会措施，我们这方面事情差得不可容忍。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举办了苏联电影联欢节。联欢节办得像重大的文化节日，工厂和乡村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提出了报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联欢节是在人群何等拥挤的情况下度过的。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相应举办了中国电影联欢节。传到中国的报刊报道说，这次联欢节，像对待例行"措施"一样，只求做上记号来报告一下联欢节举办过了。郭沫若在告别座谈中有礼貌地提请我注意这一点，并且说："大概我们的电影已差到如此地步，不值得苏联观众注意。"要知道，中国人不是随便说说的。显然，这样做留下了相应的遗憾。

3. 在中国，我们早就牢牢记住由于各种原因而忘却的和往往因没有功劳而忘却的人们。他们是列宁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使者以及巩固中苏友谊的带路人和奠基人。中国今天领导人的青少年时代，与马林、越飞、鲍罗廷、布柳赫尔这样的人，其他与孙逸仙并肩战斗而闻名中国的人，广东农民讲习所和黄埔军校的教员及北伐战争参加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已经被忘却。他们的画像和图书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向导会把他们作为中苏友谊的奠基人进行介绍。人们有机会时常记起他们的功劳，并为同他们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等等。我们也怀念他们。正如我感到的，如今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某种不妙的状况。我想，为了我们能知道以前奠定友谊基础的人们的名字，如果不是全部，那么部分也好，为了中国人能知道这一点，同中国的友谊是值得的。这样马上就能使他们和我们摆脱我们之间现存的某种不妙的不协调之处。

4. 我认为已经到了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在中国工业中苏联顾问工作组织的时候了。他们大多数是优秀的人士，拥有丰富的有意义的经验，很有知识，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他们，中国同志创造了少有的条件，不规定他们的工作日，用最好的火车把他们分送到全国，将他们安置在宾馆最昂贵的房间内，吃饭时以宴会的方式供养着他们，如此等等。中国人是很节约和讲究合情合理节约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勉强过得去，这不是秘密。这种突出的谦虚是他们的工作作风。我感到，苏联同志在接受被给予的受尊敬的地位和福利方面，表现得太顺从了。我想，该是研究这个问题并指导我们同志的时候了，以使他们不把所给予的特别福利当作是理所应当的，以使他们生活得节俭些，不使中国人过度破费，而应满足于自己的工资，顺便说一句，工资通常是很高的。为了说明现状，我敢于把一位苏联著名学者的私人信件当作本报告附录寄给自己在莫斯科的学者同志。在这封不是为了报告的信件里，我感到，这位聪明和有远见的苏联人、共产党员，揭露了苏联专家和中国人相互关系中的所有不足。对这些不足，我们有机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从我们的工程师那里听到。我经收信人同意附上这封信。

5. 最后，关于实现莫斯科与北京联系的苏联段航线问题。我们的国际航线，在西方国家的工作有了某些改进，但是在这一段，仍处于极差的状态。由于该航线总是有大量不同国

家的人流,从欧洲来到中国,这一段航线出现的马虎行为已经变成了政治事件。10月16日,以中央委员为首的中国国家安全代表团从波兰回国时所乘的我国飞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转机时滞留了整整一昼夜,原因是没有找到必需的燃料。在归途中,我们不得不离开在新西伯利亚的国际班机,因为继续乘飞机去莫斯科的旅客比较少了,并在那里换乘了汽车。要知道,乘这架飞机的有以外贸部长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两个航班上发生两个错误。航空港的建筑物是宏伟的,而其中的服务仍像处于小木屋里那个时候。在同中国保持联系的该航线的三个地方,都高挂着众所周知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印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纳尔班江画的复制品,在画中,毛泽东的样子就像一名通过了教授考试的激动大学生。即使这幅画是真品,都会令人感到恶心,可是至今那里还挂着它的商业性复制品。一般来说,最好是根据外国模式,用飞机着陆城市和地区的大幅美丽的照片来装饰机场围墙,而不要用著名巡回医疗展览派艺术家优秀画作的拙劣复制品。这些拙劣复制品只会引起稍有一点鉴赏力的人不寒而栗。在新西伯利亚飞机场入口的对面,两根柱子上挂着一大块胶合板,文字标题为"苏联——世界社会主义主要强国"。标题上画有一幅大大的红色苏联地图,旁边有两栏,由人民民主国家的地图组成,但大小只有苏联地图的10%,地图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这样,中国在此顺序中排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挂起这幅地图的新西伯利亚的同志,完全失去了幽默的感觉,因为大地图上标出人口为2亿,而小小的中国地图上标出人口却有6亿。我们自己看到,外国人是如何站在这幅地图旁拿它寻开心的。我感到,务必对这条航线进行最严厉的检查,并且责成一些州的党委经常关心自己区段的工作、航空港的文化状况以及服务等等。

由于该航线苏联段和中国段间的不同已经太明显了,所以我感到这也是政治问题了。

Б. 波列伏依(签名)

1956年11月26日

维诺格拉多夫(召集人)、基里林、留里科夫、佐洛图欣同志:

请审核一下Б. 波列伏依同志的报告,并准备建议。

……(1)

1957年3月16日

АВПРФ,ф. 5,оп. 28,п. 126,д. 506,л. 87-93

---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2056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

（1956年11月28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8日

拜访了金日成并向他转告了匈牙利的局势。

在这次会谈结束之后金日成说，匈牙利的致命弱点是缺乏党组织，为了改正匈牙利劳动党领导人和政府所犯的错误，就不应该忽视党，要依靠党组织在实践工作中消除错误。

然后金日成说，卡达尔在自己的讲话中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一场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说，铁托也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一场革命。对于铁托这一发言的后果，个别朝鲜工作人员认为铁托向社会主义阵营接近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作出了错误的评价。

有人对我说，南斯拉夫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要团结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把那些维护和平的国家吸引到自己一边，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事业。铁托的错误言论不应该在国内向全体人民传达。

金日成然后说，从波兰匈牙利事件中他们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打开缺口，企图分裂苏联和其他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美帝国主义者唆使李承晚进行各种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最近李承晚政权号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起来反对民主制度。

金日成说，波兰匈牙利事件警示我们要坚持专政，不能满足，不能丧失警惕性。尽管朝鲜劳动党的党内状况是牢固的，朝鲜的国内状况是稳定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还是把中央委员会委员派往各道，去推进地方上的工作。11月27日地方人民权力机构的选举显示，几乎100%的居民参与投票，超过99.8%的居民投票支持人民阵线代表候选人进入各郡和各道的人民会议。

各工厂第一和第二级的党委委员长、各道委主席都被召集开会，会上向他们解释了波兰

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并且因此提出了现实任务。金日成亲自同他们谈论这些问题。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宣传工作中阐释了工人阶级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主人,这与南朝鲜的情况不同,南朝鲜的政权属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在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方面我们党也做了工作,同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畸形现象进行了斗争,在党的工作方面着重于对党员进行解释和教育工作,在于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进行斗争,在于遵守党的生活准则。

对于在我国北部的南方人,党组织也开展了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生产生活当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为他们开办技术学校以及一所党校。南方人,特别是南方青年目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还不信任,我们的任务在于消除这种不信任并赢得他们的支持。

国际关系方面工作的着重点在于巩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友谊,在于加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

经济领域提出的任务是保证日用商品生产的增加,为此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国内的资源。为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在12月10日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在咸镜北道增加农业生产的问题,而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月全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增加捕鱼量和扩大渔业生产的问题。

因此,今年的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将会比去年好一些,除了两个道,农民们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他们对日用品的需求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到今年年底将提供1 000万米布匹,然而,看起来这还不够。

然后金日成通报说,在1957年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了大额逆差,本想通过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额外援助或贷款来弥补这一缺口。然而,周恩来在赴越南访问前夕召集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大使,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国内状况,然后说,中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不能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义务。

在审视了朝鲜驻北京大使的这一通报后,朝鲜的同志们反对派遣贸易代表团同中国谈判,并指示国家计划总局考虑这一声明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他们将被迫不得不减少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煤和煤气。然而,他们却不得不请求苏联于1957年额外援助1 500吨棉花。要考虑到一些情况再制定计划。

然后金日成说,1957年最高人民会议将进行选举。他指出,最高人民会议中有180名南方人。一些朝鲜同志就有了疑问,是否按部就班地保留所有的南方人代表或者也对他们进行重新选举,只保留足够的代表数额。

金日成然后谈到了他们所提出的货币兑换问题。到现在他还不明白,流通中需要多少货币,150亿或200亿朝鲜元。货币是否足够。同时也有一些假币在流通。1946年北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已经不符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现状了。

朝鲜同志提议按照1∶1的比率兑换现有货币。这将不是货币改革,但是,在兑换货币

的过程中可以废除现在整个荒唐的货币体系，并改变货币体系的形式，使其更完善等。

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看起来，解决这项任务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不得不请求苏联印制货币，并将向苏联派遣必要的专家小组。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1，л. 297－300

№20560－5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问题

（1956年11月28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8日

拜访了南日，并转达了苏联政府对朝鲜政府备忘录的答复，这个备忘录表述了朝鲜政府对联合国第十一次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立场，这个备忘录是今年11月5日由大使馆转交苏联政府的。

在知道了苏联政府的答复意见之后，南日满意地说，在朝鲜问题上苏联政府的立场和朝鲜政府完全一致，并说，今天他就将把这一答复报告朝鲜政府。

然后南日通知我说，这个备忘录他们也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答复中也同意朝鲜政府在备忘录中关于朝鲜问题的立场，并在备忘录中提出了针对性措施。

然而，对于由联合国大会审议召开相关国家以及中国参加和平会议的提议，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联合国是同朝鲜交战的一方，因此不会通过这样的建议并作出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决议。

对于这个问题，南日说，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14个国家参与了反对朝鲜的战争，因此，

那些没有参战的国家可能会支持关于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此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事实本身也会对朝鲜有利,不论对这一问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议,因为这是展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意愿的机会。

然后南日说,在朝鲜新大使李新八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新大使应当努力把这一路线贯彻到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金日成强调说,由于众所周知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像铁托这样的领导人的行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南日谈到了前大使李相朝的行为,原来他不是一个好同志。同志们都知道李相朝的亲中国情绪及其对苏联的轻视。然而,同志们都认为这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以及不熟悉苏联真正生活的结果。同志们原都认为,李相朝在莫斯科的工作会对他的观点产生积极影响。

而现在,李相朝却打算留在苏联,南日认为,他不应该为了依靠苏联生活就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在苏联将什么也做不成。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1,л. 301 - 302

№21479

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

(1956 年 12 月 4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1956 年 12 月 4 日
第 1708 - с 号

致苏共中央:

现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报告发送给你。

附件共 7 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
雅科夫列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代表团的建议已经落实。

И. 谢尔巴科夫
1957 年 1 月 16 日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1708-c号
1956年12月4日

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访问的信息报告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苏友协的邀请，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时间为1956年9月30日到11月1日。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了解了中央和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组织和活动以及地方上对司法的管理工作，也了解了法律干部培养工作的组织以及法律方面的科研工作。

代表团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高等教育部的领导人以及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法院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并参观了上海的监狱。

代表团分成几个小组，详细了解了法院、检察院、司法部的工作，了解了高等法律学校、大学的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的教学过程的组织，也了解了政法干部学校教学过程的组织。

代表团成员米舒京同志、帕夫洛夫同志、莫罗佐夫同志、布拉图斯同志和诺先科同志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苏联法律一些迫切的问题和苏联法律的科学问题作了报告，有将近7 000名法律界的实习人员和法学界科学工作者听取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巨大兴趣，并提出了许多问题。此外，应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请求，代表团成员同他们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了20多场会谈。

前不久，在回国前夕，代表团受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

代表团到中国各地进行了访问，访问了南京、上海、汉口和广州，在这些地方了解了一些工业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工作，了解了北京西郊一个名为中苏友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代表团还访问了博物馆和剧院、幼儿园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机构。在中共上海市委、代表团听取了关于把私营工商业企业改造成合营企业的谈话。在北京，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向代表团通报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代表团同中苏友协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举行了会谈，访问了《友好报》编辑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机关的研究证明，这些机构能够顺利解决一些问题，保障和加强中国的人民民主法制。在组织上加强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正在接近尾声。他们的实习活动和任务要服从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提出的任务。但在制定和通过新的法典

(刑事法、民事法、诉讼法)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工作,这些法典都是现有法律的牢固的基础,是国内司法秩序的可靠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注关于法律干部的培养工作,在大学、政法学院、政法干部学校开设法律系以及开办各种学习班对法律工作者进行培训。但是国内缺乏法律干部,因此,法律高校接受的听众的名额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每年这些高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接下来简要地阐述一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体系、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形式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特点以及司法干部培养体系的特点和司法领域科研工作的方法。

一、司法机关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是司法管理机关。其职能包括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通过核查和对其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检查其作出的判决和决定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实施这些功能的不仅仅是司法部和各省司法厅及三个中央直辖市的司法局,还有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的一些专门的司法机构,它们对基层法院及其专门的司法工作者实施管理。因此,司法机构的功能和行使司法权的功能在组织上的区别仅仅在最高的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司法局,而在基层的司法机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则由法院自身来行使司法职能。

还必须指出,司法机关对法院司法权的监督是平行的,而且常常还是一起进行监督的,其途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检查和对其实践活动进行总结。

二、司法系统的特点。与我国的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处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委员会。基层人民法院有几个审判庭(5—7个或者更多),它们是法院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法院没有常设办公地,通常是几个乡共用一个办公地,通过定期去固定的案件审查点开展工作。大多数法官都没有固定负责的下辖地区,这些地区通常都包含数个乡,他们通过定期到一些地点出巡来审理案件。

还应当指出,不太重要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由单独的法官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司法系统的特点是,军事法院不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领导的司法体系之内。人民解放军最高法院隶属于国防部,在组织上同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关系。

铁路系统的法院和水路运输系统的法院的特点是,这些法院审理的只是在运输期间在运输时犯下的罪行,只审理在其运输路线及其办公场所犯下的罪行。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关于助理法官的条例是苏联的司法制度所没有的。助理法官的任务是协助法官工作。在地方法院,根据法官的提议,相关的审判委员会(见下)可以批准助理法官行使司法权。助理法官条例的制定,是由于很多法官都没有受过法律教育。

关于案件的管辖范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最终确定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任何一个法院,从最基层的法院开始,都可以根据案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把下级法院认为应该转交给上级法院审议的案件转交给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审理的时候应考虑下级法院的意见。

审判委员会。所有的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组建了审判委员会,由相关法院的领导

干部组成，其数量为5—7人，或者更多。审判委员会对法院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对一些重要的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也讨论一些审判政策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法院的审判工作。

三、诉讼程序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案件的调查和审议的程序进行调节的诉讼法，但是195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法院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对诉讼程序进行调节的原则。现在法院在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依据的都是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决议所确定下来。

现行的诉讼程序的特点如下：

1. 没有秘密商议室；法院在结束案件审理后有权宣布休息几天，并与法院领导人、党机关的工作人员商议案件的判决。

2. 对于法庭很难宣判或者作出决定的任何一个案件，都可以预先提交给审判委员会；法院在作出判决或者决定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法庭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3. 如果法院院长认为，对案件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案件就要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审议，审判委员会不能撤销已经作出的判决或者决议，而要委托组成新的法庭再次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新的判决和决议。

4. 缺乏明确的对提出的控告进行审议的程序：对提出的控告进行审议是以提出诉状和上诉书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对某些案件的审理程序的确定要依赖审理诉状的法院的考量。

值得指出的是，法院应该组织好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任何公民如果认为任一官员的行为不对，他就有权携带对其行为的申诉书去法院。如果法院认为该申诉不由其管辖，就会把申诉转寄给国家政权的权威机关。作为对申诉的回复，提交的申诉会转寄当地法院，并被交给申诉人。

四、调解委员会。这是一种独特的对社会进行调节的法院，审理的是一些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包括侮辱，小规模的打架斗殴等)，该委员会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地方权力机构)。调解委员会是一个社会组织，不属于司法体系，但受到法院的帮助。向调解委员会递交的案件只有在各方都愿意协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决议的履行也只能是自愿的。一旦不同意解决方案，相关的一方可以请求法院解决。全国共组建了15万个协调委员会。他们使法院得以少审理数万、数十万的案件。

五、人民检察院。与苏联的人民检察机关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检察院是合议机构。在各级人民检察院都组建了监察委员会，对检察院工作中的所有主要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只有中共党员才能担任检察官。在检察院组建了党小组。党小组成员及其领导人由党委会批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仍然在实施事先审查的制度，这一工作由公安机关进行。但是由检察院授权逮捕，并将被告移交法院。必须指出，对法院进行监督的一个特点是：在审查程序结束，进入对案件进行事先调查的阶段之后，在指控的结论得到批准之前，检察官自己会亲自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如果需要证人，他们的讯问记录可以归入审讯案件的卷宗中，而不会向公诉人提供有关案件的调查情况。检察院认为，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助于通过材料确

定案件的真相,是对调查材料进行检查的一种方式。

检察院现在尚未组建侦查机构。预计,社会安全机构今后将仅会对反革命案件进行侦查,其余案件(社会刑事案件)将由检察机关侦查。

检察院不对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社会的侦查工作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

六、对司法干部培训的组织及关于司法领域的科研工作。法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及教学过程制定的基础利用了苏联法学院的工作经验。

在1954—1955年之前,在法律大学中主要采用的是苏联的法律课程,并使用苏联的教材。现在主要讲授的是中国法,而苏联的法律课程则被作为选修课。

目前还没有固定的中国法教材。因此,教师们在向学生授课之前通常必须撰写教案。

一些法律高校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尽可能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们亲自参与到案件的实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从事实践工作。

法律方面的科研工作尚处于发展阶段。出版了法律方面的杂志,正在进行组建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准备工作。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在科学工作中,在法学领域的教学中实施"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实践中正在加强对原有的法律干部的利用。

七、同周恩来同志进行的谈话。在同代表团成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谈论了如下各点:

1. 检察机关应当实行集体领导。对于一些属于司法机构管辖权的重要的案件的审判,应当事先由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法院和社会安全部门同党组织共同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考虑到了对行使司法权的必要限制,以便消除错误。一些案件关系到公民生命和自由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刑事案件必须避免在对案件进行调查的任何阶段由个人作出决定。

2. 所有公民,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非党员,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决定对某人进行逮捕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在对刑事罪犯进行起诉的时候,不应考虑其党性如何,但应当征得党的机构的同意。

3. 在所有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中,在社会安全机构的工作中必须推行"群众路线"。人民应当了解党和国家机构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了解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一工作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不应是秘密的。周恩来说,在依赖群众的同时,我们要相信群众。上述状况也完全适于各司法机关的工作。司法方面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建立在两个原则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周恩来说,我们反对检察院和其他的司法机构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工作中,其中包括同国家罪犯作斗争,实行集中的、独立的领导。他说,只有通过集体领导,进行仔细调查,实行让群众参与这一斗争的政策,并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教育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才能真正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请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称赞少一些,而要更多地就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意见。

八、一些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构希望在自己践行法律的工作中以及在巩固国内法律的工作中逐步推行"群众路线"。司法机构认为,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保证是实行

集体领导制，依靠群众来揭露罪犯，实行宽大处理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的政策，消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保守工作秘密，反复对案件进行仔细的调查，提高思想理论和科学工作。

现存的不足阻碍了中国司法机构加强国内的司法工作，这些不足是：缺少法典，缺少成熟的法律。因此，对于那些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处罚规定，都要由审理案件的法院和检察院根据个别情况来确定，这不能不对国内司法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此外，可以提出如下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愿望，来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工作、司法高校的工作和法律管理工作。

1. 看起来，现在改造法庭的时机已经成熟，基层人民法院的"常设委员会"要有独立的司法区。

2. 为了确保诉讼业务的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创建军事委员会是相宜的，军事法院通过军事委员会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3. 应当承认，最好能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权限，其途径可以是授权其就下级法院实践工作中的问题下达指示。这一任务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会议更大的权力。

4. 应该取消助理法官制度，如果需要，可以增加法院人数来代替。

5. 最好在所有级别的法院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举，创建统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6. 最好制定检察院参加二审案件的审查监督制度。

7. 提出质疑：缺少秘密商议室，在作出判决或者决定之前审判委员会介入案件的审理，法院调查期间和作出宣判期间进行休庭，上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程序上的规则以及通过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理由，通过对他们审理的结果进行上诉)。诉讼程序普遍民主的原则要求建立诉讼形式的更高准确性和确定性。

8. 一方面通过司法部和司法局，另一方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人民法院来进行检查和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这种双重监督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9. 必须准确地确定各级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

10. 在很多情况下，法官自身就是法庭决议的执行者，而人民法庭组织法第38条规定了法院执行者的独立职能。

11. 有关公证和律师的法律规定是必需的。同样还必须通过关于司法部的结构和职能的法律规定。

12. 应当加强对检察机构进行的普遍监督，并建立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司法监督。

九、代表团提出的建议。

1. 必须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列宁格勒和伏龙芝召开法律工作者代表大会，由代表团成员向这些城市的法律界代表报告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结果。在召开会议和作完报告之后，向各法律单位和高校通报关于同上述活动有关的材料，并向中苏友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进行通报。

2. 必须出版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总结的小册子，

同时在《苏维埃国家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制》杂志上发表如下题目的文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司法体系的一些特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工作的一些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人员培训组织及司法研究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律状况的若干方面》。

3. 建议《苏维埃国家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制》杂志编辑部定期同时刊登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科学工作者约稿的文章,试着在自己的杂志上转载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杂志上刊登的比较具有现实性的文章。

4. 为了今后加强苏中两国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应当同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保持全面联系,其途径可以是私人的和公务上的信函,互换文献,就双方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互通信息。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领导人的坚决请求,代表团应该提出自己在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工作之后产生的意见和希望,并在 1956 年 12 月 10 日之前把其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苏友协。

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苏联副总检察长
A. 米舒京(签名)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242－249

№10495

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

(1956 年 12 月 12 日)

1956 年 4 月 30 日,我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在 1957 年中国将订购总计价值 8.9 亿卢布的军备物资。然而由于中国今年大面积遭受严重水灾而引起的物资供应短缺,我们不得不重新分配原计划出口的物资以满足国内供给的需求因而就会减少明年的出口。为了保持 1957 年进出口的平衡,我们除了减少购买外国产品外别无选择。可是,就像我们已计算过的,为了避免给现行的基本建设带来反作用,我们无法缩减成套设备及一般的贸易项目。因此,我们决定我们原定 1957 年从苏联订购价值 8.9 亿卢布的物资降为 4.26 亿卢布。

我们知道我们减少订购苏联军备物资将给苏联政府带来一些问题,而这样做也是有悖于我们的意愿的。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接受我们的请求。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

将派唐天基[①]作为军备物资的全权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外贸部进行谈判。我们也将尽快向苏联驻华使馆经济处提交一份详细的经过缩减并已经确定的订购清单。盼望回信。

АВПРФ,ф. 100(1957),оп. 50,п. 423,д. 5

№20588

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

（1956年12月28日）

根据 Д. Т. 谢皮洛夫同志的命令发出

机　密
文本第10份
1956年12月28日
第1578/дв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朝鲜劳动党的局势

1956年是朝鲜劳动党党内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的一年。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在中断了8年之后，于1956年4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也确定了朝鲜劳动党今后对外政策的任务。因此，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朝鲜国内及朝鲜劳动党内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实践意义。

同时，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都没有反映苏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内容，也不能从朝鲜的具体状况出发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原则：克服朝鲜党内对个人崇拜的后果，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加强民主纪律。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表现出的还是以前那种着重发展重工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倾向，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这次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中心问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① 唐天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编注

无论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一些著名领导干部都特别担心这些问题。金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和其他重要领导干部都认为,今后决不能容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大错误。甚至军队和工会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劳动党党内的状况都感到不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更加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以上指出的那些人打算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的重大错误,他们指出,盛行的个人崇拜以及按照个人忠诚的原则对干部进行任命的做法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并降低了党和国家各个机构的责任感,党内仍然像以前一样笼罩着互不信任和互相怀疑的气氛,事实上人们在工作中缺乏集体主义,朝鲜国内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极其困难。

这些著名的劳动党领导人对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证明朝鲜劳动党内产生了民族主义干部,他们对劳动党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指出的领导干部希望通过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露现有的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金日成没有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建议,也没有像劳动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他的期待那样在劳动党8月全体会议上批评党内工作的缺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开展自我批评,反而采取了一切措施孤立那些打算发言批评缺点和错误的同志。一些对劳动党领导人的缺点不满的领导干部勇敢而又开诚布公地谴责了劳动党内的状况,因此他们也被看作"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敌对集团",并遭受党内处分。以上指出的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害怕今后再受到迫害就跑到了中国(9人),而朝鲜驻莫斯科前大使李相朝则拒不返回朝鲜。

这样朝鲜劳动党内就形成了复杂的局势,党的领导人的重大缺点和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交换了意见,决定派遣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到平壤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讨论朝鲜劳动党内形成的局面。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9月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重新审查了8月中央全会关于崔昌益、朴昌玉等同志的决议,并且承认,"8月中央全会没有认真审查这些同志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9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也被恢复了党籍。

同时,9月中央全会决议也承认必须在党内创造良好的氛围,以便更加积极地组织活动讨论党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并通过开展深入的批评找出真理,而不要采取组织和行政的方法。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当为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党内民主而努力,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来自下级的批评。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通过的决议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金日成和绝大多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都是不愿意重新审查

8月中央全会的。在准备召开9月中央全会过程中他们企图证明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的罪行，证明他们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些人采取的措施是有道理的，对他们作出的组织决定也是有依据的。

现在朝鲜劳动党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种看法认为，8月中央全会揭露了崔昌益和朴昌玉敌对集团，他们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尽管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的职务，恢复了其他人的党籍。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愿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组织决定也表现在如下事实，即尽管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人都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会谈，商定在报纸公布9月中央全会关于上述问题决议的全部文本，这个决议的文本终究没有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报纸公布了简短的信息通报，公布的这份决议删除了其中两个重要章节，而这两个章节涉及了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和朴昌玉所采取措施的评价，同时也涉及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他们也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商定重新审查党委关于与崔昌益和朴昌玉有牵连的其他同志的决议。然而，这项工作朝鲜领导人进行得非常缓慢。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的领导干部、国立大学的委员长以及建设厅、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和贸易部的许多领导干部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后都被解除了职务，其中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

关于被逮捕的前政治局委员朴一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也同金日成达成了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0月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建议把他软禁在家或者遣送他到中国学习，如果他愿意到中国的话。然而，这项决议现在还没有执行，这就说明了朝鲜总体的政治局势。

朝鲜内务相方学世认为，考虑到当今的国际局势，不排除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一些不受欢迎的言论的可能性，他们支持在党和国家内实行比较民主的领导方法，尽管8月中央全会，把这种言论谴责为党派活动和反党行为，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处分。首先，这些言论可能来自中央委员崔昌益，他希望得到金雄(民族保卫省副相)、方虎山(是名中将，曾领导过一个方面军，现在是一个矿厂的副厂长)和高峰起(朝鲜劳动党黄海南道党委委员长)的支持。在方学世看来，在进行发言批评的时候，还可以期待得到金料奉类似的发言支持。

以上所述证明，过去金日成曾多次清除自己的对手并且有时对他们滥加镇压，企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现在他的领导方法改变得仍然非常缓慢，他极不情愿改正过去的错误，并且非常勉强地对对手采取说服和教育的方法。

同时应当指出，不论今年的国际事件，还是朝鲜国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以上指出的朝鲜部分著名领导干部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严重不满现象，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金日成今年夏天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他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谈，他在莫斯科得到加强对国家经济领导的建

议，他也得到建议加强对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关注，米高扬和彭德怀在平壤也开展了工作，这些也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完成农业生产合作化。在这方面朝鲜劳动党开展了政治、经济和组织工作。

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4—1956年)，工业领域提前四个半月完成了计划，而农业计划基本上也将完成。尽管北方一些省份的庄稼收成不好，朝鲜粮食生产总产量基本达到了270万吨，达到了战前1949年的水平。

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作了明显的修改。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兄弟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和合作的原则。

因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可以暂时放弃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大型工业项目的计划，这些大型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建设时间，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拥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资源的地方建造工业企业。

通过了决议决定放弃平壤大型机电设备厂的建设，放弃以金策的名字命名的清津金属加工厂的恢复工作，放弃平壤化妆品厂的建设以及其他的建设项目。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领导人最近比较关注矿物化肥的生产。他们提出了缩短兴南化肥厂硝酸钾生产车间建设时间的任务。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推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到今年10月底，所有农业作业的79%都实现了合作化生产。可以想象，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化将基本完成。

朝鲜领导人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推行的这些经济措施证明，在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能够更加现实地对待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和工业能力问题，并且表现出对提高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关心。

最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从1956年11月1日起，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并且制定和推行了新的工资表，按照这个工资表，每月最低的工资标准是1 000元，而以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00元。

在今年8—9月份，国家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些价格平均降低了10%。由于工资得到了提高以及一些商品零售价格降低，人民一年大约得到了120亿元的好处。这个数目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可以使人民得到12万吨的大米。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朝鲜领导人除了利用自己国家的资源外，还希望得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日用品的援助，这些援助应该从1957年开始得到。如果不能增加出售的商品数量，即使提高工资和降低商品的价格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

为了减轻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对国家的税务负担，朝鲜政府通过了减轻农

业税和免除农民1956年借贷的粮食的决议，也不再追索在过去年份借贷的粮食。按照这个决议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被免除今年的农业实物税，并且他们有实物税的优惠，这些税收不超过他们农业收入的10%—12%。由于干旱粮食收成低的农民、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贫苦农民、生活在非武装地带的农民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民，对于他们应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不再向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追索过去的借贷。

不应该在1956年给予农民上述优惠，但是，为实现这些目标，预计需要2.6万吨以上储备的粮食。

通过了关于降低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这些税平均降低了4%。

朝鲜政府在10月份也通过决议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不能超过1万元。

朝鲜政府的其他决议也规定地方上的人民权力机构和部门领导人应当保证私营企业主生产日用品所必需的原料供应。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可以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工业品，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资金。为了增加居民收入和外汇的积累，可以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工金砂矿床。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提出的上述措施都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然而，朝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目前仍然没有达到战前的标准。

朝鲜大约40%的国民需要国家给予生活保障。每个工人和职员每天可以分到700—900克的粮食，而每个学生和受赡养的人每天可以分到400—500克粮食。每个人得到的粮食其中50%是大米，50%是其他种类的粮食。其中只有4%的工人能够每天得到900克粮食，22%的工人能够每天到800克粮食，大部分工人每天得到700克粮食。

工人和职员按照级别每年可以分到15—23米棉布，3—12双袜子，2—12块肥皂，2—6双胶鞋(朝鲜人穿的橡胶鞋)，3公斤植物油，7公升酱油，7公斤黄豆和12公斤盐。最高级别的人占1%，第二级别的人占6%，第三级别的人占17%，73%的工人属于第四、第五和第六级别，他们这类较低级别的人获得的供应比较少。

按照票证供应的商品，远远不能满足工人和职员家属在饮食和衣着方面的需求。

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几乎不能按照票证得到肉食、油脂和糖。渔产品的供应也不经常。

市场上食品的价格非常高。比如，1公斤肉需要250—300元，1公斤鱼需要100—200元，1公斤大米需要100元，1公斤土豆需要30—40元，1升豆油需要600元，10个鸡蛋需要130—150元，等等。工业品的价格情况也是这样。纺织品、衣服和鞋的市场价格和商业价格都很高，几乎大部分国民都买不起。

国家在战后的三年时间内建造了35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然而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仍然居住在地下室或者简易住所内，这些简易住所是用高粱秆和黏土建造的。城市居民冬天极缺燃料，学校校舍和一些机关的办公室几乎不能取暖。

今年农民们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朝鲜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在把地租、灌溉设施使用费以及机器租赁站的一些费用上缴给国家之后，在新一季庄稼收获2—3个月之前他们的粮食就已经不够了。

这样，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朝鲜国内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为低下。许多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家属长期吃不饱，得不到暖和的衣服，生活在条件极差的住所里。

在国家分配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极其困苦。关于这方面应该指出，南朝鲜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居民的粮食状况要比北朝鲜居民好一些。南方居民必需品的保障程度也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南方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的破坏要轻一些，也是由于南朝鲜市场上充满了美国的工业品。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朝鲜人民目前经受的苦难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是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还没有被恢复，也是由于以前朝鲜朋友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对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和发展轻工业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尽管朝鲜的国内状况严重苦难，朝鲜劳动党的政策还是得到了城乡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过去遭受外来压迫，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困苦。

然而，由于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侵略事件以及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防备南朝鲜当局和敌对势力在南朝鲜的代理人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为了做好群众的政治工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也非常注意深入研究朝鲜人民军官兵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居民的情绪。

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美国人和南朝鲜当局加强了针对朝鲜的破坏活动。在这段时期敌对势力更加频繁地把他们的代理人送往北朝鲜，更加频繁地散发传单，他们的广播节目也加强了侵略论调。11月份汉城和南朝鲜的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号召北朝鲜人民起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为了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几百名汉城大学生在11月底乘坐汽车到了三八线，他们号召北朝鲜人民"以匈牙利为榜样"。

应当指出，北朝鲜人民对南朝鲜日益加剧的挑衅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回应，也没有发现什么反对人民政权和朝鲜劳动党的言论。

这段时间朝鲜许多工厂、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举行会议，平壤市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反对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挑衅活动，这些都证明，朝鲜人民支持朝鲜的人民民主制度。

最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非常注意在党内和居民中开展政治工作。何况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松散：党的队伍中有116万党员和预备党员，这意味着朝鲜每八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党员或者预备党员。也考虑到，60%的党员是农民，23%是工人，86%的党员和预备党员是文盲，他们只读过小学，只有0.8%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受过较高的教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54年事实上停止了接收党员，在这一年开展了检验党性的运动，今年要更换党组织

发的证明文件。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意识形态工作。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科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删除其中那些用个人崇拜的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

谴责了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现象，也谴责了把苏联的一切经验都机械地运用到朝鲜实际工作中的现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改革了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过去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

同时为了改正意识形态改革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开始在报纸发表更多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剧院的剧目中重新加入了苏联和俄国的话剧，不仅在党的建设中全面推广苏联经验，而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中也全面推广苏联经验。

今年10月份召开了朝鲜作家代表大会，而在11月召开了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大会，这些都显示了朝鲜知识分子和青年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周围。这些会议反映了他们对朝鲜劳动党政治和经济路线的支持，反映了他们对朝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支持。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核心发生了明显变化。同以前的政治委员会相比较，改选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增加了两倍，其人员组成都是那些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并拥有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干部。有5名前领导人被留任，其中包括金日成、金科奉、朴正爱、金一和朴金喆。其中，金科奉和朴正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最近有所削弱。同时，当选的常务委员会新成员的作用和影响加强了，他们是崔庸健、金昌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一龙(副首相)和金光侠(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崔庸健、朴金喆和金昌满在任用干部方面做得并非都对。比如，他们经常夸大从中国和苏联返回朝鲜的许多领导干部的错误，企图把这些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去。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委员会委员许哥而、朴一禹的，然后也这样对待朴昌玉、朴永彬和崔昌益。对他们都采取了严厉措施(逮捕了朴一禹，罢免了崔昌益)。最近针对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被看作是党派集团和反党活动。

应当指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崔昌益返回了平壤，重新考虑了他的工作问题；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一个水泥厂的领导人；一些朝鲜劳动党党员被恢复了党籍，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以前苏联籍朝鲜同志的态度向好的方向转化，其中一些苏联籍朝鲜同志官复原职甚至得到了提拔，被安排到驻外机构从事外交工作。

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进行了解释工作。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有：大会报告、金日成的总结发言以及关于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完整文本，这些材料都被分送到各道、市、郡和基层各级党组织以便对党员进行相应的解释工作。

一些地方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材料的同时，也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各级党组织会议，特别是各部和其他大型企业机关召开的党组织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议都召开两天、三天甚至四天时间。按照朝鲜同志们的通报，他们不得不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大量

的组织和解释工作，以便向党员们证明必须通过决议恢复崔昌益和尹公钦等同志的名誉，向他们说明，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党内应当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并且同志般地对待他们，而不要采取惩罚措施和行政方法；他们不得不证明一些同志的错误发言，这些发言要求严厉谴责崔昌益等人。

朝鲜劳动党及朝鲜政府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而且还出席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各级党组织会议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对地方上党的领导人和地方权力机构领导人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意见，批评他们不够关心劳动人民，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些批评意见包括，要求他们加强住宅建设，加强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的供应等等。他们也提议说，各企业在提拔工长和队长职务时要考虑到工人的意见，对生产先进分子的奖励，也要根据工人集体推荐。

对于党员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时提出的所有批评意见和要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都进行了总结并且在实践工作中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和要求。

党内来自下层的批评也更加勇敢了，然而，对最高党组织的批评还不够。各级党委在实践工作中越来越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越来越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这些材料把说服教育的方法看作是教育党员的基本方法。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之后，一些党组织重新审查了由于8月中央全会决议而被开除出党的那些同志的案件，其中两名副主席和平壤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被恢复了职务。然而，前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前不久由于不愿意“改正错误”而被重新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开始遵守列宁主义关于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准则。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走出的只是第一步。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和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1956年11月20日和27日地方权力机构实现了选举。绝大部分居民参加了选举，对朝鲜劳动党、其他党派和社会组织推出的候选人进行了投票。有99.73%的选民参加农村人民会议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89%的选民参加郡、市级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93%的选民参加省级候选人选举投票。现在正在准备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预定在1957年4—5月份举行。

朝鲜朋友们认为，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恢复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以便不在党内和国内引起不良后果。

消除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这个问题上，朝鲜朋友们采取渐进的政策。最近朝鲜劳动党的决议和文件指出，朝鲜劳动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在朝鲜朋友们承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朝鲜的个人崇拜没有消极后果。朝鲜朋友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在宣传中不再颂扬金日成，文学和艺术工

作也实行这一方针。党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都经由集体解决；对那些对领导进行批评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

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朝鲜朋友们的称赞和支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声明，对于苏联政府发布的这份声明他们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同苏联政府讨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二次会议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热爱和平的对外政策，它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即完全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友好合作，循序渐进，努力推动苏朝关系的不断发展。

尽管朝鲜朋友们宣布对于这份说明他们对苏联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朝鲜的一些内阁相非正式地提出了现在个别苏朝条约和协议中的不平等的地方，这些不平等损害了朝鲜的权利。

1955年年底和1956年年初这段时期，极不正常地对待苏联籍朝鲜同志，并且在对朝鲜人民的民族历史进行宣传的时候也犯了错误，在反对一切外来东西的幌子下经常禁止宣传苏联的活动，而现在他们改正了这些错误。

在谈到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对朝鲜进行访问的必要性时，金日成说，各党相互关系之间的这些访问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

同时应该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最近在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特别消极的因素。

应当指出，朝鲜和中国关系中的不正常因素产生于反对美国和李承晚军队的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朋友和朝鲜领导人在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发动和进程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对待中国朋友们的态度不对，这种错误态度不符合中国人民给予朝鲜的巨大援助，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战后时期。

朝鲜朋友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宣传明显不够，而推广这些经验或许会给朝鲜劳动党和朝鲜的国家建设带来实际的利益。

朝鲜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接触非常少。

金日成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中国民族节日到来时金日成没有参加那次隆重的民族节日盛会，也没有出席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然而他却出席苏联民族节日时举办的这类活动。朝鲜朋友们很少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见，也很少同他们商量朝鲜劳动党和国家建设的相关问题。

对中朝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出逃到了中国。朝鲜朋友们认为，中国方面将会遣返这些出逃的朝鲜领导干部，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这样做。在中国朋友们看来，这些出逃者将继续"抹黑"朝鲜领导人在这些朋友们心目中的形象。

最近中国朋友拒绝向朝鲜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使中朝关系更加不正常。金日成请求中国

政府在1957年向朝鲜提供额外的无偿援助或者提供5 000万元贷款,他的这个请求三个月没有得到回应,而然后的答复是拒绝。因此朝鲜朋友们取消了朝鲜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事先商议好的,打算派遣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与中国签订1957年的贸易协定。

朝鲜朋友们对中苏代表在1956年对朝鲜的访问作了积极的肯定,然而,他们不满的是,彭德怀作为中国代表被派到了平壤。彭德怀好像不受朝鲜的欢迎。

上述论述证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尽管做了一些工作来改善劳动党内的状况,来实现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是朝鲜劳动党内及朝鲜国内的状况仍然是复杂的,这需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逐渐采取措施来贯彻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而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也非常关注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

考虑到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仍然极其困难,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领导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今后巩固朝鲜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在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朝鲜的必需条件。

关于以上指出的朝鲜领导人和中国朋友们关系的不正常性,金日成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苏联驻朝鲜大使

B. 伊万诺夫

分送以下同志:
布尔加宁、朱可夫
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
卡冈诺维奇、毛希丁诺夫
基里琴科、福尔采娃
马林科夫、什维尔尼克
米高扬、阿里斯托夫
莫洛托夫、别利亚耶夫
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
萨布罗夫
苏斯洛夫
赫鲁晓夫
第2/ш号
1957年1月2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86, л. 1-17

№16686－4

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

(1957年[①])

副本

地理科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副主席
阿列克赛·华西里叶维奇·斯托日科
致朋友、冻土学研究所学者 A. M. 切卡希洛的信

亲爱的安德列·马利克维奇：

再一次祝贺您节日快乐。您白白地抱怨我了。事与愿违，我对您最近的来信一封也不能回，因为我去国外出差了一个半月。至于这次出差，我在莫斯科跟您说起过，并且我记得在信中写到过。确实，我想不能，当然也没有告诉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不起您，请原谅。我没有从中国给谁写过信，甚至给家里也仅写过一封信，为此我当然要受到训斥。但是那里的状况是这样，甚至没有足够时间做梦。要知道，我们不是去旅游，而是去工作。而工作到处多得吓人。我们的路线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格罗迭科沃—哈尔滨。哈尔滨工作10日后的路线是：哈尔滨—牡丹江—密山—虎林—锦西—穆棱—牡丹江—哈尔滨(这样的环形路线)。在哈尔滨休息3小时后(未来得及洗澡)的新路线为：哈尔滨—沈阳—天津—北京。在北京工作10日后的新路线是：北京—长春—吉林—丰满—长古里(Чаньгуль)—哈尔滨。最终，在哈尔滨逗留2天后。经过牡丹江和绥芬河回家。出差的任务是：让中国同志熟悉自己的工作、资料、示意图和未来计划；熟悉他们的资料，考察他们的资源，同水工技术、地质学、冻土学、土壤学、林业、农业和其他机构(包括科学、教学机构，也包括设计机构)建立联系；而最主要的是同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建立私人接触。间隔一个月之后，我们带着同样那些任务被 B. T. 佩科夫派往朝鲜。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我们提出任务：同邻居建立最紧密的科学联系，按许多科学领域归纳选题，而如果需要，那也可全部修改我们的选题、计划和纲要。我们是打着阿穆尔考察的旗帜来中国的。但我们在当地得到证实，这种旗帜在那里显得太破烂和褪色了。要以自己的旗帜即以远东分院的名字来开展工作。对中国同志而言，远东存在苏联科学院分部，是完全意外的。他们差不多是在同一计划内开展工作的。对我们的手稿(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拿出自己的印刷品，因为手稿上还标有“机密”字样)，他们简直是一抢而光，分成若干部分，马上开始翻译。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的著作用中文出版，随后翻译成俄文再版。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大概推断的。——编注

一般来说，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惊人的强烈印象。他们为自己提出了任务——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因而包括我们的科学)。但一切表明，他们完成计划要花长得多的时间。他们首先从此开始，从建设和装备研究所开始，这方面显示出的规模，让我们看得头昏脑涨。他们4年来建成的研究所要比科学院存在20年来建成的多好几倍。仅仅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就建成了10个左右研究所，其中包括带冻土实验室的建设研究所(我们还没有这种研究所，而中国已经有了，怎么样!)冶金研究所、土壤学研究所、林业研究所等。每个研究所，占地好几公顷，建设的建筑物规模有好几万立方米。建筑物内部有最完美的设备，这只是我们研究所所梦想的，其中也包括莫斯科的研究所。设备主要是从两个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订购来的。虽然也有我们的设备，但最新最完美的我们自己还没有见到过。这方面最诱人的是，这些研究所已经建成，而他们的设备是在我们的顾问指导下订购和配备的。那么说，我们的学者在别人的土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部属研究所、高等学校和设计院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普遍存在甚至莫斯科理解的那种糟糕的拥挤，但公共建筑物、文化生活建筑物，研究所和高等学校是宽敞的，虽然工作人员和学生人数到处是巨大的。在高等学校，有7 000—8 000名大学生和500名教师；在设计院分院，有2 000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规模真正是惊人的。他们甚至在拍集体照时，也一定是500人或1 000人一张。

在东北，没有一个大城市不建立数十个研究所的。而且，他们建设得很快(规模2万—3万立方米的楼房，在半年内建成，包括所有各类作业直至建筑物周围的设施)、很漂亮、很有质量(墙体和设计是我们的，而屋顶是中国式的)，也很便宜。在一个项目上集中了500—600名工人，每人每月挣工资30—40元(按官方汇率60—80卢布，或按黑市汇率300—400卢布)。机械化是最少的：矿井升降机+混凝土搅拌机，这就是全部。

纪律和组织是极好的。一名技术人员领导这500—600名工人。设计图纸是最少的，而施工图纸全部都装在这位技术员的脑海里。

但中国最珍贵的是中国人自己。他们热爱劳动，遵守纪律(40天中没有见到一个懒汉，一个醉汉，一个逃兵，虽然处于最密集的人群中)，极有能力掌握所有科学，行动果断，敢于首创，不仅对我们俄罗斯人，而且他们相互间也很礼貌、很客气，但最主要的是人人都正直。如果把照相机遗忘在商店或存衣箱(我们以前有这种情况)，过了一小时、一昼夜或一星期，它就回到你身边了，也就是说你会找到它们。所有国内开销都是凭承诺进行的。把钱交给出差者没有收据，他凭自己的良知来花钱。返回后要交回剩余钱款，并按照规定将发票附上。无论他使用多少，谁也不会指责他。不过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出差者想多花费一个卢布。罗戚柱(Лу Цу-чжу)教授得到考察费6万卢布(7个人考察了两个月)，他花费了4 600卢布，剩下55 400卢布。要知道"花费"是按我们的标准精确计算的。

他们花费唯一不节约的是招待和照应苏联同志。遗憾的是，许多莫斯科人没有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个年轻而贫穷的共和国，他们的节约规定不是空话。因而不应该以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随便吃，可以睡高级旅馆，乘国际列车。诚然，离

开之前，阅历丰富的莫斯科人对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无法顾及我们的感受，实在是用强力将奢侈的接待强加于我们的，而拒绝这种接待，中国人会用引起国际纠纷来威胁。但这一切都是谎言。当我们告诉主人，我们非常喜欢中餐，但按照习惯，我们更喜欢自己的俄罗斯饭菜。这种俄罗斯饭菜不是由20—40道美味菜肴，而是由2—4道普通简单菜肴组成。他们马上相信我们，保持平静状态。我们单独用了餐，并全数付了我们的饭钱……我们说，在苏联乘国际列车的只有部长，而乘软卧车厢的只有厂长经理。于是，我们决定坐硬卧车厢。我们乘坐普通列车，认识中国同志，要比乘坐软卧"监狱"有意义得多。他们相信了我们，心情轻松，因为他们跟自己人在一起乘车，跟他们打牌，要比寂寞地与我们在一起感到有意思得多。很快我们也迅速掌握了他们玩都拉克(即"傻瓜")扑克的游戏规则，之后也把自己的游戏教给了他们。

АВПРФ，ф. 5，оп. 28，п. 126，д. 506，л. 94－97

1957 年

№10181

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

（1957 年 1 月 4 日）

苏共中央：

鉴于 1 月 7 日周恩来行将访问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建议将与中国朋友讨论涉及苏中关系、国际局势以及朝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

一、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 2 739 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 403 名，经济领域的顾问 123 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 2 213 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 374 名军事顾问和专家。

考虑到 1956 年 10 月 30 日的苏联政府宣言中和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阐述的关于此问题的我方立场，可以讨论苏联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适宜或者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数量的问题。

二、最近，不论从我们方面还是从中国朋友方面，都没提出任何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可能中国朋友会在会谈过程中提出某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补充研究此类问题。

三、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希望就涉及朝鲜局势的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

在此种情况下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这种强调应是适宜的。

四、由于英法武装干涉埃及、匈牙利事件以及美国近东和中东政策危险地活跃起来，造成近来国际局势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考虑到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可以就国际局势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会谈结束时签署一个联合声明是适宜的，在联合声明中要强调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和双方在评价当前国际局势时意见一致。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谢皮洛夫

1957 年 1 月 4 日

附件：

我们认为以下做法是适宜的：

一、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介绍波诺马连科同志今年12月7日、11日和12日关于波兰局势的密电内容，但12月12日密电中涉及在波兰军队的建设中采用中国军队经验的地方(第15页第3段)除外。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谢皮洛夫同志)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苏联国防部(朱可夫同志)准备并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局势的材料，以便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期间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他，材料中应列举具体事实说明苏联军队从希特勒占领军铁蹄下解放波兰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人民的贫困处境和波兰经济的崩溃；说明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波-苏关系的特点和1944—1956年期间苏联对波兰经济援助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苏联为捍卫波兰利益提供的支持(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问题等)；对近期波兰报刊和电台的观点进行综合：对今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波-苏会谈进行的总结等。

三、委托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准备一份转交给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其内容是关于波兰报刊是如何不正确地报道中国共产党关于波兰，特别是匈牙利局势问题的立场的。

四、委托苏联外交部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通报关于波兰的局势。

五、委托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科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大使保持紧密联系，并直接地以及通过我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士中的真诚朋友帮助中国大使获得有关波兰局势的客观的、正确的情报。

六、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在方便的场合(比如，在某一次招待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会晤，向他阐述自己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并在周恩来同志抵达莫斯科后，就上述问题向他通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

№16683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

（1957 年 1 月 5 日）

绝　密

M. A. 苏斯洛夫同志：

呈上由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准备的情况报告《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

此调研报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即将来莫斯科而准备的。

附件共 15 页。

A. 葛罗米柯

1957 年 1 月 5 日

第 12/2 号

文件送：H. A. 布尔加宁同志、K. E. 伏罗希洛夫同志、Л. M. 卡冈诺维奇同志、A. И. 基里琴科同志、Г. M. 马林科夫同志、A. И. 米高扬同志、B. M. 莫洛托夫同志、M. Г. 别尔乌辛同志、M. З. 萨布罗夫同志、M. A. 苏斯洛夫同志、H. C. 赫鲁晓夫同志、Г. K. 朱可夫同志、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Д. T. 谢皮洛夫同志、H. A. 毛希丁诺夫同志、E. A. 福尔采娃同志、H. M. 什维尔尼克同志、A. Б. 阿里斯托夫同志、H. И. 别利亚耶夫同志、П. H. 波斯佩洛夫同志

手写批注：

存档。该情报已用于关于越南的情况说明。

И. 谢尔巴科夫

1957 年 2 月 15 日

附件：

绝　密
文本第10份

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
(情况报告)

195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局明显尖锐化了。在客观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局势恶化的重要因素，是越南劳动党在领导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重大错误。

在1956年夏季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以及随后的中央委员会第十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讨论了党在进行农业改革和整顿农村党组织时犯下的严重错误。

全会通过了关于纠正错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法制和改善职工生活条件的决定。不过，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地方上会犯新的错误。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局势，至今仍是紧张和不安的。

(一)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越南农村的局势，那里生活着约占共和国90%的居民。

还在解放战争进程(1946—1954年)中，越南同志就实现了一系列农业改造——开始是减租和减息，而从1953年12月起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党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与富农达成协议，消灭封建剥削阶级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到1956年前夕，已在拥有417万农村居民的土地上进行了农业改革，而从1956年1—8月，在约有600万居民的地区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农业改革。总共剥夺了地主69.8万公顷耕地，其中1956年剥夺了37.68万公顷。[①]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被摧毁掉，而他们的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部分分配给了占农民中绝大多数的中下农。

不过在进行改革时，主要是在1956年，犯下了严重错误和过火的做法。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领导人，事实上放弃了对农业改革的领导，把它交给中央委员会所属组织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虽然这一小组形式上是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总理和总书记长征领导的，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小组的工作，而过分信任中央委员胡维泰(Хо Вьет Тан，农业部副部长)和黎万龙(Ле Ван Лонг，内务部副部长)来领导这一小组。

从城市向农村派了超过3万人的干部工作队和工作组，他们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工作队和

① 195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播种面积约200万公顷。——报告作者注

工作组很少考虑当地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意见，主要用行政方法来行事，没有依靠贫下中农。

其结果是，越南劳动党的农业改革路线在许多地方被歪曲了。往往没有考虑到中农的经济利益。存在剥夺中农土地而给他们分坏地的事实。部分中农被不正确地划为富农。中农的政治权利受到了限制。

在执行党在农业改革期间与富农达成和解的方针时，遭到了特别大的歪曲。把许多富农看作地主，没收他们的土地，禁止雇佣雇工，剥夺富农的政治权利。把农户划入地主行列，应在农民代表会议上进行，随后由省级行政委员会批准。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此程序被破坏了。在地主中间，并没有划出解放战争的参加者，他们的财产不应该被没收，而应被赎买。

党对保护教堂、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的方针遭到破坏，征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没有留下法律规定用于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夺走了宗教人士的土地。

进行农业改革的工作队和工作组，还被赋予摧毁反革命组织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在解决这个任务方面，取得了某些结果。不过，工作队和工作组的脱离群众，轻视当地党组织的意见，导致许多正直忠诚的人们受到镇压。存在迫害贫农和中农的大量事实，原因是他们和地主、富农有"联系"以及在外国占领期间参加傀儡组织或在傀儡军中服务。

往往根据挑拨性的言论或者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进行逮捕。同时，有部分敌对分子仍然未被揭露。

在农业改革进程中，工作队和工作组同时进行确定农民土地面积的工作。通常是份地的数量被提高了，从而造成农户交纳农业税的增加。

由于农业改革中所犯的错误，相当部分劳动农民降低了劳动积极性，恶化了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又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出现政治道德状态的恶化。

为了纠正农村中出现的状况，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消除确定阶级归属时所犯的违法行为，为所有不正确判罪的农民恢复名誉权利，弥补给他们带来的物质损失，纠正虚增的土地面积和税收。

全会的这些决议，农民表示满意，有助于改善农村的局势。1956 年稻米获得好收成，也对农民情绪产生正面影响。

不过，在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纠错工作中，现在已发现有严重的不足。在一系列地方，干部考虑欠周密并表现出急躁情绪。在释放因错判而坐牢农民的同时，往往也释放了被正确判罪的人，其中也包括参与破坏活动的地主。坐牢释放的人返回农村，也同时产生了复杂情势，在一系列情况下还出现了严重的混乱。1956 年底，许多农村发生了坐牢释放者和干部间的斗殴。在一系列地方，参与这种冲突的有几百人，有被杀害的也有受伤的。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地国家机关和党组织不情愿纠正所犯错误，竭力将其掩盖起来。

（二）

在工业和财政部门，存在严重困难。在解放战争进程中以及法国人撤出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期间，所有重要工业企业都遭到破坏或拆除。超过 8.5 万人失去了工作。所有铁路、

公路和主要通信线路都报废或拆除了。八大水利设施的破坏以及大部分耕地的毁坏，给农业带来重大损失。国家国民经济的出口部门陷于衰弱。

在这种条件下，越南同志没有根据地给自己提出了短期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重工业的任务。对于一个没有多少发达工业、训练有素干部和本身积累的国家说来，即便在外力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在安排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情况，忽略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的问题，没有对生产出口产品的经济部门以应有的注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层，存在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来发展经济的意图。

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友好建议，越南同志于1956年开始采取某些措施重新考虑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决定修改1957—1959年三年计划的草案，准备缩减计划建设的重工业企业数量，代之以建设11家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工厂。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近年来恢复了一系列重工业，并建成了一系列新企业。不过，工业总产值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55年等于战前水平的18%，而且1956年准备达到40%。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建设计划完成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首先是由于专业建筑工人不够，建筑材料不足，设备供应期限违约以及一系列组织缺陷，经常改变基本建设计划。所有这一切导致新工业建设和投产的拖延。例如1956年上半年，在兄弟国家帮助下规定开始建设36个项目，投产7个项目，而实际上开始建设的只有16个项目，投产2个项目。

现有的国家工业企业，胜任不了计划任务。其中许多企业的机床和设备的利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机器的故障和损坏不少。一系列加工企业的原料(棉花、甜菜、烟叶等)得不到保证。由于1956年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大幅度没有完成，原料困难也将延续到1957年。

职工的劳动纪律水平低下。缺工、迟到、借口疲劳而擅自离岗的问题大量存在。例如1956年夏季，鸿基(Хонгай)煤矿开采地有几天约有半数工人不去上班。不过，不管是上班的还是旷工的，工资都一样支付。所有这一切会对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不良影响。

工人阶级和大多数职员的生活水平极低。工人的月工资波动于3万越盾(1卢布约等于1 000越盾)范围内。这种工资水平远远不够养家糊口。例如在荣市的磷肥厂，工人本人每个月仅仅在工厂食堂就餐花费大约1.8万越盾。第十次全会后，员工的工资和军人的固定津贴作了某些提高(增加5%—15%)。国内仍有部分失业。至1956年7月，失业人数计3.06万，其中河内和海防有1.86万。

私营经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商业中起到相当大作用。1955年的这种比重，在工业中占85.8%，在零售商业中占66%。这种占优势的是手工业和小型工商企业，其就业人口超过200万。

直至最近，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发展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以及私营商业的领导仍是薄弱的。对这些经济部门就业人员的政治和教育工作估计不

足。对手工业主和私营业主的原料、设备供应以及国家贷款组织得不好。因而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企业开工不足,而其中有许多被迫停业。这一方面造成了城市失业者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是对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建筑材料、陶器、鞋子、食品、金属制品、木材、甘蔗、皮革、毛料)的生产和内贸的组织产生不良影响。

手工业的私营工商业经历的困难,造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情绪大大变坏。

最重要出口商品(煤、水泥、木材、花生、酱油等)的生产,仍然是少量的。1956 年同 10 个国家和个别公司装订了总额 2.521 亿卢布的相互供货合同(出口 1.269 亿卢布,进口 1.252 亿卢布)。但是,由于国内出口商品的不足,1956 年上半年签订的供货合同总额只有 9 330 万卢布,同期运出的商品实际上只有 2 370 万卢布,为年度计划的 18.8%。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贸平衡形成了很大的缺口。

恢复和发展消费品生产工业的速度缓慢以及现有商品储存量的枯竭,导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 1956 年下半年出现商品短缺局面。棉布、服装、过冬棉衣和毛衣、糖、药品、纸张、自行车等的供应严重不足。1956 年工业新产品价格连续上涨。仅仅从 1956 年 12 月 20 日起,一系列商品(雪茄烟、夹心糖果、大麦米、丝绸、毛料等)的国家定价就提高了 30%—100%。与此同时,稻米价格由于大丰收而下跌,从而造成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

提高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以及给受到不正确镇压的人发放补偿,要求补充发行纸币。仅仅是在最近 2—3 月间,印发了总额超过 200 亿越盾的货币,此举导致越盾的进一步贬值。越南同志认为,1956 年越盾的贬值不少于 15%。

业已形成的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更加强化城乡居民的不满。

(三)

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机关和团结所有人民进步力量的祖国阵线的作用遭到贬低,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局造成负面影响。战时证明是正确的限制的民主,在目前条件下成了提高劳动人民政治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的阻力。

如公民选出的人民议会这样的人民代表机构,作用大为降低。农村、城市和省的人民会议不经常进行选举。全国会议在十多年间没有进行过选举。宪法遭到破坏,执行委员会绝大多数不是由人民议会建立的,而是由上面决定的。执行委员会不向人民议会和选民作报告。官僚主义、行政化、忽视居民的需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中极为普遍的最大缺陷。

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选举审判机关,还没有研究立法。这在一系列情况下会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权力。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强调重视巩固民主权力机关和强化国内法制的问题,特别是通过了下列决定:1957 年选举农村、城市和省的人民议会以及选举这些机关的执行委员会;所有各级执行委员会务必定期向人民议会作汇报;研究修改宪法(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宪法是 1946 年通过的)和人民议会进行补充选举以接替已离开代表的问题;准备补充现有法律,特别是保证人民民主权利问题法律的建议。

越南劳动党对领导所有主要社会组织和政党参与其中的祖国阵线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一系列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建立祖国阵线组织。在建立这种组织的地区，它的工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越南青年联合会、越南妇女联合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组织中，政治教育工作也做得薄弱。吸引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民主建设不够。越南劳动党忽视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参加祖国阵线的政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合作。

参加政府和政府机构的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党派和组织的代表。但是，他们参与这些机构的工作，带有纯形式性质。越南劳动党成员，不考虑非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批评性言论，没有努力发挥他们的工作首创精神，这就加剧了存在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不满情绪。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进对祖国阵线以及参与其中的政治组织工作的领导，没有好好利用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积累的丰富经验。

(四)

越南劳动党长期以来成功领导了越南人民的武装斗争。不过在战后时期，它没有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队伍，拖延了和平时期条件下对党工作的改造。

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机构，对思想和理论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就导致了越南劳动党的部分干部和许多普通成员没有好好弄懂党的政策的实质，所以也不能在生活中积极地、创造性地加以贯彻。

民主集中制和党与人民群众牢不可破联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成为党的生活的法则。像战时一样，现在的县、省和地区党委也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从1951年起没有召开过党代会。越南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和党务机关的工作中，通常没有得到遵守。许多事实说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所有活动中的薄弱性。迄今为止，党内缺乏关于党组织工作基本问题，特别是干部选拔和任职检查问题的明确方针。

工业中心的解放，为更广泛地在居民的无产阶级部分中开展工作以及接纳工人入党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这种机会利用得极其不够。到1956年1月1日，工业职工中共有共产党员2 700名，即不到党员总数的1%(到1956年，越南劳动党的党员为33.2万名——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但是，1956年几乎没有接纳工人入党。越南劳动党的干部依靠工人不够，不好好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在与农业改革同时进行的农村党组织整顿中，对农民党员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到1956年1月1日，农村有党员18.76万名)。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委托给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而实际进行此项工作的是当地进行农业改革的工作队和工作组。许多党员被没有根据地指责为参与反革命活动。镇压也包括体罚，带有大规模性质。在日本占领越南时期和解放战争进程中就得到锻炼的许多好党员被判了罪。党组织松散，毫无秩序。县党委和省党委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受到怀疑。结果到1956年8月，经审查的15万名党员中，有8.4万名受到了处罚(开除党籍、逮捕等)。

整顿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导致这次最重要的运动没有达到目的，给党带来损失、被越

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评价为沉重的失败。在越南劳动党内造成了一种紧张的、不安的局面。老党员数量的减少,对党员队伍的团结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在一系列情况下,造成党战斗传统的丧失。在党员中,也包括在干部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对所执行政策的正确性产生疑问或缺乏信心。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 1956 年 11 月底向苏联驻中国大使表述的中国朋友的意见,越南劳动党某些领导人,特别是总理范文同,怀疑迄今为止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展方针的正确性。这些领导人把农业改革看作是错误的措施。

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的权威被贬低了。这从负面影响了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以及党和群众的联系。正如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阮维桢 1956 年 11 月告知苏联大使的那样,"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还没有占据以前的领导位置。团结遭到削弱,对党的信心不足,是现今局势的严重现象"。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坚决揭露了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纠正错误上。全会委托政治局拟订关于巩固党首先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以及扩大同群众联系的具体措施和计划。全会还责成政治局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原则,并准备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的计划。

不过,不论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中,还是在随后的措施中,仍然不够重视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居民中开展工作的问题。在思想理论工作和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全党方面,继续存在重大不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在部分越南党员,其中包括领导人中间,普遍存在着对中国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尤其是表现在,不友好地对待中国顾问以及很少宣传越中友谊。

全会决议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正确对待。在党组织会议上,党员们赞成全会拟订的纠错措施。不过,执行全会决议暂时是缓慢的。在一系列地方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即恢复了所有被开除者的党籍,虽然其中有部分人被开除是正确的。

(五)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外的敌对分子,试图利用已形成的局势来强化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破坏工作。他们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后,积极鼓动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提供"真正广泛的"民主权利以及"严惩"犯错误者,力图以此消灭或者败坏越南劳动党内,最训练有素、最忠实的干部的名声。在右派分子的感化下,社会党和民主党越来越摆脱越南劳动党的影响。在这些党派周围,开始聚集一些人,其目的在于限制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按资产阶级路线发展国家。

出现了坚持反动方向的报刊。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派别,开始出版报纸《人文》(根据 1956 年 12 月 18 日河内行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纸《人文》被封闭,并禁止发行)和《光华日报》,并在其上发表攻击越南劳动党和政府政策的文章。私人出版的某些报纸,如《新时代报》以前对人民政府取奉公守法的立场,现在开始攻击人民民主制度。

敌人最注意天主教徒居住的地区。他们在一系列地区组织了天主教徒的游行示威,

要求释放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判刑的天主教神甫。破坏分子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准备11月在义安省(Нге Ан)发动农民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只是在军队帮助下才得以恢复秩序。

在敌视性鼓动的影响下，要求允许自愿者进入南越的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提供类似要求的大量信件，寄至国际越南委员会。

吴庭艳政府和美国间谍旨在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明显活跃了。推动此情况的是南方当局。尽管人民不满现行制度，但南方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美国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下，南越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吴庭艳的制度(美国每年向南越政府提供大约3亿美元)。1956年初，完成了对国家机器的"净化和巩固"，从中清除了民主主义分子。1956年4月，基本上粉碎了反吴庭艳的教派武装力量。3月，举行了立法会议选举，立法会议通过了具有煽动性的越南共和国宪法。

从南方广泛派遣有经验的破坏者和间谍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下列状况，即民主共和国的安全机构还很薄弱，混杂有形形色色的人和异己分子。具有代表性的是，战争结束后，在加强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条件下，安全机构没有破获过一起大大小小的重要反革命组织。

南越政府竭力利用北方的尖锐化局势，来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似乎存在大规模花岗岩的问题。11月29日，吴庭艳政府在第十一届联大全体会议上通过菲律宾代表团致信联合国，要求进行干涉，以保证在北越的民主权利。根据比诺不久前在法国国民会议的讲演来判断，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企图支持菲律宾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的吴庭艳挑拨是非的诉状，以强化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污蔑运动。12月4日，南越的立法会议通过了"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罪行"的决议，并且号召"自由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吴庭艳政府打算提出开放北纬17°边界的问题，这样就有可能毫无障碍地从南方派遣间谍，并且组织部分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转移至南越。

南越政权加强了军事准备，特别是北纬17°地区投放了4个师。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标定线和水域事件的次数更加频繁了。

越南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出现不满分子和敌对分子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举动以及美国和南越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挑衅。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И. 图加里诺夫

1957年1月5日

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22, д. 485, л. 1-16

№21485

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

（1957 年 1 月 5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 年 1 月 5 日
第 10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
情报委员会：

现将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及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措施”呈送给你们。

附件共 30 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K. 克鲁季科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И. 谢尔巴科夫
1957 年 2 月 15 日

附件：

第 10 号文件
1957 年 1 月 5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及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措施

（情报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吸引了中国社会广泛阶层的集中注意力。党员、工人、国家干部、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界，都在座谈会上、政治教育班课堂上和讨论会上积极讨论代表大会的材料。代表大会结束后，其材料就成为党组织政治学习网的学习科目。中国的报刊广泛宣传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和阐明代表大会提出的新问题。

共产党员、广大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和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护，并且力求将其实施，广泛反映于会议和集会上的发言中，反映于中国报刊上，反映于工人农民申请入党的人数增加上。

说明不同阶层人民对中共八大深切注意和具有兴趣的事实是：代表大会期间，中国主要城市的中央报纸杂志销量明显增加。例如在北京，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报纸的零售量翻了一番；在太原市报纸销量从2.9万份增至5万份；其他城市的报纸销量也增加1—2倍。《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大量来信。

我们不详细描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反应和资料，而只是努力说明某些不是从公开报刊上获得的反映，并就中国社会舆论最感兴趣的中共八大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根据普通党员、中下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民主党派和团体的言论以及中共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措施作出回答。

据一系列城市的消息，中共八大在务实的气氛中进行，没有喧哗，没有在企业开展庆祝代表大会的竞赛，这种情况给许多党员、干部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指出，中共八大的报告是简洁的、务实的和谦虚的，没有自吹自擂，没有预先过高评估代表大会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的普通党员和干部，对代表大会工作的组织往往提出相同的批评意见。例如，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这里和其他地方引用的新华社记者的资料都属于刊登在该通讯社秘密简报上的专门情报，这些简报仅供领导干部阅读），武汉市和湖北省的某些干部表示，中共八大对党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问题注意不够。他们认为，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共的成就说了很多，但关于缺点和错误说得很少，说得不具体。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够。在中共北京市委，有些工作人员将中共八大和苏共二十大相比，很多地方是在总结经验，但不像苏共二十大上那样，谈及工作中的缺点很少、很表面。根据重庆市某些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主要注意到目前的内政问题，阐述理论问题的地方不够，而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和殖民地反帝运动的一整套理论问题，并且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政治结论。

不过，部分党员和干部发表了相反意见。例如，根据今年9月19日来自重庆市的消息，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中共八大最强的方面之一是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并

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这是中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成熟的证明。有鉴于此,有些人宣称:"以前一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那么我们就研究苏联的理论,虽然我们有了某种比它更好的东西。"

共产党员十分注意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理论新问题。在有些党组织,党员们阅读刘少奇的报告后,就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争论,特别是下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吗?为什么只有到 1956 年中共中央才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开始就已确立?现在如何对待现有的学习资料,其大部分是专门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的?多党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矛盾吗?如此等等。在北京的科学界,在高校社会科学教师中间,至今在讨论过渡时期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问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矛盾的性质,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共存和合作的基础,等等。

考虑到部分党员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某些理论新问题不够熟悉,中国的报纸杂志系统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例如,理论杂志《学习》和《新建设》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阶级性质,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特点,关于允许自由宣传唯心主义的原因,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等的内容丰富的大块文章。

必须指出,在这些文章中,从新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问题。例如在龙浦(Лун Пу)发表于 1956 年 11 期《学习》杂志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中,作者发展了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到的原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将会保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新的角度提出关于唯心主义社会根源和问题。作者批评了以前中国(以及还有苏联)哲学文献中盛行的概念,即把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归纳于阶级矛盾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作者把这个观点叫做庸俗唯物主义偏见。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积极和消极的矛盾,一般说来不仅是唯心主义错误的社会根源,而且是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他说,此外,旧思想的残余还将很长时间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一整套复杂状况,创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唯心主义的存在基础和存在形式。自然,这种唯心主义将存在于同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这种矛盾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思想生活矛盾的反映与集中表现。此一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将是社会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类似新提法同时,根据我们的意见,个别文章中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原则问题有着不完全正确的或至少有争论的阐述。例如在高放的文章(《关于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新建设》1956 年 12 期)中提出下列原理作为发展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第一步,即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作者为证明这一原理力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这正是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同

时，他忽略研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种转变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开始，并且已在自己内容的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

为了保证党的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得到较高水平培训，目前在研究关于一系列政治学校和党校举办专门学习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学习班的问题。

对中共新党章和党加强国家机关与群众联系的组织措施的反响

邓小平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肯定的反响。

大多数中共党员表示同意代表大会关于提高党员和预备党员要求的决议。不过，关于确定统一预备期为一年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希望入党的有些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认为，为他们规定的预备期和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一个样，不完全正确，并表示新规定有利于出身不好的人。有些党员甚至说出了这样的担忧，即中共新党章对入党者规定，一年统一的预备期来替代以前根据入党者的不同阶级属性而规定不同的预备期，会恶化党员的质量构成。

根据某些城市的消息，大部分民主人士、无党派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认为，对入党规定统一的预备期，符合国内新的形势，是个完全正确的措施，是消灭宗派分子道路上的新步伐。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提高了对党员和入党者的要求，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会说，党对知识分子关上了大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南开大学俄语系教师卢绍英(Лу Шао-ин)的声明。他说："我感到，开始有利于知识分子的风，近来改变了方向。接纳知识分子入党的浪潮过去了。邓小平的报告说到提高对入党者的要求，由此可见，对我们说来，入党的大门牢牢关上了。希望等待到再次刮起一股有利的风，到那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的消息，下列情况引起党员大为惊奇：以前是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和张闻天，只是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事实引起了对这些党务活动家未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原因的不同猜测。同时，许多党员注意到，李立三和陈绍禹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党员将此看作党宽大对待犯了错误但有所悔过的同志的证明。不过，有些党员因此而表现出不满，说道："陈绍禹犯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公开检讨。为什么他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许多党员认为，李立三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十分深刻和有力。

在讨论代表大会材料的过程中，有些党员表示奇怪，为什么中共八大的召开要比党章规定的晚那么久。他们说："如果这种情况将来再次发生，那么中共九大召开时，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个别党员和干部问道："为什么中共八大上没有批判个人迷信，难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是个人迷信的表现吗?"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某些城市的消息可见，党员、干部和工人都热烈赞同发展党内民

主、巩固党和群众联系、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的措施。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热烈争论。大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认为,着重注意这些问题是件正确和及时的事情。正如北京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思想领域存在主观主义、实际活动中存在官僚主义和组织方面存在宗派主义的指示,完全符合国家的现状。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的有些工作人员说,在一系列机关,官僚主义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们表示,必须组织一次新的运动来纠正工作作风,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广泛斗争,其时应特别注意反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根据其他省市的消息,许多干部也发表意见认为,中共八大后必须进行清党和新"三反"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工作作风的斗争,以前基本上是在中低级别党务机关中进行的,不大触及中央机关。

现在,党组织在逐渐开展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中国的中央级和省级报纸上,在机关等的会议上进行系统讨论。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措施,在于最大限度地缩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精简管理机关,使管理机关接近群众,减少不同层级数,动员全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同因循守旧、没有效能和无节制、漠视劳动人民事件斗争。

11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禁止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增加机关数目、扩大编制。组建新机关和极端情况下扩大编制,只有根据专门决议才允许。中下级国家机关和党务机关的注意中心,是反对粗暴行政方法,反对压制群众批评的任务,其目的是使干部更深入地研究现场的状况,考虑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12月份赴全国不同地区视察赋予很大意义,其目的是调查各地的状况和不同阶层居民的情绪,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为了发展创造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组织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管理及其民主化,摸索职工参与管理的最合理最有效形式。在国营和合营企业,召开职工代表会议,讨论企业管理的工作和组织。此外,在公私合营企业,建立了所谓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固定机构。选入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有职工代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以及资方代表。民主管理委员会定期讨论涉及生产组织和经济管理的问题,反映员工的意见,反对行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虽然这种委员会主要是咨询性组织,不过有权广泛监督企业和行政管理的活动。现在,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合营企业中建立起来。

《人民日报》社在10—12月间总结党组织讨论代表大会决议的材料时,在自己的报纸上系列刊登了关于扩大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党和政府机关个别领导工作人员骄傲自大以及脱离群众的必要性的文章。10月8日《人民日报》①在题为《不要害怕反对意见》的社论中说:"有些领导工作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

---

① 原文如此。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9日《人民日报》。——编注

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的不一致。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愈是成熟，就应该愈懂得集思广益的必要，就应该愈懂得保持谦虚谨慎态度的利益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危害。”

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十分满意地接受了董必武、罗瑞卿同志在中共八大上关于巩固革命法制必要性的发言。同时，许多民主人士注意到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过程中有错捕错判以及不正确使用称呼和破坏法制原则的情况的发言。经常说到这样的意见：目前极为敏锐地感觉到最快地制订和编纂中国新法律的需求。例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士为此表示：“这是个最迫切的问题。当建立组建律师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时，就看到希望获得宪法的公民在排队。人们想知道政府的法律，特别是民法和刑法。现在，国家机关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我希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律后要尽可能地制订社会主义法律。”

根据中共八大的决议，考虑到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关于必须加快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和刑法空白的言论，司法机关制订了某些新的法律法令。例如，11 月准备和分发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11 月 6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宽大处理不进行敌对活动的有罪的甚至犯有严重罪行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决定中也拟议了对因反革命活动判刑期满的人给予劳动安排的措施。在全国人大这次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限制获释反革命分子权利和对其监督只有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才可实施的决定。

12 月 18 日，在同出席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工商业者代表团代表座谈时，毛泽东同志说，有些资本家害怕镇反运动，但是这种害怕是没有根据的。毛泽东同志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已过去，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毛泽东同志说，匈牙利事件证明，匈牙利国内有许多反革命分子。中国不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工商业者中间有个别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的数量不多。毛泽东同志说，原先和国民党有联系，但没有严重犯罪的人，不应该算作反革命分子。在反对胡风和揭露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过程中，审查了 400 多万人，其中属反革命的约占 1%(3.3 万人)，而不是以前设想的 5%。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有 10%被捕送入劳动集中营。毛泽东同志说，对其他人，仍留在工作岗位上，不再采取惩罚措施。任务是对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改造。(注：毛泽东同志的话，根据苏联专家 E. M. 谢苗诺夫同志所作的座谈记录叙述。)

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中共邀请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出席八大以及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的方针，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别注意与兴趣。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对许多共产党员说来，民主人士出席中共八大是出乎

意料的。有些共产党员表示,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他们问,当民主党派成为劳动者的政党时,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区别在何处呢?在某些其他城市,共产党员也有相似的反映。例如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上海市和济南市的部分共产党员不能理解刘少奇的下列表示:“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以前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党。”因此,个别共产党员不清楚将来这些政党的性质问题。有些干部发表意见认为,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党代会,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相矛盾;对于他们的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可能不会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因为害怕泄露党的机密。

在资产阶级代表和大多数民主人士中间,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八大引起了最欢欣鼓舞的反响。例如海南省的民主人士,称中共中央的这一步骤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新闻”。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感到欣喜的是,关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的原则写入了共产党的章程。根据民主建国会重庆市组织领导人林广恒(Линь Гуан-хэ)和其他会员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八大,并且给他们以热烈接待,证明真正解决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和相互批评的问题。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民主人士甚至开始热烈争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是否与中国共产党一样,也是执政党?民主党派和团体的许多成员表示,希望中共八大以后允许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更广泛的民主,而民主党派和团体将享有更高的威信和更大的独立性。

有鉴于此,有些民主党派成员说,虽然中共关于对待民主党派问题的总政策不会引起怀疑,但是在地方上,这个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例如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闻柏山(Вэнь Бо-шань)表示,中共广东省开平县委统战部以前有时候不和他商量,甚至对民主人士关于认购公债的意见也不感兴趣。闻柏山说:“关于真正的共同讨论也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连形式上的讨论也没有。这里能说到什么相互监督吗?”广东省有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成员,也表示怀疑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合作的方针。他们说:“这些党派和团体的基层组织,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而经过几年,这些党派的大多数老成员将去世。那时,中共将和谁合作呢?”在青岛,有些民主人士甚至表示,八大提出中共与其他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只是为了叫民主党派更积极地工作”。

考虑到在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成员中间存在类似的情绪以及实现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和相互监督方针的组织问题跟不上,近来中国报刊尤其是《光明日报》发表了不同民主人士关于其对这个新方针理解、关于民主党派和团体新任务的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成员的政治积极性不高,以及担心和怀疑。

不过整体说来,中共八大之后,各个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活动,特别是他们基层组织的活动明显活跃了。根据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一系列消息可以看出,中共的地方组织也开始更加注意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了,比较经常地同民主人士商量,更为积极地吸收他们参与工作。据某些事实判断,党组织在努力提高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其方法是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组织独立性。例如从天津的民主建国会组织中,召回了参与其中的共产党员。

1956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了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团体)中

央二次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民主建国会的任务和下一步工作方针，并通过决议强调，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发挥工商业者在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性以及提高其自觉性，促进资本家的改造，将其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者，巩固原资本家与工人的合作，吸收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用热爱劳动、无私的精神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经营经验和技术知识教给工人。

全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最重要的若干原则问题”的决定，其中斥责了民主建国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章乃器(决定中未提他的名字)对现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关系问题的错误观点。章乃器的观点归结为：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劳动者已经几乎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相似了。章乃器据此表示，私营企业变为合营企业后，已经不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了。章乃器的观点表现了部分会员和民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情绪与观点，导致高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低估了对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工作和改造的必要性。

自然，研究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那些代表会材料，吸引了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别注意力。必须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中共八大材料的反响是极为矛盾的，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政策的不同态度。

相当部分资产阶级，饶有兴趣地、表面上极为肯定地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之后，资本家发表关于想放弃转入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利息所得的声明数量明显增多了，他们声明想完全结束剥削，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者。根据一系列城市的报道，其企业已变为合营的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道：“什么时候最终把我们从‘资本家’这个称呼中解放出来?”

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高兴地接受了下列原则：今后对资本家做工作的基本方法将是说服教育。例如，管理天津大型纱厂“恒源”的王秋民(Ван Чжоу-мин)表示：“从形势判断，可以希望将来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要好很多。”

正如新华社记者1956年9月29日发自重庆市的报道，根据重庆市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八大总结的经验，特别是执行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派政策方面的经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有些资本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执行了好政策，而且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指明了前途，这将有助于削弱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不过，部分资产阶级对代表大会持极为谨慎、疑虑或敌对的态度，等待人民民主国家出台新的限制，担心迅速取消转入合营企业的股金的定息。例如，天津市“乾忠善”银行的经营者张钟伟(Чжан Чжун-вэй)在表达原资本家一族意见的同时表示：“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易变的：今年对你宽宏大量，明年就再次开展什么‘五反’运动。”有些反动资本家竭力以最曲解的形式来想象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国家机关目前进行巩固合营企业、原资本家的劳动安排、使他们接近员工并吸收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作。195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

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完成私营企业全行行业改造为合营企业后工商业者的活动问题,资本家改造、他们与工会的关系、巩固他们与员工团结的问题等。

考虑到一定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怀疑自己被安排的位置以及担心所投入资本的定息将被很快取消,便采取措施,以便让这部分资产阶级安下心来,并且指出,资本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12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同各省市工商业者(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参加者)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中表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原资本家因将企业交给国家而得定息的期限可定为7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而必要时,如果资本家还将感到有困难,这个期限可能被延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合营企业的资本总额为17亿元,而7年来将以定息付给资本家的达8亿元。同时,毛泽东同志强调,国家不是没收而是收购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资本家可以安心劳动,因为将来不会有工商业改造的新高潮,一切将逐步适应起来。毛泽东同志也指出,目前,80%原资本家按阶级属性来说可不划入中产阶级,而是划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因为他们的资本很小,他们自己参加劳动。

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陈云和薄一波同志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陈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欢迎有些小资本家放弃定息,但近期不准备在资本家中间组织某个放弃规定利息的运动,认为把这种期限持续至原私营企业主最终获得劳动安排是合适的。薄一波同志在发言中特别指出:"过早取消支付给资本家的一定定息,会给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条件暂时没有成熟,定息将继续支付。"

由于许多小资本家在企业改造后感到有巨大的物质困难,国家机关给了他们某些补助。如果这些人获得股息——不足2 000元,那么他们就不是工会会员,但有自己的新工作岗位,生病时可得到相应的休假以及医疗补贴,与其他员工一样。代表大会也强调,当资本家不领取定息,如果工人们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他就可以参加工会。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的报道,中共八大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教师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天津市南开大学的教授和教师,十分注意谈及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任务的代表大会材料。许多教师开始制订自己个人的科研工作计划。与此同时,有些教师说出了对所提出的中国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现实性的意见。例如,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邢索(Син Со)表示:"我认为,刘少奇报告中提及的高校大学生数量增加速度太快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高校大学生数量应该比目前翻番……不过,骨干教师的问题仍未获解决。"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反响及最近中共在经济部门的措施

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间,对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国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积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材料,在党的教育系统和报刊等进行了广泛

宣传。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赞成下一步发展国家经济的新方针。

不过，在座谈和学习代表大会材料过程中，个别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非党工人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如果总结部分共产党员、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某些说法，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归纳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物质供应和工人、职员、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够快以及轻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例如，许多城市里的相当数量干部和工人说出了下列意见：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中共代表大会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规定投入工业建设的基本投资太多，而工资增长速度较慢。许多工人认为这种速度太慢，因为他们生活的改善似乎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例如，武汉市的部分工人很不满，今年工资改革后物价上涨了，副食品供应不适应需求，而有些商品仅仅上了黑市。上海市的工人中间，也极为广泛地流行类似的情绪。

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农民的收入增加25% 30%，那么参加合作社后收入很低的，或者生活深受自然灾害痛苦的地区的那部分农民，多少会持谨慎接受的态度。部分农民不满于投入农业的基本投资和投入工业的比起来规模小，收入的提高速度慢。在某些共产党和干部的发言中，也表现出这种情绪。例如，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天津市的报道，在中共县委区委的党务工作者学习的党训班上，许多发言者表示不满，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规定用于发展农业的基本投资只占用于发展经济的总投资的10%。他们表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务必增加对农业的基本投资，为农业提供更多的农机、拖拉机等以及更好地向农民供应日常消费品。

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特别是高校教师，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完成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认为任务提得太高。上海和天津市的有些教授也有这样的说法。有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代表发表意见认为，快速发展重工业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国家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这一观点的拥护者表示，目前务必主要注意提高人民物质供应水平的任务，而后全力发展重工业。

必须指出，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推动了类似情绪的流行和强化，特别是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

正如看到的，这种情绪在工人和部分干部中间十分流行，因为这年11月《人民日报》就此问题发表一系列专门文章，解释了在员工物质供应方面碰到临时困难的原因。在《人民日报》11月27日社论《人民生活只能逐渐改善》中说到，党和人民国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现象和不注意人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现象，不过，中国经济总体落后性，不可能迅速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使这两个方面适当地结合，这不仅是党和政府应当注意的重大政策问题，也是每个工人、职员和一切劳动人民都应当明了的问题。"

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修改了1957年度某些预算指标和生产计划，是共产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措施之一。中央全会指出，1956年的经济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困难。造成这些缺

点和困难的原因是：个别计划项目的指标过高，特别是用于大企业建设的基本投资过大，雇佣劳动力过多等。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必须重新修改1957年度计划和预算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195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要放慢一些，而某些部门的增长指标有所降低。工农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也将有所改变，更多地注意住宅建设。

由于某些商品的短缺，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以及为了保证农产品的销路，近来在城市建立了自由市场，来自邻近地区的农民、手工业和手艺人可在那里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由于这些市场，城市居民的供应有了改善。进入市场的这类商品，有许多在国营商店里是没有的。不过同时，这些市场的存在，也导致小型私人商业和小型私人企业的很大活跃。在有的城市(例如上海)，产生了许多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自己产品的地下小企业。自由市场的价格根据供需情况来确定，不是由国家直接调节的。这在有些地区导致一系列短缺商品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市场上甚至开始出现按规定应该只能集中分配的那些产品。

为了改善城市的供应情况，国家机关采用了这种活跃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方法，虽然这样做将给发展手工业合作化带来某种损害，强化了手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趋向。由于手工业合作社工作组织方面的缺点以及部分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的收入降低，有些手工业人力图退出合作社，在自由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目前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没有加速手工业的进一步合作化，而是在做从组织上巩固已建合作社划小的工作，不阻碍手工艺人退出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改善城市商业管理体制的工作。不久前撤销了采购部，它的机构并入城市供应部，目前从事城市粮食供应问题。该机构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由于改进城市供应问题还十分尖锐，1957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在农业领域的基本工作方向是，巩固不久前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将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打算到1956—1957年冬，将完成由占80%农户参加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合作社。

由于某些地区的自然灾害，合作社经营组织中的缺点以及副业的冻结，所以部分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有部分农民竭力想退出合作社，党和国家机关花大力气注意从组织上巩固新合作社，改善他们的经营活动。11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的若干具体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出，必须总结合作社活动的经验，研究所犯的错误，作出必需的结论。指示强调，冬季必须特别注意发展副业，为的是用由此得到的收入弥补主业生产减少的收入。

由于某些合作社中成员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代表，其中汉族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其他少数民族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从而引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代表的摩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介绍了调整这些问题的一系列途径。

指示强调，合作社领导必须严格遵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性章程，坚决改正对某些农具、森林、果园等作价和入股时犯的错误。为了巩固每个合作社中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必须精确确定低交费额，把超过这个股份的入社资金退还农民。如果不够，就要求补交费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所有干部在办理合作社事务中一贯遵守民主，定期召开合作社社员会

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示强调，农村的干部应该全力巩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和团结，勇敢地揭露合作社活动中的错误和缺点，批评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指示说，必须在今冬明春打好基础，以便在来年使90%甚至更多社员增加收入。

关于中共八大国际意义的意见

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在讨论中共八大材料时经常就代表大会国际意义问题进行争论。

根据9月28日新华社记者发自重庆的报道，中共重庆市委负责人表示，代表大会在发展国际革命运动、帮助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他们认为，中共不但在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政策这些问题方面的经验，而且镇压反革命、解决犯错误同志等问题方面的经验，都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具有很大意义。

不过，个别人其中也包括党员，高度评价八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将八大与苏共二十大相比，竭力提高该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有个别人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强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应该首先向中共学习。同时，从有些中共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对共产党八大的反应中，有时透露出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潮流。例如，据10月11日新华社记者发自武汉的报道，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八大是在有利的环境中结束的，然而苏共二十大是在“乱七八糟和神经质”条件下结束的。他们表示：“苏联批判个人迷信，引起一系列兄弟共产党的思想分歧。相反，中共八大正面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而此举将有助于消除分歧，提高兄弟共产党的思想水平。”有些人说：“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

据发自地方的报道可以看出，某些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热衷于这个方面。例如民主建国会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州市副市长严书夏表示：“中共八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比苏共二十大的意义更大。”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组织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李述中说：“中共许多新的工作方法例如组织多党专政，务必让其他国家知道和理解。现在已经可以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所以，和苏共二十大相比，派往中共八大的代表团要庞大很多。”

很难说，类似的观点流行到什么程度，但中共八大之后，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类似的说法看来不是个别的，这就是党的内部报刊关注这一点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国社会舆论热烈欢迎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不过个别普通中共党员对代表团的组成产生了疑问，因为他们认为来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一定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志。所以，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和刊登在内部简报上的报道，有些党

员和干部对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组成表示极大惊奇，并且说出了一切可能的猜测，为什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没有来。有些党员问道："1954 年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典礼。难道这次代表大会不重要吗？或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某些分歧吗？"

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注意中共八大上米高扬同志的讲话，将他的发言看作是苏共对中共工作的评价。绝大多数人对米高扬同志讲话中如此高度评价中共活动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除此之外，有些党员和干部认为，虽然米高扬同志讲话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是讲话中同时坚决强调，列宁已经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所以得出结论，似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任何新东西。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南昌的报道，江西省有些中层干部认为，米高扬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不够谦虚，充满了引文和外来的教条主义。有些党员表示："米高扬的引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考茨基的著作，不过没有一段引文来自斯大林的著作。难道斯大林就没有一条正确的原理了吗？考茨基成了叛徒，难道斯大林甚至比考茨基还坏吗？"

米高扬同志在中共代表大会结束前离开中国这件事，许多人表示不理解，引起了多种多样的推测，并猜想他过早离开的原因。在华东地区，代表会后广为流行关于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以及中共和苏共关系即将破裂的谣传。

由于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及看来考虑到有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和干部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存在混乱的不健康的看法，是年 10 月，中共中央通过专门决定，组织在中国广泛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9 周年，并且因此而举行庆祝大会、群众集会、苏联电影联欢节、同苏联专家会见。中国庆祝十月革命 39 周年时，在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和会议上的报告中，坚决强调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作用，全力巩固苏中友谊、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团结在苏联周围，并在苏联的领导下。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也写了这些文字。

不过必须指出，近来，中国同志开始比较批判地对待苏联的经验和苏联学者的理论。在党的内部报刊上，特别是在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中间十分广泛分发的信息简报上，开始经常出现反映苏联党务和国家机关工作缺点的资料、工资制度的负面现象等以及西方报刊关于苏联状况的报道。

若干结论和建议

从普通党员、国家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反响中可见，党员群众、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八大的工作总结是满意的，并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八大有助于这些阶层政治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中共在整个中国人民中的威信，提高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政策正确性的信心。

代表大会提出某些新问题和新政策，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方针，科学和艺术中开展自由争论方针等的具体实现途径，对中国社会舆论来说还不大清楚。现在解释这些问题和宣传代表大会提出的原理，在中国报刊上占到很大篇幅。

正如从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反响中明显看出的，某些阶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实际工资提高缓慢，一系列商品短缺以及城市住房面积不足表示不满。鉴于此，中共旨在更快发展轻工业、提高员工工资、组织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等的措施，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目前，中共和中国政府在政策中一贯执行中共八大的决议，特别注意全力巩固党和国家与群众的联系、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巩固法制、反对国家机关不同环节上的官僚主义、努力团结各阶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节约资金、发展生产特别是轻工业、改善居民供应。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巩固工业、商业、农业、手工业部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的成就，安排好合营企业的工作，从组织上巩固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安排好资产阶级分子的劳动岗位，暂时不加快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

考虑到中共八大的意义以及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某些新的理论问题(关于不仅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与不同党派共存和相互监督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矛盾的问题，关于反对科学艺术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方法和形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等)，组织下列活动是合适的：

(1) 在苏联社会政治和哲学杂志上发表苏联作者——这些问题的研究专家的文章以及中国作者的理论问题文章的译文。

(2) 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国立莫斯科大学举办这些问题的理论学术会议，尽可能有中国同志参加。

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与文化建设的实践，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当然，这种形式的大多数，是由中国环境、中国阶级关系以及中国所经历阶段的特点决定的。不过，根据我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形式中有些值得相关的苏联组织在可能用于苏联方面比较深入地加以研究(例如党务工作的某些组织形式，组织定期召集中央政权机构的代表到自己的选区熟悉当地情况和会见选民，组织分析劳动人民写给上级机关的信件和申请等)。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利用苏联各种代表团的访华(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们基本上都带有礼仪性)，对每个代表团提出相关的具体任务是合适的。特别是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访华，不能仅仅是回访或礼仪性的，而是希望代表团成员在中国逗留时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特别注意中国国家机关工作经验的积极方面和适合以某种形式用于苏联的工作方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A. 谢尔吉耶夫(签名)

1957 年 1 月 5 日

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22, д. 485, л. 19 – 49

№25205

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7年1月19日)

摘自 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1月21日
第4/nf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

1957年1月19日

在一次从莫斯科飞往塔什干的航班上，周恩来在与我交谈时要求告知 H.C.赫鲁晓夫以下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将继续与布罗兹·铁托就今年2月底可能召开的会议进行会谈，参加会议的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

对于这个问题，与彭真的协商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铁托可能会同意参加这个会议。那样的话，周恩来在结束对东部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及其他)的访问后，准备在今年2月初对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包括南斯拉夫，进行访问。与铁托的初步会谈中，准备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铁托可能会以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等理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这样的话，关于该会议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彭真与铁托协商的结果，周恩来将会告知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费德林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4

№138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

(1957 年 2 月 2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2 月 2 日会议第 71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基里琴科、А. И. 米高扬、В. М. 莫洛托夫、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Д. Т. 谢皮洛夫、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 2 项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晤。[①]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在向铁托通报时，不要表现出强行会晤的意思。[②]

最理想的是：在最初进行一对一的会晤(双方之间的)。

不能表现出特别关心的样子。

对中国人说——我们赞成应该找个时间会晤，可以在 3 月或 4 月初进行这样的会晤。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谢皮洛夫同志准备信函草案。[③]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7，л. 1－8

---

①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由苏共中央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同准备的，是在 1957 年 11 月 14－16 日期间在莫斯科市举行的。参加其中的有 12 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外)。他们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宣言，在宣言中对当代国际局势及倾向进行了分析，并承认有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在 1957 年 11 月 16—19 日期间，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根据这些会议的决定，开始出版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第 1 期杂志于 1958 年 9 月出版)。——原注

② Н. С. 赫鲁晓夫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由于在匈牙利事件暴发之后，在苏联共产党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之间关系的尖锐化引起的。关于这一点两国共产党领导人在 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1 月之间的信件往来可以证明。与此同时，出访南斯拉夫的彭真在莫斯科通报了他与铁托的谈判情况以及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РГАНИ，ф. 3，оп. 14，д. 99，л. 26.)。——原注

③ 1957 年 2 月 7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 Н. С. 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建议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晤以及关于自己同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面主持这样的会晤的信函草案。在信中还通报说，对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适宜的是会晤在稍晚些时候，在 1957 年 3 月底到 4 月初期间进行(РГАНИ，ф. 3，оп. 14，д. 95，л. 2；д. 99，л. 16，26)。——原注

№207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

（1957 年 2 月 2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2 月 2 日会议第 71 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①。

第 71 号记录第 2 项，1957 年 2 月 2 日。

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同志就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问题起草一份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件草稿。②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95，л. 2

№21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1957 年 2 月 6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2 月 6 日会议第 73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基里琴科、Г. М. 马林科夫、А. И. 米高扬、В. М. 莫洛托夫、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Н. А. 毛希丁诺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Д. Т. 谢皮洛夫、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Н. С. 赫鲁

---

① 赫鲁晓夫的意见显然造成了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苏共中央与南共中央关系的恶化。两党领导人在 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1 月之间互换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彭真在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之后向莫斯科通报说，他原则上同意南共参加计划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РГАНИ，ф. 3，оп. 14，д. 99，л. 26）。——原注

② 1957 年 2 月 7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赫鲁晓夫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晤的信件的文本，信中还同意由中共中央组织这次会议。信中还通报说，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稍晚的时候——1957 年 3 月底、4 月初的时候召开这次会议较好（РГАНИ，ф. 3，оп. 14，д. 99，л. 2；ф. 3，оп. 14，д. 99，л. 16、26）。——原注

晓夫主持。

第 1 项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草案①。

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草案被分发了——毫无目的。

关于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是不适宜的。

关于"取缔任何一个集团"——不应该这样说。②

1. 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

马林科夫同志：局势对缓和紧张状态非常有利。

在第 38 页——"建议没有根据"——显得很天真。

2. 关于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

米高扬同志：关于对芬兰方面在表达方式上应该更柔和、更灵活些，在外交部的口头表述中——要更委婉些。

伏罗希洛夫同志：有些无的放矢，在形式上有鼓动作用，但有些粗鲁，令人生气。

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近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出现了尖锐化的局面，对反动力量应该进行打击。

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已经向谢皮洛夫同志转达了具体的意见。

理论上的证据很多。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宣言不妥当。

福尔采娃同志：关于成绩已经谈过，"微笑政策"不成功。③

赫鲁晓夫同志：不应该削弱报告内容。目标——给予打击，达到缓和。援引的内容不合适。

词藻华丽："占优势"；关于人民民主国家——范围应该更广一些。报告很好。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7，л. 9－9об

① 在 1957 年 2 月 5—12 日期间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的会议日程中，包括了以下问题：关于苏联 1957 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报告人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М. Г. 别尔乌辛)；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报告人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А. Ф. 戈尔金)；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对外政策问题(报告人为苏联外交部长 Д. Т. 谢皮洛夫)。——原注

② 在报告草案中确定了"向美国政府建议共同发表《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原则的声明》是适宜的和及时的"。草案还谈到了"这个宣言可以使各个国家保持在相互关系中遵循以下原则的庄重承诺：1. 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2. 互不侵犯；3. 互不干涉内政；4. 平等和互利；5. 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还拟定对这些原则增补一项义务，即"不对其他国家施加任何压力"(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75，л. 44)。——原注

③ 在 Д. Т. 谢皮洛夫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资产阶级世界不成功的战略……决定我们'探索清楚'和开始考虑苏维埃制度的某些'演变'……在期待着这种'演变'时，西方的某人甚至愿意对苏联实行所谓的'微笑政策'"(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75，л. 11)。——原注

№21481

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

(1957 年 2 月 14 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发给您关于 1956 年苏联新闻局代表处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报告。

具体参见附件，共计 16 页。

苏联新闻局负责人
П. 波兹杰耶夫
1957 年 2 月 14 日

第 32 号

附件：

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 1956 年工作报告

(一)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我代表处的工作都是在苏中友谊不断巩固的氛围中进行的。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这年 9 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随着对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模式。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为用 4 年时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八大通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后者成为了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纲领。

中共八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会议也强调，必须积极发展轻工业，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合作社。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进行从低级合作社向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高级社的转变。中国北方和中部省份的多数农户已加入高级合作社，人数已占其农户总量的近 96%；而在南方和西南诸省——比重为 60%，也有一些地

方——40%，甚至更低下。在内蒙古畜牧区也开始组建高级合作社。去年，虽然国家许多地区规章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作物总产量仍略高于1955年(增产1 000万吨)。牲畜数量的增长情况比较差。虽然牲畜数量(其中包括力畜在内)有所减少，但80%以上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民的收入仍有所增加。

合作社经济在组织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和训练有素的干部，尤其是会计人员。许多问题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如劳动组织、核算，大队和小队的规模，劳动收入的分配，劳动日的评估，向计件劳动的转换，等等。目前合作社的状况是，60%—70%的收入按劳动日分配。粮食按维持生活的定额发放。如果劳动日超过了这一发放定额，那么超出部分用现金支付；如果工资不足以赎买粮食(原因是只有一个劳动力，赡养者众多)，那么劳动组合成员就必须在冬季找一些附加工作，以便合作社社员能够增加劳动日数量和补偿那些多发放的粮食定额。赎买粮食的部分费用由互助委员会负担。

去年，各阶层居民都增加了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需求，尤其是对党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了党内监督。各级党的监督委员会的作用也在提高。在这方面，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居于重要地位，尤其重视培养党员和非党员的纪律性、高度觉悟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在企业和机关领导中发挥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党委对企业的领导和人们的教育工作承担着全部责任。重视加强党组织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各级党委的工作计划中便包括指导和定期检查工会的工作情况，帮助工会完善民主制度，更广泛地吸引工人和职员群众参与生产管理。

强化党委领导企业和工会组织的责任感，使北京市的一些企业有可能转而采取另一种更广泛地吸引工人和职员参加工厂(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在内)管理的模式。例如，在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第二棉纺厂，企业经理不再实行任命制，而由职工代表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委员会也经选举产生，该委员会是这些企业的最高领导机关，拥有对经理的监督权，在必要时可以提出改选经理的提案。很难说，这些管理模式是否会得到广泛的普及，目前看来，它们只具有试验性质。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各地正在开展为扩大劳动者的民主权力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

当陆定一同志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之后，各地目前正在广泛开展关于哲学科学、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等问题的辩论。其中，近期争论的问题便包括：“关于(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否可以将资本家的非劳动收入纳入剩余价值的范畴”，“在中国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关于精减管理机构”，“与教学计划相关的八个问题的讨论”，等等。

这场正在开展的辩论是在马列主义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参考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成就以及中国自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些辩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有助于人们找到更好地解决当前一系列实际问题的办法，而这些问题均对国家的科学和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人们坚定地维护马列主义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观。另外，此类辩

论还在以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辩论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从而更自觉和积极地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就正如中国同志们常说的："这场辩论是在朋友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我们与我们的敌人之间的争论。"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在中国国内大量开展了如下工作：进一步加强苏中友谊，更深入地学习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从最广泛的层面上了解俄国人民以及苏联所有其他民族的日常生活情况。上述工作开展的方式包括：将大量艺术、科学、科普、科技等俄文书籍译成中文，出版中国作家完全或部分为苏联而写的著作，组织宏大的苏联电影展，等等。

为加强苏中友谊，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发送自己的宣传资料，从而为中国的期刊出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全面地介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满足了中国读者的迫切需求——向最先进、最进步的俄国人学习。

（二）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与中国绝大多数中央和地方、省市以及许多杂志编辑部保持着联系。这一期间，中国国内共有71家报纸(其中13家为中央报纸)和23份杂志均定期刊登我们提供的资料。与1955年相比，报纸增加了8家，杂志增加了7份。1956年请求我们发送资料的中央报纸还有：《教师报》、《人民汉语报》和《体育报》等；杂志——《农村青年》、《科学新闻》、《冶金报》、《食品工业》、《人民音乐》、《物理通报》、《今日扬州》，以及地方报刊——《广州日报》、《南京日报》、《语言报》、《闽西工人报》和《新疆日报》。

1956年，代表处共从苏联新闻局收到原创文章1 478篇(比1955年少了2篇)，其中通过邮递的793篇(1955年902篇)，通过电传的685篇(1955年578篇)。这些文章多数都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直接把原稿交给中国编辑部的，少部分(30.7%)由代表处工作人员译成汉语后(再转交中国编辑部)。

所有转交中国报纸和杂志发表的714篇文章中的48.3%，均来自苏联新闻局。

1956年，根据中国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书面和口头要求，为中国定期刊物而从苏联新闻局索取的资料，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题目的多样性上均超过了1955年。我们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提供的资料获得了好评。该报的社会主义国家部负责人陈秋安(Чэн Цзю-ань)代表编辑部对我们所提供的高质量资料表示满意。他还指出，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文章对《人民日报》进一步深入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人民、苏联的经验和成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请我们转达报纸编辑部对苏联新闻局的请求，即今年不但不能减少，而是要更增加向该编辑部提供相关资料。

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定期刊物提供自己的资料——这一帮助得到了所有中国编辑部的高度评价。绝大多数省级报纸编辑均在来信中写道，苏联新闻局出版司是他们唯一的获取苏联文章的主要来源。他们还说，各中国编辑部没有力量撰写整体评价苏联的文章，也没有翻译能够始终关注苏联报刊所刊载的内容并将所需资料译成中文。所有中国报刊均指出，我们根据各报刊的要求发送相关资料，并对满足各报刊的要求抱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具有重要

意义。我们所发送的多数文章都是根据各中国报刊的相应要求而撰写的，并兼顾了其所要求的文章篇幅，而且这些资料的模式和文章的语言也是浅显易懂，因此那些由于内容枯燥、空洞而被编辑部退稿的文章数量减少了。

不过，虽然我们所发送的资料受到了各编辑部的高度评价，但1956年我们资料的刊载率仍比1955年低了18%——减少了161篇文章。这两年间各月份之间上述比例关系，可参见下表：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5	68	76	78	66	72	53	40	65	53	90	104	115
1956	76	56	80	80	60	64	43	61	27	48	62	53

文章刊载率的下降不仅只涉及来自苏联新闻局的资料，还有各中国报刊通过中国作家和苏联作家所组织的关于苏联的所有其他资料。

下面，我将就三种主要的中央报纸列举一些数据：

1.《人民日报》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年	1956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173	98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文章数量	55	24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40	18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78	56

2.《工人日报》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年	1956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168	59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文章数量	49	27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68	16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51	16

3.《光明日报》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年	1956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160	57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文章数量	31	16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66	16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63	25

上述三份报纸合计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年	1956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501	113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文章数量	135	67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174	50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192	97

从以上所列数据可看出，关于苏联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减少了来自苏联新闻局的资料，而增加了各编辑部吸收到本单位并独立工作的中国和苏联作家所撰写的文章。

从上表数据还可看出，《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资料均多于另两份报纸。原因在于，该报规模比较大，其在莫斯科拥有三个自己的记者站，相对其他报纸该报与我们中央出版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并经常相互交流资料，且拥有自己的俄文翻译。

刊载率的减少始于1956年2月末，并在6月、9月和10月达到最低点。随后，其虽重新有所增加，但数量并不大。不过，据各编辑部工作人员所言，几乎所有中央报刊均打算在1957年增加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

前不久，在与我的一次会谈中《人民日报》社会主义国家部负责人陈秋安说，今年编辑部计划刊登比1956年更多的关于苏联的资料。与此同时，关于去年此类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他解释道，编辑部提高了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要求，在文章的筛选方面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标准。一系列报刊中此类资料刊载率的下降受到了中央宣传部的批评。而关于这方面情况，陈秋安和《中苏友好报》报副总编辑苏艳辉(Су Ян-хуй)均向我作了通报。

关于刊载率的下降，陈秋安还指出了其他一些原因，其中主要包括：筹备党的八大，匈牙利事件，(英、法)入侵埃及(他这里所指出的后两个原因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论是在英、法侵略埃及期间，还是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报刊登载我们资料的比率均是反而有所提高的)。至于其他一些报刊刊载率的下降主要与报刊规模的缩小有关，如纸张不足，报纸采用更大的字体和新版样(横行印刷)，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听到的是中央和省级报刊工作人员自我批评式的言论。这些同志把我们所提供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主要归咎于自身原因，即没有对我们所提供的文章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长江日报》报编辑便发现了7篇我们以前向他们提供的具有一定价值而未刊载的文章，只是由于一位编辑的疏忽大意，才导致这些文章没有被刊载。几乎所有我去过的编辑部均能找到一些此类文章。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央报刊也经常出现。例如，有一篇关于与柯西金同志会谈的文章《人民日常工业品的发展》。《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不刊载这篇文章的原因被解释为“没有任何新意”。而稍后我才得知，该文章的编审不是这些报刊的主要负责人。最后，当该文章转到《大公报》那里并了解了文章的内容之后，该报决定发表，但文章却意外地不见了。过了两天才搞清楚，原来是文章被一位领导锁在了自己的抽屉

里，而他本人出差去了。关于与涅斯梅亚诺夫同志的会谈资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文章被送到了《人民日报》，那里的人在审阅了稿件之后便不由分说地退了回来。直到几天前才搞清楚，该报从自己的莫斯科记者那里也得到了一份同样内容的资料，因而发生了我们的资料被退稿的事。如今，该文章已在《大公报》编辑部，近两天就将发表。

所有编辑部均承认，他们很少会拒绝发表关于苏联的文章，因为报刊在这方面总是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大众日报》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些调查表，这些都是该编辑部于去年8月份向自己的读者们发出的。表中有一个问题，即读者们对本报所刊登的苏联人民生活情况的相关资料是否满意。所有填表的人均作了否定的回答。读者们的答复充分说明，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苏联的情况，而报纸在这方面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不久前来北京的《青岛日报》编辑顾寅(Гу Ин)也对我说，读者们在来信中激烈地批评了该报，原因是报纸没有很好地介绍苏联人民的相关情况。

顾寅说："我们没有人能写关于苏联的文章。另外，你们的材料和通报只给'新华'，我们没有东西在报纸上发啊。"该编辑请求我们今年多给他的报纸发送一些资料。

通过向中国发送资料的方式，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定期出版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其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向自己的读者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苏联新闻局通过自己的大量工作满足了中国读者的各方面需求，因而发挥了重大的教育意义。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发送的资料给予高度的评价。当然，代表处也收到了不少针对个别文章和个别宣传问题的批评意见，而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这些批评意见涉及的内容如下：

1. 几乎在每封来信和每次面谈时，人们都会请求我们写一些简洁的、短的文章，多给一些具体的实例资料，而提出类似请求和愿望的并非只是个别人。所有中国报刊都希望刊登一些短小的、以有趣的事实为根据编写的内容生动的小故事。而这些篇幅简洁而内容生动的文章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和向其他人转述。因为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是文盲或文化水平低，只有这样的文章才会发挥实际的重要意义。

我们是否会考虑这样的请求呢？我们当然会考虑，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是在自己的所有文章中都能充分考虑到。例如，前不久中国《农村青年》杂志向莫斯科发了一份预约函，其中请求我们为其写一篇能够让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人不费力气便能读和理解的小文章。我们向该杂志发出了B. 库兹缅科所写的《成长》一文。该文章由三部分组成，共12页。但当我们把文章发到该杂志编辑部时，仅文章的篇幅便让他们犯了难。于是，在给我们的电话中他们说道，他们并没有要如此大篇幅的文章。说实话，我们的这篇文章只有报纸可能会采纳，而针对杂志预约的一些文章，我们只能表面性以完成任务为标准。

有时，我们也会收到编辑部的退稿，原因主要在于文章的质量比较低。一般而言，我们会注意文章的语言是否浅显易懂，是否缺乏新意，对各种技术过程是否描写得引人入胜等。《湖北日报》的编辑云宇(Юн Юй)关于此对我们说道："我们从你们那里收到的文章，关于生产情况的描写方面都很不错，但关键是读者并不能从文章中充分了解生产的具体过程。关于苏联的情况，我们从文学书籍和电影里已了解了不少，因此我们现在已不满足那种肤浅的描写。我们从

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好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但请求你们转达我们对作家的如下愿望——希望他们更好地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以更简洁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告诉我们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上述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所写的一些文章为何被退稿的原因。

我们受到批评还由于,我们并非总能完成约稿。例如,我们为《北京日报》写了 7 篇文章,但其约稿原本有 14 篇。因而该报编辑部对此很不满意。对我们更不满的是《工人日报》,因为我们欠了他们 9 份约稿。鉴此,该报副总编辑向我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的约稿你们不做,却把我们不需要的稿件发来不少,这如何解释呢?"他告诉我,今年该编辑部已与苏联《劳动》报建立了联系,以便双方相互交流信息。虽然他们仍会通过我们组织相关资料,但在约稿的数量上将会少于去年(另外,该报纸刊登我们资料的版面也会比去年少一些)。

几乎所有向我们约稿的报刊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没有按要求完成他们所约定的稿件。《长江日报》编辑就此问题对我道,今年他仍会向我们重复去年的约稿,因为那些稿件至今仍未完成。《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也请求我们向作者转达如下信息,即今年他们将放弃去年向我们约定而至今仍未收到的 5 篇文章的约稿。

严格地履行中国报刊的约稿并不会与我们希望宣传的那些问题发生冲突,从而限制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范围。其中原因有二:首先,中国报社的约稿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所涉及的问题也是不尽相同的。其次,认真地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限制,也与我们主动发送一些不属于约稿范围的资料无关。那些不属于约稿范围的资料,我们仍可以跟以前一样发送,虽然这些资料的刊载率当然会低于那些事先约定的稿件。

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会直接对苏联资料在中国报刊的刊载率产生影响。严格履行约稿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资料的刊载率。而每份中国报纸和杂志也一定会保证尽快地百分之百地发表自己所约定的稿件。

我之所以关注这一情况,是因为今年我们收到了比以前更多的约稿。仅在第一季度我们已收到了 363 份约稿,估计全年我们将收到 1 000 份以上的约稿。而按期完成这些约稿,不仅会提高我们资料的刊载率,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增加向我们约稿的数量。如今,一些中国编辑部仍对我们怀有不信任感:或担心我们会延误约稿的期限,或怀疑我们会发去他们未约定的资料。去年,为了消除他们的这种疑虑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今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仍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报刊对那些他们未约稿但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文章也是需要的。当然,临时刊登这些资料会对编辑部的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因为这些文章并没有被列入刊登计划,从而会打乱其工作节奏。为了临时安排刊登这样的文章,他们有时就需要把一些已准备刊载的文章拿掉。对于我们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质量。

综上所述,我写了关于中国同志如何评价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附录的意见和愿望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对我们资料所作的高度评价。下面,我想列举其他一类评价,即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些同志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对我们资料的评价很低。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使馆工作人员中都没有人看我们所提

供的资料。至于中国同志，至少我从他们那里并没有听到对我们资料不好的评价。他们对我们所提供文章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不好的文章他们便会说不好，而好的　　就会说好，而不会说别的。向我们提供文章的有我们的作家、诗人、学者、工程师、闻名全国的当之无愧的生产能手和记者。他们不可能只为报刊写好的文章，而只给苏联新闻局写不好的文章。我们也不能作出如下错误的结论，即苏联新闻局所提供资料的需求已不大，因为中国同志自己现在也开始写关于苏联生活方面的文章，等等。我这里保存了来自中国中央和省的报纸以及杂志社的数百封信件。其中内容使我们确信，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中国的报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给我们发出的数百封均要求加强对报刊的援助力度。当然，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性意见，但如果从其中拿出任何一项意见，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表达一个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苏联驻中国)使馆中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不宜在中国保留苏联新闻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因为中国在苏联并没有设置同样规模的机构。不过，中国同志自己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相反，他们让我们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落后以后才刚刚起步，在一些地区只是在近期才取消了奴隶制，在这种条件下来自苏联新闻局的帮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中国同志本身毫不怀疑这种帮助的必要性。那么，既然需要这样的帮助，那就得有人来组织。我们使馆的人之所以那样说，理由是：如果苏联可以在中国保留这些人，那么也应当让中国在苏联也保留相应的人数，否则就是“不平等”。如果说到“不平等”的问题，那么撤消我们的代表处正好强化了我们与中国在宣传意义的不平等现状。我虽然并没有对这方面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以确定中国在我们报刊上的宣传和苏联在中国报刊上的宣传之间的对比关系。倒是前不久有人将我们的《共青团真理报》与中国的《中国青年报》作了比较，结果表明：如果说1956年《中国青年报》刊载了38篇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话，那么，《共青团真理报》便在同期刊登了200篇大篇幅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该信息来自《共青团真理报》记者B.卡西斯)。可能，其他许多报纸和杂志也存在着上述不利于中国报刊的比例差异。

我也没有对《人民日报》和《真理报》作过类似的比较。但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我们甚至无法按照它们两者的规模来作类比(须知，《人民日报》的规模是《真理报》的两倍)。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人民日报》在莫斯科拥有自己的三位记者，与《真理报》、苏联驻中国的专家和许多苏联作家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广泛利用着苏联新闻局的资料。据该报工作人员说，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记者组织搞到像通过苏联新闻局这样如此广泛的资料。该报今年打算向我们约定的稿件不少于50篇。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即拒绝中国数百家报纸和杂志提出的关于帮助宣传资料的坚决要求，原因仅仅在于中国没有同样在苏联派驻两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

至于苏联新闻局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的下降，我认为主要与代表处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我们的代表处要把所得到的所有俄语文章的30%—40%译成中文，需要对这些文章进行编辑和校对，并对所有索取我们未翻译资料的报刊提供咨询服务。如果这方面工作被取消，那么中国几乎所有省级报刊都将放弃刊载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能

够完成此类翻译工作的翻译人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翻译人员。至于其他报刊，如果没有我们提供咨询，也会减少对我们文章的需求。另外，我们代表处还与各报纸和杂志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事组织、翻译和编辑中方的约稿，关注约稿的完成情况，并与莫斯科总部机关的同志相互交流意见。在莫斯科负责资料组织工作的同志如果不参考代表处同志的意见，工作就处于盲目状态，只有从代表处的同志那里他们才能够获得确切的信息，以便为明确的读者和确定的报刊组织材料。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工作，才有可能根据中方的所有要求和愿望完成各报刊的约稿，在作家和报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确保我们宣传工作的巨大力量和说服力。如果我们不愿意削弱自身在中国的宣传工作，那就总得有人来做所有这一切。否则，我们就无法保证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而不履行约稿——这将对我们的长远工作造成损害。

据说，在中国设有许多我们的办事处，我们只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我们与“经贸公司”代表处相提并论，这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不对的。我们在中国的正确注册并非代表处，而是使馆出版部。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应将我们简化为代表处，即使对中国同志而言，也并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如果所有中国报刊都知道，我们不存在了，那么他们就将断定，苏联使馆出版部被精简了。这样的话，他们以后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信件投到该部门。到那时，就仍需向中国报刊的同志解释，使馆出版部在缩减的同时依然存在，因为当苏联新闻局的资料到中国后，它们的收取和发送仍是由该出版部负责的。总之，从官方层面上，我们这样做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因为事情的性质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经使馆工作人员之手，仍会有一些其他资料发送到中国来，而这些资料依然是由苏联新闻局提供的。只是如今是一位不隶属于苏联新闻局的人来负责这些资料的传播工作，而且并承担咨询方面的责任。这只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而就其实质而言，我们并不是办事处，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存在并不多余，而是中国新闻媒介与苏联新闻局联系的极其必要的环节。正是通过这一环节，我们不断积累和总结宣传工作的经验。

如果我们不在中国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否仍能像现在一样给予中国报刊如此规模的帮助呢？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项工作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必须由固定的、专职人员来做，而不能委托使馆的某位工作人员来兼职。如果不这样，就必然导致以形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新闻局的文章，导致我们的宣传资料失去自己的威信(例如，在领事馆我们所摄制的照片资料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另外，我们所培养的翻译骨干也会因此而流失，中国的省级报刊也不会再使用我们的文章。例如，当以中文发行的《苏中友好报》停止出版之时，关于苏联情况的资料出版工作便发生了急剧的缩减。中国(报刊)在干部方面正面临一系列困难，而我们并不存在这方面问题。我们清楚，中国新闻媒介很需要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强加于人，甚至也不是建议，而只是在完成中国报纸和杂志所提出的大量要求。

下面说几句关于相片的事。在本报告所指的时间内，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近1 800张相片。其中，我们为定期举办的中苏友好协会展览提供了1 292张照片，其余均发往各报纸和杂志社并多数均得以发表。我们从国内收到的相片是很多的，但中国方面对它们的需求也

很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尤其是用于文章插图的照片。中国报刊要求尽可能地为每篇发表的文章都配一张照片。

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

П. 扎哈罗夫

1957 年 2 月 14 日

属实：苏联新闻局办公厅主任 В. 杜比宁(签名)

手写批注：

请注意保密并加以保管，这份资料已在有关中国的工作中使用。

И. 谢尔巴科夫

1957 年 3 月 29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259 - 275

№24932

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7 年 2 月 22 日)

兹报告如下：使中国代表团成员焦继辉(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同志和邢国文(Сень Говень)同志实地了解苏联铁路机务工作的组织的这项工作是严格按照机务管理总局制定的，并得到交通部批准的计划严格进行的。

计划中指出了如下机务段：内燃机务段——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勒季谢沃-Ⅱ机务段、В-巴斯昆恰克和古杰尔梅斯机务段；电气机务段——焦马机务段、巴拉宾斯克机务段和莫斯科夫卡机务段；蒸汽机务段——红利曼机务段、基辅旅客机车和阿斯特拉罕内燃机车修理厂，对这些地方和场所进行实地参观。

为了更加详细地介绍新型火车头的开发以及机务段工作的组织，根据交通部机务局的指示，计划中规定的各铁路火车头勤务站要安排一些勤务站的负责代表陪同代表团成员，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

奥姆斯科铁路。在巴拉宾斯克和莫斯科夫卡电气机务段由火车头勤务站总工程师库兹涅佐夫同志陪同代表团成员，而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内燃机务段由勤务站副站长沙布朗斯基同志陪同代表团。

乌法铁路。在焦马电气机务段安排勤务站副站长戈卢比亚特尼科夫同志陪同代表团。由总工程师伊万诺夫同志介绍机务段必要的改造工作。

东南铁路。在勒季谢沃-Ⅱ内燃机务段,由机务段段长和铁路分局长以及当时在勒季谢沃-Ⅱ内燃机务段出差的内燃机车管理局局长雷列耶夫介绍机务段工作的组织以及内燃机标准替换件(TЭЗ)的开发。由铁路段副段长拜科夫同志介绍路段内的工作,其中包括运行规模扩大的保障、内燃机工作的技术指数及其效能。

伏尔加河沿岸铁路。在巴斯昆恰克机务段由勤务站的内燃机车局局长罗日涅夫同志陪同代表团成员,由铁路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把同志们送往火车。

奥尔忠尼启则铁路。在古杰尔梅斯内燃机务段没有勤务站。机务段有工作十多年的内燃机车。由机务段高水平的领导人相互协调,向同志们介绍机务段工作的组织和内燃机的工作。

阿斯特拉罕内燃机车修理厂。工厂厂长费奥多罗夫同志、生产部门的总工程师和主任介绍工厂的工作以及工厂的各个车间。生产部门的总工程师和主任向代表团成员赠送试验架上的照片。

顿涅茨铁路。在红利曼蒸汽机务段的勤务站中安排勤务站总工程师柳博夫同志介绍工作情况。勤务站站长多隆丘克同志也参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在前往基辅市的时候,根据勤务站站长的提议,使中国同志了解亚西诺瓦塔亚机务段的工作。

西南铁路。基辅蒸汽机机务段由火车头后勤站总工程师季亚科诺夫同志陪同。勤务站站长克雷洛夫同志参加接待工作。

在上述列举出的每一个机务段都要详细地参观机车库的车间、设备、试验架以及生产和修理电气机车、内燃机车和蒸汽机车所必要的附属设备和装备。

正在改造成电气机车或者内燃机车的蒸汽机车要单独进行考虑,确定生产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以及利用现有的蒸汽机车设施生产出新型牵引机车的可能性。也要考虑对蒸汽机车改造成电气机车或者内燃机车的程序。

第一:必要的最少的车间和装备设备,利用这些车间和设备才有可能使新型的电气牵引机车和内燃蒸汽机车投入生产;第二:对机车库和准备设备作进一步的改造,保障能够修理各类必需的机车以及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

在参观改造成新型的牵引机车的机车库的时候,基本包含了现有的各种类型的机车库,即:扇形机车库、梯形机车库以及直角道岔区机车库。

引起极大注意的是对古杰尔梅斯扇形机车库的改造,引入内燃机车。在此需要对起重运输设备的类型给予特别详细的检查:降落槽、千斤顶、梁式起重机、天车、高架单轨铁路等修理内燃机车必要的设备和装备。

在对现有的内燃机车业务设备进行改造时,在对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进行确定的同时,还要详细地了解生产的原则以及对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定期进行维修的技术原则。

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用于组织火车头队、维修队和机车库指挥干部的培训工作上。除了对学习的组织进行解释之外,同志们实际上了解了奥姆斯科市机车司机学校的工作以

及在机车库技术室学习的组织。在转换成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的每一个机车库都要对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工作指数进行研究。

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奥姆斯科铁路段的戈利科夫同志同中国的同志们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上述指出的机车库之外，中国的同志们从1957年2月15日到2月19日在莫斯科枢纽站了解了霍夫里诺十月铁路机务段、莫斯科-库尔茨克-顿巴茨铁路莫斯科-Ⅰ机务段、雅罗斯拉夫铁路莫斯科-Ⅲ摩托车厢机务段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技术。

略谈一下中国同志同各地机务段同志进行的会谈。

火车一到达车站，中国同志们就受到机务段领导、个别铁路段的领导、党委书记、枢纽站和机车库领导以及地方机务段委员会主席的热烈欢迎(在基辅机务段个别铁路段没有一位领导)。

在介绍机车库工作和车间工作的时候，机车库的调度员、机车司机和钳工都非常热心地接见了中国的机务人员。机车库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工作地段上向中国同志详细介绍了车间的工艺、使用的辅助工具和试验架、在生产中使用的工人们的发明和提出的合理化的建议。讲述了维修的火车头的质量、枢纽和零件的相互替代性、在维修时减少火车的停工时间、劳动生产率，以及所承担的今后完善生产的任务。

必须指出，在中国同志们所到达的每一个机务段，机务段的全体人员都给予他们很多的关照，热心地向他们传达工作经验。比如，在巴拉宾斯克机务段，机务段先进的机车司机讲述了自己平均每昼夜驾驶电气机车行使883公里的工作经验。最优秀的机车司机戈连科夫带领同志们参观了他自己驾驶的电气机车，并且说，他现在同助手一起，每昼夜可以运输每公里总重200万吨的货物。为了表示对中国机务人员的友谊，机务段集体向每位中国同志赠送了一把钳工用的锤子，机务段段长亲自赠送了关于巴拉宾斯克机务段工作经验的书籍。

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机务段领导人同中国的同志们互换了地址，并且承诺在内燃机车的开发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为了表示苏中两国铁路工人之间的友谊，该机务段集体向中国的每位同志赠送了一盒制图仪器以及一套工具(扳手、截铁器等)。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同志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期间，有一天州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利亚科夫同志、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市委交通局副局长接见了他们，并一起到俱乐部观看了电影。到俱乐部看电影的机务段机车司机、钳工及其家人对中国的机务人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把其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表示了苏中两国人们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焦马机务段期间，苏共乌法市委书记带领中国同志参观了该市以及新乌法石油加工厂。

在中国同志到过的其他的机务段中，必须指出的是莫斯科夫卡和红利曼机务段。在莫斯科夫卡机务段，机务段的党组书记向中国的同志们赠送了邀请函，使其作为尊贵的客人出席区选民代表大会。红利曼机务段根据该段最优秀的机车司机舒米洛夫的建议，集体向中国的同志们赠送了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并且机务段集体在一天晚上独自为中国同志

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在红利曼机务段,应该段最优秀的一位机车司机别列维什克同志(舒米洛夫同志生病了)的邀请,中国的机务人员到了别列维什克同志的家里做客。市委书记、机务段领导以及先进工作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副部长余光生同志的愿望,在莫斯科-库尔茨克-顿巴茨铁路莫斯科-Ⅰ机务段展示了工作以及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为了对推动机进行试验,使用了总重230吨的ИС系列蒸汽机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副部长余光生同志承认,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工作性能非常好,承认其结果独特,并对红利曼机务段集体以及所有的苏联铁路工作者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余光生同志说:“我们认为这一推动机是机务段最好的推动机,并将把这一点通告给红利曼机务段集体。”

邹继辉和邢国文同志在他们的发言中对机务段集体的悉心关照表示了感谢,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

他们说,你们对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回国后,我们将把这一点告诉我们所有的铁路工作者,并把你们的地址告诉给我们的机务段,以便能够更加深入地交换工作经验。

苏联交通部机务总局副局长

拉奇科夫

РГАЭ,ф.1884,оп.60,д.1769,л.30-34

№16686

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年3月8日)

机　密

M.A.苏斯洛夫同志:

给您送去关于今年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副本。

H.米哈伊洛夫(签名)

1957年3月8日

（一）

我报告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研究和签订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结果。

苏联代表团于今年1月12日动身去北京，成员有：苏联文化部部长Н. А. 米哈伊洛夫(代表团领导人)，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Б. С. 格拉先科，苏联文化部副部长Г. А. 奥尔维德，苏联卫生部对外司司长Н. И. 马特维耶夫，影片生产总管理局副局长А. Ф. 卡拉什尼科夫，出版社总管理局副局长А. П. 雷宾，苏联文化部对外司司长В. А. 博尼。

中国方面代表团成员有：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中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文化部部长助理王阑西和黄洛峰，艺术管理局副局长周巍峙。中国方面参加工作的还有：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参赞张映吾同志，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阳翰笙同志，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同志。

研究1957年度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委员会，在今年1月12日至18日于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工作。

特别应该强调，中国同志对待所有的这项工作极为仔细，组织得很好，很深入、很具体。

在第一次联合会议上，钱俊瑞同志发表讲话，简短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文化交流情况，并且指出，苏中之间的合作在所有文化领域都获得了富有成果的发展，中国高度评价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文化活动家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苏联的先进经验。钱俊瑞同志表示相信，我们在文化合作事业方面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苏联方面致了答词。

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通过了苏联方面的建议——除了研究1957年度的具体措施计划外，还就更长期的远景规划交换了意见。

今年1月18日，在中国文化部签订了双方研究制订的1957年度计划。

根据双方对联合委员会工作总结的协商结果，发表了由中国同志编写的公报(见附录)。

计划签订后，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同志当时刚从缅甸回到北京，直接致信苏联代表团。信中说，向苏联博物馆转赠送550件艺术瓷器、玉石、搪瓷、漆器和清朝时代(17—19世纪)刺绣。

1月18日，苏联代表团组织了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和外国记者。

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代表团发表了关于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及其对巩固我们人民之间友好事业的意义的声明(声明全文见附录[①])。

需要报告苏共中央的是：中国同志关于善于把所进行的工作赋予巨大的政治意义。例如刘少奇同志同代表团座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座谈了四

① 见以下附件。——编注

个小时。我在上海同市委领导人谈了很长时间。在文化部,就思想工作和文化合作的具体问题,总共座谈了10个小时以上。

代表团抵达前夕,报刊和无线电出现了关于苏中文化合作的大量报道。《人民日报》,而紧接其后是《友好报》,发表了《真理报》的文章和其他资料,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同志的大块文章。

全部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可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提纲中看出。他在中共中央同代表团座谈时提出:苏联为全人类指明了道路。苏联人民的经验和文化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应该更努力地研究你们的经验。你们给了我们巨大的无私援助。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规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文化交流。

计划规定交换大量艺术团体。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的芭蕾舞团和哈萨克斯坦国家人民乐队将访问中国。

在苏联,其中包括远东,将组织中国歌舞团和杂技团巡回演出。他们将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

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相互组织艺术展览。

在电影业方面,计划规定联合拍摄献给苏中电视创作友谊的艺术影片,宽银幕彩色电影,关于阿拉木图—兰州铁路干线的科普电影。扩大电影院领域技术经验的交流。将建立电影记者站,在北京建立苏联电影记者站,在莫斯科建立中国电影记者站。

在出版活动方面,计划规定经常交换出版社计划、推荐出版的书目,建立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出版社的联系。

同1956年相比,计划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卫生领域采取更为广泛的措施。除了互换大学生、研究生和互邀教师外,规定建立苏中学校、医疗机构间的经常联系,科学著作、科学规划、定期资料、教学资料、设计文件、科研工作计划等的定期交换。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以蓬勃的速度在发展。

报纸的年印数,从1950年的7.98亿份增至1956年的24.01亿份。图书和小册子的年印数,从1950年的5.95亿印张增至1956年的43亿印张。

影剧院数量,从1950年的641家增至1956年的955家。

1949—1950学年,中国有2 577.6万人在学习。1956年,学生数量增至6 627.5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2年发展规划,规定拍摄电影从1955年的112部增至1967年的367部(其中艺术片136部)在8个城市建立电影制片,电影放映机从1955年的5 876台至1967年达到7.6万台,艺术团体数量从1955年的2 414家至1967年达到2 811家,报纸从1955年的289种至1967年达到4 500种,在北京建设15家印刷厂。

在苏中文化交流不断增加的条件下,由于到处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的巨大兴趣和衷心

的尊重，我们在文化交流领域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点，甚而有时是错误，就显得特别不能容忍。

苏联的中国学者断言，新的苏联中国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有段时间存在一种意见，即我们这里懂中文以及某种程度上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过剩了。这种意见是不是对的。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即懂中文的某些工作人员没有在专业方面被使用，那么发生此事不是因为我们过量培养了这种干部，而是因为某位工作人员只是形式上了解中国，而实质上受到的训练很差，不能作为中国学者来使用。

根据语文学博士奥沙宁同志的看法，错误的是苏联高校都按一个模式培养中国的学科带头专家。根据奥沙宁同志的意见，培养各种未来中国专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和文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培养内容和质量间差不多没有区别。

根据奥沙宁同志以及谢尔秋琴科教授的意见，对按中国学问题培养的所有专家而言，极具代表性的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了解很差。

按奥沙宁、谢尔秋琴科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看法，另一个不小的缺点是，苏联的中国学专家仅仅在苏联的高校中培养。顺便说一句，实践告诉我们，当青年专家在苏联高校毕业后有机会在中国大学学习2—3年时，我们就获得了成功。在某些个别情况下，即苏联青年在中国读完高校课程时，也会达到正面的结果。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培养干部，显然可以得出良好结果。

十分明显，为了培养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必须利用这样一些极为丰富的机会，例如在中国高校，训练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在中国组织对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实习。顺便说一句，目前在中国的只有一名苏联研究生——戈尔冈涅夫同志。中国同志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戈尔冈涅夫同志无暇学习，因为他的时间还不够用于完成苏联大学生代表的职责。

他们说："要知道，他一个人要面向全中国。"

中国同志在培养干部和中国青年研究俄语方面，大规模地依靠苏联的帮助。

在同我们的会谈中发现，中国同志明年至少派700名研究生到苏联高校学习。仅仅在1956—1957学年，开始在苏联高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有1 349名，研究生520名。目前，约有300名教师在进修。

我们许多机构，首先是科学院及其研究所，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存在重大不足。

不久前建立了中国学研究所。但遗憾的是，该项研究所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迄今为止，研究所没有办公场所，只有三间房子。研究所的人员没有配齐。自然，中国学研究所本质上应该是研究中国问题最主要的科学机构，而目前这样的条件下未必能在中国学者中间获得足够的威望。

根据大量事实可以判断，我国许多学术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有时候差到何等程度。

我们出版的某些学术著作，在深度和准确度方面不大出色。

中文教授援引了这样的事实，即苏联翻译了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参与翻译工作的是我国优秀语言学家，不过，在语法课本中有许多粗心的错误。

根据苏联学者的判断，契科巴娃的著作《语言学引论》，在中国引起极大不满。中国急不可待地盼望看这本教科书，但它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们的同志确信，教科书中表述不好的不仅仅是有关中国语言学的问题，而且还有印度语言学问题。对契科巴娃所著教科书《语言学引论》的意见，已经编写好，且已寄往莫斯科。不过教科书出版第二版时未作任何校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惊讶。

中国是物质文明史、人类社会史的极为丰富的宝库。顺便说一句，苏联学者在该领域的工作是极为薄弱的。我们不能列出近几年中出版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多多少少重要的著作。我们的学者在该领域同中国学者合作得极差。

苏联学者的某些著作出版得太迟。例如《中国语言学文集》排印已将近5年了。谢尔秋琴科同志的书稿《论民族文字的创立》从1952年至今没有出版。顺便说一句，中国同期已出版了两版。

谢尔秋琴科同志作为科学院研究人员，从1950年起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总共只能发表一篇。

我在中国碰到了苏联科学院的一组科研人员，其中有科研人员松赞娃同志。她还在1953年，就和佳普金娜同志一起完成了有关中文语法问题的著作。科研人员为该著作发表毫无结果地等了好多月。他们没有得到结果，便将手稿缩写后，送交学术委员会以求认可，经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办理手续寄至中国。在来到北京后，松赞娃看到自己的手稿用中文出版后在中国书店出售。

显然苏联科学院对中国的许多实际问题采取形式主义的和不认真的态度。如果考虑到工作中与苏联机构有联系的中国相关科学机构和研究所都是由最著名的中国学者和专家来领导这一点，这样尤为不正确。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确认，他们有许多问题既没有得到外交部也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所的回答。科学院两年中仅仅发来一封信，也没有涉及工作的任何实质指示。

应该指出，根据苏联文化部的方针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没有从我们这里获得足够的帮助，没有同他们保持固定的联系。

苏联的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献方面还严重滞后。虽然1957年我们打算出版中国作者的图书达100部，大大多于我们以前出版的，但这个数字还是太小(1956年中国出版苏联书籍6 210种)。苏联出版者还很不了解中国文献。文化部派遣出版总局副局长雷平同志到中国去，其目的是和中国同志一起研究进一步增加中国文献在苏联出版的问题。

近期来，中国积极发展音乐活动，有两所音乐学院在工作，交响乐队经常举办演奏会，合唱艺术在发展，中国独唱演员在增加，音乐创作在开展。

作曲家马思聪、李焕之、贺绿汀等，近年来已创作了值得注意的作品。不过，中国作品在苏联的演奏带有偶然的性质。中国的戏剧艺术，在苏联剧院的剧目中暂时也还没有占有应有的位置。苏联文化部在采取措施消除这些缺点。

应该说，苏联的报纸杂志还很少发表关于中国人民生活和文化的资料。

（三）

我认为也有必要报告涉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工作的若干问题。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在很多方面是按标准进行的，但在今天条件下，极其落后于新的要求和需求。文化领域的交流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方面产生了新的大问题，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以往的水平上。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活动中，最关注的是代表团出访。但中国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现在让两国知识分子代表参加集会、高喊众所周知的口号等，显然没有多大的需要。现在应该使工作具有更深入的、更有目的的性质。

同时应考虑到，有时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的出访准备得很差很仓促，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不久前，卡伊洛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出访了中国。其成员是苏联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文学家卡塔耶夫同志、坚德里亚科夫同志和艾德林同志，艺术家韦列伊斯基，作家 H.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 P.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作为代表团负责人的卡伊洛夫同志，最后一天才真正被批准为代表团领导。对出访中国他没能做多少严肃的准备，代表团其他成员对出访也准备不足。

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中国的若干个城市，每个城市停留 2—3 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参观各种项目，出席隆重的宴会和招待会等。代表团成员实际上几乎没有开展任何业务工作。

这样的代表团返回苏联后，通常马上被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根据我们的意见，根本改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必要性问题早就成熟了。在目前形成的情势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失去了自己的权威，变成一个纯礼节性的体面组织，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没有深入的交流。

也要注意自身这样的事实：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代表，首先是文学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访问中国后不总是在报刊上发表随笔和故事，特别是研究文章。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我们注意下列情况：

苏联新闻工作者访美后，不仅发表有独立的相关随笔，而且有大部分的相关书籍。例如，波列伏依同志写了一本几乎 500 页的书。像茹科夫、克拉米诺夫、伊扎科夫同志这样的新闻工作者，都讲述了有关美国的许多东西。

至于对中国，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著作是比较稀少的。

（四）

在中国逗留期间，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根据中国同志的倡议与其座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首先，中国同志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他们在怎样的客观形势下，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怎样的政治总背景下，必须提出上述口号。他们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即中国的人民政权已获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了忠诚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出现了提出这个新口号的可能性。之所以需要这个口号，是因为还要更加团结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开辟新的广泛可能性。主要条件之一，也在于这个口号，从策略上帮助中国共产党保证进一步团结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

陆定一同志在座谈会中也特别强调了这样的原则。

他说："我们需要，正如中国俗话说的，引蛇出洞。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中间谁传染上了唯心主义观点、不正确的观念，谁就会耐心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进行思想工作。"

陆定一继续说："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植物放在温室条件下成长。我们想使植物获得锻炼，变得强壮。植物可在斗争中获得这种锻炼。"

"我们不想同假想的敌人战斗，我们应该同现实的敌人战斗。"

"我们应该向青年展示唯心主义观点，例如哲学中唯心主义观点的内容。青年应该自觉地掌握，为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应该在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败退。"

同刘少奇同志一样，陆定一同志也强调，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因此，陆定一同志列举了这样的事实。他恰巧同梅兰芳座谈过。梅兰芳说，在"艺术推陈出新"的旗帜下，似乎是同封建主义斗，没有让他(梅兰芳)表演，虽然众所周知，他是最年长的，是中国民族戏剧的最杰出活动家之一。现在出现了新的口号，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关系也有了变化。

中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同志说，《人民日报》不时地刊登文章，证明有必要了解唯心主义哲学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目的是以此来显示这些理论的错误性，证明马列主义科学的先进。

尤其是在张岱年的讨论文章中，报纸写道："在新中国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为什么当时提供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哲学的发展是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唯心主义不仅有阶级的根源，而且有认识论的根源。唯心主义甚至在消灭阶级之后仍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领域像以前一样将继续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公开暴露唯心主义，其目的是促进展开哲学的思想斗争，活跃哲学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提供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不仅不会给唯物主义带来损失，而且相反，会促进唯物主义思想的繁荣。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以及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哲学领域学者的争鸣，将不仅表现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于同一个唯物主义阵营中不同学派的争鸣。近几年中，广泛发展的趋势，表现于要求所有的思想主张都要符合某些准则，对一个问题只允许有一个可能答案，对一种理论只允许有一种可能的解释。真理只有一个，但达到这个真理的过程往往是曲折和复杂的。所以，出现因不同方法和不同观点而固有的不同学派，是种合乎规律性的现象。形成不同学派，是繁荣科研工作和提高理论水平的强

有力保证。

在中共中央的座谈中，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只有在符合该口号性质的具体条件下才能提出来。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知道，越南想要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越南同志，提这样的口号，他们还没有必要的环境。在越南条件下提这种口号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刘少奇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口号，当时在匈牙利、在裴多菲俱乐部也进行过座谈。但是我们认为，在匈牙利的条件下，也不能提这个口号。事件表明，匈牙利实质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同志总结了这个思想："我们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只是因为必要的环境成熟了。"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同志在所有座谈中，都认为有必要说一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务必要求有党的日常领导。

陆定一说："在这个口号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作用有所增强，对党组织而言工作复杂化了。"

根据同中国同志的座谈，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表的会见以及中国报刊的言论来判断，中国认为有必要细化和发展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提出的某些原则，特别是涉及下列问题：

1. 关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

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外，艺术中也可采用其他文艺创作方法。

目前，中国报刊上强调的思想是：在其他创作方法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最革命的、最完善的。所以，尽管可以采用各种艺术创作方法，但对共产党员作家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应该是决定性的和唯一的。共产党员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应该从这种方法出发。

2. 关于文学艺术中反对公式化的斗争

文学和艺术应该涉及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旨在揭示政治上重要的，对人民迫切的这些方面的某些作品，有时候受公式化困扰，艺术性不够。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反对类似作品的尖锐批评言论。在中国报刊上，明显因此而发表了许多资料，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不可以借口反对公式化的斗争，毁灭性地批评涉及当今生活重要问题，但写作时有时候带某种公式化成分的作品。这些言论说，应该把公式化作为缺点来批评，但同时不该抹掉许多作品的政治意义。

3. 关于对古典遗产的态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旧时古典遗产的态度。如果说的是，中国文化拥有还经许多年也不会失去自己价值的宝库，这就更为正确了。同时，有时候试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掩盖下，不加批判地从旧遗产取出并非最优秀的，或者不加批判地改编旧文学旧文化的某些样本，粗鲁地破坏艺术原则，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永久保存自己作为作者的名字。中国同志认为，这种缺点也应该加以纠正。

在同中国同志的座谈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苏联没有文章和其他资料来阐述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中国同志也力图讲述为什

么在中国条件下有必要提出这个口号。

陆定一同志在有次座谈中说:“我们不怕这个口号,我们认为对它不该害怕,因为它只会有助于我们,促进工作。”

(五)

苏联文化部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继续发展同中国的文化合作。

在出版业方面,文化部打算出版一系列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著作,增加出版中国作者的艺术作品。计划出版中国诗选,建立“新中国”丛书,收入一系列有关中国地理、经济、文化的驰名出版物。今年音乐出版社将出版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集,而国家造型艺术出版社将出版“中国民间艺术”画册。

在电影业方面,文化部打算大大巩固苏中电影活动家的创作合作。除了联合拍摄艺术片、纪实片、风光片外,苏联电影制片厂、导演和电影剧本作者同中国的电影制片厂、电影工作者建立固定联系。将出版献给中苏友谊的电影杂志月刊。

计划为苏联学生创作科学认识中国的电影。

文化部采取措施在苏联剧院演出中国戏剧家的剧本。今年,音乐团体的独唱者将把中国作者的作品列入自己的音乐会节目。

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转赠给苏联博物馆两千多件中国艺术作品。目前,中国同志又给我们的博物馆转交了 550 种展品。文化部准备建议将苏联博物馆藏品中的某些作品转交给中国。

关于扩大苏中之间文化合作措施以及执行 1957 年度合作计划的问题,将在文化部部务委员会讨论。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下列建议(见附件①)。

苏联文化部部长

H. 米哈伊洛夫

附件:

苏联科学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建立了广泛联系。

几乎所有全苏代表大会和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会议,都邀请中国学者来参加。1956 年进行了三次联合综合考察,而 1957 年将进行 5 次这样的考察。1956 年,由 18 人组成的科学院著名学者小组出访中国,以帮助中国学者编制中国 12 年科学发展规划。

1957 年,苏联科学院接受 38 名中国学者来熟悉科技领域的研究组织和研究方法。从 1956 年秋季开始,科学院进行培养 128 名中国研究生和培训 10 名中国科学工作者。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建议。——编注

近几年来，苏中科学院间建立了系统的图书交换。

为了加强和扩大学术交流，1956年11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邀请由10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讨论和签订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间科学合作的协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准备了考虑到中国科学院所有原则的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协议草案。中国学者告知，他们准备1957年秋末签订协议。

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26, д. 506, л. 67－85

№20593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

（1957年3月9日）

机　密

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向您呈送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В.佩利申科与朝鲜外务相南日于今年3月9日的会谈纪要。

附件2页。

И.库尔久科夫

1957年3月25日

第292/ДВ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请将该文件在本处登记并保存。信息资料，已用于对朝鲜的工作。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　密

摘自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В.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3 月 14 日

与朝鲜外务相南日的会谈纪要
(1957 年 3 月 9 日)

今年 3 月 9 日应邀拜访了南日,并与他进行了会谈。

1. 南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要求苏联于 1957 年向朝鲜提供 3 万吨炼钢用焦炭。

关于这方面南日告知:朝鲜唯一一座运转的高炉用本国焦炭只能保证 60% 的生产能力。一年的缺口是 13 万吨焦炭。

为补足缺口,1957 年中国将提供 10 万吨,原先拟提供 13 万吨。所缺的 3 万吨焦炭,朋友们希望从苏联获得。

朝鲜劳动党中不久前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委托南日向我们提出了上述请求。

我答复南日:上述请求将转告莫斯科。

2. 接着南日说,他们已经知道关于李相朝进入莫斯科高级党校学习一事。关于这件事,南日说,平壤一些单位包括朝鲜外务省的不少朝鲜劳动党党员表示不理解和不满,为什么被朝鲜领导撤消大使职务的李相朝会被高级党校录取。有些党员提出问题:如何理解该事实;这是否间接证明朝鲜领导的路线不正确和对李相朝的支持。

南日强调指出,"我们在解释上述问题时有些尴尬"。

我问了南日,这是指哪些党员,是否包括领导干部,对李相朝提出疑问的人得到了怎样的答复和解释。

南日回答说,朝鲜领导层对李相朝的有关情况是清楚的。在回答有关李相朝的问题时是这样解释的:到高级党校学习有助于他改正错误。

我对南日说,这样的解释,依我看,是站得住脚的,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然后,南日还谈到,一些投奔到中国的朝鲜工作人员也在党校学习,但是这些人现在都不与待在中国或短期前往中国的朝鲜工作人员交往,过去也是如此。总的来说,这些人明显减少了。

至于两个曾是朝鲜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离开莫斯科后留在了中国的问题,南日强调指出,中国同志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两个人行动有所限制,要他们保证不从事任何涉及朝鲜的活动。

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B. 佩利申科

ЦХСД,ф. 5,оп. 28,д. 486,л. 71 - 73

№1049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经济评估的错误

（1957年3月13日）

中国政府声明，虽然整体上可以接受由苏联远东经济委员会编写的远东经济发展评估草案，但此草案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上有几处错误：

一、以"加速迈向社会主义"为题的一节（第1页）中提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反对"。这句话与事实不符。我们国家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刘少奇在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充分阐述，完全驳斥了这样的论断。在谈论中国的物价问题时，草案故意歪曲或抹去了李先念给人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主要成就，而夸大了我们个别的缺点与错误。因此，鉴于这一事实，草案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第20页）

二、由于只是对我们用于不同目的而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草案还有如下错误，主要表现为：

1. "加速迈向社会主义"一节提到："中国计划在1956年把手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到15.3%，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本只计划在1957年达到9.4%。"（第4页）事实上，前一个数字指的是手工工厂和个体手工业共同的产量，而后一个数字只反映了个体手工业产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2. "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一节称："中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夸大了其人均收入增长，假定中国关于国民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从1953到1956年有所增长，那就是1953年人均127元，1954年137元，1955年141元，1956年154元。根据刘少奇的报告，这是因为1953到1956年间工业生产有一个不高于90.3%的增长，而上面所列数字似乎表明增长应该是104%。"（第5页）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到的90.3%的增长包括了重工业、制造业和个体生产在内的所有工业生产，而薄一波报告中的104%的增长仅指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生产增长。

3. "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一节也指出："中国1953到1956年间基本建设总额超过了五年计划预算427.4亿元的1%，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致人大的报告中只说中国到1956年将完成计划基本建设的87.6%。"（第7页）事实上，五年计划所设计的基本建设总额只包括经济和文化（文艺和教育）建设的主要部分，而1953到1956年间的基本建设总额包括更广的范围。

4. "发展计划"一节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本以98.3%作为整体增长目标，但周恩来总理在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中将目标降至90.3%。"（第23页）事实上，原定增长目标并没有降低。因为前一个数字不包括个体生产总量，而后一个数字包括了个体生产总量，这样

就变成了90.3%。既然在公布这些报告时,对上面提及的数字所包含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毫无理由的。除了上面所列举的错误外,草案还有一些与我们关系不太大的小错误。

АВПРФ,ф.100(1957),оп.50,п.423,д.4

№25208

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

(1957年3月14日)

摘自Н.Т.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3月15日
第43/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31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

1957年3月14日

奉周恩来之命,刘晓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如下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从1958年开始,增加米格17F战斗机和VK-1F喷气式发动机的生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研究了在1959年开始生产一种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认为其符合当前的需要,中国的现有条件也能支持。

关于这一问题的陈述,中国政府提议派遣一组中国技术专家到苏联,并讨论了以下问题:

对于在中国生产一种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苏方需阐明其观点。

如果苏方对在中国生产喷气式飞机持肯定的态度,那么可以从中国当前的需求和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角度对新机型交换意见。

对基本原料的运输以及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进行咨询。

刘晓要求苏方确认什么时候能够接待这个中国专家组,以及届时应该与哪些部门进行

协商对接。

我回复刘晓，中国政府的请求将会报告给苏联政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费德林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5

№16686-2

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

(1957年3月14日)

情况通报

对H.A.米哈伊洛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的简要报告，苏共中央已经审核。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苏共中央通过了决议(苏共中央1957年2月14日通过的决议，第C-т32/222号)。批准了1957年度苏中文化合作议定书和计划，责成苏联有关组织和部保证实施预先制订的措施，批准苏联文化部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活动家代表团1957年访苏。

简要报告中包含的关于调整苏中科学交流的建议，将在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间，科学交流协议时加以考虑。为了签订这项协议，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应在今年3月访苏，但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代表团访问延至较晚时间。

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有必要改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建议，反映在苏共中央1957年3月4日的决定(第180/15号)"关于完善苏联对外宣传的措施"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向苏共中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A.列加索夫(签名)

1957年3月14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26,д.506,л.86

№24024

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

(1957 年 3 月 20 日)

关于中国报刊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报道情况的报告

致 Д. Т. 谢皮洛夫同志：

1957 年 3 月 1 日《人民日报》对此次大会作了第一次报道。该报道很短——只有 570 个字，报道了会议的开幕，认为大会对苏联艺术家 40 年来的工作作了总结；通报了艺术家大会的筹备工作以及会议的主要任务。在 3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简要描述了约甘松同志的报告内容(共计 730 个字符)。

3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简要介绍了您在艺术家大会上的报告内容(共计 1 500 个字符，共用了 3 个半机器打印版面)，其中特别关注的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艺术家们对苏联新人形象的创作态度等问题。

另外，还介绍了中国艺术家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中国其他报刊均未对会议情况进行报道。而中国 3 月份出版的杂志，目前我们尚未收到。

П. 阿布拉希莫夫

1957 年 3 月 20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228, л. 48

№24023

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

(1957 年 3 月 22 日)

致苏共中央

机　密

昨天，即1957年3月22日，我与出版和印刷事业部副部长A. M. 马扎洛夫、出版总局副局长A. M. 谢尔巴科夫等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与后者一起在场的还有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洛峰和中国使馆参赞张映吾。

中国同志与我们商议了关于即将在莱比锡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会议的问题。会谈涉及的问题具体有如下一些：

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决议，中国代表团应当在莱比锡作一个题目为《国家领导书籍出版事业和组织编辑工作的经验》的报告。

中国同志建议该报告的名称为《编辑工作的组织》。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原因在于这样的名称不会引起各方的争议并成为发生争议的借口。比如，南斯拉夫代表便提出了关于国家领导书籍出版事业的问题。

中国同志还建议由苏联代表团首先在会议上作报告。

关于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德国同志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他们主张开办一个国际性的关于出版事业的杂志；继续保留此次会议的主席团，以作为一个现成的机构——检查会议建议的具体落实情况。

中国同志询问，我们对上述建议持何看法。

……①

我们还建议，本次会议决议只具有强烈建议性质。必须使这次会议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会议上通过的任何决议均不具有强加于人的性质。会议只负责编制适用于全体与会者的决议。

会议上的所有工作均须依据如下方式进行：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点；重视出版活动的经验交流。

中国同志说，他们完全同意上述这些建议，并认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会议进程应遵循的原则。

苏联文化部与苏联代表团一起正在进行必要的会议准备工作。

近日，苏联代表——谢尔巴科夫同志将赴柏林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其职责便是落实我们与中国同志所商定的那些原则。

苏联文化部长

H. 米哈伊洛夫

1957年3月23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228，л. 46－47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两行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38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

(1957年4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4月4日会议第8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基里琴科、Г. М. 马林科夫、А. И. 米高扬、В. М. 莫洛托夫、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К. 朱可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Д. Т. 谢皮洛夫、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Н. А. 布尔加宁主持。

第43项　关于不可能给台湾、南朝鲜和南越代表签发进入苏联参加亚洲国家第四届国际兽疫学代表大会签证事宜给国际兽疫委员会的通报。①

米高扬、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

米高扬同志：建议不拒绝给南朝鲜人和南越人发放签证。

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台湾人——可以说：我们不可能给他们发放签证。

关于台湾人——应该询问中国人的意见。

南朝鲜人、南越人——可以发放签证。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7, л. 36－39

---

① 1956年1月6日，根据苏联农业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邀请国际兽疫委员会成员参加1957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举行的亚洲国家第四届国际兽疫学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时，在这个国际组织的组成中，还包括国民党中国(台湾)、南朝鲜和南越。考虑到这种情况，A. 葛罗米柯于1957年3月26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预先通知国际兽疫委员会，苏联不可能接待上述这些国家的代表的建议。在报告中还表示赞成这样的意图，即国际兽疫委员会可以把大会的地点改在其他的国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中，批准给南朝鲜和南越的代表签发入境苏联的签证，对于台湾方面的代表，建议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同时通报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不给台湾代表发放签证”(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113, л. 17; оп. 12, д. 197, л. 141－144)。——原注

№25209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

(1957年4月8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12日
第309/nf号

机 密
文本第3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①]

1957年4月8日

在会谈期间，刘晓谈到一个非官方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就像在莫斯科发行的英语和法语的报纸那样，也类似于在中国境内用俄语发行的报纸《友好》。

刘晓有理有据地强调说，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有着很多必要的因素。首先，在苏联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没达到能够熟练阅读俄文的程度。经常阅读苏联的中文报纸能够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也有大量的读者需要阅读一份用汉语发行的苏联报纸，因为这样一份报纸在其版面上能够比中国报纸更加全面而广泛地让人了解到苏联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费德林

送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候补主席团成员以及苏共中央书记处。

A.葛罗米柯
1957年4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26－27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059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1957年4月9日）

1957年4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5—12日
第8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9日

与金日成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他论述了国内经济状况的若干问题、新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以及朝鲜劳动党的党内情况。

关于五年计划。朝鲜1954—1956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经验，我们决定制订朝鲜1957—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基本控制数字已审定，并提交给各部和地方。五年计划制订工作预计将于5—6月完成，随后计划草案将交给中国朋友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协调相互间的责任。然后，国家计委委员长非正式程序出访莫斯科就计划进行咨询和听取建议并解决重要问题。

朝鲜劳动党中央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朝鲜人民在吃、住、穿方面的需求。

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主要关注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去年我们获得了朝鲜（包括战前时期）历史上创纪录的粮食收成，总产量超过280万吨。

对此金日成说，过去，朝鲜一百万农户中，36％农户缺粮5—6个月；30％农户没有余粮，只能自给自足；只有剩下的34％农户提供商品粮。现在，只有10％农户缺粮2—3个月。其余农户粮食完全自给自足并提供商品粮。去年，参加农业合作社的每个农户平均获得1.6吨粮食和9 600朝元。

在最终统计1956年粮食总产量之前，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批准的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为280万吨。最终统计公布之后又提出5万吨补充任务。各地合作社、郡和道里讨论了计划任务。合作社社员承担了额外的义务并决心把粮食总产量提高到340万吨。

金日成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有信心今年能获得粮食总产量300万吨以上。他说，支持这一信心的理由如下：

目前，农业合作社团结着81%以上的农户。由于有了合作社，我们更容易在农业中应用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在此，金日成谈了自己视察咸镜南道时看到，有些合作社善于运用科学手段，借助插播的方法取得了丰收。他列举数据：1町步插播土地上收获玉米60公担、大豆15公担、土豆150公担以及朝鲜白菜200公担。现在根据劳动党中央的指示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一经验。

今年大量开展用冷方法栽稻秧的工作。1948年开始进行的试验表明，用这种方法栽秧可以提前20 30天收稻米，即不迟于6月1—10日结束收割，而且每町步收到的稻米增加10—20公担。规定用这种方法栽秧的面积不少于稻米耕地的10%。

今年农业合作社有自己选留的种子；牵引设备条件较好；农用化肥供应达到25万吨，去年是18万吨。

为了获得稻米的稳定收成，十分关心灌溉系统建设。目前，朝鲜农业拥有的灌溉系统可以在40万 42万町步耕地上不论天然降雨与否保证收成，而很大程度上依赖降雨的水浇地面积为6万 8万町步。近几年将在这些耕地上改建灌溉系统，还将建设新的灌溉系统。提出的任务是，在灌溉的耕地上要收到40公担稻米。这样，一年我们将从水浇地上收到200万—250万吨稻米。

大量开展了种植玉米的工作。去年玉米耕地面积为60万町步。这大大有助于去年获得粮食高产。1957年规定玉米种植面积为70万町步。预计每町步获得20公担玉米。去年农业合作社成功采用青贮(饲料)法，一共青贮了180万吨。肉类生产量很小，只能首先保证军队和很小一部分城市居民的需要。增加肉类生产的任务将晚一步解决，到粮食足以满足人均10公斤肉的需求。目前很大程度上以鱼代肉。今年计划捕鱼量为380万公担，如果包括响应的承诺是400万公担，这样，平均每个居民近40公斤。1956年捕鱼量为382万公担……

在保障居民穿衣方面我们将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和发展人造纤维生产。今年规定棉花播种面积达到2万町步，到五年计划末提高到5万町步，以便可能收获原棉2万吨(棉花在旱地上种植)。

在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增加由苏联援建的联合工厂生产的棉布产量的同时，在人造纤维生产方面采取措施，为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于1958年上半年提供必要设备的协定。

预计到五年计划末将生产各种布匹达到2亿米，人均达到20米，而1956年人均只有8.4米。

在工业方面主要关注迅速恢复和建设兴南化肥联合工厂。提出的任务是，今年完成恢复年生产能力折算成硫酸铵为40万吨的氮肥生产的各项工程。

我告知金日成：苏联部长会议已通过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兴南化工联合工厂扩大氮肥生产的决议。

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的关心并补充说，他们迫切期待这一决定。金日成日前视察了这家联合工厂。厂领导向他请求增派参加建设的劳动力1 000人并采取措施加快从苏联引进设备。

拟安排生产磷肥 14 万—16 万吨以及为酸性土壤施用的石灰,1959 年共计生产矿物肥料 50 万吨。

金日成说,解决居民住房保障的任务是困难和长期的任务。朝鲜拥有的建筑材料数量很少。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使苏联援建的年产 40 万吨的马顿水泥厂尽快投产,并把全国水泥年生产量提高到 250 万吨。这样才可能安排必要数量的水泥投入企业、住宅和水泥路的建设中。此外,将可能出口水泥到苏联和其他有关国家。

金日成告知,只是今年工业部门首次超额完成第一季度计划,工人们为超额完成计划在挖掘内部潜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他列举了以下事实:

在讨论 1957 年计划时,冶金工业省建议制订炼铁计划为 19 万吨。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增加到 23 万吨。然而,冶金省不同意,认为这一计划过高了。这样,我们决定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认为,可以把炼铁计划提高到 25 万吨,而为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工人们保证再增加 2 万吨,合计 27 万吨。

鉴于要完成上述炼铁任务,朝鲜政府曾向苏联求援,额外安排 3 万吨焦炭。金日成说,朝鲜政府对苏联政府满足这一请求表示衷心感谢。

朝鲜劳动党党内状况

金日成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掌握充分材料证明:以崔昌益为首的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中的一批人去年准备改变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领导,而自己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当我们从访问人民民主国家归来时,发现了这一反党分裂集团的活动,我们马上着手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耐心听取所有的意见并以适当方式搞搞清楚。然而,尽管我们把这一切安排妥帖,但效果并不理想。当一个分裂分子在全会上发言时(看来,金日成是指尹公钦的发言),他恶毒攻击领导,其口气犹如李承晚在文章中写的。出席全会的人员对这一发言十分愤慨。我们常务委员会成员也受到了影响,放弃了原来要耐心听取意见的想法,做出了把分裂分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当然,我们表现得过于草率。因此,受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委托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来帮助我们改正。在 9 月中央全会上修正了 8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一些同志恢复了党籍,一些同志恢复中央委员职务,但撤消了领导职务。我们在基层党组织向全体党员广泛解释了 8 月中央全会和 9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全体党员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收到许多党员来信要求把这一反党集团的全体成员开除出党。我们同反党集团展开了斗争,但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反党集团的某个成员与祖国的敌人有联系。

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时揭露这一反党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金日成继续说,必须指出,在匈牙利事件之前我们国内出现了相当困难和独特的状况:

朝鲜南方的李承晚集团分子加紧派遣特务和间谍并散发传单;

国内的前地主和富农蠢蠢欲动,在此金日成告知,朝鲜对 4 万地主没收了土地;

党内存在反党集团。

金日成得出结论，如果匈牙利事件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不揭露这一反党集团，那么，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我们许多同志都读到了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铁托在普拉的讲话并发表了看法，说实话，按铁托建议行动的人不多。中央常务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有这些事件和国内形势，并认为有必要向全体党员发公开信。在信中党中央号召全党团结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周围，团结在苏联周围并支持苏联政府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这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党员积极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一切措施。

金日成说，我们人民中没有反苏情绪，除非某些个别人，他们不仅反苏，而且也反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人民十分尊敬苏联并对苏联所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感激。

匈牙利事件时期我们成功应对并避免出现某些复杂情况的标志是，去年12月顺利进行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的选举。

谈到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情况时，金日成说，常务委员会成员金斗奉(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会委员长)在8月事件时动摇了，在一系列问题上支持反党集团。我们耐心向他指出这一立场的错误。现在他明白过来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分裂分子反党的错误行为。现在我们常务委员会会内工作协调。金日成说，我在思考如何提高常务委员会成员的威信并得出结论：常务委员会成员必须经常下到基层，给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事与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党是团结的，党员拥护中央委员会。

我们还采取措施加强思想战线的工作，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中。我们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党和青友党的工作。金日成指出，民主党原来有几十万党员，现在只剩下几万党员，而青友党只有几百党员。

今年秋收前的8月份，我们决定进行最高人民会议选举。

关于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决定我们已向全党通报。但我们没有向全体朝鲜人民通报。我们没这样做是因为在我国人民心中斯大林的名字是与热爱苏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谈到朝鲜劳动党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问题，金日成说：我们是年轻领导人，经验不足。我们曾努力而且继续努力向苏共学习，吸取苏共的经验。在崇拜方面——报刊和文学作品中常有赞美和颂扬，常常高呼“乌拉”(金日成没有明确指赞美谁，但我清楚他是在讲自己)。我们决心这一切要改正，过去做了，还要继续做。但我们进行这项工作要考虑国情，不过分宣扬，不急于求成。现在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已结束。

金日成还告知，他最近一次到地方视察时揭露了法院、司法和检察机关的错误行为。金日成说，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我们也决定加强法制，对一些错判或因一些小事而定罪的人，弄清情况后予以释放。然而，最高法院、司法和检察机关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犯了严重错误：把顽固敌人、暴动头目等都释放了。当然，这种人不多，而且其中一些人又重新被关了起来。在检查中发现，在最高法院领导岗位上混进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曾在日本警察机关服务

过,而在自己履历上隐瞒了这些。是他们提出了释放上述人员的建议。高等法院中来自工人的成员提出反对,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纠正了这一错误,将于近期在会上讨论该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

会谈结束时我转告金日成,苏共中央邀请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于1957年赴苏联休养。

金日成对这一邀请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将提交赴苏休养人员名单。

南日会见时在座。

苏联驻朝鲜大使

A.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3-11

№20596-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4月10日)

1957年4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5—12日

第8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10日

在拜访乔晓光时我向他通报金日成同志的告知,他们将于5—6月完成朝鲜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7-1961年)的制订,并将把计划草案交给中国朋友,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

对这一告知乔晓光提出以下意见:

考虑到众所周知的困难,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

我解释说,金日成同志在告知中没有提出追加援助的具体问题,而只是说,他们考虑在

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中应该给谁送去朝鲜五年计划草案以听取意见和协调行动。

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3, д. 5, л. 1, 12-13

№24933

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1957年贸易协定

(1957年4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了如下协议：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协议的有效期到1957年12月31日。

第二条　1957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货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将按照上述协议，根据该纪要附件的第一份和第二份清单进行。

在第二份清单中还包括应当在1957年向苏联提供的一些货物，这些货物的总额应当补偿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和利息，同时还应当提供一些商品，用来支付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协议把其参与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份额。

第三条　为了支付根据该备忘录提供的商品，同时为了支付同商品流通相关的开支，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上述贸易协议的第5条款相互开办特别的以卢布支付的无息账户。

第四条　如果1955年12月27日和1956年7月25日苏中会谈纪要中规定的一些商品要在1957年1月1日之后进行供应，那么这些商品应该根据该备忘录的第三条进行计算。

第五条　关于如下列举的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的支付以及根据上述提到的1954年10月12日协议苏联向中国转交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的份额的价值，将在1957年支付，支付的途径是通过苏联国家银行根据该备忘录的第三条款列出的款项，它们是：

1. 1957年每月偿还根据1950年2月签署的协议提供的12 329.6万卢布的贷款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2. 1957年1—6月每月偿还根据1952年9月15日签署的协议提供的613.9万卢布的贷款总数的六分之一；

3. 1957年每月偿还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苏联向中国转交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的份额——5 567.4万卢布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第1项和第2项条款中提出的利息的支付以及1954年1月28日提供的贷款利息的支付，根据该项条款规定的关于这些贷款的条件支付，以便在1957年偿还上述贷款。

上述提到的需要偿还的贷款的总数可以由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的检查和计算的结果来确认。

第六条　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在1957年5月份前按照1957年4月份的情况对1955年12月27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给予的贷款的数目进行核算。

核算结果后的余额被划归根据本备忘录第三条需要支付的款项，在此之后，用于支付根据1955年12月27日的备忘录需要支付的款项。

该备忘录于1957年4月11日拟定，一式两份，分别为俄语文本和中文文本，每份文本的法律效力相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授权代表
И.卡巴诺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
李哲人

РГАЭ，ф. 413，оп. 37，д. 156，л. 2－3

№20597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

(1957年4月13日)

1957年4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13—27日
第10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4 月 13 日

……

接待了前来进行礼节性回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

在会谈中大使说，在伏罗希洛夫同志访华期间中国人民非常热烈地欢迎了他。

这种热烈欢迎反映了中国人民真诚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给予中国政治上的支持以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无私援助。大使还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

作为回应我与乔晓光同志谈到了苏联人民对兄弟中国人民满怀兄弟情谊。我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对中国的访问是上述感情的反映，并将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更加巩固。我强调了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对加强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重要性。

乔晓光指出，他认为今天的会见不仅是礼节性的，而且是两个曾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的见面。他表示希望今后能经常见面。他希望互相交换双方感兴趣的情报。我说，我也有同样的愿望且自己也为此努力。

大使馆武官库尔巴茨基和译员王宝琴会见时在座并翻译。

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16－18

№16682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

(1957 年 4 月 18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 年 4 月 22 日
第 146 号

机　密

文本第 4 份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一、国民经济
1. 工业和基本建设
2. 私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改造
3. 农业
二、国家建设问题
三、中共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措施
四、民族建设问题
五、与国内反革命活动作斗争
六、中共党内和意识形态工作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二、中国与亚洲、东欧和南斯拉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四、中国与近中东各国
五、中日关系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七、中英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互相关系
第三部分　使馆内部工作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第四部分　结论
第五部分　建议
附件
1. 表格一，1 页
2. 表格二，2 页
3. 表格三，1 页
4. 中国经济简要概述，88 页

前言

在过去的 1956 年中，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遵循苏共二十大决议，从事本馆活动，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苏中关系。

二十大决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各项活动打上了重要的烙印，各项基本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成。在二十大决议影响下，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结果，中国国内政治生活显得活跃起来，寻找到了进一步扩大国内民主制的途径，

对以前所通过的有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的部分决议进行了重新审理和明确解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为巩固中国人民的统一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苏联政府的各项外交基本行动，以实际行动始终不渝地重申中苏友谊和合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整个阵营力量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6年，由于国际形势出现部分的复杂变化，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展示中苏之间友谊的牢不可破，从而打消了我们敌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可能出现某种分歧而抱的希望。

1956年，国际上充满了各种重大事件，它是对苏中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进行考验的一年。我们的友好相互关系完全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中苏友谊的意义得到更大提升。中国朋友对国际社会中各种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以批评的态度对自己的成绩和困难作出评价，并且及时采取了有助于降低国际紧张局势和进一步推动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措施。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坚定地同党内和政府机构中骄傲自满和故步自封分子作斗争，密切观察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如何解决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从不忽视向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其他国家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中国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是在争取党内进一步统一、巩固党与群众联系、忠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标志下进行的。大会决议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党和国家建设实践的认识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从而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

八大的召开首次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当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主要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党应该运用自己的才能不仅要领导群众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国统治，而且要经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过程。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样能够顺利解决比打碎旧社会关系的革命任务更加复杂的开创性的建设任务。

在认为党的八大具有特殊意义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党员总是强调，大会的成功离不开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决议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仅对工人阶级、农民，而且对知识分子，甚至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出席大会并发言的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代表，无论在其公开声明中，还是私下评论中，他们都公认大会具有杰出的意义，承认会上通过各项决议是正确的，有助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并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许多代表通过大会工作以及对中国各区的个人了解后坚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批思想久经考验、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实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人。

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在大会的组织和进行、广大党员对会议决议的学习和宣传，以及贯彻

落实这些决议方面,都有许多独特而新颖的做法。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在适当情况下供兄弟共产党所利用。

中共八大工作结束刚不久,便发生了许多令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事件:匈牙利反革命政变,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公开侵略,在其他国家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帝国主义暗中偷袭。这些事件极大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不仅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都提出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在这一尖锐时期,由于一些身上披着拥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崇高称号外衣的头脑不清者就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言论,使得局势愈发严重。在这些头脑不清者人中,首先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其自认为有资格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策略拥有新的发言权。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

可以坚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动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我国坚持的党和国家路线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坚决地支持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积极行动,尤其是在发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的经济、内政、外交状况的特点如下: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①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在本报告年度,苏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得到了继续发展。苏共二十大对扩大苏中关系、巩固苏中友谊具有巨大影响,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影响。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外交领域,苏中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各国家一起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同心协力,为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建立国家间信任、联合和平和民主力量而奋斗。

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的中央决议对中国诸如中共八大、政协第三次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产生了影响。

1956年,中共与苏共中央以及中国与苏联政府继续支持和发展密切联系,在实施各自内政外交措施上彼此给予各方面支持。作为苏联与中国共同协调行动的一个鲜明例子便是对肃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苏联政府所制定的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和支持工农革命政府的相关措施。毛泽东在1956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就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予以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和赞同这些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没能实施的话,而我们(中共中央)又对此不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工人阶级事

① 该问题略去未译。——编注

业的叛徒。"他向苏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进程的详细通报和在匈牙利问题上协调行动转达了热忱的感谢。同时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还就波兰事件问题表示了保持友好接触和经常的互相磋商。在发生对埃及的侵略期间，苏联与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战术措施上，表现出了紧密的互相协作。

苏联1956年所实施的外交基本措施在中国得到了很高评价，比如：苏南会谈、苏英会谈、苏法会谈、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争取裁军的努力等等。苏联对支持中国在其国际事务中，尤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采取的外交步骤博得了中国朋友的巨大满意和感激。(参见大使馆有关中国对苏联重大外交步骤反应的现时通报。)

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政府为改善工业、农业，为提高苏联居民生活水平和完善党和国家机构工作所采取的内政基本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新闻报刊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所从事的活动予以了相当广泛的阐述。

1956年，苏联与中国领导机构就各自国内状况以及与其他各国和兄弟党之间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情报交流。苏共中央在一年内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系列不公开的材料(有关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有关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结果和执行情况所作出的决议、有关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有关与朝鲜劳动党会谈情况)，这一切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欢迎。同时中国的党和国家机构也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通报了自己的措施，并向大使馆提供了相关情报。

在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苏联对发展中苏合作、巩固苏中人民友谊分别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措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是苏联各种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尤其是A. И. 米高扬同志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代表团会谈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1956年苏中之间共签署了旨在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的11项重要协议。

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使得中共与苏共代表能够就两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换，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往。

1956年12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巩固和扩大苏中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民众阶层。苏联舰队对上海的访问，大批的社会、科学、文化及其他代表团之间的互访，同样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扩大。1956年，去苏联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一共95个，代表团人数总计1 242人。到中国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一共77个，人数总计762人。

1956年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与苏联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苏中友谊具有特别意义。在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十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的忠诚以及与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和新闻报刊上，用比以往更加大的力度宣传苏中目标统一的思想、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紧密合作。这尤其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时候。中共中央就大规模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党内大会等下达了专门指示。按照中央指示，在各个大会上发言的分别是各党委第一书记或者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毛泽东在中

共中央会议上声明说,虽然1956年不是十月革命的整数周年,但是"如今必须强调指出,中国与苏联一如既往地彼此统一,任何东西哪怕在最小程度上都不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丝一毫的紧张。对我们忠于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提出任何质疑。"《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文中尤其说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仅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必须所走的共同大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统一问题予以了认真关注,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种政治问题表示了极大关切。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积极和直接地参与了对这些事件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还与兄弟国家代表们一起认真开展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接见社会主义各国驻京大使和访华的各国代表团成员时分别强调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统一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代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在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的部分讲话中,在中国报刊大量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和其他材料中,都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问题。

在本报告年度,对华关系上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对一切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换,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互相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领导和党的干部开始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说得更直率了,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了部分批评意见,而在过去这些是难得一见,并且始终是十分含蓄的。如今,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相互关系历史上和苏联对个别问题政策上的一些地方给予了批评性的评价。比如,在1956年3月31日至5月2日与大使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看法给予了严肃批评。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中国朋友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基本上赞同苏共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而所作的斗争。同时,中共中央在评价斯大林作用问题上,起先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中共的专门看法在《人民日报》4月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得到了反映。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通过的。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言论开始更加明确了。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与大使的一次会谈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运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两把刀子,其中之一,他指出,我们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拿来进攻我们自己。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共就斯大林评价问题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并声明说:"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根据党内消息来源,中国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和干部持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过分地监管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对他们的关系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有关中国朋友中所存在类似的看法,在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中都提到了。在中国政府就苏联1956年10月30日宣言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统一及其奋斗的共同目标,一些工作者常常容易忽视国家在其互相关系中的平等原则。这种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沙

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尤其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和团结造成严重的损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提到的大国沙文主义是直接指向苏联的。其中说道：“……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斯大林)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

应该注意到，个别苏联公民在中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同志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一部分苏联人染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些苏联机关工作人员、苏联代表团成员在与中国团体组织和个别人士交往中，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谦虚，过于强调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对我们的不足却完全避而不提。他们通常把自己当成教训他人的人。

中国朋友以各种方式对苏方在重要政治问题表态时并非始终与他们商量表示了不满。根据以上所示，中国领导人认为，比如，我们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事先与各兄弟党以内部方式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波兰事件，中共领导人在10月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对没能向他们充分通报波兰事件起始阶段的发展情况表示了部分不满。(参见1956年10月21日大使与刘少奇的会谈。)

同时还引起中国批评意见的情况是，苏联新闻报刊就兄弟党互相关系原则问题所发表的部分言论，没有事先与其他兄弟党磋商。为此提到《真理报》记者撰写的《论波兰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文，对铁托在普拉讲话的评论等。

在中国引起负面反应的还有，在许多场合，苏方往往事后才与中国领导人商量各种外交问题，事后去征求对苏联所采取步骤的看法。曾有这种情况，一些苏联文件(有关裁军、埃及问题等)只剩最后1—2天时才转交中国朋友，有时离文件发表只剩几个小时。引起朋友意见的还有迟发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信，如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柏林经互会会议、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庆祝节(参加经互会会议的邀请信在开幕前夕才通知，中方已来不及向柏林派遣自己的代表团)。

在中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苏中之间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常常由于苏方的缘故而被拖得时间很长。可列举的有，由于苏联组织方面对进行经济问题谈判准备不足，使得由中国副总理李富春带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滞留了好几个月。

鉴于中国反对在运用苏联经验时采用教条主义以及在科学与艺术发展中推行新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闻报刊开始愈加经常地对苏联作者的个别论点提出批判，对苏联艺术作品提出批评。比如，《光明日报》1月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对日丹诺夫同志在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年来，中国新闻报刊第一次对举办的苏联电影节上放映的苏联影片予以了批评分析，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我们影片中的消极面。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节时，苏联新闻报刊同样对中国影片给予了批评的评价。

在中国分发给党员负责干部的内部材料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在苏中国记者和留学生撰写的报道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渠道的有关苏联现实中的阴暗面。尤其最近刊登比较多的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对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辩论，有关我们在工资问题上存

在的不足,有关苏联个别地区出现的骚乱,有关个别苏联人在境外的不雅行为等。中国朋友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苏联公民在华的错误行为以及苏联有关组织领导人在财产上犯的个别过错沉默不语了。

必须指出的是,就各种问题对我们提出批评时,中国朋友的做法是讲究策略的和同志式的,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消除有碍我们之间友谊的个别不正常现象的良好提醒。周恩来12月19日在仰光就苏中关系问题发言时声明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就像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样,原则上允许相互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只会促进我们的共同进步。”

鉴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大使馆发专电向中央通报了中国朋友对苏联的主要意见,并加入了改正缺点和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的相应建议。

至于说到这种情况,即最近中国开始对积极发展中的苏中友好关系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和事实进行更为仔细而深入研究和分析,更为经常地对个别苏联代表团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首先,如以上所述,这是由于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以及苏联政府为执行会议决议而随后所采取的内政措施。这些措施,尤其是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有利于在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包括与中国之间,营造一种更加频繁而开诚布公交流意见的友好氛围。

与此同时,决定的因素显然是由于中国政府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解放后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经验。近七年半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党和国家机构,他们在领导国民经济中取得巨大经验,目前已有能力熟练而独立地去解决管理一个经济复杂的大国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这些都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而强大的国家机构中,成长起一批干事认真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国家干部,他们在与苏联各种组织、部门、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广泛和密切交往过程中,取得了在解决个别问题以及领导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经验。考虑到苏联的经验,如今中国建立了必要的各种国家机关、设计和科研机构,能够独立解决和批评对待整个国家在企业设计、建设和经营中,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划中的复杂问题。近年来,中国干部所取得的经验逐渐丰富了与人民民主各国的专家与国家机关之间,首先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合作。所有这些合起来为中方去研究苏中合作中个别实际问题创造了新的局面,对此苏联相关组织和机构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应该指出,在中国现实中也存在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互相关系造成一定损害的个别不健康的现象。为此必须指出的是,基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中国一部分群众中,其中包括党员干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无论是对待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朝鲜、越南、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有关类似情绪在中共内部资料和中国西文新闻报刊上都提到过。

在苏中经济合作领域,过去的1956年中的特点如下:

苏中贸易。1956年是苏中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年。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与中国的外贸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为59.97亿卢布(包括通过对外经济总局渠道的供

货)，1956年苏联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为51.5%，1955年为52%。根据1955年12月27日签订的商品流通备忘录及补充协议，1956年商品流通总额苏中互相承担的义务为62.216亿卢布(不包括根据双方互相协商过账1957年的供货量)，1955年为49.158亿卢布，其中苏联向中国的供货数量预计为27.472亿卢布，中国向苏联的供货数量为34.744亿卢布。苏联完成了1956年合同额中对华所承担义务的供货数量的97.2%(26.706亿卢布)，而中国则完成了95.8%(33.264亿卢布)。苏联完成的出口计划达到了将近98.9%，中国为99.6%。与过去几年不同，1956年中，由于苏联供货进展比较顺利，极大地缩小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供货数量上的差距。截至本报告年底，双方供货和结算收支平衡中，苏方顺差为27.86亿卢布。

本报告年度，苏联继续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购买方：在中国出口总额中苏联进口比重占61.7%。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农业产品总额为17.873亿卢布，占中国商品总额的51.7%。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商品种类超过233种。这些商品诸如乙醇、干果、葡萄糖、蔬菜和蔬菜罐头、甘油、琼脂、101产品、镉等，中国还是第一次提供。苏联1956年在中国采购的商品价格基本维持前几年价格的水平，除了1956年在中国第一次采购的那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我们各家联合企业和中国各家公司根据国际平均价格水平而确立的。

1956年，保证中国商品资源出口出现了紧张局面。与过去几年情况不同，中国向苏联供货进行得十分困难，对此，中方的解释如下：1956年下半年，在中国一系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劳动人民购买力提高以及工人与职员工资的增加，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国内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上升，尤其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投资生产步伐加快对生铁、黑色金属轧材、铝、水泥、烧碱、钙碱等的需求；1956年中国出口规模比1955年(22%)有了很大增长，尤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

鉴于目前形成的局面，贸易办事处无法保证合同中所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供货数量，如猪肉、大米、生铁、钢材等。为此必须指出的是，中方到1956年11月底还声称，向苏联供货的义务将会完全履行，直到12月3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哲人才正式提出请求把1956年的供货数量5 139.9万卢布过账到1957年，其中包括生铁、水泥、生丝、橡胶、轧钢、猪皮等商品。此外，中方请求用其他商品取代数额约3 863.7万卢布的部分商品以及取消1956年中国对苏联供货数量计约3 933.5万卢布的供货合同。苏方考虑到中国朋友的请求，对用其他商品取代部分商品表示了同意，并同意将1956年供货数量5 139.9卢布过账到1957年。中方有关取消1956年供货数量计4 318.5卢布的供货合同的请求则被列入了备案。

1956年中方按季度出货进行得并不平衡，其原因解释为，1956年第一、二季度季节性农业产品出货大幅增加。中国供应的商品质量基本上符合合同的技术要求。全苏联合企业提出的个别补偿要求主要涉及商品短缺、尤其是日常用品(包袋、鞋子、针织品、手工艺品)以及商品运输途中的破损。补偿要求通常都及时得到了中国公司的满足。

由于外贸工作开展条件发生变化(很大一部分外贸业务集中在公司、部委的中央机构中，拥有一批更有经验和专业的外贸干部等)以及出于减少在华苏联专家人数的必要，对贸

易办事处机构进行了一些改革,减少了全苏联合企业在华雇员人数。关闭了设在沈阳、天津、哈尔滨和广东的贸易办事处的分部,并将雇员人数从85名减少到42名(截至1957年1月1日)。

1956年苏联供货数量比1955年增长了12.1%。这一增幅是在大宗商品供应量的增长下降到10.5%的同时,靠总体供货增加而取得的。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大宗商品供应计划只完成94.8%,数额达到10.638亿卢布。未完成设备交货的全苏联合企业,主要有机械出口公司(18.4%)、机床进口公司(13.8%)、船舶进口公司(6.1%)、汽车出口公司(3.6%)以及全苏联合企业工业原料进口公司(金属轧材)等。换言之,除了全苏联合企业机械进口公司和全苏联合企业木材出口公司之外,其他的所有联合企业都未完成1956年的各自义务。

尽管苏联出口中国的货物供应商对供货文件的手续作了一些改进,但发货仍然出现违反规定程序的情况。违反供货文件程序大部分是因发货厂家的过错造成的。一部分供货文件甚至在铁路运输中遗失了。自开通经蒙古的铁路直达列车后发现,出口商品供应商并不是都能正确标明货物应该经过的边境车站的名称。因此,中国收货人常常为货物在中国境内多余运输而承担额外的铁路运输费用。此外,根据中国主管领导人的声明,这种局面导致收货人无法及时收到货物,从而又影响了生产计划。还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给苏联境内收货人的货物却发到了中国的集宁车站。全苏联合企业和发货厂家应该认真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并采取措施,杜绝类似情况在以后重复发生。

1956年,贸易办事处基本上圆满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在贸易办事处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不足。贸易办事处未能达到合同所规定的供货数量,也未能保证发往苏联的同等数量的中国商品,这类商品是:生铁、水泥、黑色金属轧材、猪肉、淀粉、大米、猪皮、生丝、花生,从而影响了一系列苏联企业的工作。未能保证1956年修理中的"食品工业"船和"三号冷冻船"完工下水。同时贸易办事处也未能完成对合同规定的苏联商品交货数量和期限所承担的义务。

对华技术援助。1956年苏中经济合作明显扩大,尤其是苏联对华技术援助的规模扩大了。中国同志对1956年4月签订的苏中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根据该协议,苏联必须对中国55个工业企业建设提供额外援助。苏中经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就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华技术援助问题所举行的谈判。众所周知,中国同志起先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成套企业提出了过高的请求,苏联对此并未给予完全满足。拟定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109个新建企业建设的技术援助(中方请求的是200个项目以上)至1960—1961年方可开始提供设备。对中国同志的解释是,无法做到更早开始提供设备,因为在我们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按签订的协议对向中国提供大量设备已定了下来。在对完成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有关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示不构成严重损害的前提下,增加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设备供应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至于1957—1958年对中国提供设备问题,由于苏联实行工业技术改造任务以及这些年内对中国供应设

备的大量增加，有必要把1957和1958年的部分设备交货期推后至1959和1960年，因为所制定的这些年内供应大批设备数量是不现实的。尤其是过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结构复杂、独特的专业设备的请求(锻造和冲压设备、金属切割机床等)。

中国朋友正确理解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况且中共八大期间，在与A.И.米高扬同志和苏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会谈中，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承认，中国对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量新建工业项目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现实的，中方本身对其也是无法实施的。这一情况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随后所采取的措施中，尤其是中共八大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中得到了反映。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中国同志采取了放慢1957年基础建设步伐的方针。同时，这一路线实施也是针对苏联援助建设的成套企业。众所周知，1957年"156"项目中一系列企业的基本建设资金被取消了。为此，中国同志打算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的设备数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该年1月17日与经济合作顾问的一次会谈中提出，1957年中国出口的能力无法保证支付从苏联进口的供货和计划所规定的其他货款，缺口将近3亿卢布。为此，中方确定1957年苏联总体供货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为9.8亿—9.9亿卢布，以取代之前商定的12亿卢布，其中设备项目为6.623亿卢布，取代苏联所提出的10亿卢布。缩减供货主要涉及机械制造厂家、国防工业企业、部分冶金工业项目。从苏联提议供应设备的117家企业中，中方完全接受的为其中66家企业的供货，部分接受的为其中33个项目，拒绝接受的为其中18个项目。这一问题现正处在苏中双方协商阶段。

缩减苏联对华供货是在1957年设备供应计划已经被通过、对联盟各部总供应商已下达了订单——供货通知单，并且设备已经开始装运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将对我们工业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对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将造成无效的浪费和亏损。同时，这种情况还会影响到中国设备供货订单项目的完成。在北京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苏联部门专家组领导必须仔细研究中方的建议，提醒中国朋友采取顾全中苏双方利益的更为合理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对华技术援助所做的主要方面有，完成项目，提供设备以及向由苏联援建成套设备的企业派遣专家。1956年苏联对"211"项目中各企业提供了各种技术援助，除了1956年1月1日之间已经投入运行的项目之外，14家企业和2个单独车间完全投入了使用(长春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制造厂、北京无线电子管厂等)，22家企业中单独车间和项目开工。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苏联在研究核物理和民用核能方面所给予的援助。1956年提供的技术援助规模比1955年大大提高了。共向99家企业提供了数额8.396亿卢布的设备(完成计划101%)，即比1955年增加了1.5倍。然而，按供货计划单却并未完成任务。对项目、派遣苏联专家、接受中国专家赴苏联生产实践以及其他技术援助的支出达1.927亿卢布，或占计划的约96%。计划未完成，是由于未能履行提供足够的设计资料。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得到了其所提供的项目文件和必要设备。设备质量和项目技术文件总体上都很不错，并且满足了中方的要求。截至1957年1月1日，在华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共有1 904名，其中822名是成套企业方面的。向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们总体

上都能胜任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促进了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巩固。

但是,在对华技术援助的巨大而重要的工作中,至今仍存在着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严重不足。尽管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为保证苏方实质性履行义务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许多联盟部委开展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依然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大使馆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了该工作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但是1956年苏方履行对华技术援助义务的情况依然还是紧张。至今对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各家企业在设备交货期、项目技术文件转交和派遣专家上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违约。对中国履行各自义务无法完全令人满意的部委有: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苏联化学工业部及一系列其他部门。一年内,化学工业部违反项目技术文件转交所涉及的企业有:吉林炭化氰生产厂(炭化物分类和包装车间、压缩车间、毒气吸收装备车间)、太原化工厂(供水和下水表面布局工作图纸、工厂总图纸等)、兰州化工厂。该部对一些工厂没有很好地供应设备。对吉林氮矿肥生产厂的个别设备交货拖期达到2年以上,对吉林氨基染料生产厂的设备拖延交货达到半年以上。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曾多次提请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注意苏联对该厂、太原工厂和其他设施的设备交货中不满意的情况。中国同志向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就其违反各项目的项目文件转交期提出了许多意见。该部拖延转交245工厂工作图纸,结果造成将近4 000名建筑工人严重停工。由于未及时转交804工厂工作图纸,使得该厂建设全年计划搁浅。在该总供应商和其他部分供应商工作中还出现了对建筑文件转交的不道德做法,具体是:地下排灌图纸(供水和下水等)在大楼工作图纸之后才转交。这种技术文件提供程序严重地违反了建筑技术并因此导致了无效浪费。

作为六大项目的总供应商,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在履行其对中方义务上态度极其玩忽职守。在对待所有这些企业上,该部系统地违反了项目文件转交期。尤其是严重耽误了工厂内地面上的排灌和道路的技术文件,没有这些就无法开始生产大楼的建设。违反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的还有一系列其他联盟各部(苏联电站部、苏联黑色金属部、苏联国防工业部等)。

各部总供应商尚未达到高质量地完成对华项目工作。苏联项目组织对适合中国地方条件的项目结合上注意不够,通常所设计的构造和设备都是过时的种类。例如,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完成的工作图纸常常质量不行,其中存在许多错误,设计方法陈旧,在推荐使用金属构架的那些地方,中国设计者早已使用上了混凝土。

各总供应商并非总是保证其所供应的设备令人满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们工业在中国工作人员心中的威信。质量低下的设备分别供给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锻造冲床)、吉林的氮化氰生产厂(冷却桶)和氮矿肥生产厂(空气分离机组)、哈尔滨锅炉厂(弯曲设备)及其他设施。有些情况,由于包装不好,设备在途中损坏了。

在向中国派遣专家方面,联盟各部依然违反自己的义务(苏联化学工业部、苏联石油工业部、苏联药品工业部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中国同志对违反向中国派遣专家期限的苏联各部曾多次提出了意见。

过去一年的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工作实践再次表明，在派遣专家去中国工作上，务必要仔细注意人员的业务和道德素质。鉴于中国国家干部人数的极大增加以及所取得的一定工作经验，要求联盟各部派遣去华专家务必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面、充分的工作经验和技术教育专业知识，能够向中国工程技术工作者提供专业技术帮助。然而，至今苏联各部显然没有认真注意这一问题。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专业水平还有待做得更好。中国同志愈加频繁地对苏联专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的做法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比如，通过内部文件上发表的批评资料)。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六局副局长史可壮(Ши Кэ чжуан)在出访苏联前夕与苏联专家Я. И. 帕胡奇的一次会谈中，请求其向苏联交通机械制造部领导转达说，该部近期来的技术援助专家的技术专业比1—2年前来的专家水平要低许多。并非所有的专家对其承担的事业都充满义务和责任感，他们中一些人并非竭力让自己"辛勤承担"与中国干部一起频繁而辛劳的工作。武汉在建冶金联合企业厂长直接向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苏联专家组组长萨维茨基对中国建筑联合企业工作人员援助不够。在使馆人员到中国一些城市出差时，中国地方负责人员也向他们提到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不足。

使馆认为有必要指出，苏联各部来华解决技术援助问题的一些专家和负责同志实际上根本就无所事事。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外事处主任A. E. 霍赫洛夫同志领导的该部工作组对中方采取了显然错误的立场。他们对西安市和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向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予任何答复，借口说，他们不想去"检查"苏联部长会议有关向中方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限的决议。换言之，A. E. 霍赫洛夫同志不敢向中国同志通报，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无法保证按协议规定的期限如期完成一系列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在霍赫洛夫同志向北京大使馆和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作了解释后，情况才得到了扭转。

我们苏联各部和机关显然没有完全考虑到无可争议的这一事实，即中国已经培养起一批自己的专业工程技术干部，他们在苏联企业经过了认真学习，从参加建设中国企业的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此外，不能不注意到，现在中国工作的有一大批来自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都有中国专家在学习和工作。这一切致使具有很多知识的中国专家可用更加批评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专家的工作，去评估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去评价技术文件以及与技术援助相关的其他问题。

鉴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同志对待苏方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不足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开始更加直率地指出这些不足，随即向联盟各部、外经总局和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提出意见，尤其是在苏联使馆人员出差去中国一系列城市的时候(西安、太原、哈尔滨、汉口等)。中国同志对设备供应工作，对提供给中国设施的设计，对苏联专家在华项目组织和企业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都给予了直接的指摘。毫无疑问，这一切应该成为一种信号，即坚决消除所有不正常的现象，其中包括那些在联盟各部、对外经济联系总局以及与中国有关各部、各机关的专家和个别企业领导人看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刚刚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为巩

固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采取了最新措施。

说到中方与苏联共同对"211"项企业中的一系列设施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应该指出，中国同志在选择建筑场地、准备原始数据和设计任务、进行勘测工作中犯了严重差错。比如，中方至今迟迟未能按"55"项企业协议提供发电站设计的原始数据(延迟了近半年)。中国有时拖延提供苏方设计所必需的补充原始数据，从而造成苏联设计机构设计工作完成期爽约。在一系列情况下，出现拖延提供苏中项目部分互相结合所需要的数据。在设计过程中，中方有时改变工厂规划，从而对设计结果(化工厂、国防设施等)也就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同志并非总是及时为本厂在建企业订购设备，这有时导致企业投产期限无法履约，因为临时去订购很难得到满足(如平安煤矿5号矿区、新丘煤矿)。

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呼吁保证履行苏方对中国技术援助的义务。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工作，在很多情况下，对违反设备供应协议和合同、提供设计技术书、派遣专家等的联盟总部供应商、个别部委和机构及时地发出了信息。但是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未能达到及时而优质履行苏方对华技术援助的所有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本机构在工作上所出现的不足。机构中对苏联设备交货以及对技术援助设施的项目书从不进行系统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有关履行设备供应义务的情况，并非来自外经总局和苏联外贸机构，而是来自苏联设备专家组领导人从中国朋友和中国机械进口总公司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反馈，也就是来自中方的两条渠道，而这些情况未必都是准确的。

机构转交苏方技术书情报的程序十分复杂而紊乱，其结果是实际上无法建立起及时对履行这部分义务的有效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对使馆消除技术援助工作中的缺点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评价不够。尽管实践已经证明，使馆的干预有助于解决涉及对华技术援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京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显然对1956年8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系事务总局办事处"决议的实际意义评价不够。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不足还有技术专家与苏联顾问组之间缺少密切联系，从而阻碍消除中国同志在苏联技术援助企业建设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企业建设规划问题、投入使用期、原材料供应等)。

科学技术合作。过去的一年中，苏中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极大发展。1956年6月和12月在北京与莫斯科分别举行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和第五次会议对此予以了极大的促进。使馆在上半年工作报告中对第四次会议的工作结果进行了通报。

第五次会议上倾听了有关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过程的通报，审议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开展先进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的迫切问题。会议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不仅中方，而且委员会中的苏方代表对如何使用所取得的经验都分别进行了介绍，从而纠正了过去只有中方介绍如何使用所掌握科技资料的那种显然不正常的情况。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方所提出的有关获得苏联各种科学文件和派遣专家的近500项申请以及苏方所提出的近100项申请。应该指出的是，从整体上说，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苏方对第五次会议的筹备比以前的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要成功得多。就筹备中方提交会议审理的申请进行了巨

大的工作(半年之内准备了1 000多个项目)。苏联有关部委对中方的申请开展了比较有组织的工作。向第五次会议提交了2 000多个项目的中国同志当然期望其一大部分申请能得到苏方的满足。但审议通过的只有近500个项目，并且其中一半还是在会议间隙协商通过的。由于一些不明原因，将近900个已经准备好的中方申请在会上以其"未准备好"为由而没有进行审议。这样一来，科技合作处和委员会苏联方面领导人使自己处在了明显被动的地步，因为中国同志通过联盟各部早就得到确定，事实上是对上述项目，各部早就准备好了，并且还在科技合作管理处放置了3个月之久。使馆认为，必须对这种不正常情况予以重视，并建议科技合作管理处领导采取措施，在科技合作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将这些项目转交给中方。会上就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情况进行了审理。尽管对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联盟各部履行苏方对华科技合作义务的监督予以了改善，但占已协商通过的所有中方申请数量10%的一系列项目却未能如期提交，并转放到1957年。中方基本上是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去年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巩固了委员会苏中双方之间的交往。双方关系开始具有更加开诚布公的特征。中国同志积极地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转用于国民经济中，就可能会引起苏联兴趣的那些科技资料提出了自己的推荐意见。他们创造一切机会，以便使在华苏联专家能够了解中国在国民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中国朋友开始对委员会中的苏方工作表现出十分严格的要求和批评态度，经常对苏方因未能完成某种义务而提出公正的意见(苏联专家来华拖期、团队零散、延误文件转交等诸如此类)。他们对进一步扩大中苏科技关系表现得比苏方更为积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对建立苏中相关部委之间直接联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几乎一年时间内，中国同志已经努力设法取得苏方同意给予各部在交换各种科技资料上的自主权利。中国政府自己已经通过了相关决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有关扩大苏中相关各部和部门直接交往的决议未能完全满足中方在该领域的期望。

1956年，中苏之间的科技合作采取了一些新的工作方式。其标志在于这一年开展了一系列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有关掌握黑龙江河的能源资源、勘查中国地下矿产的一系列地质考察、防止中国土壤侵蚀的研究等)。联合研究给苏中科学家带来了很大益处，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工作友好联系。但在很多情况下，个别苏联中央机构组织对筹备和进行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所抱的形式主义态度使苏联威信以及加强苏中友谊造成了一定损失。苏方在筹备黑龙江野外工作综合考察中暴露的不足说明了这一点。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的州、边疆区和地区组织都未事先得到中央有关今年中国大批科学家、专家和年轻学者将抵达边境地区开展联合工作的预告。结果是，中方境内地方当局预先做好了接受考察团的准备，而我方的地方当局则在交通运输安排、解决与中国朋友抵达后相关的琐碎日常问题上进行得十分吃力。考察团中的苏方在设备、水上交通运输和食品供应上比中方要差许多。设法克服苏中联合科学考察组织中的其他不足，尤其是苏联科学院与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活动中的闭关自守，毫无疑问，这势必能使开展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同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开展中苏科技合作方面专家和学者之间的联合工作同样是

十分适宜的。首先,这符合互助原则,其次,能给苏联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益处。1956年,中苏之间以及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了多边科技关系(举行学术会、工作会议、联合研究个别科学问题等)。1956年1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船舶制造会议上,苏联、中国、波兰、东德都出席参加。中国学者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国同志十分乐意接受邀请参加各种国际科技合作会议,派遣专业、权威代表团参加。去年的另一特点是,苏中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科学研究所、项目研究所、实验室等),尽管这一合作形式尚未得到广泛发展。互相邀请专家了解科研成果和交换工业和农业各领域中的经验是过去一年中科研合作的重要形式。通过科技合作路线,苏联有100多名专家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代表团成员),也就是说,比1995年多出了将近一倍;中国有200多名专家莅临苏联。中国同志十分乐意邀请苏联在各科技领域的著名专家来华,帮助解决中国的个别科学问题。

文化合作。1956年7月5日苏中文化合作协议的签订促进了过去一年里苏中文化联系一定程度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协议制定的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要求开展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和体育代表团互相交流以及出版物、电影影片等的交换。

根据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中国向苏联派遣了3家艺术团体和11个各类代表团以及1 343名本科留学生、520名留学研究生以及97名进修生。苏联向中国派遣了2家艺术团体和9个代表团。

文化合作计划是主要的,但并非是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的唯一渠道。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发展,这些都是直接通过苏联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全苏对外文协和中苏友协之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中国总工会之间以及通过国际旅行社、国际图书协会、影片出口公司等途径实现的。

1956年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中,中共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称赞了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活动。毛泽东在与大使的交谈中对伟大的苏联科学专家组的工作表示了满意,并对他们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规划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苏联在原子能运用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苏联生产先进工作者代表团的活动也得到了中国高度评价。

本报告年度,总共有26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其中成员人数达到254名。回国后,代表团成员为巩固苏中友谊以及广泛宣传他们在苏联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开展了卓越的工作。比如,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两个月内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先后作了200多场介绍有关苏联情况的报告和演讲,出席人次达到约30万人。

1956年苏方在实施文化合作计划时出现了一系列不足:苏联代表团经常晚到或者分成好几批往返中国;苏联文化部在向中方通报有关苏联代表团的出发日期上做得很差。未能及时通报代表团和艺术团体成员的基本资料。

苏中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派艺术团体。

苏联艺术团体在中国的演出取得很大成功。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在中国表演很成功,演出观看人次达到22.5万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与前几年赴中国的其他苏联艺

术团体不同，乌克兰艺术团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巨大中心城市表演，而且还到无锡、郑州、西安、杭州等地。苏联马戏团长时间的巡回演出同样也很成功，并引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兴趣。基辅歌剧与芭蕾舞团女独唱演员 Г. 奥列依尼琴科在中国做了很好的自我展示。遗憾的是，苏联人民演员 Б. 戈梅拉的表现却无法让人恭维。戈梅拉所表现出的有些高傲的举止以及对巡回演出提出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要求，给中国朋友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对中国人民了解苏联在文化、科学和技术以及对华转授苏联技术经验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1956 年 5 月 5 日至 8 月 5 日在杭州举办了展览。共有 34.66 万人次观看了展览会。两个月内共有 20.2 万人次参观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根据中方的愿望，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上，安排 9 000 名中国专家对展览会资料进行了深度介绍。

过去一年中，苏联影片在中国放映得到了扩大。1956 年在中国银幕上共上映了 103 部长片，其中 45 部苏联片、37 部中国片、21 部其他国家产影片。此外，还上映了约 100 部苏联纪录和科普短片。反映苏共二十大工作的新闻影片特刊发行量十分巨大。1956 年观看苏联影片的中国观众总人数达到 3.5 亿人，1955 年为 3.35 亿人。

11 月 7—13 日，为庆祝十月革命 39 周年，在中国 20 个最大城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列入电影节片单的有影片《母亲》、《未结束的故事》、《士兵伊万·勃罗夫金》、《外来亲家》。电影节期间，共有 427.5 万人观看了苏联影片。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在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应该指出，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但对苏联所举办的中国电影节则无法恭维(中国内部新闻报刊上刊登了中国作者撰写的资料，证实莫斯科举办的电影节组织工作很糟糕)。

1956 年，与往年一样，苏联书籍依然是中国人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科技先进成果的重要来源。

与 1955 年相比，1956 年中国出版的苏联图书从 5 184 种增加到 6 210 种，增长了 19.7%，而发行数量则从 4 500 万册增加到 6 400 万册，增长了 42.7%。几乎中国出版的每三本图书中就有一本苏联图书。几乎中国出版的高中等技术院校的所有教科书都是翻译苏联作者的书籍。

中国同志对中国出版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赋予了重大的意义。根据中国出版总局资料显示，从 1956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出版了列宁著作 28 种，发行量为 72.25 万册，斯大林著作 19 种，发行量为 132.8 万册。1956 年对华几乎没有供应任何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因为中国组织方安排在中国翻译出版苏联书籍。

1956 年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俄文及其他文种图书(没有维吾尔语)共计 327.216 5 万册，1955 年为 321.025 7 万册。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图书在中国传播和出版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虽然 1956 年出版的苏联中文图书的总发行量以及科技和政治类书籍的发行量增加了，但由于中国作者的政治

类书籍出版大大增加,苏联政治类书籍的数量则因此减少了17%。在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数量增长绝对可观的情况下,1956年,按种类数量,其在外文书籍再版中的比重从94%下降到89.3%,按发行数量,从92%下降到88.9%。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的增幅(主要是科技类书籍)比苏联书籍出版增幅要高许多。比如,按发行数量,苏联书籍出版增幅为42.7%,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则增长了一倍,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出版几乎也达到一倍。按书籍种类,增幅数字则更有特点:苏联方面为19.8%,人民民主国家方面为60.8%,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则接近了1.5倍。1957年中国在订购苏联文艺和社会政治杂志上(《苏联》、《苏联妇女》)预计要减少苏联这类书籍的进口。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和机构减少了对不具备学术性质的外文出版物的订购经费。同时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的进口(主要是科技书籍)则比1956年增长了85%,而按整套数量计算则增长3倍。从人民民主国家进口的书籍预计也增加了。但是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外文书籍的比重不大,苏联书籍依然在这方面占据主要位置。

使馆注意到苏联进口的中国出版的俄文和中文书籍及期刊出现明显增长(达到1倍多)。中国朋友十分满意地接受了有关从1957年1月1日起在莫斯科开版印刷《友好报》6.1万份的决议。同时必须注意到,根据订户数量,《友好报》的发行量明显很少(为总印数的20%)。

总体上应该承认,1956年苏中图书交换扩大并非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工作成功的原因,而是由于中国出版社的高度积极性和中国国际书店公司的良好工作。在国际图书公司和图书贸易总局积极活动下,按满足中方订购的情况看,1956年苏联图书在中国所占比重还可高出许多。使馆认为情况尤其不正常的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未能完成国际书店的订购,特别是科技书籍,1956年,不算完全拒绝发货的话,共有43.9万册苏联图书未能完成发货。

使馆注意到在苏联出版的俄文中国图书发行量相当少。甚至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共八大文件资料》汇编,苏联只出版发行了7.5万册,无论怎样都不能满足苏联读者对其的实际需求。中国则大量出版了苏共二十大文件资料。这些文件,如《苏共中央二十大总结报告》和《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决议》,其单行本发行量达到318万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报告》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1956—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发行总量为80万册。

使馆注意到苏联文化部和出版总局对苏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书籍和中国出版社出版苏联书籍工作的合作和协商显得十分薄弱。这种协商差的原因之一是,在使馆看来,在京国际图书公司分部只从事机械的图书邮寄和统计,没有起到它所应该起到的作为苏中出版社和图书贸易组织联系环节的那种作用。

1956年1月17日,苏中国际旅行社之间签订了游客互换协定,根据该协定,从5月18日至12月31日,在苏中关系历史上,苏联有44个旅游团,共计1 344人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使馆认为不妥的是,1956年去中国的所有旅游团都没有进行身体检查。其结果是,团

组中出现了病人，造成团组行动不便，并且给中国国际旅行社带来许多麻烦。严重不足的还有，旅游团组中没有自始至终的陪同人员。

1956 年 12 月 31 日，第一个，也是 1956 年唯一的一个中国旅游团，一行 23 人到达了莫斯科。苏中旅游人数出现的这种比例，在使馆看来，其原因是，去苏联的旅游按其成本，中国职工还负担不起。在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60—70 元的情况下，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期一个月旅游的二等火车票价格为 1 000 元，飞机票价格为 1 500 元。造成中国游客去苏联旅游更多实质性障碍的还有中国缺少休假制度。因此，1956 年唯一的中国旅游团的旅游还是工会支付的或者是分配给大资产阶级中的代表。

由于旅游的昂贵成本以及中国朋友去莫斯科的愿望，中国国际旅行社只能设法给那些过境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发放旅游通行证。因而，使馆认为不妥的做法是，尽管中国国际旅行社再三请求，苏联国际旅行社理事会 7 月份仍然拒绝向中国演出团一行 78 人发放旅游通行证，8 月份则拒绝接受过境莫斯科赴人民民主国家留学的 300 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旅游申请。

从 1956 年 12 月 14 日至 1957 年 1 月 24 日，莫斯科举行了苏中国际旅行社代表会谈，结果签订了 1957 年游客互换议定书及为过境旅客提供互相服务的议定书。1957 年游客互换议定书中规定，1957 年苏联将派遣 1 000 名游客，赴苏联的中国游客人数将晚些时候确定。鉴于中国国际旅行社宾馆总量有限以及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签订游客交换协定的愿望，根据中方请求，将苏联赴中国游客人数缩减到了1 000 名。

在对 1956 年苏中文化合作进行总结时，应该指出，7 月 5 日协定为扩大和加深两国人民文化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1956 年文化合作方面特点在于，由影片、文学作品的一般交换开始过渡到科技领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国各区之间、苏中边境地区、大城市、院校和企业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工作联系；开始过渡到联合创造影片、学术和文学作品等。

苏联文化部与中国文化部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对进一步发展苏中文化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谈判中对 1956 年的文化合作实施进行了总结，制定和签署了 1957 年文化合作计划，预先讨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关于有必要增补为期 3—5 年文化合作前景全年计划的问题。

二、中国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56 年，与过去好多年来一样，朝鲜问题在中朝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鉴于 1956 年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企图加紧取消中立国委员会和朝鲜停战协议，对中朝政府而言，特别是该年上半年保持朝鲜停战和维持和平具有绝对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美国与李承晚集团之间频繁破坏停战协议而造成的朝鲜实际局势以及对方企图直接摆脱中立国委员会监督，中国政府奋勇承担起制定一系列整套措施的倡议，在中国同志看来，这些措施的实施便能粉碎美国的阴谋。在 1955 年 12 月 28 日的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说明，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在精简中立国委员会机构和人数问题上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但决不允许完全推翻该机构的活动，以保持委员会继续执行对双方履行停战

协议监督的权利。

1956 年中国政府继续探索调解朝鲜问题的途径，1956 年 4 月对美国、英国以及与联合国军队具有关系的其他国家政府发出了正式呼吁，建议召开相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和平统一、从朝鲜撤出各外国军队及其他问题。但是，考虑到目前朝鲜和平统一尚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过去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必然会遭到美国强烈的否定，所以中国朋友认为这一建议缺乏真正的实际意义。这一建议的目的，正如先前所考虑的，主要是为了能够减轻来自坚决要求精简会员机构的瑞典和瑞士方面的压力以及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在调解朝鲜问题上的真正反对者。

中朝之间经过磋商之后，中国朋友同意了这种意见，鉴于召开朝鲜问题会议缺乏良好的局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其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和逐渐接近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在中国朋友看来，中朝政府之间在一系列外交关系问题以及对朝鲜国内状况的评价上缺乏完全足够一致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 年 11 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备忘录，文中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提出研究有关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的适宜性。因为朝鲜政府这一建议完全背离了以往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朝鲜问题应该取得公正解决。还在 1954 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中国和朝鲜就已共同表示要坚持这些原则，中国政府在其回电中对这一步骤的正确和现有条件下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

在之后对该问题予以解释时，朝鲜同志声明道，显而易见，朝鲜与中国政府在对联合国本身概念的解释上存在分歧；在他们看来，不能把作为朝鲜战争中的作战方的“联合国军”与整个联合国对等起来，除了朝鲜战争参与国之外，许多反对联合国军事干预朝鲜冲突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因此，朝鲜认为，把整个联合国看成为参战方是不利于共同利益的。

在仔细研究了朝鲜政府的建议和论据以及就这一问题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之后，1956 年 12 月 8 日，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发出了第二份备忘录，文中指出：

1. 美国经常利用联合国来干涉朝鲜事务。朝鲜、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决地反对联合国干涉。

2. 联合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朝鲜战争的作战方。

3. 直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奉行其几次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联合国始终只承认南朝鲜并允许其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的各种会议。

4. 目前，对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利益而言，解决整个朝鲜统一问题条件尚不成熟。为了取得朝鲜统一目的，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未接受朝鲜政府提出的有关联合国参与朝鲜问题调解的建议，接受该建议，正如中国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等于承认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正确的。

据今年中国对使馆内部通报，得知在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存在行为不端，个别中国军人，

主要是指挥部成员出现严重违反朝鲜现有法律和风俗的情况，出现干涉朝鲜当局内政的个别事实，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从新华社内部简讯某期刊登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个别中国军人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朝鲜老百姓极端的不满。刊登在这份简讯上的一些朝鲜公民的言论证明，目前朝鲜中许多人把一部分中国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其在朝鲜进一步存在是不受欢迎的，侵犯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从中国朋友的通报中可以得知，这类看法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提出的。

1956年中朝贸易关系是建立在按全年贸易协议互相供货以及1953年11月23日有关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协议基础上的，而且与过去几年一样，中国供货数量按价值要超出朝鲜供货数量的几乎11倍。

根据9个月的中朝贸易的资料初步显示，证明中方对1956年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履行情况是满意的。9个月来中国向朝鲜提供了价值人民币2.197亿元的商品，完成全年计划的90%以上。同时，朝方在同期内却只完成了全年供货计划的58.4%。

1957年1月，中朝之间签订了1957年商品贸易额议定书和根据1953年11月23日协议对朝援助议定书，该协议有效期到1957年。从1958年起，两国贸易关系将建立在普通商品交换基础上。

在进行有关1957年中朝之间商品交换问题的会谈进程中，中方无法完全满足朝方所提出的提供某些粮食品种的申请要求。比如，朝鲜人坚持要中国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诿本国物质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并且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

1956年中朝之间代表团进行了大量交流，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相互间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各自所取得的经验。比如，朝鲜教育工作代表团10—11月期间到中国访问，熟悉考察了中国初高级教学安排情况。差不多同时期，另一朝鲜代表团对中国金融和贸易进行了访问考察。为了熟悉考察非灌溉水稻培植和朝鲜“人参”种植经验，中国农业代表团6—7月期间去了朝鲜。1956年9月，中国林业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熟悉考察朝鲜植树经验。

根据1956年中朝文化合作计划，双方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交流，举办展览会、电影节，并举行了印刷出版物的交换。1956年2月，中国人民代表团一行125人访问了朝鲜。随同代表团出访的有13个演出团组，成员总数达到755人。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56年中国在发展和巩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方面取得了进一步成就。

1956年中蒙政府在两国关系和国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经常和密切的工作联系。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代表团三次访问了蒙古，其中3月份，中国出访代表团是由朱德同志率领的；7月份，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中国出访代表团则是由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本年初，中国代表团出访是由中国铁道部长滕代远率领的。

1956年，蒙古方面，以达姆巴同志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党中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出席了中共八大。

1956年8月,中蒙之间签订了中国向蒙古提供总值1.6亿卢布无偿援助协议。这项协议签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声称的,只是"偿清了陈年老账"(延安时期,为援助解放区),对发展蒙古经济以及巩固两国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在4年期间援助蒙古建设一系列大型企业(如精纺毛厂、玻璃器皿生产厂、造纸厂、标准房工厂和其他部分厂)以及援助对蒙古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产业的组织和配备(蔬菜种植产业、伐木业、渔业等)。

协议中规定,这些企业的建设和设计将根据蒙古工人和技术专家力量条件予以实施。但是为建设这些企业,除了按照1955年4月所签协议规定目前已在蒙古的1.2万人之外,中国同志拟定另外再派遣1.5万—2万工人和技术人员。

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中国政府一方,还是蒙古政府一方,对派往蒙古的中国劳动力予以了很大关注。1956年中国向蒙古继续派遣了1955年未能成行的中国工人和专家队,计1.2万人,同时还有他们的家属。由于蒙古当局对前来的中国工人的物质供应以及日常设施问题安排解决不够及时,使得中国工人中间出现了不满,甚至与蒙古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此外,还引起中国同志许多意见的是,常常出现蒙古当局不加区别随意使用中国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情况,并且在非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去挖井和植树。

使馆了解到,中国同志具有向蒙古迁移很大一批中国公民的计划,但由于蒙古人采取的含糊立场,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但又不准备与中国同志就该问题讨论具体建议,因此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取得很大增长的唯一国家。1956年2月7日在乌兰巴托签署的中蒙1956年双方货物供应议定书中规定,今年商品贸易总额将比1955年增长1倍、比1951年增长8倍。根据议定书要求,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米、生丝、烟草、干果以及其他商品。蒙古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依然还是蒙古马、毛皮和其他一部分畜产品。

1956年蒙古向中国出口了总值约1 400万卢布的4万匹马。

1956年对中蒙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是,按照两国贸易组织之间达成的相互协议,取消了过去所存在的价格不正常情况,比如,蒙古在苏联和中国采购的一系列同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根据该协议,1956年所有相互供应的货物及其结算均按照中国和蒙古与苏联之间贸易结算时现有的等价价格。

1956年中蒙贸易的增长还促使开通了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运输直达列车。

1956年12月22日,中蒙之间签订了1957年双方商品供应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蒙古1957年将向中国另外再供应4万匹马、22.7万张皮革以及毛皮、马鬃、鹿茸及其他商品。中国将向蒙古供应:机器、工具、建筑材料、丝绸、布匹及各种日常用品。

两国在文化领域合作发展顺利。该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是,过去一年里,中国同志对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接文化联系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比如,1956年访问蒙古的大多数中国文化代表团均来自内蒙古。在赴中国的部分蒙古文化代表团同样也

只限于参观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5月，内蒙古作家和演员代表团访问了蒙古，6月，内蒙古文化活动家代表团和民族剧团则对蒙古进行了访问。鉴于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旅顺和大连港演出团赴蒙古举行了音乐会。蒙古方面，1956年蒙古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该团将近一个月对内蒙古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了考察。10月，访问内蒙古的还有蒙古铁路工作者青年代表团。

目前中蒙相关机构之间正在解决在呼和浩特——内蒙古行政中心开设蒙古总领事馆问题。蒙古同志认为开设该领事馆对关注中蒙有关相互提供牧场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在该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蒙古公民情况是必要的。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在于，努力巩固作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越南的地位，况且它在中国南部边界占据着重要战略地位。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日内瓦协议来加强保障越南和平发展。依靠我方在越南问题上所拥有的那些优势，中国同志在正式声明和宣传中揭露美国和吴庭艳集团旨在撕毁日内瓦协定和加剧越南分裂的政策。然而，在他们看来，越南同志不该非常热衷宣传越南统一，从而避免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众产生多余的幻想。为此，中国同志考虑到以共同选举方式实现其余所有分裂国家(越南、朝鲜、德国)统一问题的复杂性。在河内与越南活动家领导人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有必要对人民进行解释工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北方的人民民主主义制度，意思是说，越南统一是未来的事情。

中国朋友对越南就改善其与老挝关系及改变对老挝立场发表了看法。他们指出，为了促进老挝的和平调解，从丰沙里和桑怒省撤走少量越南人是适合的。

中国同志不止一次并且尤其在年底对越南处理个别内政问题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在抵达河内期间对越南同志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近年内他们所采取的部分措施带有一些极"左"性质。

说到越南国内状况，中国同志在承认有必要克服大量缺点和错误的同时，认为越南改变对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农业改革方针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中国同志认为，对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让步使得这些分子甚至对人民民主主义制度采取了攻击，毫无疑问，这一点马上被吴庭艳所利用了。1956年底，当帝国主义者加紧反苏和反共宣传后，吴庭艳还十分积极地开展了颠覆活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进攻。据中国同志提供的资料，吴庭艳集团对挑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关注。

有关周恩来与越南同志的会谈情况中国同志向使馆只是概括地进行了通报。但是，使馆不清楚，河内方面究竟是怎样接受中国同志的批评以及其结果又是怎样的。

1956年中国继续给予越南经济援助。虽然其规模比1955年要缩小了一些，但对加强越南经济依然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1955年7月7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双方1956年7月26日签订了两项议定书，对援助的具体性质做出了详细说明。其中一项规定中国向越南提供对其国民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成套设备、轧件、机床、汽车、列车厢、船舶及其他商品。第二份议定书规定中国向越南派遣工业、农业和林业、水利和交通领域的专家。此外还规定

向中国有关企业派遣越南实习生。与此同时，中越还签订了1956年双方供货和结算协议。1956年4月开通了越中空中航线，12月则签订了海运协议。

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消除与越南关系中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对此中国同志，按他们的话说，对中越互相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周恩来在与越南的讲话中指出，在越南的中国专家必须谦虚谨慎，向越南人民学习并对其予以忘我的帮助。在1956年11月22日签订的中越联合公报中强调指出，两国政府在各自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将坚决克服沙文主义性质的错误。在对上述公报进行评论时，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我国人民就更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在于围绕苏联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与团结，保障其相互安全，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独立和互相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加强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各项措施正是基于这些任务出发的。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1956年1—2月，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中国代表团支持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有关建立这些国家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的措施，并于1956年1月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1956年9月，鉴于中共八大举行，欧洲人民民主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其政党领导活动家的带领下全都访问了中国。邀请这些政党领导人赴中国出席中共八大，极大地促进扩大了中共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之间的交往。中国朋友组织安排这些国家代表团成员在华行程，让他们一一了解中国国内状况、个别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1956年12月，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并于次年1月访问了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旨在消除相互关系中个别误会的措施表示了欢迎。鉴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宣言的发表，1956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政府声明中强调指出，这一宣言对纠正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关系中的错误、巩固其之间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朋友在公开讲话中总体上强调指出有必要彻底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一贯遵守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密切关注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内的局势，并对这些国家中及其与苏联和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相应的反应。中国朋友认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应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必须深入研究这些事件并从中作出正确结论。在11月1日的声明中，中国政府指出，不久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整个事件过程对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提出了要求，并强调，这些

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在第一份声明中还未强调匈牙利事件反革命性质的话，那么在第二份声明中，尤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匈牙利事件所作出的这种评价则是十分明确的。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政府对匈牙利工农政府镇压法西斯分子嚣张气势所给予援助的行动，支持Я.卡达尔政府，谴责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干涉匈牙利内政。1956年11月5日的电报中，中国政府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战胜法西斯分子表示了欢迎。鉴于匈牙利出现的经济困难，中国政府决定无偿转给匈牙利工农政府价值3 000万卢布的物质和资金供其支配，以作为对匈牙利人民的友好援助和支持。11月，中国政府向匈牙利发送了1.2万吨大豆和花生，年底又发送了4.4万吨各种食品。

匈牙利法西斯叛乱期间，由于在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匈牙利专家和在中国的匈牙利人民军队演出团成员中弥漫着不健康的反苏情绪，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阐明匈牙利事件的真实含义。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中国同志一开始就强调匈牙利与波兰事件之间的原则区别，指出，匈牙利И.纳吉政府实质上是向反动势力投降，其结果造成反革命分子在10月底和11月初期取得了力量上的优势，而波兰政府和劳动人民则是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拒绝华沙条约组织。在中国期刊上没有刊登有关波兰局势或者针对波兰政府的任何批评文章。《人民日报》将1957年1月苏波谈判及其成果评价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活生生的例子"。波兰领导人更换之后不久，1956年10月，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并要求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转达了一系列友好建议。毛泽东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必须特别重视巩固波苏友谊，目前不提苏军从波兰撤离的问题，巩固党的统一，宽大对待犯了错误的党的老干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鉴于波兰事件和苏波谈判，中国朋友仔细检查了中国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否有违反平等原则的地方，特别重视与波兰贸易的条件和中波轮船公司的工作。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了针对这些国家产生骚乱的原因、苏匈和苏波关系中的问题、匈牙利过去领导人所犯错误的广泛热烈讨论。

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文章和文献上刊登对这些事件的观点之前，党员、干部、大学生、知识分子等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性质发表了各式各样以及时而混乱不清的观点。个别知识分子代表和民主主义活动家提出的看法是，匈牙利出现骚乱责任在苏联、苏军帮助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是毫无依据的，是干涉匈牙利内政。在中国政府就这些事件所阐述的立场的文献上发表之后，其立场马上得到了工人和职员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支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成为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部分人之间对工资增长水平缓慢、粮食商品供应和居住面积保障不足情况的不满情绪的逐渐而公开的流露。

1956年，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继续保持积极的贸易交往。年初，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贸易代表团交流。1956年1月，中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

兰签订了1956年商品贸易及支付协议和议定书,1956年3月则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协议。6月,在波兹南举行的国际交易会期间,中国与波兰组织之间签订了总价4 100万卢布的商品交换协议。此外,1956年7月4日,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了1958年至1962年间长期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1956年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出现了部分缓慢增长,甚至有部分缩小的明显趋势。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扩大与中国贸易很有兴趣。但1956年期间,由于中国出现经济困难,中国经济机构不愿去满足扩大商品贸易规模的建议。比如,1956年初,拉科西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建议将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1956年商品贸易总额提高到3 000万卢布,未来再提高到2亿卢布。中国政府回复道,鉴于国内经济困难,中国无法同意扩大这种贸易。由于这一原因,中方取消了与匈牙利签订长期贸易协议的决议。

1956年上半年,鉴于国内困难局势,阿尔巴尼亚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向阿尔巴尼亚出售20 000吨小麦和玉米的请求,其中6 000吨,阿尔巴尼亚请求于1956年9月发货。中国对外经济组织拒绝了阿尔巴尼亚这一请求,声明道,中国无法出售所请求的粮食数量,因为中国1956年同样遭遇了粮食供应困难。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会谈中对中方组织的这些行动予以了解释与说明。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出现了经济困难,将影响到与兄弟国家经济合作的长期计划的制定。在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经济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强调说,举行的将只是初步的谈判、协商和交换意见。同时周恩来指出,处于经济严重状况的个别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将通过特别方式予以研究,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对外贸易关系的领域。

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年初,中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对建设45个大型企业给予援助的请求。其初步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华将建造一系列热力和水力发电站、合成汽油厂、化工厂、冶金厂、食糖厂等,并对这些企业提供成套设备。然而后来,这些企业则被缩减到14家。相关的总协议没有签订,只是对个别企业签订了合同。1957年上半年,将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关系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1956年中方组织通知东德方面,他们提出要向东德订购价值几百亿卢布的设备。其初步要求是,这些供货将包括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成套设备。但是在以后谈判过程中,中方并未确认自己之前的订购要求,只确定1957年东德对华提供价值1亿卢布的供货量。在此期间,根据之前所签订的贸易协议,反而去重新审议削减供货数量。

与此同时,中方明显减少了对民主德国所供应的一系列粮食商品,尤其是肉类、脂肪、含油作物。中方组织拒绝起先所订购的工业设备以及力求减少向民主德国出售粮食的做法引起了东德方面的不安。根据1957年1月访问中国的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负责人科贝尔的话说,这可能会导致民主德国生产能力供应不足并对给国内取消粮食供应卡带来困难。为此,目前东德对外贸易组织正在设法了解有无可能向中国采购哪怕有时对东德并不需要的新商品品种,只是为了避免减少东德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规模。

科贝尔同时还因中国与民主德国商品贸易规模继续缩小对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发展表示出担心。

中国与1956年底来华的波兰贸易代表团之间举行的谈判未能扩大双方贸易供货。1957年中国与波兰的商品贸易规模增幅极其有限。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1956年经互会会议的结果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该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为其经济新的广泛而有力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向经互会会议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扩大。一年内先后举行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科技合作委员会联合会议，并签订了相关议定书和协议。同时还签订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合作协议。在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就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所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合作协议将得到执行。但指出在早先科技合作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比如，中方有时提出十分大量的订购申请，使得兄弟国家难以履行承诺。周恩来说，必须给科技合作奠定更现实的基础，明确确定中国的需求和能力。

与1955年相比，1956年在华工作的来自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并且保持了继续增长。这从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管理局所提供的下列数据中可以看出：

国　别	专　家　人　数		
	1955年	1955年10月	1956年12月15日
匈牙利	3	61	60
罗马尼亚	4	6	15
波　兰	39	45	59
捷克斯洛伐克	53	57	63
民主德国	33	191	221
保加利亚		—	7
共　计	132	360	425

来自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增加使苏联专家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产生了与其建立至今尚未有任何联系的必要性。我国的专家直到目前依然还是单独工作和生活，与其他国家专家不相往来。

1956年1月，匈牙利政府像苏联一样向中国赠送了一套长途电信设备，并为组建该站工作派遣了自己的专家。建于山东省的新长途电信站被授予了“中匈友谊长途电信”称号。1956年6月，中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整套机器和设备基础上建立了“中捷友谊国家农场”，还有中阿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交往得到了进一步扩大。1956年1—2月期间,中方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分别签订了1956—1957年文化合作协议执行计划。

一年内,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分别开展了社会、专业科学、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以及艺术团体的广泛交流。中国向这些国家派遣的代表团有:赴民主德国的中国律师代表团、赴罗马尼亚的卫生工作者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的煤炭专家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和民主德国的新闻记者代表团(3月份)、赴罗马尼亚的工会代表团(11月份)、赴民主德国(3月份)和阿尔巴尼亚(11月份)的青年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代表团(8月份)和妇女代表团(3月份)等。此外,中国演员团组、文艺演出团和杂技团先后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

1956年,访问中国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工作者代表团(6月份)、德国研究农业和饲养家畜问题科学家代表团,他们分别访问了华北和华东(5月份),以及民主德国培植野生植物代表团、罗马尼亚科学家代表团(11月份)、民主德国教育和记者工作者代表团(12月份)、工会、青年代表团、文艺演出团等。1956年,在中国先后举办了几个电影节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5月份)、保加利亚电影节(9月份)。一年中,中方组织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相互系统地举办了展览会。

1957年,为了节省经费,中方组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之间文化合作方面所需资金和活动次数。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奉行其过去所制定的与南斯拉夫保持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更加密切关系的方针。

中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是以争取进一步接近南斯拉夫、吸引其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为基础的。

直到1956年底,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人,甚至在那些与南斯拉夫之间存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上都未公开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通常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同志只是采取限制阐述对各种问题的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发表与其不相符的自己的言论以及不去过于突出这些分歧。

中国同志的这种克制被南斯拉夫人错误地解释和理解为,如果不是间接支持的话,那么就是对南斯拉夫"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思想的默认。可见,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自己的官方发言中始终赞扬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国"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尤其强调中国与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方式和途径上的"共性"。在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南共联盟代表团团长И.维塞林诺夫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如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无数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维塞林诺夫把自己讲话中的相当部分用来赞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通过工人苏维埃取得社会自治"和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可见,是为了设法向中共证明"南斯拉夫道路"的优越性。

但是，自中国新闻报刊上刊登了兄弟党对1956年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讲话的反应之后，南斯拉夫人开始彻底明白了，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领导人近几次讲话所持的立场对他们来说是远非有利的。因此，南斯拉夫驻华外交官采取一系列步骤，打算对中国同志施加明显压力，促使中国人至少对南斯拉夫人自己提出辩论的问题不公开发表看法(参见大使与王稼祥就其1956年12月11日与波波维奇[1]之间谈话的记录)。在有些情况下，南斯拉夫试图甚至采取类似威胁的手段，声明指出，如果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持批评立场的话，那么这将是"退回到1948年了"，如果这种情况还继续发生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人将会坚持到底"。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质上是对南共联盟领导试图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意义以及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验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给予了回击，如果不是下结论的话，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南斯拉夫人设法从中国朋友那里寻找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支持的企图是徒劳的。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发展朝着好转的方向向前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南斯拉夫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问题、在涉及巩固和平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中国与南斯拉夫同志在处理解决这些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存有一些分歧，但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南斯拉夫新闻报刊一年内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正义要求。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斯拉夫人曾提出要求举行中美更高级别谈判，从本质上说也是支持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立场。

由于1956年2月中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完成，中国与南斯拉夫贸易规模与过去一系列年相比有了很大扩展。

1956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与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判，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关于延长1956年2月17日中南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贸易协定有效期的公报。协议规定，协议双方在进出口中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在1957年间，双方向各自对方提供价值700万英镑的商品，这几乎是超出了1956年水平的3倍。

在谈判期间，南斯拉夫人坚持要进一步地扩大中南贸易，并设法取得中国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但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不够以及必须对其更为迫切需要的领域提供帮助，中方没有接受这些提议。

南斯拉夫人同时还提议建立类似中波公司那样的中南轮船合资公司。但南斯拉夫人的该项建议也未被接受，因而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南斯拉夫人试图把中方拒绝这些建议与铁托近期的讲话联系起来。在扩大与南斯拉夫贸易关系上，中国表现出部分矜持态度，其中另一原因在于，1956年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贸易谈判时，南斯拉夫人拒绝了向中国提供一系列战略性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南斯拉夫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

---

① 波波维奇，时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编注

在贸易谈判的同时,还举行了中南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结果是签署了该委员会章程。

在过去一年内,中国与南斯拉夫之间互相交流的代表团有:青年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军事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此外,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有: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南共中央委员维塞林诺夫(他还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过中共中央八大)率领的南斯拉夫农业代表团、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和艺术活动家代表团。中方访问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有: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杂技演员代表团及其他一些代表团。

1956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中国工艺品展览会取得了很大成功,继在贝尔格莱德展览后,在南斯拉夫其他城市又先后进行了展览,就像中国人民赠送礼物展览一样。

此外,1956年4月,在萨格勒布举行了中国集邮展览,而在贝尔格莱德则举行了中国古代书画和版画展览。

1957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南斯拉夫图片和艺术展览会开幕了。

为庆祝南斯拉夫国庆节——共和国日,在中国20个城市先后举办了南斯拉夫电影周。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两项协议:2月份签的邮政通讯协议和4月份签的关于影片租赁和纪录片相互交换的协议。

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

在对待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南斯拉夫的所有问题上,中共中央全都赞同苏共的路线,这一切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同志与大使多次会谈以及一系列官方声明中都有所反映,证实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赞同苏共中央的立场。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依然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解放进程给予积极支持,降低这些国家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力争消灭侵略集团和扩大整个亚洲“和平区”。如同以往那样,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最大地利用亚洲国家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中国始终一贯地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其视作为这些国家接近中国共同接受的基础,视作为争取巩固其独立的战斗武器。作为一个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中国坚定地提出团结亚洲各国的口号,号召他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其所存在的争议问题,旨在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利用这些矛盾的机会。

在对待侵略集团成员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以及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其他亚洲国家问题上,中国朋友自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手段。根据目前亚洲的具体情况,中立是亚洲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民族解放意志的表现形式,是其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斗争方式,是反抗美国和其他殖民主义列强的方式,中国朋友针对各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目的是从自己一方来促进巩固和发展亚洲国家这种中立地位。

对那些参加美国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国朋友并不公开向他们施加压力,相反,对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因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而遭受的困难还尽量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表明支持他们的愿望。中国以此极力鼓励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倾向,并不断强调他们参与这些

集团是不得人心的。中国朋友的出发点是，对瓦解集团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作为眼前任务，应该设法哪怕甚至去降低亚洲国家在侵略集团中的作用和积极性。

1956年，中国政府极其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政府领导人、著名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个人交往。在这些会面时，尤其是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时，中国同志灵活而多方面地为执行上述任务而努力。周恩来的出访毫无疑问是中国近期最大的外交活动。这次出访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得到了进一步接近，促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在中国代表团所到达的国家，而且在邻近国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向亚洲国家领导人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竭力强调指出，亚洲国家和我们阵营应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冒险和颠覆活动。由于周恩来对亚洲国家的出访，大大抵消了因匈牙利事件而掀起的反苏和反共宣传的效果。

中国同志对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表示了满意。他们指出，各国政府分别为周恩来举行了十分友好的招待会，尤其是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出访期间，亚洲国家人民群众对中国明确地表现了巨大同情，视其为坚决地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和封建主义压迫并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亚洲强国。按照陪同周恩来出访同志的话说，与中国代表团的会晤常常超出了本地当局所拟订举行的框架。

1956年中国政府为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作出了许多努力。中国政府鼓励进行各种代表团之间的交流。积极采取措施以打破对中国贸易禁运和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56年11月，在广州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共展出了1 300多种商品。邀请了亚洲和非洲贸易界3 000多名代表参加。1956年中国与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39.4%，或增加了7.356亿卢布。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贸易规模中亚洲和非洲国家所占比重达到64%。中国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是为了赢得政治成果，在经济问题上经常予以让步。(详情参见使馆195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甚至现在，在中国被迫稍微缩小自己对外贸易总量的情况下，依然规定要扩大与亚洲许多国家的商品贸易规模。

印度。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继续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奉行的对外中立政策。

中国同志认真关切的是，印度人对中国外交和内政能形成更加正确的理解。中国政府多次秘密地向印度通报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周恩来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与尼赫鲁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满信任的意见交换，尤其是他对尼赫鲁阐明了匈牙利事件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印度驻华使馆十分愿意促进对中国社会改造和中国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1956年，印度政府向中国派遣了为期不等的4个阵容十分庞大的代表团，他们专门对这些问题从事研究，如农业合作化与规划、铁路交通工作、中国的五年计划及规划机构。在对印度表示真诚愿望的同时，中国同志向印度人讲述了其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一些不足，这无疑使印度人对中国产生了好感。

1956年，中印之间各种官方、社会、体育、文化和宗教代表团交流开展得十分活跃。印度议会和军事代表团对华进行了访问。

为了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解决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问题。美国人试图利用这一活动，通过其在印度的代理人在印度境内掀起宣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不回西藏的运动。一些印度反动组织和亲美的社会各界在纵容印度政府时参加了这一挑衅运动。周恩来在新德里时提请尼赫鲁关注这些事实，并坚定地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滞留不归的话，一切责任将由印度政府承担。为此，尼赫鲁再次让周恩来确信，印度始终一贯地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当局不允许在自己境内进行敌视中国的活动。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国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政治势力，他们采取公然敌视中国，图谋公开对抗中国的西藏政策并一直在从事有关西藏应该成为独立国家的宣传。

中国竭力扩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1956年中印贸易规模比1955年增长了35.6%，并且增长部分靠的是中方的出口。中国从印度的进口规模缩减了33%。在中国从印度进口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生棉、黄麻和烟叶(按对印度烟草采购量比较，中国与印度烟草主要进口方——英国相差无几)。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为丝绸、纸张、化学品以及大米和工业产品。

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其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中国积极的支持。有关在第11届联大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就是由印度提出的，从而给美国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

印度继续努力扮演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中间人角色。印度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和美国大使尽快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中达成协定。为此，印度谴责了“不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访问美国期间，尼赫鲁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提出了改善美中关系问题。而在自己的讲话中则表示反对“两个中国”原则并强调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解决亚洲的国际问题。

中国朋友欢迎和鼓励印度政府所做的类似行动，同时，在严肃的原则问题(比如匈牙利事件)上或者涉及事关其自身特殊利益的问题上的分歧则持足够的坚定立场，比如，他们不赞同印度提出的有关释放在华服刑的美国间谍的建议。

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利用印度的中立政策和国际威望，以扩大“和平区”。在一系列情况下，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建立与印度更密切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与印度的互相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印度在中国政策中比其他亚洲国家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中国完全考虑到印度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所能起到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竭力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去巩固其与印度的关系，只要存在可能的话，在国际事务中去联合印度一起或者得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通常总能够与印度政府就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达成协定和协议。

鉴于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发展，中印关系具有某些特殊性。1956年9月20日签订了

“关于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王国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议”。这一协议声明，中国与尼泊尔“将拥护和平和友谊”。协议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为出发点。9—10月，尼泊尔首相阿恰里亚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根据尼泊尔人的请求，签订了有关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价值6 000万卢比无偿经济援助的协议。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把尼泊尔视为几乎是印度一部分的印度政界的担心。所以，为缓解印度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反应，中方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中国取消了尼泊尔起先提出与其签订条约的建议，拒绝了向尼泊尔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在加德满都和北京互设中国和尼泊尔永久大使馆的建议。在中国朋友看来，他们最终使得尼赫鲁能比较平静地去看待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缅甸。考虑到缅甸复杂的内政局势和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其的压力，中国政府1956年十分关注支持和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中国朋友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以支持缅甸统治阶层中以拥护缅甸自主独立和外交中立的部分人。为此，中方耐心地处理研究中国与缅甸之间所积累的一系列无法调解的问题(中缅边境、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华侨等，这些问题被反对中缅接近的敌人广泛利用，以便在两国关系中煽起纠纷和散播猜疑)。

1956年中国政府对中缅边境问题表示出不少善意并作出了妥协的准备。(详情参见“关于中缅边境问题谈判”说明资料，发文号934，1956年12月4日。)应该指出，在对边境问题的长期谈判中，吴巴瑞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加剧与缅甸关系的紧张，毫无疑问，这样做只有对那些反对缅甸中立、独立政策以及缅中友谊的敌人是不利的。中国政府甚至在边境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让步。根据1956年11月初周恩来与吴努之间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双方至年底从互相有争议的领土撤走了军队，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旨在向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解释边境协议的重要性。然而，边境问题的调解尚未结束。

吴努率领的缅甸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1956年10—11月)以及周恩来出访缅甸(1956年12月)被中国政府又一次抓住利用，为了打消缅甸统治阶层对中国好像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对缅甸内政干涉问题所存在的担心，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讨论了缅甸国内战争问题。众所周知，反动分子竭力设法阻挠中国和缅甸之间逐年不断发展的合作，广泛利用反缅共宣传来攻击中国政府。如同去年一样，在与吴努和缅甸其他活动家以友好委员会形式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对扩大缅甸民主主义战线和以政治方式解决内部分歧的益处发表了意见。这样看来，中国朋友再一次清楚地让人明白，他们并非是在如何极力利用内部纠纷，相反，而是欢迎缅甸国内局势能保持稳定。

在会谈中，中国同志坚决打消掉了缅甸人的疑心，怀疑中国政府似乎在引导在缅华侨从事反政府活动。在仰光华侨集会上，周恩来彻底打消了这种怀疑，中国政府与华侨反缅活动毫无关系，相反，周恩来呼吁中国公民尽量遵守缅甸的风俗和法律，支持缅甸政府的措施，为避免误会，他拒绝参加缅甸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周恩来这一讲话不仅在缅甸，而且在亚洲拥有几百万华侨的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反响。

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缅甸境内存在着约3 000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缅甸政府声明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国民党分子，事实上是想逃避责任。同时，根据可靠消息来源，缅甸当局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民党并与这些国民党分子保持联系。缅甸人倾向于利用自己境内存在的这些国民党部队来对中国实施一定的压力。中方认为，最好暂时不要去提出这一尖锐问题，不要去揭露缅甸政府的不友好立场。近一年中，两国积极开展各种代表团交往。中国朋友对自己在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久前叶剑英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缅甸的回访。

1956年，双方(首先是中国朋友)为发展中缅经济关系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努力。1956年中国采购的缅甸商品比1955年多了一倍，实际上是对缅甸的积极援助。1956年夏天，签订了有关中国向位于塔曼卡由中国专家援助在建的纺织厂提供设备和原料的合同。12月31日，在仰光还签订了有关扩大中国援助该厂的两个合同。按照这些合同，中国将向缅甸提供相应的设计资料并另外向缅甸派遣技术专家。

柬埔寨和老挝。去年中国为接近柬埔寨和老挝采取了积极步骤。1956年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果是，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发展中柬经济和文化关系协定。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以及周恩来回访柬埔寨的时候，中国朋友对柬埔寨政府所声明的奉行中立政策的意向表示了理解和赞成。中国强调了在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柬埔寨建立关系的愿望。正如中国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柬埔寨当局为周恩来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

为了更大程度上接近柬埔寨，促进削弱其对美国的依赖并鼓励其政策中的中立倾向，中国政府决定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1956年6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无偿提供柬埔寨的援助规模为800万英镑。中国在柬埔寨将建立几个不大的工业企业、医院和水利灌溉设施，还向柬埔寨派遣了中国专家组。

中国政府对在京柬埔寨经济使团给予了事实上的外交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柬埔寨也派遣了经济使团。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领事馆在柬埔寨依然还在工作。虽然柬埔寨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说，他们不承认该领事馆，但同时他们又不赶走国民党代表并允许他们进行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根据日内瓦协定条例促进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国朋友认为，看不到巴特寮具备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任何前景，王国政府与巴特寮势力之间斗争加剧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在他们看来，在苏发努冯亲王和梭发那·富马亲王取得协议之后，老挝的进步力量应该自主、积极地争取国家民主。至于我国对老挝问题的立场，他们应该设法让王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协议，而不是竭力通过各种限制和消灭巴特寮势力方式来寻找巩固自己的阵地。

中国为富马亲王首相率领的老挝代表团来访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鉴于老挝政府正遭受着内外困难，如同与柬埔寨代表团的谈判一样，在与老挝代表团的谈判中未提出有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方表示准备给予老挝经济援助，并且向老挝人表明，向他们提供援

助如同对柬埔寨提供援助一样，将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再者，由于富马担心中老关系与解决老挝统一问题之间有某种联系，所以中国政府建议老挝自己来决定何地、何时和何种代表团进行有关对柬埔寨①提供经济援助的谈判。富马对中国给予经济援助的建议当众表示了感谢。

谈判中，老挝人提出希望周恩来对老挝的访问安排在较晚时间。中国朋友认为，在调解老挝内政之前，老挝政府不想接待中国代表团。于是初步商定，今后两国政府将通过印度保持联系。

老挝代表团对中国的来访有助于老挝政府加深对中国立场正确的理解，也为进一步发展中老关系创造了前提。两国之间所取得的某种接近给那些内外势力制造了障碍。他们试图把王国政府推向拒绝履行富马与苏发努冯之间协议的道路上。

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选举以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取代哈拉哈普内阁之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重新又顺利发展起来。各种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建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著名国务活动家之间的个人交往呈现出一片活跃景象。中国十分重视议会代表团以及一系列其他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访。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来访。中国政府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而热情洋溢的招待会。苏加诺对其中国之行感到十分满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规模、中国人民的政治统一和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内的民主党派合作。

中国同志极为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他们将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原因解释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利用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以分裂其队伍，动摇政府稳定，破坏国家经济独立，阻挠中立和独立外交政策的推行。中国朋友认为，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必要支持由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领导的为维护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力量。中国朋友正是遵循这点，以往在一系列问题上予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各种建议。

与1955年相比，中印贸易规模有了极大增长。1956年11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印贸易协议并将1954年支付协议期间延长了一年。根据贸易协定，每方的供货量应该是1 200万英镑，超出了1953年第一份贸易议定书所确定的贸易总额的4倍。双方谈判中还讨论了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这些问题讨论最终达成了协议，中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印度尼西亚提供部分种类的轻工设备，向印度尼西亚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接受印度尼西亚实习生，以提高他们的技术专长。

从政治设想出发，中国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那些甚至连其本身都十分需要的商品(钢铁制品、棉纱线、铁矿石等)，而向印度尼西亚所采购的商品则多半是印尼感到销售困难的商品(砂糖、可可油、椰子干籽、调味作料等)。其结果是，1956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增长了3倍多，而从印度尼西亚的进口数量则几乎增长了一倍。中国政府在结算问题上也迎合了印

① 原文如此，疑为“老挝”之笔误。——编注

度尼西亚。比如,如果说1965年之前根据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议,印度尼西亚在一旦出现商品贸易债务情况下必须用外汇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根据1956年的贸易协议,这一债务则可以用货物来予以偿还。1956年,遵照自己国家利益,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道,印尼对橡胶贸易限制将不予遵守。这对于对华禁运政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中国政府始终极为担心200万印尼华侨对印尼国内事务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在新闻报刊和中国国务活动家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中国政府呼吁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众所周知,1955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有关双重国籍的条约"。但反动党派(马姆米等人)因试图利用华侨问题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并破坏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而坚持反对这样做,因此,印度尼西亚议会至今未能批准这一条约。

锡兰。自从亲帝国主义的科特拉瓦拉政府选举失败以及班达拉奈克执掌政权后不久,锡兰政府就采取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骤,向中国派遣了以锡兰驻英国最高特使克利斯为首的锡兰代表团。1956年9月14日,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立外交关系和扩大贸易及文化联系的中锡联合公报。至周恩来访问锡兰之后,双方已达成了互派大使的协定。

周恩来在锡兰访问期间,中国同志坚信,锡兰政府和社会各界是希望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锡兰民众,包括农村,处处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的到访。

1956年与锡兰的贸易得到了继续顺利发展。1956年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955年水平的236.7%。1956年12月29日,在科隆坡达成了有关延长中锡贸易协定至1957年底的协议,并且签订了中国向锡兰提供27万吨大米以及锡兰向中国提供5万吨橡胶的合同。中国政府对发展与锡兰的贸易赋予了重要意义。按照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作出了一定的牺牲。比如,从1952年起,中国按照比新加坡橡胶价格高出许多的固定价格支付锡兰所供橡胶。这使得锡兰获得了2亿锡兰卢比的利润。如今按对华进出口业务规模,锡兰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中国在锡兰对外贸易中同样也占据了首要地位。

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同志为扩大文化,尤其是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方面各种华侨组织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使得英国,尤其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主要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当地反动活动家的担心。按照他们的指令,有步骤地展开了反华运动,煽动华侨与马来西亚人进行冲突,追踪和逮捕进步活动家。年底,香港骚乱之后,反动势力发动了特别强大的反华运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中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民众中间上升的威信,使他们无法与中国接近。

中国同志积极利用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出现的经济困难。美国和英国减少了对自然橡胶的采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出购买其橡胶的建议。并声明说,今后还将采购橡胶。这一提议显然对在该地区工商界留下良好印象是有利的。在他们的压力下,1956年6月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声明说,他们对橡胶贸易禁运的限制将不予遵守,并将鼓励旨在扩大"法律框架内"的对华贸易的各种努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商

界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作为该代表团顾问，前新加坡首席部长 Д.马歇尔随团抵达。该代表团 82 名成员中有些是著名的商业界代表。在抵达中国之前，马歇尔在东京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道，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会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孤立"中国对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朋友极为重视马歇尔和全体代表团。与代表团的谈判是以签订一大笔交易而顺利告终，可更重要的是，此举是理顺中国与该地区的商业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谈判中也显露出许多阻碍与该地区商业往来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制定的限制以及英国人的反对所造成的。

中国同志极其重视与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关系。正如以上所述，中国对巴基斯坦(以及泰国和菲律宾)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和脱离侵略集团。

去年，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来华访问，而周恩来又访问了巴基斯坦。众所周知，为苏拉瓦底的来访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期间双方仔细研究了中巴关系各个方面。鉴于巴基斯坦内政外交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国内对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存在着不满，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对改善与中国关系抱着一定的期望。

两国总理的互访以及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其他合作形式对巴基斯坦领导人来说十分有必要，这样能展示巴基斯坦外交联系的广泛，证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不是只限于参加集团和完全服从美国统治。并且，正如朋友们所指出的那样，苏拉瓦底想亲自去中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和巩固自身在国内的地位。

中国同志对苏拉瓦底予以了某种礼仪接待，也就是说，表示了自己愿千方百计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与苏拉瓦底会谈时，中国领导人竭力阐明，面向美国将导致巴基斯坦孤立，并且将使其与亚洲其他国家所隔绝，如遵循这一方针的话，巴基斯坦将无法解决自己的内外政治问题，无法克服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并由此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中国领导人还强调指出，巴基斯坦奉行的中立政策更为完全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中国朋友认为，苏拉瓦底来华访问和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回访毫无疑问对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和民众产生了有益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总是嫉妒地注视着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巴基斯坦领导人始终特别密切关注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虽然中国同志认为，最好的方案是保留克什米尔的地位，但认为还是最好不公开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巴基斯坦出访期间，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国人民相信，巴基斯坦和印度兄弟民族能够通过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这一立场总体上无论对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都能愉快地接受。由于知道中国与印度关系十分友好，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在他们之间有争议问题上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的做法十分赞赏。

由于中国的努力，1956 年与巴基斯坦的文化联系得到了顺利发展。建立了中巴友好协会。加强了各类代表团、展览会等的交流。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关系得到了一些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从巴基斯坦的进口却大大减少了。中国外贸组织 1956 年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购买棉花和黄麻的几个合同。众所周知，棉花和黄麻约占巴基斯坦整个出口的 80%。

中国同志考虑到，由于美国人对其出口实行反倾销，巴基斯坦棉花和黄麻销量减少对这个国家经济产生了痛苦的影响。中国外贸组织与巴基斯坦还签订了提供42.5万吨煤炭、出售6万吨大米、赠送1000吨大米的合同。大米和煤炭在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93.2%。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拥有多余的大米和煤炭。显然，中国同志借这些协议所特别追求的是政治目的。应该指出，为了不想引起印度和缅甸的不满，中国拒绝低于国际价格向巴基斯坦销售大米，并建议赠送一定数量的大米，以避免其价格下降到巴基斯坦所期望的水平。

总体上说，在积极评价过去一年里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时，中国同志认为，巴基斯坦还将长期追随侵略集团，但是他们打算今后耐心地向巴基斯坦就其在国际事务中适宜奉行中立政策进行解释工作。

在泰国，1956年与中国接近的社会情绪在不断上升。它与泰国国内经济困难状况以及民间对亲美外交愈加不满有着关联。正如中国朋友所指出的，近几个月，泰国报刊上，在发表对中国攻击言论的同时，开始第一次出现了赞同的言论。

中国同志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泰国人对中国的担心，并促使泰国统治阶层寻求与中国建立联系。1956年泰国代表团对中国的一次秘密访问和一系列公开访问，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代表团的成员请求中国购买泰国多余的大米和橡胶。中国同志不仅同意购买泰国人的大米和橡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贷款。泰国与中国不断接近的倾向使美国人感到担心。他们对泰国政府实施了强大压力，一时影响了中国与泰国联系的发展。

不断加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反而迫使泰国人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联系。无论是銮披汶总理，还是泰国许多著名活动家，数次发表公开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与中国朋友建立联系的只是那些指望在对华贸易中发财的个别集团的代表。中方设法让泰国政府本身参与贸易关系的建立，以便能使中泰贸易公开进行。

早在1956年6月底，泰国政府就予以声明，取消有关禁止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战略意义商品的贸易，并且泰国政府将支持扩大“在遵守法律框架内”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努力。泰国新闻报刊对此表示疑惑不解，为什么泰国要反对对华通商，而一系列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全都在对华进行贸易，并且作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大发横财。鉴于1957年2月的选举，对华通商问题在各党派宣传竞选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切迫使泰国政府为了建立对华直接贸易关系而采取新的步骤。1957年初，在泰国政府亲允下，泰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与中国外贸机构进行了扩大两国贸易的谈判。

中国同志对菲律宾国内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多次指出，去年菲律宾反美情绪有了一定增强，尤其是针对美国基地的无数次集会具有重大意义。

菲律宾国内听到要求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呼声愈加频繁了。菲律宾商会董事会成员曼多查于1956年7月声明道，菲律宾商会正在研究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他还声称说，菲律宾议会一系列议员和工商界赞成对华发展贸易，在这方面“菲律宾拥有极其重要的利益”。但菲律宾政府却依旧反对与中国建立联系。所以，目前中国与菲律宾的联系尚不很多。更何

况，中国同志把建立对华联系的集会认定是一种积极的征兆，是菲律宾改变其对华立场可能性的一种迹象。

四、中国与近中东国家

去年，中国在对近中东国家关系上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这种突破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政府主动而十分灵活地利用所开创的条件与阿拉伯国家接近，促进加强各民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的团结，建立广泛的反殖民主义战线。

中国领导机构始终明白这一地区的特点。考虑到这一地区一系列国家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还十分强烈，他们竭力设法与这些国家建立作为建立外交关系基础的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以此来削弱这种依赖。

1956 年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一系列非洲国家中也都出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能够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倾向。

尤其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以及对埃及侵略战争期间，中国在这一地区国家中的威望得到了上升。中国发表的有关坚决要求停止侵略以及准备向埃及派遣志愿者的讲话对阿拉伯国家社会舆论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一年中，中国同志积极地从事发展与埃及的全面关系。各种代表团交流活跃，建立了中埃友好协会，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以及支付协定和中埃贸易协议次年供货执行议定书。为了加强与埃及的关系，使其进一步脱离西方列强，中国人竭力为解决埃及经济困难给予了有力帮助。中国向埃及提供了价值 2 000 万瑞士法郎的贷款。中国外贸机构与埃及 300 多家公司和企业建立了贸易联系。1956 年中国继续向埃及大量购买棉花。从埃及的进口数量总体上保持了 1955 年的大致水平。中国对埃及的出口增长了好几倍。中国向埃及提供了钢铁轧材、织布机和精纺机等。

中国竭力利用自己与埃及不断增强的关系来建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许多前往埃及的中国代表团也都到过其邻近国家。中国政府为加深和扩大中国与近中东其他国家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同样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与叙利亚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与黎巴嫩签订了贸易协议（为此黎巴嫩专门成立了中国贸易办事处），与苏丹达成了互换贸易代表的协定。中国还致力于与其他非洲国家——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联系，尽管这些国家对中国表示了很大兴趣，但由于其与美国的从属关系，他们迟迟不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良好。对两国合作关系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活动是，为纪念阿富汗独立日，中国出席了工业展览会，双方艺术家代表团进行了交流，以及喀布尔市长访华。1956 年底至 1957 年初，阿富汗代表团抵达北京，考察两国贸易发展条件以及准备政府间贸易和支付协议。但是，为促进两国经济联系发展必须进一步谈判。1957 年 1 月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

五、中日关系

1956 年中国政府对开展对日关系一直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竭力促使其脱离美国并增强其中立国倾向。这一政策既符合维护远东和平、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又符合国际社会孤

立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因为对蒋介石而言与日本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朋友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努力最终会取得一定的显著结果。

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在日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其原因在于,首先,日本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兴趣上升首先与战后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相关。与过去年代情况不同,那时几乎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代表主张扩大与中国经济联系,如今对日中贸易开始产生部分兴趣的则是大财团。其次,缺少对像中国那样亚洲大国的正常关系,对活跃日本亚洲外交来说是某种障碍。其三,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日中关系能够大大加强其为减少对美国的依附所开展的斗争。

在中国同志看来,恢复苏日关系以及随后日本加入联合国,将是日本向推行更加自主外交道路过渡的重要阶段,并且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况且,根据中国人掌握的情报,日本统治阶层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日本如今是联合国成员了,就没有必要去认真在意蒋介石集团了。

在实施对日外交任务中,中国政府一如既往以这种方式去构筑自己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美矛盾和该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如同以往年代中那样,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吸引日本社会各阶层投向自己,并通过他们对日本政府予以施压。两国社会政治、工会、体育和其他组织和活动家之间联系依然得到了各种发展。按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数量看,日本依然占据着首位。据报刊报道,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日本各种团组有60个。整个一年来,有2 000多日本人到过中国。其中不乏大量的日本大财团代表以及有时是极其反动的右翼集团活动家。

利用日本人对发展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兴趣,中国朋友十分巧妙地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各阶层代表拥护改善对华关系,反对美国对日中贸易的限制政策。

1956年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52.5%,达到5.08亿卢布。美国实行的对华贸易禁运促使中国朋友为更加扩大与日本的贸易联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而没有考虑中国实际的进出口能力。

1956年5月,正如使馆上半年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相关组织延长了1955年“第三次”中日协定和捕鱼问题协议。1956年底,在中国第一次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展览会上中国设法使一系列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得以展出。中国同志尽量设法在展览会准备期间与日本尽可能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展览会使更多的日本资本家认识到发展日中贸易是适宜的,并使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中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机构对日本进行了系统性的宣传。在新闻报刊、广播中,如同在中国领导活动家声明中的那样,坚定地贯彻有必要改善中日关系的思想,并以各种方式指出,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是中日实行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强调两国之间已经确立实际关系的意义以及对日本政府所遭受的困难表示理解的同时,中国人说,为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本阶段双方,正如周恩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声明的那样,“应该采取过渡性质的措施”。

1956年对在华日本战俘问题进行了审理。1 062人中只有45人被送交了法庭。他们中

没有一人被判处最高惩罚。其余1 017名罪犯全都被释放并遣返回日本。这一措施在日本引起了对中国良好的反响，打破了不久前日本所发表的一个主要提纲中的敌视宣传。由于对日本人进行了教育工作，使得他们从中国返回日本后就再也没有从事任何反华运动。况且，中国朋友还寄希望于其中一部分人在日本会从事有利于中国的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各界代表更加坚定地拥护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1956年春，周恩来通过印度政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事隔不久，中国同志又再次表达了类似姿态。中国同志十分清楚，日本政府尚未准备好与中国开始直接谈判，因而经常设法利用这种手段向日本统治阶层施压。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自民党领导的更替评价良好。从这些变化来看，他们在期待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首先发展两国经济关系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比如，我们的朋友认为，1957年日本政府可能会同意"民间的"(非政府的)贸易办事处进行互换交流，并且签订中国与日本银行间的结算协定。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是公开敌视的。美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权利，继续对台湾实施自己一整套侵略活动，对赞成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政策的国家予以强大施压。这种政策迫使美国统治阶层竭力对华继续实施"强权立场"政策，希冀阻挠中国国际威信的提高及其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竞选运动前以及1956年期间因匈牙利事件而大肆喧嚣时，美国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反共宣传，但在美国反对不承认和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绪逐渐也有了增强。这首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信提高，中国多方面的努力以及经济地位的加强是密切相关的。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系在美国工商界引起了一定担心，为了不放弃有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利用中国市场的机会，他们开始考虑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的问题。由于来自日本、英国、西德和其他国家对缓解对华贸易限制的要求不断增强，这种倾向开始变得愈加明显了。在美国开始更加频繁地发出"承认"中国的阵阵声音，批评美国对华非现实主义政策，虽然这种批评声还是很克制的。

1956年底，美国一部分新闻报刊对中国的言论调子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对中国敌视的强烈言论开始少了。美国政治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兴趣开始上升。然而，中国同志并不期待近2—3年内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实质性改变。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中国同志看来，只有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才有可能。

中国政府与以往一样对美国"不承认"政策不抱任何担心。他们经常说，可以等待10年。他们认为，甚至可从美国这一政策中为自己获取一定利益。美国人目前的立场使得中国能更自由、更广泛地揭露美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本质，更积极地主张团结这些国家民族去争取其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在中国同志看来，目前在中国没有美国代表(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没有派代表)，将使中国有可能比较安静地去处理自己的问题，而美国一旦承认中国，其余国家的代表就会接踵而至。

为了对美国施压,中国政府继续有系统地、主动地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提出倡议,以此揭露美国统治阶层不想接受中国建议的愿望。在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中美大使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不止一次地提议举行双方外长会议,希望能促进解决所存在的争议问题,其中包括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等问题。中国政府允许大批美国记者代表团进入中国。美国国会禁止美国记者以及美国文化活动家("艾弗里曼歌剧"演出团等)受邀访华的做法甚至遭到了美国反动报界很大一部分人的谴责。中国同志的这些成功手段给美国会造成了不小麻烦,使得其在对华问题上的政策愈加被动而不受欢迎。

根据战术设想,1956 年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要求,认为在目前问题暂时还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情况下,这些行动甚至可能会给作为大国的中国威信带来损害。中国朋友更倾向让其他国家出来支持尽快准许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对印度所提出的有关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问题列入联大第十一次会议日程议案进行讨论,并在联大全会对该议案予以表决,这一切证明,1956 年大多数国家是公开表示反对美国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无论美国如何粗暴施压,有 24 个代表团对美国取消印度提议在联大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问题的决议投了反对票。

无论美国怎样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恢复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合法权利,1956 年中国的对外联系得到了继续发展。中国代表参与了 50 多个有关社会和科学问题的各种非政府国际大会、研讨会、会议的工作。中国坚定地反对美国建立"两个中国"的企图,拒绝参加有邀请蒋介石代表出席的各种组织和研讨会(哪怕就是把他们称为台湾岛地方代表的情况下)。

1956 年期间,中美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在设法拖延谈判,竭力设法利用其达到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保留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的目的,从而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其合法占领台湾事实并以此继续加剧在亚洲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了这些目的,美国继续坚持首先解决"集体或者独立自卫权法"和在台湾地区"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但是,在几乎 10 个月(从 1955 年 9 月至 1956 年 7 月)期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尽量掌握主动和取得突破,在 1956 年下半年中方提议讨论取消禁运和发展中美人民交往和文化交流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当提出在谈判中讨论禁运问题时,中国竭力设法利用美国毫不妥协的立场,旨在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即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建议的做法以及四面八方发出的对华通商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同志明白,如果取消禁运问题得到积极解决的话,中国将会处于困境,因为中国不具备进行广泛贸易所需的足够外汇储备,缺乏出口能力。

1956 年期间,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有关开展谈判的声明,从中揭露了美国企图无期限地拖延谈判、继续保持台湾地区和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在有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多次警告美国,造成目前谈判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继续持鲜明的敌视态度,甚至整个地把

美国作为侵略国家。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并未取消以往所奉行的反美方针。

使馆认为，中共和中国政府让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政治动员状态中，为此不仅利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行动，而且利用了凡是表现美国人奉行侵略政策的所有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如同往年那样，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主要而关键的问题。在继续实际占领台湾时，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了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1956 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价值 3 370 万美元的工业设备。为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提供了价值 6 000 万—7 000 万美元的设备。除了这些所谓的“经济援助”之外，美国每年还向蒋介石分子提供总额约 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956 年期间，在美国军事顾问领导和监督下，继续进行以喷气式飞机更新老式飞机，加强防空导弹体系，增加海军数量。1956 年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台湾完成了各种军事设施的装备，其中包括在台湾、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沿岸工事和“防御”设施建设。1957 年初，美国宣布在台湾建设新的“超现代”机场，其建设成本估计在 2 500 万美元，并且还向蒋介石分子转让了遥控炸弹发射装置。驻岛美国军事顾问团从 1955 年的约 1 700 名增加到 1965 年底的2 600—2 800 名。他们的活动分散到了包括营连级单位。1956 年期间，来台湾访问的大量美国高级军事和文职官员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包括尼克松、杜勒斯、雷德福、饶伯森等。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以及在美国人压力下国民党分子所进行的大量“改革”，岛上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80%以上的预算经费花费在供养 53 万军队和准备“反攻大陆”上面。台北报纸《征信新闻》1956 年 10 月 31 日谈到台湾经济，尤其是财政所面临的困难时，这样写道：在长达 7 年期间，无法做到平衡预算，每年约有 8 000 万美元的对外贸易赤字。台湾商品昂贵的成本使其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无论蒋介石分子如何努力防止通货膨胀，截至 1956 年底，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比 1949 年还是增加了 58 倍。通货膨胀的威胁引起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其他复杂情况。

众所周知，中国宣布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和平解放方针。很显然，从一方面来看，这一方针有利于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更长的和平喘息机会，从而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期间，国家能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可使中国朋友拥有广泛的政治手腕以及影响国民党分子、台湾所有民众和世界社会舆论的良好机会。

1956 年中国政府不止一次向国民党分子发出赞同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吁。在中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讲话中，周恩来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讨论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的愿望，并表示期望，“只要台湾当局一旦寻找到对自己合适和方便的时候，可派自己的代表前往北京或者其他合适地点”，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向台湾的国民党活动家发出呼吁，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加深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分裂，激励为和平解放台湾事业的爱国力量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引起国民党和美国人之间的猜疑和摩擦。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还考虑到，美国人竭力想摆脱一部分有损于自己利益并令其不快的国民党活动家以及国民党集团不同派系之间在台湾无休无止的纷争。

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周恩来1957年底至1957年初出访亚洲国家的时候。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周恩来特别指出，北京考虑到蒋介石返回大陆以及向他提供在中国政府中显赫地位的机会。中国同志当然明白，和平解放台湾的条件至今尚未成熟，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无论是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情绪，还是对美国，都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为了对国民党分子各阶层施加影响，中国同志在对台宣传广播中利用前国民党活动家(张治中、翁文灏等)发出和平统一呼吁。尤其在庆祝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这项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比如，被邀请到大陆参加庆祝活动的邵力子就发表了广播讲话。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报刊界往年经常刊登激烈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和漫画，那么1956年期间，这种文章和言论就已经相当少了。宣传中主要关注美国人在台湾作威作福(其中包括其试图清除令美国不快的人)、经济困难和台湾民众沉重的生活条件。在向国民党分子和台湾民众发表讲话时，中国朋友很少把台湾与全国人民分割开来，而更多的是强调所有华人都是爱国者的必要性。中国同志指出，他们对台湾人士的宽容政策开始收到了良好效果，他们已经拥有了与这些人建立联系的某些经验。

在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基本方针的同时，中国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尤其在1956年2月，完成了连接厦门与浙江、江苏的战略铁路建设，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沿海战线与内地的联系。

七、中国与英国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互相关系

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发展，主要是在贸易和文化联系方面。但是西欧和美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1956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寻求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上态度并未表现得十分坚决。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出这种意思，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哪个国家歧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多半只会给这些国家本身造成损失。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并非坚持等待和消极的立场。中国意识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无力违背美国统治阶层的意志，立刻改变对中国的外交方针，所以中国政府摆出不少条件，旨在利用英国、法国、西德和西方其他国家工商界对华通商的利益关系来影响这些国家政府去重新审视贸易限制政策和扩大对华经济与文化联系。

1956年5月，根据东南亚各国总理倡议所举行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取消对华贸易限制等问题。在反映英国工商界因对华通商限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情绪以及对如日本和西德其他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的担忧时，英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重新审视被禁止对华贸易的商品名单以及更大限度地利用对华通商中的“例外程序”问题。在英国和英联邦个别国家提出之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局部改变了其对“禁运政策”的处理态度。

西德工商界对发展对华经济联系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向中国派遣了不少本国代表，比如，国会议员施万(与克虏伯有联系)前来中国与中国外贸组织进行关于对华提供巨大数量

设备的谈判。可以期待，随着1957年西德代表团的到来，这些谈判将会继续下去。至今与西德之间开展贸易还是通过非政府渠道进行的。1957年2月26日，在西德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的声明中提到，西德不打算与中国签订政治或者贸易协议，或者与其进行谈判，直到"中国共产党不再固守不符合国际准则的行动"为止。对此有充分理由可以初步认定，近期西德政府不可能去迎合西德商业界和政治活动家不断提出的有关与中国建立永久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要求。

法国商业界也出现了对华通商兴趣的增长。尤其证明其事实的有，1956年初，由罗塞罗议员率领的法国贸易代表团一行28人抵达中国。中国参加了1956年巴黎博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展馆的参观人数超过了80万人。中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在博览会期间签订了300万英镑的合同。总体上，中法贸易规模与1955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在双方贸易合作顺利发展以及法国社会各界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法国政府领导人，其中包括比诺，应该会发表与中国建立永久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声明，并向北京派遣代表团，举行有关贸易和进一步改善中法关系的谈判。

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工商界代表团分别有来自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代表对荷兰、丹麦、芬兰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出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互惠合同。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贸总额增长了29%。对法贸易额取得了很大增长，达到56.7%，对西德贸易达到49.5%，对意大利贸易达到93.9%，对比利时贸易达到70.9%，对瑞士贸易达到44.1%。与英国的贸易额只增长了6%。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占据首位的依然还是香港(与澳门相加为7.7亿卢布，其中6.73亿卢布基本上是中国商品出口)，1956年位居第二的是日本达到5.08亿卢布，英国退居至第三，为4.436亿卢布。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非一直局限于商品贸易额指标上。比方说，中国政府善于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极其广泛的商业界感到对华通商前景的兴趣。这一点并非不重要，他们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胜利。至于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前景，中国现在拥有的进出口条件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今后将不得不稍微减少，或者无论如何暂时不会扩大与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之间的贸易规模。

1956年期间，中国组织对发展中国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贸易关系的条件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但是目前中国同志却说，近期内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前景不会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国提出的主要都是农产品，向中国所能购买的东西也不多。并且从大洋彼岸运输商品的附加开支将导致其成本巨大地上涨。事实上，1956年期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没有取得多大的突破。唯一能指出的是，与1955年相比，中国与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规模却是缩小了。

在建立和扩大文化和科技合作联系上以及与西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非政府和社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上，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年，访问中国的分别有：巴西、比利时和英国议会团，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活动家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同样也长时间地去了西欧、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代表

团出访智利、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受到了这些国家的热情接待。但是，中国同志却没能让这个代表团实现访问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一些美洲国家的计划。中国代表团领导人、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楚图南在与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说，对中国代表团予以善意接待的不仅有上述南美洲四国民众，而且有其官方组织，但后者则常常避免出现官方仪式，担心由此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中国代表团在南美国家成功地建立起许多有益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报界广泛报道了代表团的出访及其成员对这些国家的印象。

有关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组织发展联系的报道，有以下方面：一年来，来自43个国家的590名工会代表团成员分别到过中国。过去的一年中，中国76名学者分别出席了在13个国家，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等国所举办的15个国际会议。同时来自19个国家(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约200名学者分别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许多资产阶级活动家回国之后都表示支持与中国接近。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澳大利亚宗教代表团领导人莫埃尔在悉尼教堂讲台上的讲话，他对中国人民六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激动人心的评价，并揭露了有关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的谎言；巴西议员维拉斯科发表的声明把议员代表团中国之行评价成中国与巴西之间"为实现关系所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却还是唯命是从地跟随美国，继续无视强烈改变对华关系的要求。以休斯曼率领的比利时议会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同志说，比利时过于依赖美国，所以很难估计什么时候比利时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景时，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在与我们的会谈中指出，近期很难期待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希腊和奥地利方面来说，中国朋友认为，情况会有一些例外。希腊和英国之间矛盾因塞浦路斯问题而变得尖锐起来，中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会促进中国与希腊建立关系。奥地利所持的中立立场也为奥地利在相对不远的将来寄希望承认中国提供了依据。所以，中国朋友十分细心地对待与希腊和奥地利建立联系的机会。

中国继续与西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文化联系。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上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6—7月份，以芬兰议会主席苏克舍拉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在中国报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赞成芬兰所奉行的和平与中立政策，逐年不断牢固的中芬友好关系可以成为中国与各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

1956年，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依旧还是具有"半外交"关系的性质。造成与这些国家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的主要路障依然是英国和荷兰政府不愿放弃支持美国在制造"两个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

英国与中国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朋友经常大量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争取这些国家脱离美国。对此，毛泽东在与大使会谈中曾多次讲到。如往年那样，在对英关系上，中国政府力求取得能够接近和关系逐渐正常化，但基于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英国需重新审视自己对上述根本问

题的观点，拒绝对华歧视和通商禁运的政策。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主动提议采取了如以上所述的一部分步骤，旨在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扩大对华销售商品名单以及还采取了一些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其他措施。有关开通广州与九龙之间直达铁路的谈判已开始启动。双方同时还就设立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使办公室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是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谈判暂时尚未取得任何结果，总体上说，在中英互相关系的基本问题上英国并未表现出改变自己本质上反华立场的愿望。

从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中国坚决地表示支持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英国重新压缩了向中国出口商品名单。促使关系恶化的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挑唆的1956年10月在香港发生的寻衅闹事。香港事件开始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与英国临时代办会谈中向英国当局断然提出了警告，要求英国当局对拖延制止闹事和惩罚肇事者采取一切所需要的措施。在中国的压力下，香港当局不得不逮捕几百个10月在香港闹事的参与者，同时还声明准备审理闹事期间受害者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1957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由香港英国当局当年1月1日所公布的有关香港闹事报告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中国再次谴责了英国政府纵容国民党特务机构以及英国当局试图逃避对出现闹事所应承担的责任。声明中还要求保障在港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朋友认为，中英目前无法调解的关系将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显然，英国在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问题上依旧继续支持美国，竭力在某些对其重要的问题上从美国那里得到所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样也不接受与英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因为目前的正式关系形式在政治关系上赋予其一定优势，为对英国人施压、揭露英国政府政策提供了更多机会。

第三部分　使馆内务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1956年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对各类在华苏联机构以及全体出差来华的工作人员经常提出任务，要求尽力扩大和加强苏中多方面合作友好关系。特别在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之后，使馆多次研究了苏方对苏中协议及合同的义务履行情况，并就所规定的义务履行以及个别协议修改意见向中央提交了设想和建议。

同往年一样，使馆关注苏联各部门和机构对协议和合同义务的执行情况，并采取措施以消除这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是，使馆始终关注苏联专家的活动，注意提高其工作质量，削减那些今后不再需要来华的专家人数。为消除各种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友好事业不利的障碍，使馆十分关注研究中国各界对苏态度，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措施建议。1956年，领导和监督在华苏联机构工作的问题占据了使馆工作很大位置。在华苏联机构包括外经总局办事处及其各分部、贸易办事处及其各分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组、各领事馆、学校等，总共有88家。这一数字本身就已经让使馆警觉地感到，有必要对这些机构今后保存下去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自苏联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之后，这一问题便显得更加尖锐了，根据宣言要求，使馆与党委一起对每个机构的工作进行了评析。

针对在华苏联机构数量过多以及人员编制太大的情况,使馆认为这既不符合政治观点,也没有实际必要。使馆对缩减在华苏联机构数量提出了建议。目前一部分领事馆已经关闭,取消了驻天津和广州的贸易办事处分部,精简了苏联新闻局分部、亚洲各国工会局办事处,将苏联红十字医院转给中国政府管理。从1957年7月1日起,将精简电影出口公司分部。有关取消驻大连海事处问题将稍晚些时候予以解决。

1956年全年,在华工作的有2 300—2 400名苏联专家,他们分别合并成由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的团体和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直接领导的科学文化团体。使馆对这个与成千上万中国人有着直接联系的庞大的苏联人团体的工作情况予以了时时关注。

与往年那样,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继续提供了重要的各方面援助,他们的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国党政领导机构和普通员工的高度评价。但是最近中国朋友在对待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他们对个别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水平开始提出批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抱怨专家表现不够积极,并对建议或讲座的质量提出意见。公道地讲,中国朋友的不满在于,来华的专家常常是那些他们不需要的职业和专业。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事实情况,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曾不止一次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过去的一年里,使馆对经济小组专家工作做得更多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56年8月3日通过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决议明确了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序。

1956年,经济部门顾问的工作是在与中国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展开的。正如以上所述,积极援助建设的项目数量从145个增加到了211个,配套供货规模与去年相比几乎增长了1.5倍,部分申请及合同的技术援助规模也得到了显著扩大。一年来,在华苏联专家的人员结构因顾问人数急剧裁减而发生了变化,以下数据对此予以了证明:

	截至1956年1月1日	**截至1957年1月1日**
专家总人数	1 745	2 025
根据211建设项目	853	822
根据个别项目和特种援助	546	1 082
咨询专家(顾问)	316	121

在每周的部门小组领导会议上以及针对各类问题举行的专门会议上,经常对专家活动和技术援助实施进程问题予以讨论,这类会议既由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召集,也由专家小组本身内部举行。1956年组建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及其部门下属的技术委员会成为了对专家活动进行领导的新的方式。顾问机构在基本任务上为专家组指明了必须为之努力完成的正确方向。但是机构工作人员尚未十分深入地投身于许多专家组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边区工作上,对其活动监管薄弱,在研究、总结和推广苏联专家对中国干部技术援助工作经验上做得不够。

去年,在研究各种跨部门问题上,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改善了对协调个别部门专家活动的

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转交中国上级领导的极其重要的经济提议方案。然而，仍然还存在着一些情况，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对中国具体情况研究依然不够，或者说与其他领域专家之间缺少应有的合作。另外出现了一种情况，在专家建议及其言论中，对朋友不该用不妥当的批评口气。顾问机构向外经总局和部门系统地汇报了已被查明的有关设备制造质量不好的事实，包括设计文件中存在缺陷以及货物包装和运输中的缺点问题。多次向中央汇报了有关苏方对华技术援助义务履行的情况，并对消除被查明缺点提出了建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苏联组织履行合同和其他义务中的不足并未及时作出反应，缺乏应有的果断和敏锐。在向中央提出这些问题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甚至也不向使馆领导通报这些情况。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部分专家处理问题中的狭隘集体立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它与各部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有着密切联系。

在使馆讨论顾问专家报告以及与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个别部门专家之间日常联系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必须建立我国专家与其工作所在的中国相关机构人员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在执行所提出的建议方案时，决不允许干涉中国机构内政以及对中国工作人员施加压力。自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后，使馆与党委对此作了大量解释工作。在使馆业务会议上和各专家组的党员大会上，对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进行了讨论。

使馆由一名参赞、三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二等秘书负责中国科学、文化和卫生专家组的工作。截至1957年1月1日，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人数总共是414名，他们分别在中国19个城市的100多家教学机关和组织中工作。

科学和文化组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日常组织工作，维持与中国相关组织的联系，看望苏联专家所工作的教学机关单位，外出走访几个集中了我国更多教师人员的城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武汉、西安、南京等)。

专家组每月举行两次高级顾问专家会议，会上主要讨论各个顾问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专家们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建议方案。

在了解掌握专家组工作的基本情况时，使馆领导人注意到，在高级顾问会议上，过分关注了来自中国科学、文化和学术机构的批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讨论苏联专家本身在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及其工作的实际成果上。在负责科学和文化组的外交人员身上，也曾有类似不正常的情况，如今这一缺点正在改正。在高级顾问的工作会议中，使馆同样指出了经济合作顾问身上所存在的类似错误。

近2—3年内，科学和文化组专家及苏联教师在工作中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高等与中等学校的组织问题，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改革，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制定等。在中国朋友对这些问题坚持不懈的关注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教学系统如今基本上已形成，高校内部组织工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为此，目前，我们让全体苏联教师组主要去关注对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开展高校科研工作，加强对高级顾问专家讲座质量的监督。

根据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使馆在其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有必要大大削减苏联专家人数，尤其是在中国中央机构的顾问人数。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支持，并提

交给中国领导组织研究。据使馆所知,中国朋友原则上同意削减在各部的苏联顾问人数,但不希望因此而搞成一种运动,近期内,将逐渐把顾问人数降到最低限度。有关削减从事技术援助的专家人数问题,中国朋友认为,近期内,大量削减这部分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还十分需要我们的专家。同样技术学科的教师人数也不会大量削减。至于社会经济学科、其他人文学科的教师和俄语教师,中国朋友则同意我们的立场。在1957年度的申请计划中,几乎不再对这些领域的专家和教师提出任何需求了。

考虑到1957年度科学与文化组成员中技术学科教师的比例将占多数,使馆建议将科学与文化组与经济领域工作的专家组合并起来。1957年3月报送中央的这些建议正在研究之中。

有关科学与文化组专家工作情况将在单独呈报中央的报告中予以更详细的阐述。

1956年,在北京的苏联红十字医院进行了大量工作。医院实际上就是一家主要的医疗机构,除了治疗工作之外,还安排来自国内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的专业进修。在医院工作的苏联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每年平均达到45—50名。我国医生在中国医生专业进修班上主要进行教学工作。1956年医院门诊部共接待了约12万病人就医,在住院部进行治疗的共有2 880名病人。在我国专家的指导下,我国医生,还有中国医生,一共进行了4 596例手术,大多数情况下手术做得是成功的。医院还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组织了两次学术会议,举办了约90场报告会。两次会议的报告全都印刷出版了,并被列为中国和我国医生的教学资料。

由于医院在北京已经开业约5年时间,其今后的存在似乎已经不再必要,于是使馆便提议将其转交中国组织进行管理。2月12日举行了隆重的医院转交仪式。出席仪式的周恩来和彭真对五年来医院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联大使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对赴华出差苏联人员进行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56年底,使馆党组织合并了35个基层党组织,其中党员人数共计2 206名(包括57名预备党员)。在各基层党组织中,共有42个车间党组织和100个党小组。

在过去的一年中,作为统一党组织的党委会和基层各党总支,其各自活动主要是执行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1955年)的决议,年底时,则关注实现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的要求。

为了改善在华苏联机构的工作,使馆和领事馆基层党组织、贸易办事处及其分部、外经总局办事处以及在华各地生产部门的苏联专家组,其他苏联团体(科学与文化工作组、医院、学校等)展开了各自的活动,力求增强每个党员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对所肩负事业和巩固苏中友谊及合作的责任心。

加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对苏联团体和部分专家组生产和工作活动的重视,有助于督促苏联团体遵守劳动纪律和国家法律,改善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所在国的行为举止。

在过去的一年中,基层党组织在各自会议上讨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苏共中央"关于学年总结报告

及新学期开展党员教育的任务"、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所提出的党组织的任务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改善和活跃党的工作，加强党对生产和政治各领域的群众工作的影响。在党的组织中，开始更加认真地遵守党组织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员们开始更加勇于揭露苏联机构、党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工作中的不足，提高了党员的原则性。

可以列举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党总支对其领事克留奇科夫同志不良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作为例子，该同志滥用职位，违反境外行为准则，粗暴对待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出差公民。根据普通党员们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些事实在大会上给予了揭露，党员大会还作出了将克留奇科夫同志开除出党总支委员会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基层党组织(党总支书记M. П. 瓦西连科同志)在加强党组织以及解决苏联团体和苏联专家组日常活动出现的问题方面，开展了认真工作。党总支在其会议上系统地讨论了党员在企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了对苏联团体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先进经验的研究活动，在加强动员苏联团体帮助中国朋友培养自己国家干部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党委听取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总支有关党组织情况的工作报告，力求运用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组织的经验来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党委会听取党总支工作的汇报，有助于发现和改进一些缺点，总结成功的经验。比如，在党委会讨论长沙和武汉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指出，武汉苏联团体基层党总支人事工作做得不够，很少讨论该团体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对车间党支部工作领导不力。同时还指出，长沙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尚未形成集体领导机构，忽视党员工作中的实质性缺点，对党员自我政治教育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

党委通过的关于这些党组织汇报的决议，帮助了党总支改进了工作，目前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改正。

自1956年10月30日发表苏联政府宣言之后，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组织和政治活动，旨在贯彻宣言所提出的要求。1956年11月中旬，党委举行了苏联机构及团体领导人和在京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会上讨论了宣言中所提出的党组织任务。之后，党委成员和党委机关工作者分头奔赴一些有苏联出差人员的中国城市，就地帮助安排实施宣言所要求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做解释工作等)。在党组织和党委活动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对在华出差的苏联所有公民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在各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举办各类政治报告会、讲座、座谈会。在北京，由党委领导的编外宣讲团与基层党组织一起来实施这项工作，宣讲团中拥有50多名演讲人员。

去年，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演讲团成员共举办了约250场讲座，共有2万多苏联听众出席了讲座。

今年，所有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及其家属成员深入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八大会议资料，从而对提高在华出差苏联工作人员生产和政治积极性，对他们更充分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国际主义义务产生了积极影响。

目前，在统一党委党员教育系统中学习的人数共有3 634名，其中党员1 689名，共青团

员 341 名,无党派人员 1 604 名。这些数据中不包括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的数据,因尚未得到那边所提供的必要数据。

党组织通过党员教育系统开设了 23 个苏共党史学习小组和讲习班,人员总数 245 名;政治经济学讲习班 74 个,人员总数 733 名;中国历史和经济讲习班 26 个,人员总数 424 名;苏联工农业具体经济讲习班 12 个,人员总数 164 名。除了参加讲习班的学习,大部分党员和无党派人员都单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793 人)。

党组织举行的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成为党员积极进行政治学习、巩固和宣传学习资料的名副其实的形式之一。比如,去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纪念 1905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 50 周年理论研讨会。党员对去年在大连、乌鲁木齐等城市所举办的理论研讨会给予了良好评价。

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不足:在一些情况下,对党员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关心不够,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组长的工作存在缺陷,对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性缺乏监督,在一些团体中,对部分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履行国家义务和工作职责方面要求不严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党委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问题和进一步改进各级党的工作。

在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开展党的组织、政治和教育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对所肩负职责的责任心,加强了劳动和国家纪律,对在华出差的所有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成员遵循境外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此,应该指出的是,在华的大多数苏联人员的行为是端正的,是着力于尽力巩固苏中之间友谊的。

但是,去年,在中国一些地区的苏联团体中分别出现了部分苏联人员违反行为准则的事情,现对他们已进行了适当的教育。比如,在大连有几个苏联海员(帕夫洛夫、伊万尼、维列缅耶夫、克拉夫佐夫),上岸后喝醉了酒,在中国酒吧表现得有失行为准则,而水手帕夫洛夫和维列缅耶夫则在不省人事状态下被送到船上,其中一人还丢失了自己的证件。在乌鲁木齐,苏联国家空军的空中摄影考察组专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宾馆里大闹,殴打自己的同事。

在哈尔滨,苏联专家扎伊采夫道德生活腐化,与当地一名苏联女公民同居,经常与其约会和吃喝,向其赠送相片,其中包括苏联专家集体合影照。在上海,苏联专家罗斯拉维兹(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教师)非法从学院领导那里获取莫斯科至上海的旅费 2 093 元,欺骗苏联同事,并对他们声称说,他与中方完全结清账了,这一骗局直到几个月之后才被揭穿。因这一严重违背行为准则的事情,罗斯拉维兹被责令提前回国。他所欠的全部金额被如数没收并归还给了中国朋友。

在出现所有类似情况下,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都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当从吉林方面得知,苏联专家波波夫、沙马耶夫、科尼亚泽夫及其他一些人违反医院内部秩序准则,滥用公车,并对中国朋友说话语气不恭,党员大会立即对以上党员行为中的错误分别予以了谴责,并给予他们党内处分。

在武汉，在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场地工作的苏联专家马多尔斯基将自己与整个苏联专家组对立起来，在中国朋友面前歧视他们，试图对中国同志提出违背之前集体所作出的建议方案。为此，他还放肆地声称道，这样做是符合“百花齐放”方针的，中国朋友自己会分辨他们更喜欢哪一种建议。同样还是这位专家违反了劳动纪律(擅自行程1 000多公里去北京，由中方提供费用)。在审理这一问题时，党组织对马多尔斯基给予了警告。

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努力利用上述情况提高党员对不能容忍各种违反行为准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每个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对无条件履行自己工作和社会职责的责任心，使每个在华苏联人都成为守纪律、勤劳、谦虚以及具有崇高道德素质的楷模。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减薪原因，1956年底和1957年初，我们工作人员(大多数情况下是专家)中出现了个别不良情绪和言论。专家指出，两个月之内薪水减少一半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专家在苏联(以前工资的60%)和中国所得到的工资总额还是比其去苏联出差之前所得到的要少。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家庭成员较多者(4—5人)，则抱怨物质困难。使馆机关和党组织针对这些事实做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使馆内部本身与党组织经常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和提高业务专业工作。从使馆外交成员党组上所讨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当中，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如“关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宣言的党员任务”，“关于改进中国外交关系研究的措施”，“关于使馆全体人员思想工作的现状”及其他等。在这些会议上，党员表现出了必要的政治上的成熟，对使馆领导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发表了许多涉及改善全体人员工作的宝贵建议。

去年，外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很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文件准备更加深思熟虑，对当代国际局势复杂问题的判断更加慎重，对改善中苏关系提出了更有价值的新建议等。属于该队列的工作人员是，切卡诺夫、罗满宁、扎尔科夫、莫丘尔斯基、杜布罗夫斯基、什利亚普尼科夫、诺维科夫、勃列日涅夫、拉扎列夫、库达舍夫等。

集体团队中政治道德状况基本上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过去一年以来，对党方面没有出现任何经不起考验的言论，这可足以证明对党和政府决议与措施的理解上都是正确的。在进行外交礼仪活动时，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自我表现得很有自尊，表现出克制，善于使会谈进行得饶有兴趣、内容丰富。

使馆信息工作。有必要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采取批评的态度，还应该指出的是，1956年使馆信息工作与之前相比有了一些改进。

使馆尽可能广泛利用中央有关中国内政现状、中国政府外交措施、发展苏中关系的所有各类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更为重要和迫切问题的详细电文、情报简讯、概述、对重大问题的客观资料。使馆人员与中国不同机构的工作人员、外交使团成员的许多会谈记录等，同样对中央信息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年来，使馆向中央发送了几百封电文，500多份会谈记录，30份资料及其他情报，其中基本反映了中国的生活方面。在使馆情报资料内容本身上得到了一些改进，中央对收到的

资料所给予的评语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逐渐克服了以往情报资料中所存在的缺点，其中纯描述方面、个别事实和数字占据大量篇幅，对之评价则往往出自中国资料。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待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现象批评不够尖锐，只是在文献中消极地转述中国党与国家机构发表的官方论断和概括结论。在使馆1956年所准备的情报材料中，我们力求更多地展现独立性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生活的批评看法。当然，这不意味着，在自己的结论和总结中，我们没有去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决议。

除了与中国同志和外国人会谈之外，其他的重要信息来源于中国各部门提供给苏联专家的各种材料。其中有些带有公务性质，有些则有时带有机密性质。中国相关组织向我们顾问团提供了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汇总统计资料、党的内部文献以及报刊上未公开发表的法规。专家们有机会阅读到党的内部杂志《组织工作》、《监督与检查》、《统一战线》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材料内容十分精彩，在给中央写各种文件时，使馆通过专家途径采用了这些资料。

与以往相比，使馆如今对准备发送中央的资料和情报经常进行集体讨论，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工作人员的视野，促进了其业务专业的提高，改进了情报材料本身的质量。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1956年中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质量并非都很高，其原因还在于，使馆外交人员很少到现场，深入中国内地，因此，对各阶层民众生活了解还甚少，对中共和中国政府政策实际贯彻情况，对中国普通民众对苏联、对各种国际事件的态度缺乏足够的了解。使馆情报资料缺少鲜明的生活事例，基本上都是充塞了统计数据或者是选自中国内部及公开报刊上所报道的事例和事实。

使馆情报工作中尚未克服的缺点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现象给予评价时，往往只是单方面的，对事实缺少足够分析和批评态度。作为案例，可以举以下例子。在我们的情报资料中，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来源，我们对中国近几年基本建设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由于受宣传文章基调的影响，我们只看到这一大问题的表面，而事实上情况则并非如此，取得的这种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在一系列情况下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误和失衡。我们认为，与苏联和中国报刊上刊登的情报资料不同，使馆在自己的文件中应该更仔细地去分析困难、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无可争议的成就的反面。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使馆情报工作中，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中，在1957年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中国经验好的方面，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建设特色。

本报告年度，使馆举办了20多次外交和办事人员以及苏联专家组和苏联机关领导会议。在生产会议上，使馆总结了所做的工作，研究了下季度的工作计划，倾听了大使所作的各种传达，包括有关苏联外交部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对本部和境外外交代表处任务讨论的情况，有关中共八大决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关中共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政策，有关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通常经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馆制定出相应的建议。在工作会议上，则主要是听取使馆部门的汇报(领事处、礼宾处、科学

文化处)，讨论使馆工作人员编制的一些资料。在大使召开的会议上，听取苏联专家通报有关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12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问题，中国农业现状，工资改革和城乡之间商品贸易流通现状。很多苏联代表团的领导人和成员先后在使馆作了报告或进行了座谈。

使馆部分人员还倾听了中国领导人员和苏联专家对中国部分政治与经济问题所作的报告。

为了提高业务专业水平，使馆全体办事人员有系统地进行外语学习。目前，学习中文的有27人，其中包括进修中文知识的有24人。学习英文的有20人。为帮助人员学习外语，使馆经常放映中文和英文电影。许多同志经常去中国剧场、影院、展览会。学习外语人员开始更多地重视提高口语水平。同时，使馆部分工作人员对所在国情况研究尚且不够，特别是其文化和日常生活情况，对中国文学作品了解甚少，不听公开讲座等。使馆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不足。

使馆经常举行各级招待会、电影观摩会、联合郊游、国际俱乐部见面会、友谊体育比赛和其他礼仪活动，所有这些为使馆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加扩大与中国朋友和外交使团人员交际面的机会。我们外交人员与中国外交部、文化部和高等教育部、中苏对外友协、《人民日报》社、各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高校校长、部分学者、文学和电影活动家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

使馆一年当中举办了4次大型招待会，26场电影观摩会，11次大使午餐会，28次参赞和使馆其他人员小型招待会，26次与中国同志和外宾之间体育比赛、郊游活动及其他类似见面会。鉴于使馆人员无法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使馆专门开设了一间用来举行小范围招待会的办事处住房，尤其是为中国外交部、中苏友协、宣传机构、各类北京组织等少量中国相关人员所举行的招待会。

1956年下半年，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联系极为活跃。基本上根据这些国家使馆的主动提议，我们积极为其国内所举行的苏联友好周和友好年举行了庆祝活动。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举行了体育比赛、休闲晚会、电影观摩会。类似友好见面会一般都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使馆工作人员一起举行。6月份曾为南斯拉夫使馆人员举办了招待会。匈牙利十月事件之后，使馆组织了与在京匈牙利人友好见面会。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次招待会对曾经历了严重动摇的许多匈牙利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使馆同时还对资本主义国家使馆外交官的工作予以了认真关注。大使和外交工作人员与埃及、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使馆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使馆一次生产会议和党组织会议上，对办事处活动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从而促进提高了外交人员在招待会上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有效地去利用招待会收集情报，开展有关苏联外交政策、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交谈。

领事问题。截至1956年1月1日，在中国共设立了9家苏联领事馆。本年内关闭了满洲里领事馆和喀什市总领事馆。目前在中国只有5家苏联总领事馆(分别位于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乌鲁木齐)和2家领事馆(位于广州和伊宁)。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决定是

根据使馆的建议作出的。因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可派1—2个工作人员常驻伊宁办理当地苏联公民证件,使馆认为有必要研究关闭伊宁领事馆的问题。使馆还认为可以精简领事馆人员编制,特别是广州和大连的领事馆。

使馆人员,包括使馆下属党委工作人员,一年内平均要到苏联驻华东地区的领事馆4—5次,党委工作人员去了新疆两次。使馆参赞对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广州各领事馆的情况也作了调查。进行一系列寻访的原因是由于个别领事馆工作中出现了问题。1956年使馆听取了上海和哈尔滨两地总领事和广州领事的汇报,并且还举行了苏联驻中国领事机构领导人的会议。

在本报告年度,使馆向各领事馆下达了关于在情报领域和其他问题方面改善对苏联专家、当地苏联公民的领导工作指示。使馆多次提请领事馆重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国先进经验的必要性。年底,领事馆对苏联专家的领导工作有了一些起色。沈阳和大连总领事馆概括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运用中国先进经验的建议。沈阳总领事馆同时还取得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工作的显著改善。根据哈尔滨、乌鲁木齐、沈阳、大连和上海各总领事馆的建议,有系统地从中国调回了一些专家,因为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已没有更多必要。

去年领事馆在向苏联外交部和使馆通报有关各领事管辖区政治和经济状况上做了相当大的工作。使馆明确要求各领事馆进行研究,在其领事管辖区的具体条件下是如何实施中共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措施的,并且现场研究有关苏中关系的所有问题。使馆经常提请各领事馆工作人员重视扩大其与党政和社会组织,与文化和民主党派活动家联系的必要性。使馆建议各领事馆对及时提供最紧迫问题的简要情报予以更多重视。实践证明,这种情报往往比大篇资料更有用,而为了编写大篇资料,各领事馆则常常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给其他工作造成损失。在本报告年度,最感兴趣的情报资料来自上海和沈阳总领事馆。在编写情报、资料、管辖区出访报告上,哈尔滨、大连和乌鲁木齐各总领事馆工作做得还不够。

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对组织和调整各领事馆情报工作做得还不理想。由于与使馆工作计划协调不够,领事馆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送交使馆的时间太晚,往往在使馆已经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准备向中央送交相关文件之后。对存在的这些不足在1957年3月份北京的领事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

1956年,使馆对减少常住中国的苏联公民人数问题继续予以了很大关注。为此,使馆考虑到了中国朋友对清理在华整个当地苏联侨民区——首先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关心。

正如1956年的工作经验所证明,对大量减少长期居住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问题不能只通过组织这些公民回国的个人方式来予以解决。根据资料初步显示,1956年从这些地区返回苏联的人数达到2 200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约900人。在这些地区所剩下的1.32万人同胞中,根据现有资料初步显示,看来,将近有三分之一人表示愿去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中许多人在那里都有亲戚。

为了减少长期在华居住的苏联公民人数，1956年使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关于当地苏联同胞出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简化苏联公民出国手续；关于运送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苏联同胞回国进养老院。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采纳了，并且部分已被贯彻执行。使馆和领事馆获准在1956—1957年向苏联残疾人疗养院运送500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同胞。简化了以往返回中国拥有苏联国籍的前政治移民出境手续。各领事被授权可以核销当地同胞，只要他们一旦提出要求离开中国，包括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朋友十分赞同取消对当地苏联同胞离开中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

考虑到当地苏联同胞突然大量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会急剧加重当地侨民区中的不良情绪，给中国朋友造成困难和引起外国新闻舆论，使馆提请领事馆注意有必要改进在苏联同胞中的教育工作，同时还提醒领事馆核销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公民，防止他们转变成为一种运动。吩咐各领事馆，应该与本地当局紧密联系推行这项工作。可以期待的是，随着继续组织当地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使居住于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在近期内有实质性的减少。

解决新疆苏联侨民区减少问题遇到了极大困难。根据截至1956年1月1日情况统计，长期居住新疆的苏联同胞有4.34万人。此外，根据中国外交部通报，新疆拥有从俄国和苏联出来的无国籍人士20万—30万人。

1956年期间，从新疆返回苏联的当地苏联同胞人数为8 000多人，无国籍人士7 000人(苏联同胞家属成员)。根据伊宁领事馆估计，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拥有近6 000家苏联侨民家庭和大量的无国籍人士，他们同样也想返回苏联。

根据与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会谈以及我们新疆领事馆的通报，可以作出以下结论，中国当局对从事农业的当地苏联侨民大批离开新疆回苏联持否定态度，因为其很大一部分人已加入了合作社，这些公民的大批出走将对其所居住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及对生产合作社的巩固造成损害。中国当局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同胞要求离开新疆返回苏联，但希望他们的离开不要像往年那样形成一种广泛运动，从而对当地整个苏联侨民区以及从我国出来的更多数量的各种无国籍人士的情绪造成较大影响。

所以，我们新疆领事馆应该在1957年更加谨慎地处理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问题，对中国当局有关公民任何群体离开新疆的观点予以考虑。领事馆不应该进行间接的或者通过当地苏联同胞动员大量公民回苏联。为此，还需考虑到新疆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顺利进行，首先是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合作社，应该改变在当地侨民区中的政治群众工作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取消苏联侨民协会分部，并将文化教育机构转交合作社与当局管理，以便为整个当地居民，包括苏联同胞服务。在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伊宁苏联领事馆便可关闭了。

中国当地侨民区大量减少使得1956年先后关闭了喀什、乌鲁木齐、满洲里、大连、沈阳和北京的苏联侨民协会。至于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苏联侨民协会，则根据中国同志的愿望，根据保留对以上地点大量当地侨民区的当前教育工作形式情况出发，使馆认为有必要暂时保留这些协会。对取消上海和天津苏联同胞协会问题待1957年底再处理，等这些城市的

当地侨民区减少之后。

1956年使馆和领事馆就吸引当地苏联同胞积极参加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工作。长期居住在新疆的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数量不多的苏联同胞。

使馆和领事馆对中国当局代表所表示的意思是,如果作为工业和商业企业拥有者的当地苏联同胞,随同中国公民一道,在与中国公民相同的基础上投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话,苏方不会反对。但是1956年期间,中国当局没有对当地苏联同胞的工业和商业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像对其他外国公民那样。根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立真的通报,1957年初,中国国务院规定,在中国拥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外国人可以继续在国家监督下从事自己的活动,对他们将基本上使用社会主义改造低级形式(由国家提供加工原料任务和按照当局所定价格的订单,向国家销售成品等)。一旦苏联同胞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企业改造成混合制,那么其要求可以予以满足。作为手工业、畜牧业和农业所有人的苏联同胞则根据其本人愿望,在严格遵守自愿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加入合作社。对房屋所有者目前将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有关领事处工作的报告将单独呈上。

第四部分 结论

在过去的1956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经济;完成工业化、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得到了顺利进行;加强了围绕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各阶层民众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民主国家;扩大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同时还巩固了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劳动人民的高度生产积极性,1956年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顺利发展。

中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完成了生产总值计划107%,基本建设计划完成99%。工业和基本建设呈现发展速度十分高的特点: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提高了27.7%(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7%),而基本建设则提高了约60%(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约10%)。1956年工业产品增幅几乎等于1950年全年工业产值的规模。1956年基本建设完成工作量几乎等于1953年和1954年基本建设规模两者相加的总和。五年规划所制定的工业生产总值、大多数产品种类、工人和职员工作水平的指标都提前一年完成,而基本建设则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一切为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完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证明,1956年计划定得非常之高并且平衡不够,尤其对基本建设,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在完成1956年计划过程中,查明了三大基本矛盾:资本投入需要与资本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增长速度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最后则是进口增长与出口能力之间的矛盾。

由于整个计划中出现过错和失误,尤其是在制定物质和财政平衡上,由于基本建设资金大量分散,工人和职员人数超计划增长,在国内经济中造成了严重紧张。这促使中共中央和

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过去所制定的1957年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规划草案，以消除已形成的比例失衡。

二、1956年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改造工作。改造规模和步伐极大地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规划所制定的指标。工业生产中私有部分比重从1955年的16.2%减少到1956年的0.0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国内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56年整个工业总产值约1/3是由合营企业所生产的。

由于中国经济中上述改造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进一步增长和合营企业逐渐转变为全社会性质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工人和职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掀起了竞赛活动，从而保证完成了1956年生产计划和提高了商品贸易额。在社会主义竞赛影响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本家的合作得到了改善。在把私有工业和商业企业改造为合营制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对合并小企业主、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许多情况考虑不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日常用品生产的下降和居民商品供应情况不良。

尽管中国领导机构对新成立的合营企业经营重组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组织经营活动以及对资本家不断进行教育，依然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主要问题。

三、在农业方面，中共和中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采取了巨大努力。其结果是，无论遭遇自然灾害的损失有多么严重，1956年还是取得了农业产量进一步增长。粮食总收成达到1.846亿吨，比丰收的1955年多收940万吨(5.7%)。棉花总收成比1955年增长2.1%，为155万吨。虽然国内农业产量得到了提高，但大多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由于削弱了中央对采购谷物和居民粮食供应的领导，造成该工作中出现了很大错误。中国粮食收支平衡依然还是紧张。截至1956年，国家仓库粮食储备为3 520万吨，比1955年底减少了10%。棉花采购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这一原料的需求。

畜牧业，尤其是耕牛和养猪业情况依然严峻。产生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合作化进程中出现了错误，1954—1955年饲料基地被减少，收购价格太低，合作社缺少饲养和使用牲口的经验等。政府和中共中央为改正上述缺点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注意提高农民和合作社社员对畜牧业的兴趣。这样做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但尚未取得重要进展，无论是牲畜总量还是各种主要牲畜量的增长计划均未完成。

1956年是中国农村完成基本合作化的一年。随着进一步吸引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向社会主义的高级社过渡，同时巩固大多数合作社的进程开始了。截至1957年1月1日，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由于合并而减少到75.8万家。其中合并了1.174亿农户，或全国农民的96.6%。1.066亿农户，或全体农民的87.7%，合并为56万家高级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全年对巩固合作社生产活动组织和安排问题予以了很大关注，以取得在合作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生产高潮，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提高合作社90%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从而显著展现合作社经营的优越性。中国党和政府在合作化和合作社组织经营活动进程中查清和改正了大量缺点、错误。比如，他们让合作社对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估

计不足予以关注。为同破坏合作社的民主领导、浪费和其他错误现象作斗争采取了有效措施。所有这些取得的结果是，大多数合作社基本上于1956年顺利建成了，尽管发生了自然灾害，80%的合作社农民与去年相比还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帮助弱小合作社和进一步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依然是中央和地方党及农业机构关注的中心。

四、城市和农村生产关系性质的深刻变化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其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逐渐消除了民族资本家阶级，全面加强了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团结，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一切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理论，探索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正确而灵活的形式，以保证完成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过去一年，共产党队伍得到了很大成长和壮大，实施了旨在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党政工作的措施。

中共中央极大地关注加强党内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会、国内其他阶层民众的教育工作。这一工作的基础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和政府决议，为此，特别强调在人民中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因取得巨大成就而骄傲自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工作和生活中谦虚朴素作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科学与文化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一定意义，这关系到把中国科学与文化提高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总任务。

五、根据团结中国人民所有力量的必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人民民主战线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出并实际上贯彻了共产党与中国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相互监督的方针。作为中共统一战线领域新的政策方针，它极大地提高了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任，加强了其对中国政府在国内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外交措施的支持。过去的一年中，统一战线组织改造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显得十分活跃，民主党派成员的队伍得到了扩大，召开了各党派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其基层机构组织得到了加强。

六、1956年举行了一系列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活动。在选民十分积极地参与下，进行了国家政权基层机构——乡镇、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与前几次选举相比，参与投票选举的选民百分比有了极大上升；比往年更广泛地实行了无记名投票；会上发言的代表及其提出的有关改进权力机构活动的建议数量都有所增加。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方面，选民和代表更加直率而大胆地对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为了使国内行政区域划分接近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开展了乡镇合并，县和省部分重组。许多上级组织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工作。鉴于国家管理存在过于集中，在国家和党的机构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反法制的现象，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缺点，并开展与这些机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

七、与前几年相比，1956年更多地去关注民族建设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

大量大汉族沙文主义、限制中国落后少数民族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因。在个别居住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出现了由民族主义和敌对分子组织的骚乱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灵活、谨慎和正确的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增加对这些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拨款，继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反对大汉族沙文主义现象。

八、在中国人民内部逐渐统一和国家内政情况稳定情况下，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没有停止自己的破坏敌对活动。在下半年，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农民中出现了个别骚乱，工人中出现了个别罢工，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恶意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认定这些动乱具有严重意义时，认为没有必要广泛地采取镇压措施，而是着重全力开展了说服工作，克服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都是群众中不良情绪和举动的原因。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活动家最近发表的原则性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在先进和落后部分之间有必要利用民主方式去克服这些矛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声明的，对敌对分子不应该采取镇压方式。

1956 年，作为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形式之一是，在这些分子中开展"自我揭发，自我坦白的运动"。对自愿坦白者，其人数超过了 10 万之多，则采取了"宽大政策"。

九、1956 年中国外交状况的主要特点是：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领域以及科学和文化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关系得到了继续发展。

苏共二十大是极大推动这些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大会决议对中国政府外交和内政措施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彼此工作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苏政府之间、中共和苏共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中国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整个一年中一如既往互相通报各自国家内部情况，并且在外交政策领域互相协商和密切合作。在匈牙利事件和对埃及侵略时期的复杂形势下，这点表现得尤其鲜明。这一时期在敌人攻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十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忠诚。中国朋友对苏联政府向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提供援助的行动，对旨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所采取的其他措施给予了坚决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活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在这方面具有特别意义的是，1957 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苏中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具有国际意义的苏中联合声明。

近一年来，对苏联、苏联组织和在华专家工作提出更加公开批评意见成为了苏中关系中的某一特点。为此，应该考虑到，通常对我们的类似批评是出自友好的立场，并且反映了中国同志为争取更加多的互相理解和巩固苏中人民友谊的渴望。

1956 年标志着苏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相当扩大。苏中之间对外贸易总额比 1955 年增长了 24.3%，达到 59.97 亿卢布。但是 1956 年中国在履行义务向苏联提供部分商品时出现了严重困难，从而导致了年底中国商品供货部分减少，中方未能完全履约的部分达

4.2%。根据1956年合同，苏联履约供货97.2%，而外贸部供货仅履约94.8%。对我们企业和设计机构来说，通过技术援助对华提供设备和完成设计工作进行得十分紧张。虽然对华提供配套设备计划超额完成了，但并未按要货清单履约完成。一年中，许多部级总供应商严重违反了设备交货、设计技术文件转让和专家派遣所规定的期限。

到年底，中国降低基本建设速度和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设备和设计资料的趋势更加明确了，从而有可能对已经开始着手完成中国定单的我国工业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1956年苏中科技合作极其活跃，它表现为在双方科研机构、科学院、设计院等机构之间采取了直接联系的新的各种形式。组织苏中联合科学考察队共同研究个别问题是有益的。中方依然要比苏方更加积极地主张进一步扩大苏中科技关系。苏方对中国成功经验的研究和利用还是不够。

1956年与去年相比，双方在文化合作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这得益于1956年中期苏中双方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文化关系得到了一定扩大，但依旧落后于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水平。今后文化合作的工作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科学基础上，朝着更加深入、更加专业的互相研究两国文化和科学的方向发展。1957年即将制定的3—5年文化合作远景规划将对这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十、过去一年中，中国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中国与苏联一起坚决贯彻平等、互助和友好合作原则。

1956年，中国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正常。中国向朝鲜和越南继续提供极大的经济援助，同时还与蒙古签署了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协议。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56年中国和朝鲜政府在朝鲜内政状况问题上暴露出严重分歧，其结果导致1956年中朝关系有些恶化。

1956年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家和政党接触扩大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对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镇压匈牙利法西斯暴乱所提供的援助，并且表示对卡达尔政府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朋友十分谨慎而审视地去评价波兰事件，多次反复研究自己对波兰事件始初阶段的立场。

随着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的巩固，1956年双方贸易和经济关系出现了缓慢增长，甚至在贸易额上有些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财政方面遭遇了困难。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得到了一些扩大，对此可证明的是，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开展了各种代表团的大量交换。由于1956年南斯拉夫人掀起的宣传“民族共产主义”以及对苏共的攻击运动，中国朋友坚决地站在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以此支持他们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斗争。

十一、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坚持奉行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发展各方面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反殖民化斗争和中立化，促进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反抗帝国主义者将其结成该地区自己侵略集团的方针。与往年那样，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利用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1956年，在解决上述任务上取得了极大成就。

中国成功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这些主要反映在与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国家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扩大了与亚非国家的国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个人的交往。中国对一系列国家(缅甸、柬埔寨等)给予了经济援助。

中国政府赢得了亚洲国家对自己政策的巨大理解，积极促进了他们对苏联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情况更正确的理解。在这方面，周恩来对亚洲八国的出访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次出访时间正好在1956年底，因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者掀起了反苏联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这次出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威信的进一步提高，巩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改善了中国与部分国家的互相关系。

中国政府对印度继续予以特别多的关注，1956年与印度友好关系取得了发展与巩固，在国际问题上，中印进一步互相理解和合作。

十二、中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日本工业生产增长及其对外贸易发展困难、日美矛盾上升、苏日外交关系恢复以及日本随后加入联合国——所有这一切为促进改善中日关系建立了更加良好的氛围。中国政府利用这种局势，继续积极地推行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中国同志对日本所做的工作使得与日本的联系得到了极大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社会民意产生了影响。但是，考虑到日本与美国之间更大的依赖关系以及日本统治阶层反动亲美分子十分强大的立场，可以预见的是，近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只可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虽然中国毫无疑问会设法利用这种进展来争取更大的政治效果。

十三、美国对中国依旧奉行自己公开的敌视政策，继续事实上占领台湾，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和中国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对那些反对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施加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旨在揭露美国统治阶层的政策。比如，在日内瓦大使谈判过程中，中方不止一次提议召开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和发展两国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之后，中国又表现出主动姿态，邀请美国文化人士和记者访问中国。美国政府禁止这些出访甚至引起了美国部分反动报界的不满，对中国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依然还是美国对台湾问题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中国同志对拖延解决这些问题持平静态度，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利用各种途径对国民党人和台湾居民施加影响，促进台湾岛上爱国主义力量的活动，加重国民党人之间的分化以及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尖锐矛盾。

1956年中英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双方关系出现了某种恶化趋势，尤其在英国策动对埃及侵略，并在香港和九龙进行反华挑衅之后。

十四、1956年，对中国国内生活及巩固其国际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显著事件是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展示了党的统一，与群众广泛而牢固的联系，中国主要阶层民众对共产党及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支持。大会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本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在总结了七大之后所走过的道路，分析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拟定了实施建立

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规划途径和方法。

第五部分　建议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的宪法中,在附加在这些国家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条约序言中,强调指出,巩固与苏联的友谊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不变的原则。为此,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至今只在苏联政府声明和宣言中予以了阐述。但是这些原则尚未在我国的基本法——宪法中得到反映。

考虑到苏联外交的列宁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平等和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争取保障全世界和平等)不仅是苏联政府实际活动中的外交政策,而且是苏联国家整个长期政策中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提交下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把这些原则写入苏联宪法序言中是适宜的,特别要突出和强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永久而牢不可破的友谊原则。这一举动所要强调的是,苏联政府在以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外交基本原则不仅是苏联政府当前的外交原则,而且是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始终不变的原则。

提请对苏联宪法加上序言,强调苏联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不可摧而永久的友谊、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无疑将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引起良好反响。

二、1956 年苏联比往年更加重视普及了解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但是在使馆看来,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少。访问苏联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认为,苏联公民对中国人民生活,对中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了解不多。在苏联学校里对中国现实生活、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介绍不够。

为了在苏联推广对中国知识的了解,我们认为,必须开始苏中友协的工作。两年前在莫斯科就已宣布建立这个协会,在中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三、目前,在苏联的中文定期出版物上,对苏联成就的宣传以及在中国民众中对苏联人民生活的介绍还做得明显不够。1956 年中国出版的苏联中文期刊只有两本——《苏联》和《苏联妇女》,年发行量为 240 万册。这些杂志上所刊登的材料无法满足中国同志对苏联的兴趣。

为了加强我国在中国的宣传,使馆认为在莫斯科组织出版中文大众版报纸是适宜的。报纸可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因为苏联目前尚未成立苏中友好协会)。报纸的主要任务在于,依据具体材料,以普及形式宣传苏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苏联在民主发展方面的成绩。向读者介绍苏联人的生活和日常习俗等。考虑到中国大多数居民是文盲和半文盲,最好在报纸上广泛使用照片、图片和其他插图。

有关技术方面,则可以利用中方《友好报》的出版经验,即在莫斯科进行报纸排版,将版子发往北京并在中国印刷发行。对报纸出版社工作而言,应该邀请几个中国专家担任顾问。

目前中方在苏联发行的俄文定期出版物有三种——《友好报》、《人民中国》和《中国》期

刊，年总发行量为2 100万册。据使馆掌握的情况，中方对我们出版介绍苏联的中文报纸持积极态度。因为这符合中国朋友在中国更广泛地介绍苏联生活的愿望，并且这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

四、1957年中国报刊出版社发来了大量征订有关介绍苏联文章的申请。但是接到这些申请的苏联新闻局只能满足中国出版社30%—40%的需求。目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有关出版供中国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阅读的《苏中友谊》月刊的决定，上面将完全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并且中国朋友计划出版物大半部分保证登载向苏联作者约稿的文章。

鉴于以上所述，使馆请求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就及时而完全满足中国申请的重要性予以重视。

五、使馆认为必须做到的是，苏联新闻报刊不要只限于登载按照通讯社有关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材料，还应根据中国外交和内政的措施刊登社论、编辑部和评论员文章。这不仅符合双方的相互关系，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政府措施的一定支持。

六、使馆从与中国主管人员会谈中得知，中国广播听众对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对华广播质量反映不好，认为苏联广播的许多材料中文翻译很差，枯燥单调。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广播委员会重视从根本上改进苏联对华广播质量的重要性。

七、鉴于最近美国加强在东南亚、近中东国家的宣传，有必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宣传与反宣传，使馆认为合理的是：

1. 委托苏联驻东南亚、近中东国家各使馆研究所在国苏联宣传的效果问题，并向中央提出相应的建议；

2. 召开苏联和中国宣传工作人员有关交流经验和改进亚洲国家宣传组织会议。在该会议上可以协商我国与中国对亚洲国家宣传的协调问题。

八、近来，美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数量出现了增加，并且其活动显得很活跃。美国的广播电台分布在直接靠近东南亚和远东国家(日本、菲律宾等)，并且与苏联广播截然相反，他们的广播听得很清晰。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加大我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功率，同时还要与中国政府商定有关安排从中国南方地区转播苏联对东南亚的广播。

九、正如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国家和党的建设与群众组织工作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根据本国情况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做法。对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地方党和国家机构实际活动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值得进行仔细研究。使馆认为，可从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地方党的机构(州委)向中国派遣工作组，以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情况。

十、个别苏联部门在向中国派遣各自代表团时没有要求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没有对代表团提出具体的任务，没有提请他们注意有必要去研究中国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好的做法。通常去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对中国国内形势了解很差，并且对代表团感兴趣的领域的情况也很少介绍。

与此同时，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回国后通常不总结出访期间所收集的材料，在部委会议上

很少听取他们的汇报,代表团成员对报界和社会各界发表出访成果总结表现得不够积极。

使馆认为,有必要最好提请我们各部门注意仔细做好代表团赴中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有必要建立对所做工作的汇报程序,包括在同事会上听取代表团汇报。

十一、中国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向苏联征求过并且一直征求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许多严重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与苏联经济建设协调规划的建议。考虑到中国没有加入经互会,目前缺少一个建立在对等基础上讨论中苏经济的某种机构,最好是对合理建立常设苏中联合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议予以研究。该委员会将被赋予规划和协调苏联与中国国民经济部分部门发展的功能,研究中苏部分毗邻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问题,协调对资本主义市场和亚洲与非洲的外贸政策,交换经济信息等,其中包括外贸业务信息。

十二、使馆支持在华苏联贸易办事处提出的有关中苏贸易关系领域的建议:

1. 为了更加合理地解决中苏双方之间往来货物的价格问题,应参照相应商品的世界价格行情,研究相互供应商品价格转为每年制定的问题。一旦世界市场部分商品因特殊情况出现价格上涨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则由双方进行特殊协商。

同时,有必要研究有关取消对苏联商品发往新疆至边境公路的苏联境内段或者水陆运输的额外补贴问题,因为中国机构在向苏联发运其商品至边境的该地区段是通过其境内公路和水陆运输的。

2. 有必要与中方讨论有关签署增加向苏联提供钨精矿石和锡矿石数量的补充协议问题,如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有关向苏联提供有色金属议定书所规定的条件那样,因为考虑到上述金属的实际供应已大大超出了该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数量。

3. 为了提高双方对如期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供货义务的责任,应该提出,如果双方有任何一方违反交货期,实行制裁是适宜的,正如供货总条件中对此所规定的那样。

4. 到目前为止,苏中贸易问题谈判通常都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为了尊重相互关系,这些谈判在莫斯科和北京轮流举行比较合理。

十三、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中央考虑研究在北京建立常设苏联展览厅的问题,以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该展览厅可以用实物或者图片展示苏联的新技术产品、苏联出口品种,并组织有关经济与国家建设、外贸、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等各种问题的图片展览会。

十四、使馆未收到我国驻中国邻国各大使馆(蒙古、朝鲜、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有关介绍各所在国情况及其与中国关系问题的材料,使馆极其需要这些材料以便经常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请安排向使馆定期寄送上述材料(汇报章节、个别材料、情报),同时,请允许使馆外交人员出访中国的邻国和地区(越南、朝鲜、蒙古、缅甸、香港)。

十五、1957年8月1日,中国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应该在苏联报界广泛介绍这一纪念日,并从巩固中苏军队关系出发,委托苏联国防部按其组织系统制定活动计划。

十六、鉴于1959年中国即将成立10周年,有必要提请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和相关的

出版社着手准备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可以在纪念庆祝日时出版。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的专题文献集列入出版社计划，同时还应该责成外国文献出版社在1959年扩大中国文学翻译出版。

附件92页为机密，47页为非机密。①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1957年4月18日于北京

文件送：А.А.葛罗米柯、И.Ф.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苏共中央联络部、档案室

1957年4月15日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报告简介和说明已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9月17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252

№23032

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技术专家

(1957年4月23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中国驻苏联使馆贸易参赞遵照本国政府的委托致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请求苏联政府，根据1950年苏中协议条件向中国补充派遣96名苏联专家，为期6个月至2年。

中国政府请求苏方给予技术援助，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具体解决如下问题：新建马丁(炼钢)炉的运行，冶金设备的设计，硅化砖的研究，水泥厂和电缆通讯的设计，有色和稀少金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属的地质勘探，机器制造厂和轻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的改进以及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工作方面的问题，等等。

中方还打算让上述专家来从事培训和提高本国干部技能方面的工作。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事先与中国有关方面作了协商，明确了中方工作中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和专业。最终，中方决定将自己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减少45人，即其请求派51名苏联专家赴中国。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认为理应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并于1957年第二季度派遣45名苏联专家，而其余6名专家则从先前已承担了这方面义务的专家人选中派出。

在签署合同时，这些专家每个人在中国逗留的期限均按中方要求的上述最低期限确定。

这些苏联专家均将按照技术援助条件派往中国，与其出差相关的一切费用支付均按照现行苏中贸易协议相关规定执行。

与苏联相关部委和部门协商后所颁布的指令性草案，具体参见附录。

П. 尼基京

附件：

机　密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

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给予其技术援助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就该问题所发指令的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指令

1957年4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请求：

1. 兹责成苏联相关部委和部门于1957年第二季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苏联专家以给予中国国民经济各领域技术援助，期限为6个月至2年，专家人数参见附录。

所派专家的专业及其在中国逗留的具体期限请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协商。

2. 责成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依据本指令就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事宜与中方达成约定。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将由中国和苏联相关部门之间视具体情况所签署的协议而

定。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事宜将根据1950年10月25日苏中协议条件进行，其差旅费用的支付则遵照苏中贸易协议办理。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附录：

1957年第二季度派遣专家赴中国实施技术援助的苏联部委和部门的名单

部委或部门	派遣专家数量
苏联黑色金属部	3
有色金属部	5
电站部	4
电力技术工业部	7
重型机器制造部	5
机器制造部	2
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	1
苏联工业和建筑材料部	4
苏联粮食产品部	1
苏联轻工业部	1
交通部	1
苏联通讯部	4
苏联内务部	3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	2
莫斯科市执委会所属桥梁建筑总局	2

苏联援建企业事务管理局局长

H.科雷巴洛夫(签名)

1957年4月23日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讨论的情况说明

派出专家的部委(部门)	参与讨论的人
苏联黑色金属部	副部长 B. Б. 赫列布尼科夫
有色金属部	副部长 И. A. 斯特利津

续 表

派出专家的部委(部门)	参与讨论的人
电站部	副部长 А.С. 帕甫连科
电力技术工业部	副部长 Д.С. 切尔尼奇金
重型机器制造部	副部长 К.К. 维诺格拉多夫和 А.Г. 波洛任科夫
机器制造部	副部长 В.Д. 列别杰夫
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	副部长 Н.В. 马丁诺夫
苏联工业和建筑材料部	部务委员会委员 Ф.Т. 萨多夫斯基
苏联粮食产品部	副部长 В.И. 布拉吉列夫
苏联轻工业部	副部长 И.Н. 阿基莫夫
交通部	副部长 Н.А. 贡多宾
苏联通讯部	副部长 З.В. 托普里亚
苏联内务部	大地测量和制图总局局长 А.Н. 巴拉诺夫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	民航总局副局长 Н.Н. 阿索夫斯基
莫斯科市执委会所属桥梁建筑总局	桥梁建筑总局副局长 К.Д. 维诺库罗夫

苏联援建企业事务总局局长

Н. 科雷巴洛夫(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228,л. 78-84

№1038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

(1957 年 4 月 2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4 月 24 日会议第 90 号记录

第 35 项　关于遣返从中国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问题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草案。

(库尔久科夫同志、奥尔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勃列

日涅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认为目前不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发此电报。[1]

中央委员会书记

M. 苏斯洛夫

ЦХСД，ф. 4，оп. 15，д. 549，л. 16

№24934

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

(1957年4月29日)

会议主席：博戈罗茨基同志。

与会者以掌声迎接走入大厅的焦朝河(Цзяо Чжаохэ)和王满寿(Ван Маньшоу)。

主席：同志们！在苏联国内欢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北京中央艺术学院的王满寿教授和焦朝河教授，莫斯科的艺术家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国画艺术学校在莫斯科举办的艺术展引起了苏联观众和苏联艺术家的巨大兴趣。中国保留下来的传统的民族艺术非常美妙，国画艺术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当代自由的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作品的创新性很强，这样的创新性我们只有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中才能看到。

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同志般地交换意见，谈论关于中国和苏联艺术的发展道路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问题，可以听取中国同志对我们苏联艺术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是怎样理解社会现实主义的主要轮廓的，中国怎样实现中共八大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现代中国的艺术领域主要的艺术方向，关于中国艺术家工作的组织问题。

我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指出苏中艺术家之间今后友好关系发展的道路。……[2]

焦朝河同志：我想谈的是，国画艺术学校是怎样进行教学的，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工作过程。

首先，我应该说，在技术方面，中国的艺术家把大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对于艺术家

①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电报。——编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能够接触到的他希望塑造的世界上的客体和现象,他首先应该很好地予以了解,应该深入其实质,而在此之后,当世界上的这些客体和现象——无论对艺术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艺术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和作品中把这种印象塑造出来。他应该对这些客体进行仔细的研究,深入其主要的实质,无论艺术家塑造什么,是否有花、鸟、人、美景,他都应该仔细地对其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塑造。

问题在于,在此还需要谈论一下表达的方法和手段。中国的国画主要是线条画。勾画的线条应当具有概括性,言简意赅地勾画出世界上的客体。当然,实物画是基础,但它完全不需要使艺术家深入其中。有时候艺术家要对这些实物进行观察,然后把其转化为自己的意识,并在画布上简洁概括地勾画出这一实物的形象。艺术家不应该完全依赖客体的明暗面和亮度。主要是需要勾画出这一客体的内涵,而这种内涵是可以通过线条来表现的。而艺术家本人应当尽力抓住某一形象确定的特点,而这些单独的明显的特点有时候在艺术家的意识里被夸大了,而有时候被艺术家故意强调。

在这一展览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的例子,艺术家用线条展示了形象的结构。或者你们已经看到了,在许多的中国作品中都缺乏背景,缺乏环境。中国绘画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一点——关于特点就简单地谈一下。

至于教学的方法,也就是怎样对青年艺术家进行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方法完全来自形式,从中国的国画绘画中就能看到例子。首先,青年艺术家应当仔细而深入地对某一形象和物质世界的客体进行分析。在青年艺术家深入某一客体的内涵,搞清了形象,之后就可以教他来利用什么方法,什么色彩,怎样构建作品。

主席:这就是说,他要从绘制实物画开始吗?

焦朝河同志:你们是否看到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实物画与西方的实物画不同,当面对某一实物的时候,就尽力把其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艺术家首先应该进行想象,该形象的内涵是什么,内部结构是什么,而后,当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意识中的时候,在他对这些进行消化之后,他就能塑造这些。(掌声)

但问题是,为了塑造当今复杂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塑造所有复杂的内涵,塑造人们的心理活动,为此我们就必须学习和接受西方、苏联和其他国家绘画中一切好的方面。因此,一方面,我们的青年艺术家、我们的大学生在学习我们的民族遗产和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造型艺术展中一切好的东西,以便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但在此方面主要的是:我们的民族艺术是基础,而我们从西方学到的一切,都应当有助于我们丰富我们最主要的东西,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

(有人说:对)

至于我,我在尽力对我们的民族遗产进行研究,研究欧洲和苏联一些好的东西,而在我对这些东西进行消化之后,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在许多国画艺术家,他们几乎不能不对欧洲的艺术进行研究,因为欧洲的艺术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揭示今天人们生活的精神内涵。

在我从事中国画的整个生涯中,毫无疑问,我们在努力接受其他国家的绘画中和造型艺

术中一切好的东西，而今天，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意义。

事情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样领会西方这些所有好的东西。对于那些参观了我们的展览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谈谈自己对欧洲流派中的这些问题的意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工作中有许多的错误和不足，毫无疑问，我们的作品还不能完全反映当代的生活。因此我真心地请求你们直率地把这些错误和不足告诉我们。

克贝尔同志：我大约在中国待了七个月，因此我想在此就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些答复。因为我看到过。

1955 年，我参观了第一次在苏联展厅展出的中国展。在那里我首次了解了焦朝河的作品。那里展出的作品是《小男孩和鸽子》。当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大作是在我国的展览会上。我看到的这部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贝尔·维基就雕塑艺术提出的问题，我想谈论一下自己的印象。

中国人能够在很小的东西上塑造出极大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油画，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曾到过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其中包括齐白石的工作室，我得以看到他本人是怎样绘画的。我在杭州、北京、广东，特别是在软玉庙看到过许多画作。软玉庙的长老在上海收藏了许多画作。那里有一件特别的作品使我感到非常吃惊。事实是，在这些奇妙的狭小的画布上通常画的或者是小虾，或者是小鸟，或者是小鸡，从这些小小的绘画世界中艺术家们能够看到许多东西，并且对画作进行这样的结构组合(我对画作产生的最多的联想就是这些)，精美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油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齐白石那里有许多以小虾、小鸟、鱼、小鸡为题材的画作。为了证明我们的客人所谈论的关于他们是怎样领悟自然的话，我想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印象。我曾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艺术问题的大型讨论会。他们确实会观察实物，并带上画板进行绘画，但当他们在进行绘画的时候，他们眼前没有任何实物，整个绘画过程都是凭印象进行的，但绘得是如此的形象，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不存在任何自然主义。这就是中国画——广义上的中国画，不仅仅在绘画方面和雕塑方面，而且还在戏剧方面，它的准确性和形象性使我非常吃惊。这些同活生生的实物没有区别。

如果你们发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缺乏背景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戏剧中也是一样——没有布景，纯粹是演员在进行表演。例如开门或者关门，只做一个小小的姿势。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画都是千篇一律，与实物的相似度很小。但是，当我看到了中国的大自然之后，我开始明白，中国画是非常接近自然的，同时不是对实物的描绘。中国画是经过艺术家用心加工的。在中国，我经常同中国艺术家们进行会谈，我听他们谈论说，“我们非常热爱大自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但是当绘画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实物”。

一名艺术家，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得非常好，“我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一幅画画了 2—3 年”。我问他：“你是怎么了？要用 2—3 年，是在写作吗?”这位艺术家回答说：“不，我要思考，研究材料，而作画用了 2—3 个月。”他把绘画看作是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这种方法非常聪明。

我想，本次展览会上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留下的美妙的印象都会证明我的看法。

我到过杭州，看到过中国应用画家的精美作品。这里的作品是同样的风格。他们这些应用派画家一代一代地把现实主义方法传承下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约定俗成。

我想谈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1954年在中国提出来的，在两个地方——在杭州的华东科学院，在上海与程教授——谈到，中国的艺术家应当怎样向苏联的艺术家学习，他们应当怎样地领会我们的艺术。最初我以如下问题对他们的这个问题进行答复：我们应当怎样向你们学习？因为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艺术，喜欢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他说，我们这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艺术，而你们的是全欧洲的艺术。这使我感到吃惊，我们也有民族艺术。

我的印象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如果中国同志们把这种最伟大的传统艺术混为某种偶然的、过去的、没有支撑的艺术，那我觉得就犯了大错。因此，对于我们的客人今天作的发言我很喜欢，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吸取的只是能够发展他们的民族艺术所需要的合理的东西。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如下看法是所有在座各位的共识：中苏人民、中国艺术家和苏联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是兄弟般的深深的联系，它首先在于我们应当对艺术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中国的民族艺术进行更多而深入的了解，而他们对苏联的民族艺术进行更多的深入的了解。我还认为，我们相互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会更加喜欢对方，并从对方吸取好的、合理的东西。

最后我想说：苏中友好！（掌声）

焦朝河说："苏中友好！"作为回应。（掌声）

……

РГАЛИ，ф. 2890，оп. 1，д. 396，л. 3－4，21－29

№25210

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1957年5月17日）

摘自А. А. 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20日

第714/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29份

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陈楚[①]

1957年5月17日

根据陈楚提出的要求接见了他。

根据政府交给他的任务，陈楚转交了周恩来给H. A. 布尔加宁同志的信，这封信要求商谈有关中国十二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本建议，这份规划已经由特别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出来了。同时，陈楚转交了有关该计划草案的说明，并补充说余下的有关该计划的建议将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为转达。他还表示在苏联专家对计划进行研究后，中国政府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向苏联派驻一个代表团，就以上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磋商或让苏方派遣专家到中国。

我回复说会尽快转达信件和所附文件，同时也向他保证苏方会认真研究。

……

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候补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秘书处

A. 葛罗米柯

1957年5月20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50,д. 3,п. 423,л. 28－30

№20599－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5月20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　密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平壤市

1957年5月20日

……

南日说,他刚刚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各分组审议朝鲜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进展情况。决定各分组工作5月21日结束,5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将听取各分组负责人关于所做工作的汇报。看来,这一天五年计划草案的审议将结束。常务委员会将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指示应如何修改完善五年计划,然后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协调,在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朝鲜将派代表到中国去。南日指出,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没得到中国政府的回音,尽管金日成在出访咸镜北道之前就接见了中国大使并请他转告中国政府希望接受他们的代表带着五年计划草案前往。接着,南日告知,打算在与中国政府协商一些必要的问题之后,派一组负责干部到苏联就五年计划进行咨询和协商。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46-47

№20599-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年5月22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2日

我径自拜访了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

我向他叙述了自己与金日成同志一起完成咸镜北道和咸镜南道之行的印象。我谈到了三年来在这两个道工业企业恢复中取得的成就,谈到了工人们由朝鲜劳动党12月中央全会

和4月中央全会决议激发起的劳动热情。我提到朝鲜领导同志强调指出，恢复工业生产中成就的取得多亏了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兄弟般的援助。我特别谈到了朝鲜领导人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的援助所说的感谢的话。

乔大使指出，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朝鲜人民的英勇劳动。工业生产的恢复主要靠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提供原料、某些设备、粮食、日用消费品。

我对大使关于朝鲜人民作为的话表示同意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现金援助不比苏联初期提供的援助少多少。

我继续谈了工业生产安排方面的某些缺点，特别是生产场地和工业设备没有充分利用，经济核算执行得很差。我还举了一些实例。

大使指出，我所说的意见与不久前到过朝鲜工厂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乔大使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150人。团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志。代表团于今年5月1日至20日在朝鲜各地访问。

谈话涉及朝鲜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我对大使谈了这一问题讨论是如何组织的。乔大使问我，是否清楚投资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规模，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我回答说，目前具体数字还不清楚，希望在我们两家使馆获得这方面材料之后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

大使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后说，1957年5月6日金日成在与他谈话时请求中国政府于今年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我已转达，但回复尚未收到。

我还表示希望与大使见面并就朝鲜劳动党党内情况交换意见，我还非常希望听大使谈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这一重大举措的实际情况。

乔同志很爽快地同意对我谈谈整风运动的有关情况，但他实际上回避了回答我关于就朝鲜劳动党党内情况交换意见的问题，他借口自己了解情况不多，他基本上只掌握报刊上公布的材料，他很少与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见面，即使见，也只是与金昌满见面。

我邀请乔大使星期天去钓鱼。他表示感谢并同意。

乔大使邀请我一起前往开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表示感谢。去的时间以后另行商定。

会谈时武官 M. П. 库尔巴茨基和王宝民在座并翻译。

会谈持续了两小时。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48－51

№25211

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

（1957 年 5 月 22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6 月 14 日
第 225 号

机　密
文本第 7 份

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纪要[①]

1957 年 5 月 22 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通报了中国政府对大使馆提出的一些对外政策问题的答复(已电告中央)。

接着周恩来说，他受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些与整风运动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关的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最初，周恩来说，鉴于在一些兄弟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报道，他要澄清一些事实。他说，在某些报纸上甚至出现了"毛泽东报告实录"的报道。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8 日[②]中国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面文件。然而，为了就所提及的问题开展相应的工作，这一报告的内容在党员和无党派群众中广泛作了口头的传达。在对这一报告进行描述的时候，出现过对其描述不准确和不正确的地方。周恩来说，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国外的报纸对毛泽东报告的报道不准确、不正确。此外，资产阶级的报纸对"毛泽东报告"有明显的歪曲。

周恩来向我通报说，现在毛泽东正在对他那次报告的记录进行修改，对报告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中共中央打算在其完成之后正式予以发表。周恩来表示，在报告发表前，其文本会及时传送给苏联大使馆。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现在在国内开展的关于民主党和无党派代表对共产党和政府机构的批评这一问题。他说，在这些言论中有许多是有益的和正确的，但也有不少反动的反党言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 2 月 27 日。——编注

论。他说，其中个别言论还是对苏联的攻击。周恩来对我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不会限制和禁止这些言论，相反，还要在报纸和广播中进行完整的报道。周恩来说，在这一问题上，党所追求的目的是：对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考验。

之后，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话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了简短的评价。他说，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他们分为三类。超过100万的知识分子属于左翼，信仰马列主义并支持它。这一群体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或者说“右翼”有几十万人，他们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些人在开展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的反动宣传。最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超过300万人)处于中间立场，也就是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他们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赞同社会主义，但是对马列主义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他们认识不到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类知识分子是不牢靠的。

周恩来说，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分析和分类是基于知识分子各群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立场。他说，在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划分的依据是他们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态度。

然后周恩来谈到了关于解放后、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知识分子看法的发展问题。他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越、“三反”和“五反”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在这些具有尖锐的阶级性的运动中，他们都没有冒险地提出自己的特别的立场、进行批评和表达不满。而是相反。比如，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涨的时候，“他们同所有人一样，到街上敲锣打鼓，欢迎改造”，尽管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右派。

现在，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宣布，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随着在实践上采取措施解决内部矛盾，这些人“有了彻底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

接下来周恩来阐述了党在现在开展的这场意识形态运动中的策略计划。他说，可以预料，右派分子会在初期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尖锐的批评。周恩来说，在此之后，预计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和左派会广泛地发出自己的言论，他们除了对党和政府机构进行强烈批评以外，也会遭到“右派”的批评。

在最后阶段，共产党代表会大规模地发表看法。周恩来表示，到这个时候，将会发表中共领导干部对以往的争论进行总结、对批评意见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和发言。此外，他还说，所有正确和有益的言论都将会被接受，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和意见将会受到批评，并被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对那些敌对和反动的言论会被揭露出来。

对于这场运动的结果，周恩来说，我们将会成功地向广大人民群众揭示朋友和敌人的真正面目，表明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他说，另一方面，我们期待知识分子继续分化，继续孤立较右的、较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继续说，在这一运动中，持中间立场的广大知识分子将会受到极大的锻炼，会在思想斗争方面得到经验，他们会与左翼知识分子代表进行更加紧密的团结。同时，右翼知识分子在被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孤立

之后,也会逐渐得到改造。

周恩来指出,当然,对知识分子的各类群体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会用很多时间。“不能指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在一两次运动后都完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不仅仅要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中共开展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使广大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的职员和学生等在思想上得到锻炼,教育他们。

周恩来接着说,解放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数量得到了大量的增长。比如,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党员的数量增加了将近8倍,从150万人增加到了1 200万人。在这一时期,共青团员的数量从19万人增加到了2 200万人。周恩来指出,工人、国家机关职员、商业机关职员、大学生、教师和军人数量的增长大致也是这样。在1949年之前,这类人有1 200万,而现在则有2 600万,其中1 600万人是青年。所有这些在人数上的重大变化都对相关组织的人员质量产生了影响,因为在人民政权成立之后的许多年,党、共青团和国家机关的人员补充主要依靠的是没有经历过革命锻炼、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生活经验不足的青年。因此,党的整风运动和在思想上采取的其他措施就像一所好学校。

接着周恩来说,在开展这样一个对党和政府的缺点进行批评的广泛运动的时候,中共中央自然会对所有导致采取这一措施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仔细的分析。在这一问题上也会考虑到匈牙利的经验。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匈牙利事件绝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党和政府紧紧地控制并掌握着国家的形势。

周恩来接着说,同时,我们不能保证,在个别工厂、合作社、学校会发生个别的某种规模的骚乱,或者敌对的游行。一种情况是,对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官僚主义行径进行的歪曲宣传会引发这样的骚乱和游行。周恩来说,到时候我们“同群众一致,撤换官僚主义领导人并处理好事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游行只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另一种情况是,骚乱被反革命分子组织和挑拨起来。周恩来说,中国不会出现反革命分子发动起大量人民群众的情况。因此,这类骚乱只会具有局部的性质,只会有为数不多的人参与其中。通常可以利用分化骚乱参与者、孤立反革命分子的方法来消除这些骚乱。

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反响。较为反动的一些报纸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危机”的叫嚣,声称“中共不能处理好国内局势”。周恩来说,一些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代表则从这些措施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看到了它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会谈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理论方面,谈到了关于把中国经验运用到兄弟国家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一个新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矛盾总是存在和发展的。这两种矛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中的一种矛盾会转化为另一种矛盾。周恩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像斯大林晚年那样,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要善于及时发现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他提出了如下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立场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思想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周恩来指出，我们觉得，"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指出，《联共(布)史简明教程》中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一些表述。

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周恩来说，这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他说："无论如何，方法都是不能照搬的。比如，我们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方针、借助其他的群众思想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方针的。"

周恩来说，在同兄弟党代表举行的会谈中，中共中央告诫了他们关于机械照搬中国经验的危险，告诫他们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研究这一经验。比如，就没有建议越南同志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匈牙利驻华大使谈论过，他说，匈牙利对反革命不断进行镇压的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没有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方面开展工作。在希罗基总理到华访问期间，他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应当以自己的、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谈到了 K. E. 伏罗希洛夫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的访问。他说，这一访问对加强苏联和印尼的友谊、对亚洲的和平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说，苏加诺利用 K. E. 伏罗希洛夫对印尼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内局势，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就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简短地交换意见的时候，周恩来指出，作为对日本社会党人关于签署"四国条约"的答复，他赞同签署有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多边集体安全条约。

在会谈中，我也向周恩来讲述了关于就改革工业管理和在苏联进行建设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讲述了关于我最近同一些大使进行的会谈。

在告别的时候，我对周恩来提供的有趣而详尽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东司的刘清宇，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以及二等秘书 O. B. 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0, п. 423, д. 5, л. 27－33

№20599-3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

（1957 年 5 月 23 日）

1957 年 5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5 月 6—29 日
第 133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5 月 23 日

……

南日告知，常务委员会审议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已结束。建议国家计委在 5 月底前进行必要修改并交给各省，以便他们能根据企业和工程项目情况做好修正。6 月份党中央和政府的一批领导干部深入到企业与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讨论五年计划草案。打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讨论计划草案。到底将在哪里讨论计划草案，尚未最后决定。

南日又一次提到至今没有收到中国政府同意接待前往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朝鲜代表的回复。此时他说，他与中国大使乔晓光之间目前还没形成亲密的同志式关系。我与他很少见面。这是什么原因，甚至很难说。不好的方面，当然，是我不懂中文，因此直接交换意见有困难。然而，我的副手朴成哲懂中文。我已建议他常常邀请中国大使交谈，并与大使一起上我这儿。

我指出，我曾几次与中国大使见面，他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诚然，他不懂俄文，我不懂中文，我们交谈借助翻译，但我并没有得出他为人虚伪和封闭的印象。据我知道，乔晓光过去是党务工作者。

南日说，他与中国前大使关系很好，他与在停战谈判时经常见到的其他中国工作人员的关系也很好。他希望与乔晓光也会有好的关系。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52-55

№20599 - 4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 年 5 月 26 日）

1957 年 5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5 月 6—29 日
第 133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5 月 26 日

根据原先的约定我与中国大使乔晓光同志一起去钓鱼。

在交谈中乔告诉我，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关于建议朝鲜政府针对美国违反停战协定并准备把新式武器包括热核武器运到南朝鲜一事提出抗议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授权他与南日会见并转交这些建议。乔补充说，现在重要的是，哪些内容纳入这份抗议以及公布的时间。他说，定于明天他与南日会见。

我对大使的告知表示感谢，并对公布抗议的重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大使关于朝鲜外务省声明内容方面必须谨慎对待的意见。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55 - 56

№20599 - 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 年 5 月 29 日）

1957 年 5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5 月 6—29 日
第 133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5 月 29 日

应约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同志。

会谈一开始乔大使告知，他在拜访南日时向他转交中国政府关于针对美国官方人士有关新武器运进南朝鲜的讲话及朝鲜外务省在报刊上发表声明的建议。乔援引南日的话说，声明将于今年 5 月 30 日发表。

我说，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我于 5 月 28 日向南日转交了类似建议。昨天与我谈话时南日告知，声明将过 2—3 天发表，因此，他们未必能在 5 月 30 日做成这件事。

谈起今年 5 月 22 日我们的会谈，乔说，他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政府就五年计划进行咨询的请求发来的答复。答复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准备接待朝鲜政府代表团。但由于今年 6 月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团最好在今年 7 月来访，而不是请求中所说的 6 月初。

我告诉乔大使，在昨天与南日的谈话中他对我说，朝鲜政府决定于 7 月中旬派非正式代表团到苏联咨询五年计划编制工作。我提到，看来，鉴于朝鲜政府的上述答复南日说，先派代表团去苏联，然后派去中国。针对乔关于代表团的组成以及计划在苏联待多久的问题我回答说：据我们所知，率领代表团的将是金一和国家计委委员长李钟玉。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国家计委和其他部门的 8 人。代表团在苏联待多久没有谈起。

然后，乔根据我先前提出过的要求谈了目前在中国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

我对乔内容充实和有意思的通报表示感谢。

谈到昨天我与波兰大使谢特列茨基的谈话我说，波兰大使告知，美国企图 6 月 1 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的问题。我问乔大使这方面知道些什么。

乔回答说，以前就知道美国企图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以便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合法化，重新审议这一问题的数量方面。过去不知道美国要提出这一问题。

乔还谈到了南日在与他谈话中讲了对待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大使转述的南日所讲内容与南日亲自对我讲的内容完全一致。参见 5 月 28 日谈话记录）。

我讲了自己对该问题的想法，正如我对南日所讲的。

乔完全同意拒绝讨论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问题的意见。

会谈持续了 2 小时 30 分。会谈时 M. П. 库尔巴茨基、王宝民在座并翻译。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62 - 69

№20764

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

（1957年5月31日）

关于组织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备忘录

1957年5月31日

今年1月份，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我们通报说，为了就各党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需要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关于这一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对此你们持积极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的条件是，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应当随后再谈。①

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同意兄弟党关于举行会谈的建议，并且希望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意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是否认为，举行这样会谈的必要条件现在已经成熟。②

苏共中央认为，如果与会兄弟党代表都同意的话，可以在黑海沿岸地区——苏联、保加利亚或者罗马尼亚举行这样的会谈。

如果愿意在苏联举行这样的会谈，那么可以把会谈的地点选择在克里米亚。会谈应该秘密地进行。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在原则上同意参加这一会谈，那么，很想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在关于会谈时间问题上的意见。

至于会议的日程问题，我们认为，就会谈时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事先确定一个范围，以便与会代表就地解决交换意见的性质、内容和方式问题。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26，л. 27

---

① 1957年1月7—11日和17—19日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1月18日布尔加宁和周恩来签署了苏中联合声明，声明的文本见1957年1月19日《真理报》。——原注

② 1957年1月，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到访的周恩来进行会谈时说，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同时强调说，不应该强制性地通过所有的决议并把这些决议强加给他们。6月3日，南斯拉夫总统对苏联大使费留宾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将巩固和发展苏南关系，同时，他也说，在兄弟党会谈之前苏共和南共代表团之间应该举行双边会谈(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31，л. 2－3，37－41)。——原注(此处俄文编辑注释有误，访问南斯拉夫的中国领导人不是周恩来，而是彭真——编注)

№16686-1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

(1957年6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作家Б.波列伏依1956年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致信苏共中央。信中对在苏中文化、科学以及苏中其他联系的实践中所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并据此提出了某些建议。1957年初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米哈伊洛夫同志，也向苏共中央寄送了类似信件。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苏共中央的科学部、学校部、文化部、行政机关部都研究了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信件，并根据信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采取了措施。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批评和建议，大部分是正确的。

为了改进苏中文化联系，1957年初在北京签订了包括广泛领域问题的协议，规定继续巩固同中国的文化和科学合作。比如苏联文化部准备实施一系列措施，扩大中国科学、艺术和其他文献的出版。准备出版通俗文库"新中国"、中国诗选、画册《中国民间艺术》等。今年将出版中国作曲家作品集，并把中国音乐和歌曲列入音乐会节目。在电影艺术领域，除了业已建立的苏中电影活动家创作合作外，将出版献给苏中友谊的电影杂志月刊，计划创作关于中国的科学认识电影，采取措施改进在苏联中国电影联欢节的组织。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赠给苏联博物馆2 500多种艺术制品和其他艺术作品的回报，文化部准备建议将苏联博物馆藏品中有些艺术作品转交给中国。

波列伏依同志建议在莫斯科和北京协调出版苏联和中国所出版文献的图书目录手册，这些文献可相互被推荐来翻译出版。这种类型的手册，在苏联由科学院基础图书馆、苏联作家联合会外国部、外国文学出版社等出版。

关于互换艺术文献图书目录手册，委托苏联联合会同中国作家协会谈判，并实施该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指出了在接待和照应访苏中国代表团方面的一系列缺点。特别是，这涉及代表团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见。

目前，这种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按部、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组织渠道来访的代表团，通常可以同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会见。

波列伏依同志的见闻录指出，当中国早已存在中苏友好协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时，苏联并没有类似的同中国的友好协会，这不符合苏中之间确立的兄弟关系，引起中国朋友的不满。波列伏依同志建议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关于在苏联建立

苏中友好协会的类似建议，交给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苏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于今年3月4日通过决议，责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研究和向中央提出关于在苏联建立同一系列外国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友好协会或部门的建议。目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已准备了自己的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在见闻录中提出了在苏联出版中文报纸是否合适的问题，它类似于在北京由中苏友好协会做的那样。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苏共中央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外国文化交流委员会准备了这个问题，并于最近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在苏联出版中文报纸的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提出关于改善在华苏联专家教育工作的问题，提到苏联专家享有太多的特权，而其中有的滥用中国的好客。在中国实行勤俭节约的条件下，在华苏联专家的生活，甚至和中国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相比具有太大的反差。

波列伏依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考虑到了苏联大使馆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建议。1957年1月11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报酬的决议。关于改善在国外苏联专家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工作，苏共中央外交和外贸机构干部于今年4月召开了国外苏共党组织、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克服该项工作中缺点的问题。

波列伏依同志注意到了莫斯科-北京航线上旅客服务方面的缺点以及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和其他城市里飞机场很差的文化装饰。

因此，民航管理总局副局长热伏龙科夫同志亲自来到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航线检查和克服缺点。根据今年2月6日管理总局的命令，准备就改善苏联国际航线工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此外，同苏共州委书记商谈消除波列伏依同志信件中指出的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航线存在缺点的必要性的问题。

波列伏依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苏共友谊，应在苏联以某种形式普及在华首批苏联顾问的名字，如马林、越飞、鲍罗廷、布柳赫尔以及20年代同孙中山合作的其他人。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特别措施。在个别情况下，我们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1956年，苏联报刊首次刊登了孙中山和越飞的通信。在中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日子里，苏联和中国报刊都发表了孙中山政府及原军事顾问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位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去了中国。这样的实践，今后也可能被认为是合适的。

关于根据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所采取的措施，已告知他们本人。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В. 基里林(签名)

Б. 留里科夫(签名)

В. 佐洛图欣(签名)

1957年6月1日

第 15 - Д - 144 号

АВПРФ,ф. 5,оп. 28,п. 126,д. 506,л. 101 - 104

№20600 - 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

（1957 年 6 月 4 日）

1957 年 6 月 19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6 月 3—18 日
第 144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6 月 4 日

我应邀拜访了南日。

南日告知，朝鲜政府同意关于今年 12 月召开人民民主国家对外联络部长会议的建议。

南日接着说，今天中国大使乔晓光来访并转告说，周恩来同意南日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中立国委员会提出修改协定第十三条，即南朝鲜运进新武器问题，应当坚决反对修改。金日成也是持有这一意见。他接着说，有一项建议：今年 6 月下半月在朝鲜外务省召开有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委员会的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朝鲜的代表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在该会议上将通报朝鲜政府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会议目的——达到协调一致的观点。

我问南日，对即将召开的第 12 届联合国大会外务省是否已有拟定好的建议。

南日回答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难道只能，他带有很大保留地说，提出单方面撤军问题（我的理解是，他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

我谈了以下意见：这样的建议，依我看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现在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军队人数几乎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出将使局势朝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利的方向发展。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得不补充征召人员入伍并增加军费开支。然而，朝鲜的经济状况，我认为不允许这样做。

南日对我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并补充说，谈到撤军他指的是，撤出的部分军队将部署在中朝边境，一旦有情况能迅速出手援助。他继续补充说，他提出这一问题不敢说一定有把握，这一问题没有在任何场合讨论过。

通过交谈我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推测)：

朝鲜朋友希望的是，部分中国军队撤出并部署在中国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

谈到最高人民会议选举的准备工作时，触及到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

南日说，金日成希望自己仍保留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职务，目前令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不安的是首相问题，尽管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这一问题尚未讨论过。问题是很复杂、很困难的。

为什么？

曾打算让崔庸健担任这一职务。为了这一目的把他实际安排为第一副首相和朝鲜劳动党第一副主席。为了这一目的金日成放弃了内阁的职务。然而，实际情况表明，崔庸健担任首相职务不合适：工作较差，没有干劲，对国家的国民经济情况了解得很少，而且不努力争取更好地了解。虽然担任民族保卫相的职务，但军事工作也没有好好搞，全部工作由总参谋长金光侠(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担任。首相人选可以提出其他更合适的人。但问题在于崔庸健已知道准备给他什么职务。他是一个贪权和爱记仇的人。他会用庸俗的、蛊惑性的手段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方。因此担心，南日继续说，任命其他人为首相会引起崔庸健的激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党内非常复杂的局面。

谈到首相的可能人选，南日提到了金一。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116－117

№24936

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

(1957年6月5日)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被派往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以便了解中国的生活，为作讲座和报告做准备。

由于我受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邀请，因此我成了该局的客人。马列主义研究所

同该编译局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研究所曾向其提供了自己的出版物、参考文献，并同他们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进行过磋商。1955年，编译局副局长曾到马列主义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以便熟悉组织工作。最近两年有三名研究院的专家到编译局工作，现在编译局仍有一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且我们现在收到了再派遣两名工作人员的请求，要求一名在编译局工作两年，另一名工作一年。研究所工作人员给予编译局的工作人员巨大的帮助。

附属于中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其中有300多名工作人员。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已经出版的有：3卷《列宁选集》(第四版)，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11卷《斯大林选集》。编译局还把马列主义研究所出版的其他一些文献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列宁的《论重工业发展和国家电气化》、《论苏联国家机关工作》、《回忆列宁》、《苏联共产党决议》(第三卷)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译局计划改组为研究院，其任务类似于附属于苏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

我曾向编译局的工作人员作了两场报告：关于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列宁全集的报告，也向北京高级党校的教师们就苏共党史问题作过报告，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苏联专家会议上作过报告，为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作过报告。

在中国期间，除了到过北京，我到过的城市还有：广东、武汉、上海和杭州。众所周知，广东和上海曾是中国革命的重大发源地。我们访问了广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现在该校成了博物馆)，在上海，我们参观了曾为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纪念馆以及其他的历史名胜。

在北京，我了解了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党史文献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社，排字的困难令我们吃惊，排字工人不得不处理大量的文字符号，并且需要非常了解它们的位置，以便迅速找到需要的字符。尽管如此复杂，排字工人排字的速度很快，而且也很准确。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一个生产电子仪器的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工厂。该厂以前的主人现在是该厂的工程师。在同他和现在的共产党员厂长进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该厂前主人现在工作得很好，忠实于人民政权，在工作中同共产党人友好相处，参加了对资本家进行改造的学校的学习。他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块钱，是共产党员厂长工资的两倍多。此外，他还可以从自己被估算的数百万元的资本投资中每年获取5%的红利。上海的这个电子仪表厂看起来是其他工厂及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访问期间，我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授进行了会谈(1949年他到过研究院)，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进行了会谈。会谈中谈到了关于党的教育的组织问题，关于学院的培养问题，关于编译局的工作，关于文字的改革，关于党的工作作风的整顿，等等。

会谈中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针的实施并没有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唯心主义的信奉者在高校中讲授唯心主义哲学，结果是，没有发现唯心主义的信奉者、没有发现希望上唯心主义课程的人。北京大学

讲授了关于凯恩斯经济观点的课程，但是上课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因此，宣布这一方针不会导致高校中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的"毒花"的增长。中国同志说，北京大学将会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但上这些课的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他们说，希望要求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来授课，但能否邀请到，现在或许还很难说。

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这一方针将导致文艺、戏剧和出版领域的极大活跃。

关于党内生活，苏联现在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中国正在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大规模工作，并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各级党组织都在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短暂的在中国访问期间，通过同中国同志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进行的谈话得到的印象以及一些观察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活，这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根据报纸公布的材料，最近4年，在商品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33.5%。从1950年到1956年，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157%，诸如棉布、胶鞋、盐这样的农用商品的销售增加了2—3倍甚至更多倍，而煤油的销售增加了12倍。

无论到了哪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热爱劳动的人民，他们是纯朴的、诚实的。无论到哪个地方，苏联人都会受到特别热情的接待和尊重。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

Г.奥比奇金

1957年6月5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95－98

№1180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党务代表团

（1957年6月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1956年的年度报告中，建议派出由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作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和党务机关的工作情况。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年代里，在党和国家建设领域以及组织开展群众性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提出了许多有特色和独到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党务机关工作中一系列好的方面，尤其是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务建设工作方面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向苏联派出自己的党务代表团，学习苏联共产党党组织的工作经验，而苏共党的代表团前往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等等。在我们看来，苏共代表团前往中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肯定会受到中国朋友的热烈欢迎。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大使馆的建议，在今年派出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党务代表团前往中国。按照互相轮流的方式，可以邀请中国共产党党务代表团前来苏联。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就此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适宜的。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7年6月7日

第15－д－207号

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函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并递交以下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贵党建设实践和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到现场了解贵党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实践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互相交换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负责人员代表团，以便相互了解对方党的工作的经验。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那我们可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编制15—20人，同时接待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了解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实践。

致兄弟般的敬礼。

苏共中央”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41, р. 8862, л. 16–17

№20600–2

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

(1957年6月11日)

1957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3—18日
第144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6月11日

南日邀请我以及中国、捷克和波兰大使到外务省，并说了以下内容：

众所周知，去年美国人单方面中断中立国停战委员会的工作，把该委员会的代表撵出南朝鲜。目前，美国人在散布北朝鲜破坏停战协定的挑拨性谣言的掩护下把武器运进南朝鲜。

有种推测，美国人7月1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或中立国委员会里提出修改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的问题，目的是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合法化”，而且可能单方面宣布这件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对中立国委员会的瑞典和瑞士代表施加压力。

鉴于此，建议于6月17日在朝鲜外务省非正式召开中立国停战委员会的波兰和捷克代表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国和朝鲜代表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和捷克大使的会议。

会议宗旨：达到协调一致的观点。

中国大使乔晓光、捷克大使苏利纳·米库拉什和波兰大使谢特列茨基完全支持南日关

于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

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美国人煽动的挑衅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千方百计把非法运新武器进入南朝鲜伪装起来，不是保持持久和平，而是破坏朝鲜停战，这一切是为了使美国人继续实际占领南朝鲜。必须大力揭露美方宣传的这类阴谋，揭露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和实际行动，不允许修改协定第十三条。我认为6月17日在外务省召开会议是适宜的。至于苏联大使参加会议问题，我另行告知。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3, д. 5, л. 124－125

№25212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

(1957年6月11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1957年6月11日
第645/дв号

苏 中 关 系[①]

……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之间建立在交换意见基础上的信任和相互理解仍然得到了极大加强。中共中央和党内领导干部谈及苏联、苏联机构以及苏联驻华专家时，能坦率地提出对他们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在早些时候是很少或者通过很隐晦的方式提出的。

此外，中方就(赫鲁晓夫)评估斯大林角色的演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中国朋友的批评指出，在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以及双边的党际关系等问题上，苏联方面往往没有与中国进行事先协商。

苏联和中国之间就经济或其他问题展开的磋商，常常因苏方的失误而延期。这一事实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在中国并非没有被注意到。李富春副总理就因苏方负责经济谈判工作的部门在准备工作方面做得很糟糕而在莫斯科滞留了几个月。

在反对在中国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科学和艺术发展新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报纸越来越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作家的个人立场，批评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举例来说，1957 年 1 月 11 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直接批评了日丹诺夫同志有关哲学史的言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国报纸对苏联电影展开了批判性分析，这在当时的苏联电影节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些中国文章中指出了苏联电影的消极面。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举办电影节的时候，苏联报纸也批判性地评价了中国的电影。

在那些只在党的领导干部中传阅的内部资料中，越来越多地刊登了生活在苏联的中国记者和学生提供的消息，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报刊的关于苏联国内某些负面情况的报道。尤其是，最近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就不同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关于劳动收入问题的争论，关于苏联不同地区广泛存在的混乱的思想情绪以及一些在海外的苏联公民的不当行为等方面的材料非常多，而在过去中国朋友并不关注一些在华苏联公民的错误行为，以及相关苏联机构领导人所犯的个人错误。

正如他们向大使反映的那样，中国朋友毫无疑问是从良好的动机出发，以同志的身份去批评我们的各种问题，除了个别非正常的会干扰巩固我们之间友谊的因素。

……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

远东司三等秘书

Ф.莫丘利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29，п.426，л.40－52

№09981

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

（1957 年 7 月 3 日）

摘自阿布拉希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7 月 9 日

机　密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会谈纪要

1957 年 7 月 3 日

1957 年 7 月 3 日，我拜访了邓小平。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向他递交了苏共中央 7 月中央全会有关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问题的决议以及苏共中央致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信的全文。

在随后的交谈中，邓小平谈到了中国国内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据估计，这场斗争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有力量在两三天内就把右派分子压垮，但是没有必要那么做。将给右派分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说完想要说的话，因为这样能给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上一堂很好的课。

通过暴露真面目，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教育广大群众和中间分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鼓励，他们是不敢开火和这么大规模地干的。邓小平特别指出，右派分子像一条从地里钻出来的蛇，察觉到危险以后想钻回去，但是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尾巴。

反右斗争已经展开。这场斗争积极的一面是使干部们有机会积累经验，得到锻炼。有些党员干部不敢让右派分子有充分自由来陈述他们的观点。可是经验表明，哪里的右派分子有充分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哪里的反右派斗争就进行得比较成功。在那些地方，斗争的对象暴露了，反击的目标显露出来了。在那些地方，群众看清楚了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露骨敌视，在开展斗争的时候就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在有些单位和组织，右派分子没有机会讲话，他们的真面目也就没有得到暴露。有些地方甚至邀请别的地方的“右派分子”来讲话。在这样的单位，斗争成了无的放矢，达不到目的。

这场运动的缺点是，不是所有的党组织都能在必要时充分地讲清楚中共中央为这场斗争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中央避免管得很细或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而是想让党组织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来体会中央的策略，深入地理解执行这一方针的必要性和好处。

邓小平还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冷静来忍受右派分子在口头上和通过报刊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一连串攻击。

另外，邓小平说，这场运动开展得不平衡。有些地方反击得太早，敌人隐蔽起来了。但是迟迟不动是不能原谅的。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给予打击。当然，让右派分子再多讲十天也是可以的，但是总的来说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已经暴露自己，群众对他们的观点已经了解。邓小平说：“大鱼已经在网里了。”

我说，周恩来同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工作报告，而且也是党给予右派分子第一次有力的打击。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补充说，人民群众正是这么理解周的报告的。右派分子也清楚地看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报告的这一内容。

我问，右派分子在全部进攻都崩溃以后，现在表现如何。

邓小平回答说，他们现在想隐蔽起来，但是他们办不到。右派分子之间已经开始争吵和分裂。在上海，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谴责右派头目，说他们反动透顶。有些右派分

子已经投降，其余的人还在继续顽抗。

中国共产党不但不镇压这种顽抗，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支持它。右派分子正在彻底地撕掉自己脸上的假面具，在此基础上将能够给群众上一堂很好的课。章乃器等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在继续顽抗。中国共产党认为，即使他们负隅顽抗一年，党也要在整个一年中向他们做艰苦的解释工作。

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也将执行同样的政策。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将留在高校内，其中的有些人在毕业后还可以留在各自的高校内当教员。例如，甚至给他们机会每3个月讲一次他们的观点。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学生中间通过直观教学来开展教育工作。对高等院校的教师也照此办理。

我问右派分子大约在大学生中占多大百分比，邓小平回答说，右派分子在大学生中平均只占1%，还有更多的摇摆不定的人，他们受了蛊惑人心的右派分子的欺骗，但是目前他们正再次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某些高等院校，右派分子的百分比要高些。例如，北京大学是3%，有些高校则高达10%。

在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提到，今年的农业收成前景良好，但是7月底和8月初常发生水灾。

在中国，平均每年有2 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了三次严重水灾，每次大约有4 000万人受灾，去年有7 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

在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向他谈了将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的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谈话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阿布拉希莫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0, п. 424, д. 8

№20601－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

(1957年7月5日)

1957年7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19日至7月8日
第157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5日

我应邀拜访了南日。

……

在交谈中南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反党小集团在8月(1956年)中央全会被揭露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党内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南日没有举出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我从内务省的苏联顾问专家处得知，对集团头目进行了侦察跟踪，但没有查到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

在8月中央全会上，南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对反党集团的行为很愤怒，并一致谴责他们反对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的活动。我们在A.И.米高扬同志(代表苏共)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共)的参与下又举行了9月中央全会。

谈到这里我对南日说：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党集团参与者及其追随者发了好几次言，给了他们知无不言的机会。苏共中央全会参加者在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之后，一致谴责集团的反党活动。(60人发了言，其他人递交了书面声明。)决定一致通过，只有一票弃权(莫洛托夫)。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没有南日所说的集团中的任何人发言，开除几个人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前也没有听取他们中任何人的意见。因此，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就来了。众所周知，他们并没有判定一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想提的建议是否正确，而是着重指出代表们粗暴地违反了党内生活准则。

南日表示同意，但他力图辩解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参加者被尹公钦在全会上发言一开始就进行的诽谤性攻击所激怒(发言半途被中止)。

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并提醒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在场时)以及金日成与我于今年4月9日谈话时都承认他们做得不对，违反了党内生活的列宁准则。

南日问我是否已把朝鲜内阁首相人选问题的现状向苏共中央领导通报。

我回答说，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做，因为全会之后我马上回到这儿，为的是尽快把全会决定向金日成同志通报。南日再一次重复说，如果任命崔庸健为首相是很危险的，他会在朝鲜的内外政策上犯许多错误。

我问南日，金日成是什么意见。

南日回答如下：

在最近一次谈话中金日成说，他将找崔庸健谈一谈，让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担任党的工作。然而，他(南日)持反对意见并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金日成仍担任首相，同时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以便主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而为了领导全部工作设立朝鲜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金一为第一书记，2—3年以后选金一为首相。根据南日的话金日成说，他将考虑这一建议。

南日说，大量军事干部积极支持崔庸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战争期间反对采用苏联军事战术，他(南日)当时担任总参谋长曾经与这些人展开斗争。他特别提到原朝鲜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朴一禹。谈到此我问，朴一禹目前处境如何。

南日回答说，朴一禹释放以后现住在家里。(的确如此，朴一禹与家里人一起住在郊外，受到保护。对他的审讯已停止。)放他到中国的问题已解决。领导层委托金一在他带着五年计划草案前往中国时，试探一下中国朋友现在如何看待朴一禹前往中国一事。如果意见没有变化，那就允许朴一禹前往中国。

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3, д. 5, л. 138–141

№1381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

(1957年7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7月8日会议第10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库西宁、米高扬、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柯西金、波斯佩洛夫。

1. 米高扬同志中国之行的情况通报。①

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体会议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最初他们说：开除出中央是徒劳的(反对采取尖锐的措施)。

赞成米高扬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认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提交了情况报告——中国还欠我们多少债，都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收到了什么。②

---

① А. И. 米高扬于1957年7月上旬访问了中国，其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出访结果获得了赞扬(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134, л. 1)。——原注

② 临近1957年年底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收支出现了赤字，仅在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就超过了25 000万卢布。在1957年，中国向苏联转交了根据此前协商一致的12 500万卢布的黄金，而不是外汇，就像前几年一样。——原注

(委托柯西金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研究这个问题。)

2. 关于国防委员会的组成问题。[①]

(赫鲁晓夫同志):不应该把别尔乌辛同志列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中。[②]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没有这个必要。)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7,л. 59－59об

№218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1957年7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7月8日会议第100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米高扬同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的决议[③]

第100/I号(1957年7月8日)

绝 密

1. 我们认为,米高扬同志访问中国并向中国朋友通报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相关决议是有益而必要的。

同意米高扬同志在访问期间所做的工作。

2. 责成米高扬和柯西金等同志研究中国对苏联所欠债务问题,并就该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34,л. 1

---

① 根据苏共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1957年7月8日批准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В. М. 莫洛托夫和Л. М. 卡冈诺维奇开除出苏联国防委员会以及把А. И. 米高扬和И. И. 库兹明列入到该委员会的组成中的决议(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34,л. 2,4)。——原注

② 在Г. К. 朱可夫1957年7月3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议把А. И. 米高扬、И. И. 库兹明和М. Г. 别尔乌辛列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中(РГАНИ,ф. 3,оп. 12,д. 240,л. 5)。——原注

③ 决议提交者:А. И. 米高扬。——原注

№20602－1

普扎诺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

（1957 年 7 月 12 日）

1957 年 8 月 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7 月 11—31 日
第 175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7 月 12 日

我与朴义琓同志一起视察了位于索普河(Сопхо)的苏联大使馆官邸地块(为了进行水上勘查设计工作)之后，在我的官邸午餐时与他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朴义琓讲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近期工作情况，并涉及一些其他问题。

朝鲜劳动党 9 月中央全会之后，朴义琓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更多遵循集体原则。定期召开会议，更积极地开展问题讨论和交换意见。在会议过程中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观点的，除了金日成，还有总参谋长金光侠、他(朴义琓)以及其他人。但是常务委员会许多成员(朴金喆、金昌满、朴正爱、郑一龙)按惯例，没有充分讨论，各方面都支持金日成的建议。而金料奉和崔庸健多数情况下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保持沉默。

然而，不久前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研究犯有巨额盗用公款的朝鲜文化省事态问题时，崔庸健发言激烈，提出逮捕文化相的建议。常务委员会没有同意这么极端的建议。

几天前常务委员会在谈论朴一禹问题时崔庸健也发了言。他继续坚持不放朴一禹到中国，而这一点先前已作出决定，因为按他的意见，这样会壮大跑到那儿去的朝鲜干部的反党集团。金日成对改变先前已作出的决定表示反对。他说，关于朴一禹问题的决定不能再拖延了。必须或者给他在朝鲜安排适当的工作，或者同意他到中国去。金日成强调指出，中国同志将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士，因此，不用担心朴一禹到中国去。已经委托 3 位常务委员会委员再与朴一禹谈话，弄清他的最终愿望并据此决定问题的处理办法。

朴义琓接着又告诉我，1 个半月至 2 个月之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将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韩相斗任命为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取代逃往中国的徐辉)。同时，讨论了中央组织部起草的文件，文件中对徐辉的反党活动给予了评价并特别

提到他对苏联籍朝鲜人的挑拨离间活动。

就此问题(朴义琓)发了言,在肯定对徐辉活动评价正确性之后指出,徐辉反对苏联籍朝鲜人运动中的助手是韩相斗,正是他在那个时期提出了全部苏联籍朝鲜人的"黑"名单。因此他(朴义琓)建议把韩相斗的这一错误立场写入上述文件。常务委员会否定了这一建议,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我问,我认为金日成目前对苏联和苏联大使馆的态度是真诚和友好的看法是否正确?朴义琓作了如下回答:

金日成真诚和深信不疑地支持苏共中央的政策和苏联政府采取的措施。他现在给予苏联大使馆很好的评价。至于反对苏联籍朝鲜人的运动(1955—1956年),依我看,朴义琓说,金日成完全清楚中央在那个时期所犯的错误,但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点,也不认为可能通过为我们恢复名誉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朴义琓强调说。

在交谈过程中我问朴义琓,在他看来,朝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朴义琓回答说,朝中关系的许多困难与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的错误行为有关。他不与朝鲜干部进行任何交谈和联系。甚至精通中文的金昌满,朴义琓补充说,要与乔晓光搞好关系的努力毫无效果,并认为他在调整好朝中关系方面是不称职的大使。

我对朴义琓说,对乔晓光下这样的结论是不能同意的。我们对他形成了良好的印象。可能他在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还缺乏经验,但这件事需要双方坚持不懈和友好的工作。

朴义琓对朝鲜内阁首相人选这一目前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候选人崔庸健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他能力差,不懂得也不想学习经济和国内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大多数领导干部中没有威信。朴义琓补充说,崔庸健过去曾带头反对苏联籍朝鲜人。

随后,朴义琓谈到了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对待经济问题顾问马卡罗夫同志的要求的错误态度。李钟玉拒绝给马卡罗夫同志提供关于基本建设物资平衡和分单位制成的总预算表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根据朝鲜朋友的要求,给他们在朝鲜五年计划草案方面提供咨询所必需的。在朴义琓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向金日成作了汇报,金日成吩咐立即提供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所需要的五年计划草案方面的资料。同时,金日成对李钟玉指出其错误行为,并说任何必要的材料都应当提供给苏联。

接着,朴义琓讲了他两个月前主动找朝鲜劳动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金昌满谈话的情况。朴义琓问,为什么金昌满和其他常务委员会委员对他(朴义琓)不怀好意,甚至敌对。金昌满回答说,他和其他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朴义琓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朝鲜期间的表现不满,当时朴义琓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但是现在金昌满认为他与朴义琓的关系是正常的。

我问朴义琓,他如何评价相互关系,他回答说,确实他与常务委员会委员之间的关系已有改善。近几个月金日成多次找他谈话,给他讲一些问题,对朴义琓有关的工作指出建议。

随后,谈到朴正爱,朴义琓指出,她在中央和常务委员会的地位和威信近来也都有提高。

朴义琓最后讲了他与南日的谈话，谈话是关于金承化(原建设相，目前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学习)。朴义琓建议南日把金承化从莫斯科召回，并当面弄清对他的指责。南日不同意。朴义琓说，对他有点新意的是南日认为金承化不愿意回到朝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会产生他过去与苏联大使馆不正常关系的问题，而这是不允许的。至于什么关系，朴义琓不能说。

大使馆参赞佩里申科谈话时在座。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147-151

№20602-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

(1957年7月16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16日

根据原先的商定我接待了中国大使乔晓光并与他进行了交谈。

应大使的要求我对他谈了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

大使对我的通报表示衷心感谢和个人赞同全会决定，还讲了我们已知的中共中央的态度以及《人民日报》已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大使同意我所说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历史形成的苏联与中国、苏共与中共的友谊与团结的重要性。

随后，乔问起金一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何时从莫斯科回来。大使补充说，代表团回来后将前往中国，他将陪同前往。

我回答说，计划今年7月20日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咨询工作。我估计代表团可能将于本月底回来。

谈话时担任翻译的是大使馆随员 M.П.库尔巴茨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51－152

№20602－4

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

（1957年7月29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29日

我和朴正爱一起回到了平壤。在交谈中她谈到了以下一些问题：

关于内阁领导。让崔庸健担任内阁首相，这是1956年金日成曾经提出的，已完全不可能。据她说，金日成自己也深信这一点。待在别墅期间金日成曾与朴正爱商量，是否从本地朝鲜人干部中推荐首相人选，当时提到了财政相李周渊。

朴正爱说，我当时就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并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一段时间内金日成继续兼任内阁首相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

第二，崔庸健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金一担任内阁首相，而金日成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

据她说，金日成表示要好好考虑这一建议。

朴正爱说，崔庸健对这一职务会满意的，对于他将不担任首相，也不会引起什么麻烦。至于金一，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修养和做事认真的干部，长期和金日成一起工作，金日成

很了解他。金一在工作中与各阶层干部和劳动群众保持广泛联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人商量，能认真听取意见并执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指示。因此，金一是首相最合适、最好的人选。朴正爱指出，同意这个建议的有金昌满、南日、金光侠，她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其他委员也会同意的。

至于金枓奉，朴正爱说，不要再让他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了：他工作没有任何积极性，年龄也大了(68 岁)，做出了违反党性的事，具体如下：

战争期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他提出尖锐批评(鉴于丢失苏联制造的勋章以及常委会工作的缺点)之后，他在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会议上当着党外人士的面宣称，政治委员会不把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放在眼里，不让它有独立性，他还说，如果不是战争时期，他会辞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朝鲜劳动党 8 月中央全会之后，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本应讨论撤消一些反党集团成员担任的领导干部职务问题，金枓奉借口已订好火车票要去休假，就在常委会开会时离开了。其实他早有预谋，并根本不想讨论解除这些反党集团成员所担任的职务，因为他同情他们并支持他们。

随后，朴正爱说，金光侠(总参谋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民族保卫相，南日担任副首相和外务相是相宜的。

她对内务相方学世工作的评价很高并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上应当把他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关于一些省(部)的合并。朴正爱告知，已通过决定要合并文化和教育省(部)，建材省与建设省，储备省与公用事业省，最后一个省的名称尚未确定。

我指出，合并文化与教育省、建材省与建设省显然是合理的，至于把储备省与公用事业省合并为一个省，我不完全理解，怎么可以把很少有共性的两个省合并在一起。

朴正爱也没有讲出什么想法和根据。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朝鲜军民的态度。我问朴正爱，应如何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什么误会或相互有自以为是的行为。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待朝鲜居民的态度，朴正爱对此的反应良好。诚然，初期有过傲慢的情况："我们来自大国，你们是小国，因此，我们可以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些坚决被制止。有几个人由于错误对待朝鲜居民甚至被枪决，尽管我们请求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现在一切正常，个别小事忽略不计，这类事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朝鲜人民军战士也犯。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159－162

№08851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

(1957 年 7 月 31 日)

1954 年苏联内务部消防队工作人员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朋友们现在表示，愿访问苏联以便学习我国的消防经验。

苏联内务部请求允许邀请中国消防队工作人员代表团来苏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1957 年 9—10 月期间)，这是考虑到中国代表团出席华沙国际消防委员会代表大会后，将于今年 9 月 20 日返回。

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的费用可由苏联内务部预算报销。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91，л. 380

№0885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

(1957 年 8 月 7 日)

作为 1956 年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领导人曾请求如有可能邀请他们来苏联参加一次本土防空演习。

由于 1957 年 8 月下半月将同苏联国防部一起举行苏联本土防空演习，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允许 6—8 名中国同志参加这次演习，在演习过程中给他们介绍参加演习的各加盟共和国、州和区指挥所的战斗编组工作。

请求苏共中央对上述内容作出决定。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91，л. 349

№25213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

（1957 年 8 月 8 日）

摘自 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8 月 10 日
第 1596/ГС 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①]

1957 年 8 月 8 日

我在刘晓的要求下会见了他。

……

2. 刘晓奉其政府之命，询问苏方是否有可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使得两个即将建造的回旋加速器的其中之一具有 2 500 万伏特的能量，苏方是否可能提供所有必要的技术文件，并在 1958 年上半年接待一个由 5—6 人组成的小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刘晓强调该请求是非正式的，还要取决于苏方的具体情况，并在双方协调沟通的基础上予以确定。

我回答说我会将他的请求转达给相关部门。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50，д. 3，п. 423，л. 37－38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4937

《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

（1957年8月9日）

《真理报》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来自中国材料的内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指示——引起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反响。就其性质来说，这些信件可以被分为如下三类：来信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表示欢迎，并认为这些指示在我国也可以实行；来信者建议我国报纸对中国开展的这些活动进行更多的解释和评论；来信者在信中反映了中国开展的这一运动的一些问题。

按这些类型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汇编。

Е. И. 热尔瓦科夫（莫斯科州昆采沃区、马兹罗沃村、什科内利街、12号，信件编号116758），写信者是第п я222号工厂的一名铣工，他请求把他的信转交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我在《真理报》上看到了您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以前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工作作风的指示以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经验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对任何一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答复，实在是太好了。显然，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应该尽快贯彻一切宝贵的、有益的东西，同时尽快消除我们阵营中的各种错误。毛泽东同志，请允许我真诚地祝愿您——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领袖健康长寿，为亿万中国人民谋福利，并且保持世界和平！再次请求您向中国人民转达我亲切的问候，祝愿他们万事顺利。"

Н. И. 莫金，苏共党员（阿尔汉格尔斯科市，卡尔·马克思大街28栋6号，信件编号100557/2），他在信中写道："《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这一指示令人非常激动。这一指示非常英明，又很实在。读起来令人兴奋，这一指示非常有力，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人民的智慧。把所有这些指示都贯彻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我们的个别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十月革命之后，我没有看到苏共州执行委员会、州委、市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同自己的同事们一起就城市的公共事业工作过。阿尔汉格尔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Н. А. 拉奇科夫同志、州执委会副主席Н. П. 叶多文同志、И. П. 阿拉贝谢夫同志、Н. Н. 谢德利切夫同志一刻也没有就城市的公共事业工作过。这些人认为，同自己的同事一起工作是可耻的。好似那样做会损害他们的尊严。"

И. 库季诺夫是一名苏共党员（塔什干州，俄罗斯奇尼阿兹村，信件编号97921/101），他在信中写道："当在《真理报》上读到关于中国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时候，非常高兴。中国同志们开始在思想上完善自己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下达该指示的重要性是显然的。这一指示将使党和人民群众相接近，这将使共产党更有力量、能力和威信。体力劳动将使人们更加健康和理智，并能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类似的消极现象。列宁尽管非常繁忙，

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中国的同志们走的是列宁的道路。我们中间就有个别同志整天躲在办公室中，埋头于大量的文件材料，而不了解集体劳动的重要性，害怕走入集体，害怕抽出时间参加劳动。所产生的问题达到的程度是，生活在距企业100—200米的厂长，还乘坐汽车上班。到田野的生产队的时候，这样的领导人不能走向田野的深处，以便检查土壤的质量。只是向远处张望一下就走开了。这些同志没有感觉到，工人们和农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并且认为这样很正常。更糟的情况是，有一些同志非常狂妄，认为自己比自己所有的下属都高一头。”

A. И. 柯林(古比雪夫市，信件编号 99825/51)在信中写道：“应该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产生的最初年代，列宁就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从中不难发现现在中国推行的整顿领导作风的活动的相似性。列宁在其最后的信件中指出，必须显著提高苏共中央委员的素质，依靠的方法是使那些值得信任、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基层工人干部进入中央。由于一些原因，首先是由于个人崇拜阻碍了列宁指示的实行和进一步推广。从苏共中央相关的决议中的共同的看法来说，这些原因及其后果没有被好好地反思。在这些原因中比较明确的有两点：第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精神状况恶化了；第二，人为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和农民分割开来。事实上，在苏联政权存在的 40 多年内，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挑选出来各种各样的人，尽管他们较有才华、能力，有一些特别的和独特的能力等。数百万或多或少对非工人的专业领域和非农民的领域的工作表现出能力的工人和农民被发掘了出来，他们在经过训练后被派往了国家机关、党的机构、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军队、文化组织、创作机构以及其他的许多组织，这样，他们就不再是工人和农民了。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同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失去了日常上密切的联系，这首先阻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精神和文化发展。

那些曾是工人和农民而现在成为苏联知识分子的数百万领导干部的工作也不会更加顺利。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忘记了体力劳动，这不仅对知识分子的外部面貌，而且对他们的内部面貌都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结果，知识分子的一些消极的社会陋习就不断蔓延，比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自高自大的老爷派头、功利主义、受贿、教条主义、无原则性、政治消极、创作无力以及其他一些微小但具有社会危害的缺点。正如所看到的，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相脱离对一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脱离在工作的时候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我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是：即使是在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领导同志把双手插在口袋中，下达所谓的领导的指示，并且认为同普通的同志一起工作一会，哪怕是工作 2 个小时也是很可耻的。这种对体力劳动的忽视将会导致个人的身体素质和道德的改变。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数百万优秀儿女们应该改变他们所犯的、对他们的阶级产生危害的错误，也就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关于这种回归的方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来了，这就是：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

德列穆奇，苏共党员(莫斯科，斯塔罗-皮缅诺夫斯基街区 13 栋 21 号，信件编号 103248/0)，他在信中写道：“当你看到描述列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图画的时候，普通人的心情都会特别高兴，正是这些普通人改造着整个世界。我国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将会教育新

的一代,消除老爷习气、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件编号第106367/87号,(斯塔夫罗波尔区),该信的作者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共中央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如果检验一下我们对区级和州级干部工作的态度,那么就会经常发现,其中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事实上对人民的生活了解得很差。其中的许多干部曾是党内优秀的同志,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早就不工作了,而是处处由专家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准备报告。比如,如果到斯塔夫罗波尔区执委会副主席洛尼斯同志那里检查收割庄稼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一定会随身带上一名农业专家和工程师。是时候把那些长期以来占据要职但什么也不做,并丧失了列宁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从他们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使他们同普通人和工人接近。"

A. 戈林(斯捷尔利塔马克市,共青团街98栋,信件编号102077/7)在信中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该文引起了人们非常大的兴趣。该文谈论了关于怎样深入而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活动是非常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在我国开展这一运动也非常有益。"

П. П. 加夫留克(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信件编号195867/10)在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首倡是明智的、富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应该学习和贯彻。尽管我国的国家管理机构经常缩减,但现在仍然非常庞大,它脱离了许多人物质财富的生产。巴拉诺维切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以及苏联其他许多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急需工人,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播种、栽种蔬菜、施有机化肥、除草、购买种子、收割等等)。特别是在城市周围的那些农庄,由于许多村民都到了城里从事生产工作。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区委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州机构和加盟共和国机构的工作,那么就会得出结论,机关干部可以利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建筑业和工业企业的工作。"

P. 达夫利亚托夫(塔什干州,上沃棱区,区执行委员会,信件编号107794/101)在信件中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我认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应该通过这样的决议,因为党的机构和苏维埃机构的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一些'脏工作'、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老爷式的。此外,他们自己不工作,而且漫不经心地对待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会对我们共同的事业产生非常大的危害,这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为费力的工作就是采摘棉花。不仅工人和职员,而且中学生和大学生也帮助采摘这'白色的金子',在采摘棉花这一重要的工作中,领导干部的直接参与起着重大的作用。此外,这将会额外收获数十和上百吨的棉花,领导干部本人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动员劳动者采摘棉花,提高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但是,情况经常不是这样。

去年秋天的一个休息日,上沃棱区委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了红色十月集体农庄的第14大队采摘棉花。这一天是区委组织部主任 A. H. 沙赫马托夫和区调查员 A. 尤努索夫第一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出来工作,他们每人采摘了1.5公斤棉花,然后在中午12点

离开了田野。在看到这些共产党员对体力劳动的这种态度之后，其余的工作人员在午餐后也回家去了。他们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拍那些不会采摘棉花、不会弯腰的人的马屁。共产党员阿布巴基罗夫·阿布扎尔、巴甫别科夫·扎基良、贾纳别科夫·拜穆尔扎以及其他人对体力劳动都持这种态度。除了谩骂其余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做。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也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除了组织上的作用外，这还有巨大的教育意义：领导干部亲自参与劳动的那些工作队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余工作队的1.2—1.5倍，比起领导不愿干活的工作队，有领导参加的工作队的学生也更加愿意在下课后参加普通的工作。

如果直接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就会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建议。这将非常有助于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有助于同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其他的缺陷作斗争。”

Ю. Н. 萨尔诺(哈尔科夫市，比罗比詹大街4栋13号，信件编号107312)在信件中写道：“中国就逐步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采取了初步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有力的、重要的。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在我看来，设计师、工艺师以及其他的在工厂技术部门工作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在工作日的最后几天的工作成效是非常少的。此外，技术部并不总是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利用，经常有许多空闲时间。我觉得，一些部门的技术工作者以及工厂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自己工作日的最后一段时间应该在车间、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基连加乌捷(列宁格勒州，别索契内，列宁格勒大街第81栋，信件编号107166/55)，在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而且对我国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将会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领导更加正确和具体。实践证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劳动者需要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主要在于，机关和组织的领导干部对生产需求和劳动者的需求的了解不够。

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还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业务领导更加正确和具体。领导干部参与体力劳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苏维埃机构和党的机构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每年都应该在一定的时期从事……①”

斯佩西夫采夫(格罗兹尼市，克拉斯内-弗伦托维科夫大街15栋，信件编号10122/23)，苏共党员。他在信件中写道：“如果说在劳动人民夺取政权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同志采取了一些坚定而完全现实的措施，警告国内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行为，那么，我们也应该采取其中的一些措施。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自然能顺利地摆脱如下不良状况：尽管国内的总政策是正确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紧密的日常联系，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因此，我认为，《真理报》必须就如下问题交换意见：关于中国同志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其中的哪些建议。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正如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所提出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一措施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

И. М. 库祖博夫(沃罗涅日州,里斯基市,信件编号 82306/19),他在信中写道:"《人民日报》针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把官僚主义从我们的社会清除出去,苏联人民将会得到许多好处。因此,我们也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生产中最为经常发生的冲突正是由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引起的,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没有真正同官僚主义开展斗争。"

Е. И. 戈洛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信件编号 84162/81)在信件中写道:"让我们看看中国吧,它成立才只有 7 年,就勇敢地提出了关于矛盾的问题。为什么成立了 40 年的苏联不像中国那样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在伏尔加顿斯克市的一个人造脂肪合成联合加工厂的建筑工地工作,该厂的名称为尼日涅敦盖斯特罗伊。我们的每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得到劳动者的尊重,毕竟领导干部有国家授予的权力,他还是党员。在我们的建筑工地上领导是不受尊重的,他们搞了建设,然后又把它摧毁了。比如,水泥地板在刚入冬的时候就有水珠渗出,今天由于废旧金属的打击倒塌了。其损失是数十万元人民的资产。但是有关部门还因这一耻辱的行为得到了奖励,而工地主任——酒鬼库克索夫还被授予了红旗称号。对此您会怎么想呢?这是矛盾还是比这更糟的什么东西?毕竟我们有工会、党组织。他们应当对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者不愿接受建议,不愿听取工人的意见,他也不把建设的任务和前景向工人们讲解。而工人们也不会尊重这样的领导人。"

Н. Д. 德罗诺夫、А. 谢苗诺夫都是苏共党员(巴库市,卡冈诺维奇大街 22 栋 65 号,信件编号 106040/4),他们在信件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国同志的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非对抗性矛盾、克服官僚主义、不仅加强国家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控制,而且加强对党的机构的控制,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把广大群众吸引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两份文件中的内容没有争议和需要驳斥的内容。我们认为,中国同志谈论的许多问题都符合我们的实际。遗憾的是,在苏联政权建立 40 周年的时候,我国事实上仍然存在官僚主义,大量的官僚主义经常藏在社会主义的队伍中,经常阻碍着广大群众的创造性或者犯下罪恶。

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这些建议也适合我国,采用它们对我们将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项党的或苏维埃机构的工作,许多同志都坚决拒绝从事生产工作,从事群众工作,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旧中国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还没有被摆脱掉。当我们的领导干部留起长长的手指甲,把手指保养得光光亮亮的时候,还不能说明这一点吗?遗憾的是,在许多大学毕业或中等学校毕业的相当多的青年中也可以发现对体力劳动的忽视。那些被父母娇惯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被许多的事实所证明,这该怎么办呢?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或许,我们写的信件不很重要,但是我们写信的时候是真诚的,是凭党员良心写的。《真理报》没有对发表的中国同志的文章作任何评论。因此,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内容是公正的和应该被关注的。既然这样,就希望通过《真理报》或者其他的报纸了解一下,中国同志的

文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国的现实。”

维里加耶夫、罗曼诺夫(克拉斯诺雅尔萨市，建筑中等技术学校夜校，信件编号104275/49)：“我们是克拉斯诺雅尔萨市建筑技术中等学校夜校的领导干部，读了中国同志关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文章，我们希望了解我们的党和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否有必要利用这一经验？”

Б. И. 雷瓦(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大街38栋1号，信件编号10082/0)在信件中写道：“我要表达许多读者的愿望。我详细读了《真理报》上的文章以及对毛泽东报告主要内容的解释，我认为，这些内容和解释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实践意义。我给《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写了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些报纸和杂志上还没有发现有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同志上述报告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和重要的。”

Б. М. 维连斯基，苏共党员(博布鲁伊斯克市，昌噶尔大街46栋85号，信件编号102749/60)，他在信中写道：“前不久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人民日报》关于改变领导作风以及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文章。在共产党人中开始讨论这些文章。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些内容应该在我国立即实施，而另一些人，比如我们的宣传员佩夫涅夫则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工作已经做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定只是关于中国人的。我想了解《真理报》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Е. Е. 温尼茨基，В. 西拉耶夫(伊万诺沃市，信件编号92929/32)在信件中写道：“在读完《真理报》上刊登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之后，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请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答复。1. 苏联的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矛盾？2. 我国的报纸是否会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这个问题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3. 针对我们的情况，苏共党员应该怎样向广大群众解释这些文章？

我们觉得，必须在我国的报纸上在更广的范围内阐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请共产党员对这一问题予以正确的理解。”

М. К. 阿拉克洛夫(第比利斯，格里鲍耶多夫大街19栋，信件编号101594/25)在信件中写道：“我不能想象，怎样能够具体地把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条件，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共同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中国同志提出的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一些建议将会以其他的方式得到采用。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搞清楚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在现在，在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进行改革的时刻。因此，我请求在《真理报》上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酌量解释中国同志提出的一些意见。”

А. 马库什金(莫斯科，别斯查第3大街5栋1号大楼32号住宅，信件编号97945/0)，在信件中写道：“我不完全明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报纸上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评论。非常希望《真理报》解释一下，这一新方针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

П. З. 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彻尔卡斯卡伊州，齐继林区，梅德韦多夫卡，信件编号99123/118)，在信件中写道：“我对《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非常感兴趣。我发现，其他许多同志也对这些文章感兴

趣。我个人认为,中国同志在其中阐述的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社会中的问题,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报刊对中共的决议阐释得不够。"

Г. П. 博鲁阿尔什诺夫(莫斯科州,莫斯科河区,48 栋 37 号,信件编号 103467/65)在信件中写道:"最近,《真理报》转载了《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文章。中国同志的这些文章写得非常简单明了,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另外一种阐释,这种阐释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接受的。我指的是,其中包括,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把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等等,关于改变工作作风的文章也引起了我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讨论,我们在我们的集体中也对其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指示对我们的党是有益的,其中包括,诸如怎样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的指示,怎样把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等等。

我是一名新的苏共党员(1956 年入党),或许,在许多方面都会犯错误。我们的宣传员不能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真理报》还是其他的报纸都没有刊登关于上述文章的评论文章。希望《真理报》能够发表我国著名的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评论。这将是有益的。"

Г. А. 东琴科(克拉斯诺达尔市,绍缅大街 50 栋 5 号,信件编号 102243)在信件中写道:"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将使得许多由于官僚主义引起的错误很容易得到避免和克服,使得人们改变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我想知道,中共中央在实践中将怎样贯彻这些指示?在我们许多机构的工作中都存在官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每天都在谈论。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借鉴中国同志采取的方法,采取措施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拉霍夫,苏共党员(斯摩棱斯克市,国际大街 5 栋 23 号,信件编号 101684/86),他在信件中写道:"我请求回答如下问题。能否认为,《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只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结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之间,其中包括我国的人民和领导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国揭露的关于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在我国存在的这一现象,是否有共同的原因?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我国能否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同群众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能否认为,苏共中央 2 月全体会议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七次会议的报告中揭露的工业领导中的所有不足都只是由于以前的管理形式引起的?

如果说,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以前的管理形式,而且是由于以前的管理方法和管理风格,由于总局、各部、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引起的,是不是更为正确一些呢?"

别里科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列宁大街 50 栋,信件编号 97249/78)在信件中写道:"在同周恩来会谈期间,我国大使尤金说,在我国也存在矛盾。请对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一分析。"

С. Н. 巴尔卡尔(列宁格勒,莫霍沃伊 32 栋 36 号,信件编号 92767/55)在信件中写道:"我经常读《友好报》,在 4 月 27 日的一期上我读了周恩来同志同苏联客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谈话。我国的大使尤金同志指出,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你们能否回答一下,我国的

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哪里？以及消除这些矛盾的途径。”

С. А. 罗曼诺夫(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扎姆布里州，楚站，莫勇-古姆集体农庄，信件编号96942/36)，在信件中写道：“尤金同志在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说：‘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见《友好报》)，应该怎样同这些矛盾作斗争？除了进行批评外。”

В. Б. 格林丘科夫(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苏呼米市，少先队大街1栋，信件编号89257/25)在信件中写道：“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国是否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矛盾？”

П. 利特维年科(库尔斯克市，集体农庄大街，3栋，信件编号98827/53)在信件中指出：“《真理报》上刊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请解释一下，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怎样开展斗争，消除这一矛盾。”

Х. Г. 海尔利耶夫，苏共党员(古里耶夫州，杰恩吉斯区，扎姆布尔集体农庄，信件编号90421/36)，信件中写道：“在我们苏联是否存在矛盾？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应该怎样克服这些矛盾？”

Г. И. 库尼斯，苏共党员(基辅市，列宁大街9栋3号，信件编号6978/42)写道：“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是否都完全符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些信件由《真理报》读者来信部文学编辑С. 尼古拉耶夫编订。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228，л. 155-167

№2060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

(1957年8月9日)

1957年8月16/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15日
第182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8 月 9 日

应邀拜访了南日。

南日谈了他与选民见面的印象：见面和座谈在热烈、亲切气氛中进行；选民们大量谈了在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不少宝贵建议；从与其丈夫在战争中牺牲的妇女谈话中很高兴地听到了，道领导非常关心烈士家属的生活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工作有保障，给这些家庭发放配给粮食。全道农作物长势良好。农民们告知，他们今年交公粮任务全部完成并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口粮，而近三年该道的收成低，大量农民交不出公粮，他们甚至要靠政府救助。

在交谈中涉及崔昌益、朴昌玉等反党集团案件最新的审讯材料(这些材料我从其他渠道充分了解)。我很谨慎地对南日谈了最好和有必要向中国大使乔晓光通报金日成在今年 8 月 1 日与我交谈时讲的那些问题。南日说，看来，要委托近期即将前往中国咨询五年计划草案的金一去做这件事。

我提醒说，延迟这类通报是不合适的，这件事应尽快通报大使。但南日回应我的提醒说，中国大使乔晓光很少与朝鲜领导人见面，给人的印象是，他常回避这类会见，他很少与别人交流，我们这方面的努力至今没有明显效果。

我指出，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大使的经验不足和他的谦虚。然而，保持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朝鲜与中国、朝鲜与苏联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不取决于某个工作人员或大使。

南日对这点意见表示同意后说，金日成大概今日也会向中国大使介绍预审材料。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165、180 - 182

№20604 - 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

(1957 年 8 月 16 日)

1957 年 8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16日

参观体育场。庆祝解放一周年时举办了各种体育活动。领导人坐在包厢里，其中有金日成、崔庸健、金一、郑一龙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金日成说，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即8月15日，很顺利，国内和边境上都未发生任何事件。朴正爱、李钟玉今天外出与选民见面，金一和郑一龙于8月17—18日离开。

金日成在和同志们谈论发展体育运动时，他说，要从苏联聘请必要数量的教练来帮助运动员，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教练交流经验。

金日成还说，今年10月将有明斯克的斯巴达克足球队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谊赛。

金日成说，金一在莫斯科商讨五年计划的草案时，到处都感到苏联人民和领导人全面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真诚愿望。商讨工作非常顺利，讨论也很热烈。金日成接着说，根据苏联朋友的建议，拟对计划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在此期间金一同选民见面，几天后，金一将带着经过修改的计划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这是用提问的方式发表的意见，所以我说，金日成讲得对，在前往中国之前，要把计划加以修改。

……

我们了解到中国大使乔晓光对莫斯科方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反映很感兴趣，便邀请乔晓光8月20日(星期二)来使馆共进午餐。就餐时马卡罗夫参赞向(中国)大使通报了计划草案的商讨结果。

乔晓光表示非常希望了解苏联同志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的实质，并对安排这次会见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193－195

№20604－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

（1957 年 8 月 20 日）

1957 年 8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8 月 16—30 日
第 196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8 月 20 日

在别墅为中国大使乔晓光举行午餐会。同大使一起出席的有一等秘书程文津和随员王保民(翻译)，我方出席的有参赞 B. И. 佩利申科，B. И. 马卡罗夫，稍后商务代表 И. A. 格拉德科夫也出席了。

应中国朋友的要求，马卡罗夫详细通报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乔晓光对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朝鲜同志告诉他，现在他们正根据苏联的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他们将于 8 月底前往中国。

乔晓光接着通报了朝鲜朋友要求中国提供粮食、煤炭、硫黄、棉花等商品的数量，已获同意。

经外交部授权，我向大使通报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崔昌益、朴昌玉反党集团的情况(这时只有大使和他的翻译在场)。我没有表示个人的评论和意见。

乔晓光十分留意地听取了我的通报，并深表感谢。他说，有关这一问题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朝鲜同志不向他通报，他是无法了解的。他还补充说，如果他了解到新的情况，他将立即向我通报。

乔晓光邀请我和使馆人员及家属近期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接受了邀请。参观日期到 8 月 23 日最后确定。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03－207

№20604－3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联系

（1957 年 8 月 23 日）

1957 年 8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8 月 16—30 日
第 196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8 月 23 日

……

南日告知：金日成赞成就双重国籍和双边民事、刑事的法律援助、领事公约等进行谈判。

南日请求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意愿转告苏联外交部，南日同时表示，谈判可在平壤进行，换文可去莫斯科。

南日接着说，中央领导现忙于处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集团活动的事。但他没有通报新的事实。

我问南日，就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已向中国大使乔晓光通报过？

南日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但准备通报。

我谨慎地表示，我认为，应尽快通报，可取得中共中央更好的理解，我补充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好保密的，我认为，你们在努力同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建立良好的友谊。

南日完全同意我所表示的意见，他说，我最近全面考虑了我们之间就这一问题的谈话，近期我将亲自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国大使乔晓光建立亲密的、坦诚的、同志式的关系。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15－222

№08877

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测绘代表团访华

(1957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照会，请求苏联政府派苏联大地测量专家代表团参加1957年11月2日至12月2日将在北京召开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届时出席会议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测绘工作代表团。

这次会议是根据1956年布拉格测绘工作会议的决议召开的，该决议曾得到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4月10日决议(第411—204c号)的同意。

测绘科学技术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技术可能性，以便尽快实施绘制详细地图的工作，在没有或没有完备的大地测量网的地区建立测绘网。实现上述措施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意义。

中国政府已责成中国测绘总局筹办这次会议。

苏联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必要的，因为在解决会议所提出的任务当中苏联比其他会议参加国都有经验。

所以，苏联内务部请求批准派代表团参加北京测绘科学技术会议，为期一个月，代表团成员有：С.Г.苏达科夫(团长)，А.С.尼古拉耶夫、Г.В.罗曼诺夫斯基，П.С.扎卡托夫，Б.А.拉林，А.Д.科洛米耶茨，А.И.库列绍夫，А.И.布拉诺夫，А.И.索洛维约夫，Б.В.特罗伊茨基。

关于苏联大地测量局参加召开的会议和苏联军事测绘局在代表团的成员问题将同总参谋部(А.И.安东诺夫同志)协商。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和中国外交部今年6月24日的照会副本附后。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佩列韦尔特金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机　密

一、接受苏联内务部关于派苏联测绘代表团参加195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大地测量

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为期1个月，代表团由以下人员组成：С. А. 苏达科夫(团长)、А. С. 尼古拉耶夫、Г. В. 罗曼诺夫斯基、П. С. 扎卡托夫、Б. А. 拉林、А. Д. 科洛米耶茨、А. И. 库列绍夫、А. И. 布拉诺夫、А. И. 索洛维约夫、Б. В. 特罗伊茨基。

二、委托苏联财政部与苏联内务部一起研究上述代表团参加测绘科学技术会议出差费用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
(1957年6月24日)

尊敬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兹谨通知贵馆以下事宜：

中国测绘总局根据布拉格国际测绘会议决议，建议今年11月2日至12月2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亚洲五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

届时参加会议的将有以下五国的代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布拉格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考虑亚洲人民民主国家自然地理条件和其他特点，通报并讨论每一个国家的测量网的位置，比例为1∶100 000地图和各种比例的地形图的测绘方法和技术以及其他问题。

中国政府特邀苏联政府派团(10—15人)参加这次会议。

此外，中国测绘总局还提请会议参加国和代表团成员注意以下会议内容。

一、天文测地网的分布和共同测绘问题。

二、亚洲人烟稀少的山区和高山地区的测绘方法和技术问题。

三、基本重力点的确定和普遍重力测量的方法和技术问题。

四、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技术报告。

我们请苏联政府在尽短期限里通知我们你们对会议期限和内容以及各代表团将所作报告题目的意见。

为顺利进行会议准备工作，我们请求尽量在1957年8月底之前把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人数通知中国测绘机关，提交贵国代表团在会上将要作的报告材料。

代表团到达中国后的花费和返回祖国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请将以上内容转达给苏联政府。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92，л. 40－44

№20604 - 4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7 年 8 月 28—30 日）

1957 年 8 月 3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8 月 16—30 日
第 196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8 月 28—30 日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和司令员杨勇的邀请，我们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方出席的有：经济参赞马卡罗夫、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武官助理斯捷潘诺夫、大使馆随员奥格涅夫。中国使馆方面出席的有：大使、一等秘书程文津、三等秘书张瑞杰和中国使馆女译员王宝琴。

会见是在十分热烈和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全程陪同我们的有司令员杨勇、政委李志民（第一天陪同，后来病了），还有几位副参谋长。到达后我们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向毛泽东儿子的墓献了花束。晚上在俱乐部里欣赏了很有意义的音乐会，由人民志愿军歌舞团演出。音乐会开始前，副参谋长肖应棠致欢迎词，我致答词。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33 - 236

№11455

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

（1957 年 9 月 18 日）

今天我拜会了李志敏。

我简单向他通报了胡志明同志的苏联之行。

李志敏问：苏共中央代表与越南同志在统一越南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

我回答说，我没有看到分歧。越南同志建立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当然，未来这一斗争的策略应当仔细考虑，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必要时可以改变形式，例如，目前不能不考虑到两个越南国家的存在，越南分裂成两部分将会保持一段时间。有些越南同志有时疏忽了这一现实。例如，有些在南越工作的越南同志表现出简单的、非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认为有必要组织某些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以此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有些越南同志尚未注意到政治斗争的主要火力应当对准美国。他们在大骂吴庭艳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北方和南方建立实际联络的方法。

李志敏还对苏共中央与越南同志在接纳北、南越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意见是否一致感兴趣，我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一致。

李志敏同志说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是有根据的。部分越南同志过去不同意苏联的立场，主张接受两个越南国家参加联合国。总之他认为，越南同志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任何步骤，可能间接承认南越的做法非常敏感。特别是他们未必能正确理解苏联政府的决定，向南越出席国际气象组织地区会议的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

我对李志敏回答说，越南同志应当正确理解已经作出的决定，向南越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

我认为，必须承认越南存在两个国家的事实，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南越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

李志敏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并指示必须提高越南同志反对吴庭艳政权的宣传水平。

武元甲在答新华社记者就吴庭艳7月公报的提问时，仍然是充满了谩骂之词，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中国同志迄今拒绝发表答记者问。

后来谈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在胡志明不在国内期内的活动时李志敏说，越南同志在国内的政治和生活中没有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他认为，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推迟了，也没有对纠正土地改革所犯错误的工作总结，部分原因也可能是越南同志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水灾作斗争上。他认为，越南劳动党最近搞的最重大活动之一，是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以巩固军队人员必须进行长期的统一祖国斗争的意识，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念。

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党的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就地了解纠错情况。纠错推迟了，看来某些地区将拖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结束。最大的困难是退还被恢复名誉的农民的财产。此外李志敏指出，在越南劳动党领导干部中，迄今对纠错活动是否正确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谈及胡志明同志访华，李志敏说他尚不了解胡志明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只向他通报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际活动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还向他通报了关于解决老挝问题进程的谈话内容，他已经就此事通报了苏联

大使馆。李志敏认为，胡志明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老挝问题的反应非常积极。回到河内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苏发努冯，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最近几天与李志敏谈过话的清顺认为，由老挝同志准备的关于老挝形势报告草稿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很好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明白了作为保持亚洲和平共同问题的一部分，老挝问题应当解决。

胡志明同志在北京讨论的问题之一，系非越南族系，特别是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国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居住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为了研究对侨民工作的经验，越南同志打算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新疆派遣代表团，当地生活着大量的侨民。

李志敏同志在谈话结束时说，根据最近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精神，在越南进行技术援助的中国人员，今后的工资将不以越南盾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发放，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这里包括住房和伙食。这一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中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的中国专家，其生活水平不应当高于越南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周恩来同志1956年秋季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谈过这个问题。

АВПРФ，ф. 079，оп. 12，п. 17，д. 6，л. 69－72

№20608－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

（1957年10月7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7日

应南日邀请拜会了他。南日告诉我，金日成今天同他通了电话，建议加快因朝鲜公民被

美军杀害而致信联合国的事。

南日要求我同苏联外交部联系，质询目前这样的信件是否适宜。

我回答南日说，10 月 2 日的谈话后，我已转达。

南日表示感谢。接着他通报说，根据政府的指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内外商业相陈班秀致信南朝鲜贸易部长，建议为开展贸易而相互开放城市，为南朝鲜人开放开城市，为北朝鲜开放南朝鲜的一个边境城市。

这封信件将于明天，即 10 月 8 日见报。我授命将这一信件的复印件提交给你们大使馆。

对南日通报这件事，我表示感谢。

南日还说，他同邮电相详细研究了同莫斯科建立高频通信的事。邮电相说，现在正在架设平壤-伏罗希洛夫的线路(恢复原有的高频通讯)。全部工程于今年完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征询苏联政府关于是否能从 1958 年初起架设高频通讯线路的意见。

我答应把这一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

谈到去莫斯科的事，南日告诉我，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于 1958 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时，我用委婉的方式提请南日注意，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很少去兄弟的邻国——伟大的中国访问。据我所知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邀请中国党政界的朋友和其他中国代表团。而邻国之间领导人的相互接触，更不要说是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十分必要的，可带来很大的益处，而且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南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他说，的确如此，金日成每年去苏联，而自 1954 年以来，他没有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和情况来解释这一点。我们的确应经常去中国朋友那儿，同他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面。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应经常接触。在这方面我们应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补充说，除了领导人之间的正式会见外，还可以有非正式的见面。例如，您知道，苏共中央每年都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去苏联休息和疗养。今年也曾邀请过。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去苏联的并不多：只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副首相郑一龙和财政相李周渊几人。但即便是他们，也没有同我们的领导人会见。为什么不更多地利用这类邀请呢？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可以在休息和疗养之余，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

为什么不能组织这样的活动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南日同意说，这是建立个人接触的重要形式，他们今后要考虑的。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63－265

№2521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

（1957 年 10 月 11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11 月 1 日
第 382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①]

1957 年 10 月 11 日

今天毛泽东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在北京举行的印度展览，刘少奇也与毛泽东一起参观。印度大使陪同中国领导人参观了展览。

毛泽东和我在展览期间的交谈，主要涉及的是苏联的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对于卫星的发射过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还热情地谈论了该事件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了极大的倾斜，”毛泽东说，很明显，帝国主义现在不会冒险发动一场针对我们的战争了，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这个卫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还对苏联科学家在未来能够成功发送更大更完美的人造卫星表示了信心。

在谈话期间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和莱斯顿的会谈记录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听到我的回答后，毛泽东说，现在他们要将这些材料翻译成中文。我向毛泽东说明了他们谈话的基本概要。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后对赫鲁晓夫的发言作了赞许的回应。对于他们的谈话，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表示：“这些事务在我们这里，以及在苏联都进展得很好。”“火箭、人造卫星和相关的胜利对美国人而言是个打击，这不仅让你们，也让我们感到轻松和高兴。”

……

会谈由大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50，д. 5，п. 423，л. 44－45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0608-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1957年10月16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16日

拜会金日成，向他转交了苏联国家计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控制数字的书面意见。

金日成对转交的苏联国家计委的意见表示感谢，他还对苏联政府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缔结1958—1961年向苏联提供既定数量的浓缩单核细胞和锌精矿的建议表示感谢。

我向金日成通报说，由民航总局委派的图-104机长贝科夫已于日前来到平壤，他来考察顺安(Супунск)机场是否能起降图-104飞机。贝科夫对我说，机场可以起降这种型号的飞机。他将向民航总局的领导报告。因此，可能在10月20—25日就可作出决定，派什么飞机来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

金日成为此表示感谢，并对苏联同志的关心表示谢意。他说，如果乘图-104飞机去莫斯科当然很好，但如果有什么原因不能派图-104飞机，那么像去年那样，乘伊尔-14飞机也不错。

我告诉金日成，已收到增加2—3名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积极参加者加入劳动人民联合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邀请。

金日成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

我对金日成说，在十月革命40周年时，我们想邀请所有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以及由苏联援建的企业的领导人(15人左右)到苏联大使馆来参加招待会。

金日成对这一动议表示赞成，并说，这样做很好。如果大使馆认为可以，也可邀请一些其他党派的道委员会的领导人来参加。

我对金日成说，我们会考虑这一建议的。

在这次会见时，金日成还通报了金一和李钟玉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

金日成说，我们把苏联国家计委的意见向中国朋友作了详细的通报。他们也很支持这些意见，他们特别建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苏联同志也曾有些建议，我们准备这么做。中国朋友对我们用自力更生的办法来完成五年计划这点评价很高。我们曾要求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年供应 12 000 吨棉花，中国同志无法满足，他们将供应 8 000 吨。因此，我们作出专门的决议，扩大国内的棉花生产，采取具体措施以建设牢固的产棉基地。打算在 1958 年种植棉花 6 万公顷(1956 年种了 25 000 公顷)，全部棉苗在培养器皿中进行培植。这样的种植方法今年获得了良好的收成。有一个合作社，有些棉田的产量每公顷达到 23 公担，平均每公顷可收获 12—17 公担的籽棉。

我们计划在 1958 年平均每公顷收获 8 公担，力争收获 1 吨。

……①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60－264

№24939

《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

(1957 年 10 月 18 日)

在《苏中友谊》样刊出版之后，编辑部收到了读者发来的 400 多封提出意见的信件。党委、友好组织的工作人员、工人、教师、各机关和学校的工作人员等都谈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都对该杂志的出版表示欢迎。(没有一封提出反对意见的信件。)

为了使这本杂志能够办得更好，读者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读者的意见可以简述如下：

1. 样刊的优点。

《苏中友谊》杂志要好于以前出版的《苏中友谊》报纸。该杂志内容简洁、范围很广，对问题的阐述很详细。对材料有很好的说明。杂志基本上克服了报纸上出现的缺点。

2. 读者非常喜欢伏罗希洛夫的文章《同列宁的第一次会见》。读者写信说，伏罗希洛夫撰写的这篇关于列宁的文章，对当时现实事件的描写通俗易懂，内容简洁而令人激动。他们

① 该文件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希望再刊登这样的文章。

读者主要回应的是关于列宁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反响较好。读者认为，授予列宁奖金是一件大事，它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列宁奖金的获得者及其作品是非常有益的。

一些读者认为，发表苏联作家的回忆《伏罗希洛夫在中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该文不同于中国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同时它还反映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这是令读者非常高兴的，对他们来说也是珍贵的。

读者对《在平凡岗位上的苏联青年》这篇文章的反响很好。读者都写信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该文以具体的实例简要阐述了苏联青年是怎样以自己平凡的劳动来建设共产主义的。这篇文章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使每一位读者更加尊重劳动。

读者们对杂志中《关于苏联》的文章表示了巨大的兴趣，因为该文简要而及时地阐述了苏联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读者非常喜欢《读者来信答复》这篇文章，因为诸如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问题，在哪些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哪些方面还没有超过，苏联打算以什么方法在多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等问题使所有人都感兴趣。

读者希望，今后每一期都刊登一些文章，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答复。

读者非常喜欢杂志的封面以及乌兰诺娃的彩色照片。

读者还指出了杂志的一些不足之处。

1. 杂志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不是很全面。在样刊中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材料太多了，而关于工业和农业问题的材料不够。杂志的内容还不够丰富。

2. 文章太长了(在三篇文章中每篇都超过 15 000 字)。

3. 文章的语言还不够通俗(一些中学生在来信中写道，许多内容还看不明白，特别是涅斯梅亚诺夫的文章)。

4. 反映苏中友谊的文章太少。比如，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苏联工人对新中国建设的帮助，或者，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和八路军领导人的照片。

我们的读者非常喜欢对历史进行回忆的材料，关于我们友谊的材料。第一期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文章。

5. 关于苏联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样刊向读者介绍得不够。比如，读者非常想知道飞往月球的问题等。

6. 读者非常喜欢《谁是第一个到北京的俄国人》这篇文章。他们表示，希望今后每一期都刊登这样的文章，但是我们希望，要使这些文章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感情。在样刊中，这篇文章包含了过多的历史材料，因而有点干巴巴的。

读者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意见。

1. 如果杂志不是月刊，而是更加经常地出版，并且杂志的容量也改变一下(大家都建议使杂志的容量为 30 页)就更好了。

杂志的价格太高了。(邮局认为，最好的是，每份杂志的价格不超过 2 角。)

2. 一些读者建议,每期都刊登一篇小说。(短篇小说,不超过1万字。)

3. 中国读者非常想了解苏联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情。比如,婚礼,为新生儿选择名字的风俗,各节日的风俗等。

4. 在杂志的封底不一定都只刊登照片。如果每一期都刊登一些著名歌曲的歌词、乐谱,或者图画,那么将会使杂志的内容更加丰富。

5. 希望杂志的插图更加丰富。

ГАРФ,ф. Р-9324,оп. 1,д. 2,л. 8-12

№20607

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年10月1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日
第378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李永镐的谈话纪要

1957年10月19日

接待了前来礼节性拜访的李永镐。

相互致意后,李永镐说,他担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一职时间不长,还缺乏经验。他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我表示任何时候都可提供这种帮助。我建议他同中国同志建立最紧密的相互信任关系,李永镐称,他同不少中国机构的领导人有不错的交往,今后他还将扩大这种交往。他向中国朋友通报朝鲜内部生活的各种问题,也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重要信息。李永镐简要地介绍说,不久前为了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和贸易问题,一个专门的朝鲜代表团非正式地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交换意见十分有益,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全部主要问题。

谈到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的相互关系时,李永镐指出,他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越

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关系特别密切。李永镐解释说，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目前的情况同朝鲜有许多相似之处。李永镐说，我曾同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有过严肃的争论，因为他有意歪曲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1956年)的内容，并对匈牙利和波兰发表了错误的评论。他说，在匈牙利发生的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群众反对党和政府的错误政策。听到反驳后，基里洛克说，他(李永镐)是斯大林分子，什么都不懂。李永镐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他使用"斯大林分子"一词不恰当。从此以后，李永镐与基里洛克再没有就这个话题交谈过。

李永镐说，南斯拉夫方面目前对朝鲜大使馆的人员没有什么不好的举动。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团中，印度人、缅甸人、印度尼西亚人对朝鲜人的态度不错。李永镐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在同这些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最后，李永镐表示希望能组织一次苏联大使馆和朝鲜大使馆人员的联欢晚会。

大使馆随员 A. A. 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文件送：Н. Т. 费德林同志、И. Ф. 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1957年10月23日

第704号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55－256

№20608－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及中国的援助

(1957年10月23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23日

根据预先的约定,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并作了交谈。

谈话时中国大使馆一方有参赞曹克强、商务参赞薛春圃和随员王保民,我方有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参赞佩利申科和二等秘书Ю.И.奥格涅夫。

乔大使称,准备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主席金一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问题而对中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结果向我们通报。接着由商务参赞薛春圃发言,他陪同朝鲜代表团一起去中国,并直接参加了这些谈判。

薛春圃说,以金一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于9月12日抵达北京,9月13日至10月6日进行会谈,讨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和两国的外贸问题。

中方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率领参加会谈。中方代表团的成员有:国家计委的专家、财政部、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

两个代表团一开始就分成两组。第一组研究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问题;第二组讨论贸易问题。

中方代表团首先表示赞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总方针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控制数字;同时还向朝鲜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

中方代表团对计划草案总体上表示满意。计划草案规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方向朝鲜同志就以下三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情况:

1. 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表明,农业发展的快慢对工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确定了农业发展的新指标,但要考虑到不利气候的年份对农业歉收的可能性。工业发展的计划指标是在考虑农业发展指标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在执行计划期间,1955年是高产年,1957年的产量也不错,1953年的收成是中等,而1954年和1956年由于气候不佳收成不好。1954年和1956年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料和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这使完成计划遭到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对工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17.3%,农业生产达到4.5%。但这个增长是不平衡的,碰到了巨大的困难。

考虑到农业基础对发展工业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十分重视那些能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对农业的投资是5.7%,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提高到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对发展农业的投资预计增加到1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五年计划中,将考虑大力进行水利建设,提高山区的农业生产,增加产量。

中方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中方认为,对农业的投资最好还要增加,可以考虑降低某些重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那些朝鲜本身缺乏原料的企业和产品销售有困难的企业。这样,可腾出一些资金来投向农业。

中方认为,计划应该有可靠的基础,要全面考虑,因为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不可预

见的困难，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这些困难必须加以克服。

2. 中国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存在不少实质性的缺点。

第一，没有考虑到歉收的年份以及它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

第二，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之间的本质差别，其结果是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国民经济的非生产领域。

第三，为了发展文化和教育，计划大量建造学校和培训干部，但没有考虑到必须首先发展国民经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文化和教育水平。

第四，提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但没有考虑到首先必须保证提高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水平。提出了在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但广大劳动群众对这个口号理解不一致，各个企业有不同的解释。某些企业的工人提出要求说，他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水平提高了，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依旧。现在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和任务：在工农业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方认为，朝鲜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要研究工业发展、原料供应基础和销售是否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但必须考虑到歉收的年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等，要使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有可靠的保证，因为顺利地完成计划会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可以对劳动群众起到鼓舞作用。

3. 必须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因为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但提出提高生活水平任务的同时，必须考虑发展商品供应的基础；在提高工资时，必须考虑农民的购买能力，用商品来保证工资的提高。

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方总的意见就是这些。按照薛春圃的说法，中方无法提出具体意见，因为，如要提出具体意见，就必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进行更加详尽地了解。

第二组的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交换。朝鲜同志提出了一张拟于1958年进口商品的清单。这张单子中的许多商品中国是短缺的，其中有些商品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

会上决定，1958年互供商品的具体问题，提交双方的商务代表团去讨论，这次只是决定一些主要的商品。

朝方要求中国在1958年提供70万吨炼焦煤，17万吨动力煤和3万吨焦炭。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也缺煤。中国在1958年缺煤达600万吨以上。但是如果中方不向朝鲜提供煤，朝鲜经济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中方决定满足朝方的要求，保留上述数字。

还决定满足朝鲜同志的如下要求：提供3万吨大豆和5 500吨硫黄，尽管中国自己也缺硫黄。

朝鲜同志1958年的清单中还有橡胶，中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橡胶的。中方同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3 100吨橡胶(朝方原要求提供3 300吨)。

解决棉花、棉纱和棉布问题最为困难。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棉花生产没有完成任务。1956 年的棉花播种计划有 500 万亩(1 亩=0.067 公顷)没有完成，今年有 700 万亩没有完成。居民的棉布供应逐年减少。1951 年的棉布生产量人均为 7.3 米，到 1957 年则为 6 米，1958 年减至 5.3 米。棉布人均数量的降低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棉田播种面积的减少以及由于缺乏原料，不少纺织厂停工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进口几万吨棉花。

考虑到这些情况，中方同意向朝鲜提供 8 000 吨棉花，而不是朝鲜同志要求的 12 000 吨；提供 500 吨棉纱(朝方要求 1 500 吨)和 500 万米棉布(朝方要求 1 000 万米)。

1958 年的贸易就讨论这些。中朝之间商品交换的其他问题由两国的商务代表团去解决。

此外，朝鲜同志提议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制订，所以缔结上述协定的事被推迟了。但中方向朝鲜同志表明了进一步提供煤炭、硫黄、棉花和橡胶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希望，1959 年还能获得像 1958 年这个数量的煤炭，到 1960 年和 1961 年能每年进口 100 万吨。中国同志说，他们认为 1959 年有可能提供 1958 年的数量，而 1960—1961 年的供煤量只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之后才能决定。

至于硫黄，中国同志同意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保持原来的供货数量，尽管朝鲜同志的要求要多得多。

薛春圃说，朝鲜的硫铁矿蕴藏量同中国一样多，所以他们向朝鲜同志建议搞好自己的硫酸生产。

中方向朝鲜同志预告，棉布和棉纱的供货量今后将减少；到 1960 年，中国将完全无法提供棉花。橡胶的供货，中方将努力使 1959 年、1960 年和 1961 年维持在现有水平，而到 1961 年有可能向朝鲜提供人造橡胶。

从明年起，中朝的贸易交换将按世界市场的价格，用卢布结算，对此，双方已达成协议。向世界市场价格过渡的具体问题将提交双方的贸易代表团去解决。

朝鲜同志还提议缔结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表示同意，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专门机构去审议。

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对今年的换货情况感兴趣。

薛春圃回答说，总的来说换货正常，中方在这方面未提任何要求。今年中国向朝鲜提供 310 万吨小米和 5 万吨大豆。

他说，明年看来朝鲜靠本国的收成就够了，因为只计划进口 3 万吨大豆。

薛春圃表示同意。他说，根据 1958 年度的初步货单，朝鲜同志计划进口 5 万吨小米，但后来不要了，大概认为收获会很好。今年中国向朝鲜供应 11 000 吨棉花、100 万吨煤，其中包括 50 万吨以上的焦煤。

1957 年中国向朝鲜的供货总量为 7 500 万元，援助为 5 000 万元，今年的全部援助就这些。

1958 年向朝鲜的供货量将近 1 亿元。

参加会见的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问薛春圃，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是否讨论过朝鲜的货单?

薛春圃回答说，没有讨论。但他发觉，某些商品，例如水泥、电解铅、硝酸铵、石墨、玉米淀粉，中方很难接受，因为这些商品中国自己也有多余。

朝鲜同志建议向中国提供3万吨碳化钙(中国自己拥有量很大)，中方同志接受8 000吨。因为中国以前接受过碳化钙，1958年如不接受会对朝鲜工业带来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接受朝鲜同志提供的30万吨铁矿石。

我对乔大使和薛春圃商务参赞的通报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们说，苏联也接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许多自己绰绰有余的商品，例如，苏联向朝鲜购买了单核细胞，而且其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

接着，我向乔大使讲述了不久前同金日成谈话的情况。我说，金日成高度评价中国同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他说，他们在最终审定这个计划时加以考虑。金日成说，朝鲜同志理解中国同志在棉花供货上的困难，因此他们打算在明年扩大朝鲜的棉花播种面积，从25 000町步增至60 000町步(1町步＝0.9公顷)。

向乔大使简要通报了朝鲜劳动党10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情况。

乔大使对通报情况表示感谢，他也讲述了同朝鲜国家计委主席李钟玉的谈话情况。

李钟玉在谈话中对中国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对朝鲜代表团在中国的热忱接待表示感谢。李钟玉说，朝鲜政府拟用扩大棉花的播种面积生产人造纤维和与埃及签订贸易协定的办法来解决棉花问题。

谈话后乔大使招待便餐，参加晚餐的除了以上同志外，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委旷伏兆中将，他来平壤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七周年的活动。

利用这个机会，我邀请旷伏兆参加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招待会。

会见和晚餐都是在友好的、兄弟党的气氛中进行的。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74－280

№0888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

(1957年10月28日)

苏联内务部请求任命苏联内务部测绘总局局长亚历山大·尼基里弗里维奇·巴拉诺夫同志为苏联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北京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技术会议的工作，以取代

患重病的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第50/161－rc号)今年9月21日被任命为该团团长的С.Г.苏达科夫同志。

苏联代表团将于今年10月30日赴北京。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92,л.204

№03372

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

(1957年10月30日)

绝　密
副本,第1份

致赫鲁晓夫同志：

今天(10月29日)晚上,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同行。在去克里姆林宫[①]的途中,他开始谈起刘晓关于米高扬向他通报的有关苏共中央决定撤消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职务的报告。

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毛泽东说,他十分满意地接受了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他声称,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苏共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接着毛泽东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

我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军队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情况。对此他指出,近来我们(中国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有所削弱,军队党组织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也削弱了。

谈到撤换朱可夫时,毛泽东说,这次手术会比撤换莫洛托夫更少痛苦。莫洛托夫几十年来已经作为党的领袖之一深入群众的头脑,而朱可夫则和马林科夫一样,还没有作为一名政

① 原文如此,这里是指中南海。下同。——编注

治领袖在群众的头脑中扎根，尽管这是不同的两个人。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来。毛泽东简要地向来到的同志们叙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然后，他开始谈到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并说，他再一次重复通过周恩来转达过的请求，无论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鄂木斯克都不要举行欢迎仪式，而他为了避免感冒也不准备走出飞机，而在莫斯科，除了在机场发表谈话外，从机场出发沿途也恳切请求不要组织欢迎仪式，因为他也好，宋庆龄也好以及许多其他同志也好，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从苏共中央收到的关于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文件。

首先，毛泽东说，我先说我们对于声明草案的一些意见。草案要大大删减。这事不难。只保留未来声明的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声明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个别有一些意见，准备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谈。

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来判断，那么我们对这种解释有某些不同意之处。

不能仅仅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和平过渡，而且应当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有些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处在由和平转变被武装斗争所取代的阶段。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而且取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能会迫使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把它强加给工人阶级。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考虑到这第二种可能性。

宣言在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应当既写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可能随时将武装斗争强加过来，对此无产阶级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何表达这个思想，是个文字问题，但这个思想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第二，毛泽东说，在草案中说到，近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日益接近。他说，应当为争取与社会党人共同行动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应当把社会党的普通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人一边来。对此，我们并不表示怀疑。毛泽东接着说，但是，在声明中最好采用一种对这个问题的更加一般性的提法，说明共产党人不仅同社会党人，而且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为和平、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种流派等等日益接近。他说，不应当仅仅突出提到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

第三，是关于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那一节的问题。在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对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关系作了长时间的回顾。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1949—1950年在莫斯科关于条约、关于势力范围、关于股份公司的谈判，并且说，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也就是说他在同我们讨价还价。

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时，曾经与苏联商定，在人民民主国家将不搞间谍活动，当然也包

括中国，但是实际上是搞了间谍活动。罗申大使就招募了一名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要他提供情报，且不要告诉周恩来。但是，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不经莫洛托夫认可。还有别的问题让我们对莫洛托夫不满(这时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上述罗申的事件并不重视，并请求不要告知苏共中央)。因此，毛泽东说，希望苏共中央能正确理解我们，我们(中国人)对莫洛托夫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不过我们认为，在声明中以不提到莫洛托夫为好。因为，在我们中国某些地区，莫洛托夫的威望并不比斯大林的威望低。这样的人不仅在中国有，关于苏共中央谴责反党集团的决议应当提到，但是不要指名道姓(这时他指出，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作为个人则不值得注意)。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6月中央全会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他说，我(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就在他们(他指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得到通报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开会，详细地说明并维护了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说，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并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人们反正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利益。

此时，毛泽东谈到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知道在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曾存在过分歧。曾经有过两派。我们曾几次讨论过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局势，结果认真负责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团中和赫鲁晓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这里也有过对个别问题的不一致和分歧，但是时间越长，这些不一致和分歧就越小。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毛泽东说，应当承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大大地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好比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是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他接着说，我们从来不允许从我们方面站出来反对苏共，即使我们不同意某些做法。他还举出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例，说他们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同苏共不一致，他们甚至在私下谈话中也不曾提起这个问题。

谈话进行到此，我作了以下的说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以及在苏共中央以后言论中，丝毫也没有讲到要无产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武装斗争。二十大决议只是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于若干国家，工人阶级用和平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也就是说，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当前形势下，可能为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足以迫使资产阶级后退，并从而避免武装斗争。接着我指出，当您(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交谈时，您毫无疑问会轻易地取得一致意见。我想，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对苏共论述个别国家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误会。毛泽东对我的这一看法极表赞许。

接着，毛泽东转而谈到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是否有必要通过宣言。他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党都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如果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反对通过宣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口实，让他们说我们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出现了矛盾，莫斯科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的党，而其他党不同意，等等。但是，如果预先通过决定说，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通过宣言，宣言也要通过，那也可以这样做。毛泽东形象地表达说："天下不会大乱"，但这一切都要预先讨论好。

第二个方案可以是这样的，毛泽东继续说，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

一、关于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

二、关于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等。

三、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争取历史进步而斗争，等等。

四、关于开辟了党的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十月革命，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民族条件和民族特点。

宣言式公报这种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最后，是第三个方案：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宣言。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说，为什么只有两个党发表宣言，那就说明其他党不同意。对此可以回答说，这两个党是最大的党。此外，大多数别的党已经通过了联合宣言，而我们两个党没有参加。这是方案之一，但这个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毛泽东转向我说，请您尽快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知道我们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

此后，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他同斯彼哈尔斯基①的谈话。毛说，我努力向斯彼哈尔斯基证明，对他们(波兰人)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是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消除波兰的反苏情绪，并始终强调说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我是否和他一起去莫斯科。我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说，他乐意和我一起去莫斯科。

谈话持续了约4小时。

П. 尤金

1957年10月30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589，л. 173－179

---

① 斯彼哈尔斯基，时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编注

№1382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

(1957年1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2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Н. Г. 伊格纳托夫、О. В. 库西宁、А. И. 米高扬、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А. Н. 柯西金、М. Г. 别尔乌辛；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1. 对尤金同志发自北京的1957年10月30日电报，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对于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声明草案的问题，以及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意大利就此问题发来的电报的答复。

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库西宁、波诺马廖夫、帕托利切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福尔采娃。

简短的公报(这一方案)不要接受。

应该倾向于签署宣言，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同意的话。

如果将通过共同宣言的话，那么，也可以同意搞一个(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宣言。

完成草案。[①]

同志们应该在今年11月3日之前提交新的宣言草案，在今年11月__日[②]之前提交声明的草案。

2. 葛罗米柯同志就裁军问题发自纽约的1957年10月28日电报。[③]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佐林、布尔加宁、帕托利切夫、米高扬、福尔采娃、库西宁。

我们应该声明：不再参加分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说完了一切，阐述了所有内容。准备返回，如果将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建议的话，或者应该扩大委员会。

佐林同志：现在采取这样的步骤为时尚早。

---

① 在1957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准备的新的宣言草案。——原注

② 原文如此。——原注

③ 1957年10月26日，Н. С. 帕托利切夫向葛罗米柯通报说，大概，他应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苏联拒绝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工作的声明。在10月28日的答复电报中，А. 葛罗米柯表示不赞成这样的声明，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将会在“宣传机器”中利用这个声明和指责苏联中断裁军问题的谈判。除此之外，这样的举措将会给苏联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造成损害(АПРФ, ф. 3, оп. 63, д. 579, л. 61-62)。——原注

帕托利切夫同志：发表强硬的声明。

米高扬同志：发表强硬的声明，使他们无法指责我们。

委托外交部，根据交换意见的精神，准备给葛罗米柯同志的指令性指示。

批准葛罗米柯同志返回莫斯科。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8，л. 26－27

№2076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

（1957年1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2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的问题。

第122号记录第1项

1957年11月2日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意见，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会议宣言草案及告世界人民的宣言草案。[1]

上述文件在今年11月4日之前提交。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61，л. 1

---

① 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57年2月初就提出了这一想法，2月2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2月7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信件中表示同意这个建议。信中说，苏共支持中共的提议，并且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苏共领导人认为，可以在3月底4月初举行会谈（РГАНИ，ф. 3，оп. 14，д. 99，л. 16；д. 161，л. 26）。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党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的意见致使两党关系更加复杂，这次会议被推迟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苏南领导人可以在会议召开之前进行非正式会晤，交换看法。1957年8月1—2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进行高层会晤，这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希望，他们希望在南斯拉夫的立场同其他与会国家的立场存在分歧、会议的宣言不写入南斯拉夫立场的情况下，南斯拉夫领导人也能够参加会议。但是，10月18日苏共中央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同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弗拉霍维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时，南斯拉夫领导人通报说，南斯拉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的讨论并且不接受这一宣言，并且说他们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担心会使南斯拉夫的国际局势复杂化（АПРФ，ф. 3，оп. 23，д. 63，л. 64－71）。——原注

№200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

(1957 年 11 月 9 日)

今天晚间毛泽东邀我去会谈。

他请我向 H.C. 赫鲁晓夫转达自己与会议筹备有关的几点愿望。

一、他认为，应当在 11 月 10 日前彻底结束中苏两国代表间关于会议声明草案问题的协商，并在这一天将协商过的草案散发给所有兄弟党代表团，包括那些未参加此次会议的兄弟党在内。

二、毛认为，声明草案最好以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名义发出，因为"苏共明显不便于仅以自己的名义涉及以下两个原则性问题，即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倡议召集以后的兄弟党会议"。

三、(毛)希望会议能于 11 月 13 日开幕。因为 11 月 10 日所有兄弟党代表团便可收到会议声明草案，并在 11 月 11 日前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等同志)。而在 11 月 12 日，即会议开幕前一天，(我们)还可以参考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声明草案再作修改。毛泽东希望，开会时间应不少于两天，如果需要，也可用三天，即 11 月 13—15 日。

四、毛泽东表示同意 H.C. 赫鲁晓夫向他通报的关于波兰人所提的建议，即通过第二个"包含有向世界和平大会呼吁精神"的集体文件。[①]毛认为，这份文件应草拟得简洁些。文件的签署既可以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党代表，也可只包括目前在莫斯科的所有兄弟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毛指出，最好能让更多的党派代表签署该文件。毛泽东请求苏共中央亲自负责该简明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 11 月 10 日让所有党派代表了解其内容。

随后，毛泽东说，他对苏、中两党能在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上迅速取得相近的观点表示满意。他指出，苏、中两党代表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只是对个别措辞作了精确和完善，对个别观点作了强调，等等。另外，只是就一个问题作了几处改动，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方式。毛泽东认为，宣言的特点和积极意义在于，其内容只涉及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并未谈各个国家(如苏联、中国、波兰等)复杂的内部问题。

毛指出，有必要保留宣言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要补充文字(该补充性文字是毛亲自写的)。对此，毛强调，斯大林在世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而上学泛滥成灾，辩证法

① 指《和平宣言》，于 1957 年 11 月 23 日公布。——原注

立场被严重削弱。在人们评价和分析各种现象的过程中，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居统治地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错误的根源。哲学本身有时也会有局限，从而不能完全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同志很少讲到和使用辩证法。我建议，我们应经常地大规模宣传辩证法。毛说，他很高兴地看到，H. C. 赫鲁晓夫报告中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回到声明草案的话题，毛希望苏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能再次读读它。毛声称，他自己也将再次阅读该草案。在此期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没能在宣言中反映出来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例如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在宣言中补充关于农民地位的内容，等等。

之后，毛泽东又谈到关于让所有兄弟党代表事先了解草案内容的必要性的问题。他说，这一方面是坚持民主，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思想。只是务必让各代表团最晚于11月11日夜前把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报上来。确实，我们给他们研讨草案的时间并不多，但"应当考虑到，会议要持续2—3天，其间每个代表团仍可以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关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几个方案：1. 只有中共中央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不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财政部长李先念)；2. 代表团所有成员——共产党员(11人)都参加会议；3. 包括非党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在内的来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所有成员都参加。毛指出，应当考虑到，我们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便可以邀请其他国家(如波兰等)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参加会议。关于这一问题，毛说，可以再商议。

接下来的会谈中，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关于自己在莫斯科与一些兄弟党代表会面的情况。

毛说，他与哥穆尔卡会谈的时间最长。关于对这次会谈的评价，毛指出，宣言中有两点让波兰人有些为难：1. 抨击美帝国主义；2. 指出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哥穆尔卡"在与我交谈期间以波兰人民的名义强调，并非他个人，而是波兰人民不能接受(宣言中)这些条款"。毛说，我建议其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哥穆尔卡答："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不了。"他在与毛的会谈中强调，波兰不会接受宣言中有关激烈指责美国的表述。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些内容在苏联和中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他预测，会议宣言"将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毛解释道，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被迫反戈一击，"遏制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哥穆尔卡表示，在这一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毛与哥穆尔卡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问题上。其间，毛强调，"每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班长，每个排也得有排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团队里也理应有自己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毛继续对哥穆尔卡说，"这个领导的角色并不好当，很麻烦哩"。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仅仅通过一次会谈是很难取得什么根本性的成效的，但我还是极力证明哥穆尔卡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能够如愿，让波兰人在宣言上签字，那

是再好不过了。可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毛声明，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仍要通过宣言。“(我们)不希望他们说，自己是被迫在宣言上签字的”。他们拒绝签字，我们可以等，过上3年左右，他们反正还是要签的。与毛会谈期间，哥穆尔卡并未否定宣言本身，但提了许多附带条件。毛泽东说，在将声明草案分发给波兰人之后，他打算到哥穆尔卡那里，与他再好好谈谈。

关于与南斯拉夫人的会谈，毛指出，情况比波兰更复杂些，因为“他们不是脚踩一只船，而是两只船”。

毛说，在与多列士、陶里亚蒂和波立特[①]会谈期间，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形势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欧洲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毛与这些国家的代表还就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在这方面，英国共产党还郑重通过了一个决议。去年，在访问中国期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仍坚持“不开一枪”的立场，可“现在如果敌人开火的话，那么，他们也打算还击了”。毛说，会谈期间，我建议英国同志要多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注意到，波立特对签署宣言表现得相当积极。很明显，英国人是想借此来达到“提高英国共产党声望”的目的。毛说，“我对英国同志的这些想法表示反对”。

毛继续说，在与法国同志会谈期间，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表示了不满。“不过，现在我们感到法共和意共与英共的立场已相当接近了”。

毛泽东还讲了关于自己与金日成的会面情况。毛说，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撤出朝鲜和在中国的朝鲜政治侨民的情况。[②]毛让金日成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并建议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平均为2个军。在谈了这样做的理由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他还强调，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有可能促使美国人的两个师也撤离朝鲜，并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是志愿军，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援助朝鲜人民的”。毛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境内的朝鲜政治侨民问题，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在途经中国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将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并“宣布予以大赦”。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日成答，“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

接下来，毛泽东又与金日成谈了关于周恩来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问题。对此，毛说，我对金日成讲，“看来，要是我(毛泽东)去朝鲜，你们是不会欢迎的，因为我带去的都是些坏消息”。金日成不同意这一观点，并表示，如果毛泽东来朝鲜，他

---

① 多列士，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② 所谓政治侨民，是指1956年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时，逃亡到中国的延安派干部。当时毛泽东为此事严厉批评了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详见沈志华：《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4月号，第32—43页。——编注

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

П. 尤金

АРАН，ф. 1636，оп. 1，д. 199，л. 1－6

№138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声明草案

（1957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0日会议第12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别利亚耶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柯西金，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1. 关于在兄弟党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

（赫鲁晓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库西宁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应该把由苏斯洛夫同志准备的报告，作为经过中央赞成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分发给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分发报告的日期——1957年11月11日。

2. 关于兄弟党代表团会议的声明草案①

（波诺马廖夫、尤金、赫鲁晓夫、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柯西金。）

声明草案是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议的。

关于协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②

---

① 新的宣言草案是由两个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提议的。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委托М.А.苏斯洛夫、О.В.库西宁、П.Н.波斯佩洛夫、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和П.Ф.尤金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声明文本的制定工作(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63，л. 1－2；оп. 12，д. 296，л. 4－22)。——原注

② 在被讨论的宣言草案里，记录了以下内容："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РГАНИ，ф. 3，оп. 12，д. 296，л. 18－19)——原注

坚持自己的立场。

进行会晤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尤金。

关于致拉科西同志的贺词。[1]

(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8,л. 28－28об

№2076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

(1957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0日会议第124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

第122号记录第2项

1957年11月10日

绝　密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尤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继续开展工作,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会议的声明草案进行协商。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63,л. 1－2

① 话题指的是祝贺拉科西65周岁的生日。——原注

№1382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的修改

（1957 年 11 月 12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11 月 12 日会议第 125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О. В. 库西宁、А. И. 米高扬、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А. Н. 柯西金、М. Г. 别尔乌辛、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1. 关于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和会议的组织问题。

安德罗波夫、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伏罗希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

安德罗波夫同志：报告关于对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

波诺马廖夫同志：报告修改意见。

委托同一委员会形成可以接受的修改意见。

与中国人进行商议。

会议定于 1957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1 时开幕。

委托就会议开幕事宜征求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明确会议的工作程序。

代表苏联共产党的是——中央主席团委员。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8，л. 29

№2076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草案

（1957 年 11 月 12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11 月 12 日会议第 125 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苏共代表以及会议的组织问题。

第125号第1项

1957年11月12日

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和候补成员代表苏联共产党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会议。

2.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尤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按照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提出的并可能会被接受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的文本，并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文本的内容进行协调，以便形成决议草案。

3. 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于今年11月14日上午11点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举行。

4. 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于今年11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举行。

5. 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并把其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代表。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64，л. 1－2

№20606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

(1957年11月12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3日

第1228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同金日成同志谈话纪要

1957年9月[①] 12日，同金日成同志会面。他讲述了会见毛泽东同志的情况；并通报了代表团在即将会见赫鲁晓夫时准备提出的问题。

---

① 原文如此，应为11月。——编注

金日成同志说，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非常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毛泽东同志说，战后金日成同志已两次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我们暂时还没有去过你们那儿。我们决定在近期向你们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然后，我打算亲自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怎么样？你们接待吗？邀请吗？"

金日成同志回答说，他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同他们的意愿完全一致，他们自己也打算在1958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日成同志在同我会见时还说，他们感谢中国朋友决定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人民将会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友善的态度，真诚地接待中国朋友，接待中国的党政领导人。

金日成向毛泽东同志通报了朝鲜劳动党的情况和有关1956年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以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

毛泽东同志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有关小集团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去年这个小集团的一些朝鲜人来到中国，给中共中央写信，片面地反映朝鲜劳动党党内的情况，只讲朝鲜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去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事，可以说是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每一个党在工作中都会有错误和缺点，应该由他们自行改正。你们曾经犯过命令主义的错误，你们自己克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错误，我们做了自我批评，也请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克服了缺点。最主要的是，我们党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要完全相互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金日成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的确认为"来朝"一事是干涉内部事务，但我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好研讨，保持我们兄弟共产党之间的正常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完全支持中共和苏共的政策。例如，匈牙利事件时，我们立即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政策。我们全党和全体人民在这件事上也支持我们。

接着，毛泽东同志建议，让8月中央全会后逃来中国的那些朝鲜人回去。金日成同志回答说："我们不强迫他们。"

毛泽东同志向朝鲜朋友建议，考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论据是，这样的措施在政治上是适宜的，世界舆论容易理解，还可以促使美国人把两个师从南朝鲜撤走。

金日成同志回答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这一建议。

在谈及即将同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时，金日成同志说，他们会向苏共领导通报有关朝鲜劳动党内部的问题，并交换意见。至于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他们对朝鲜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援助表示完全满意。所以有关经济问题仅提出两点：

第一，我们要求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每年向我们供应5 000—6 000吨棉花，而1958年

的计划只供应 2 000 吨。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我们本来想向中国朋友要求提供 12 000 吨,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提供这个数量,现在他们只能提供 8 000 吨。如果没有这样的援助,我们就无法完全满足平壤纺织联合企业的要求,如果棉花供应保证的话,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 1 亿米的棉布。我们现在正研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产棉基地以及增加人造纤维的产量。但暂时还未能成为现实,我们还需要苏联的援助。

第二,关于建立军队的后备资源,以防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入侵。根据国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难再建立军用后备资源。所以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请求,希望在苏联的国防计划中考虑建立后备资源:燃料、汽车、武器装备、弹药等,以防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遭到军事入侵时能向朝鲜人民军提供这些物资。

金日成同志还告诉我说,他同法共代表团的领导谈过,他们预定于 1958 年派出法国共产党访朝代表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还同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同意斯托伊科·基弗同志 1958 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接着金日成同志特别强调向赫鲁晓夫同志致敬和衷心地感谢,感谢他同意并愿意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向苏联党政代表团展示,朝鲜人民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他们如何使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我们还将认真地听取赫鲁晓夫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的各种意见和意愿。

会见结束时,金日成同志通报说,在各种会议和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话后,他们想马上回到朝鲜去,以便尽快地召开有广大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在全会上,金日成同志将作报告,介绍党政代表团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的情况,传达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以及这些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他们认为这非常重要,可以动员党和人民去胜利完成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项任务。

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签名)

文件 6 份,送:葛罗米柯同志、巴托利舍夫同志、扎哈罗夫同志、费德林同志、书记处、档案室

第 2172 - дв 号

1957 年 11 月 13 日

АВПРФ,ф. 0102,оп. 13,д. 5,л. 251 - 254

№08881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通事故

（1957 年 11 月 19 日）

机 密

副本，文本第 3 份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

1957 年 11 月 19 日 0 时 15 分，苏共中央办公厅汽车队的司机 В. М. 伊柳欣，驾驶着一辆吉斯-110 型汽车，车内坐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彭德怀元帅和其他人，沿着伏龙芝大街向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大门方向行驶，行至十字路口时遇黄色交通信号灯，它没有让行正在通过十字路口的由司机 П. И. 塔塔拉什维利驾驶的“胜利”牌汽车。

两辆汽车相撞，结果是造成了汽车的某些技术故障。

事故发生时车内人员没有受伤。

事故正在调查中。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92，л. 256

№26346

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

（1957 年 11 月 19 日）

摘自 А. А. 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11 月 20 日

第 02429/ГС 号

绝 密

文本第 36 份

毛泽东与 A. A. 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

1957 年 11 月 19 日

今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毛泽东同葛罗米柯的会谈。

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首先回顾了 1949—1950 年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的几次会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很感兴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他说，苏联的外交官"不仅为自己战斗，有时还不得不为我们大家而战斗"。毛泽东指出：至于我本人，我一向支持你们，不错，"是在你们背后"。

葛罗米柯说，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事务中，苏联代表都感受到人民中国的支持。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人民中国总是无形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接着，毛泽东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一向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在同美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中国力图"离美国更远些"。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以下基本方针：在今后 10—15 年内中国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个方针对中国有利。"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助于实现这个方针。他指出，美国想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对我们有利。他开玩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杜勒斯成了兄弟。他接着说，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即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或在国内势力的影响下，美国将抛弃台湾的蒋介石，"并试图渗透到我们大陆来"。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一定的困难。

毛泽东继续发挥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说，虽然我们公开声明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甘心情愿，因为在个别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甚至弊大于利。中国在政治和人口方面是个大国，但在经济方面是个弱国。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同我们建立官方关系并渗透到中国大陆来。中国有 500 万知识分子和 70 万资本家及其家属。在这些人中，大部分赞成社会主义。但其中一部分是右派分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理人。

中国在经济方面还不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因为中国没有必需数量的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缺少外汇。根据这些原因，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对中国有利。杜勒斯的对华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效劳。他不想承认我们，这使我们很高兴。如果这样长期拖下去，比如说，拖半个世纪不承认，到那时就有可能赶上美国。在经济方面达到这个目标，看来需要十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钢的年产量为 520 万吨；美国为 1 亿吨；英国为 2 000 万吨；德国为 2 000 万吨；法国 1 600 万吨；日本 1 000 万吨。意大利的钢产量大体上和中国目前的水平差不多。因此，意大利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毛泽东强调说，从上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定地奉行既定的对外方针政策。

他问葛罗米柯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葛罗米柯答：中共的这个方针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他补充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方针同苏联以及中国其他朋友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矛盾的。他们经常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关于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从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也强调这一点，并批评那些不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国家的顽固立场。

然后葛罗米柯同毛泽东就美国对中国最近的对外政策有何反应问题交换了看法。葛罗米柯强调指出了这一情况，即中国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的坚定的原则立场，迫使他们像尊重实力和毅力一样尊重人民中国，尽管他们非常敌视人民中国。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再次指出，中国丝毫不急于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在日内瓦的大使级谈判可以进行20年。我们完全可以等待。他接着说，大家知道，在朝鲜同美国人也谈了两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直到朝鲜和中国军队在前线打了胜仗，美国人才不得不同我们达成协议。

葛罗米柯接着指出，根据他在美国期间形成的印象，美国统治集团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现在未必会采取实际步骤，因为他们害怕，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看作是美国软弱的表现，从而对美国的整个政策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这种心态就更加突出了。在裁军谈判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在整个对外政策方针有可能破产的威胁下，害怕作任何让步，认为这种让步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会使许多国家离开他们，从而动摇他们操纵的军事集团。

毛泽东指出，这样认识和评价美国人的情绪是正确的。他接着谈及中国对英国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反对英国奉行的对外政策措施，避免同英国接近。英国对中国大体上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毛泽东在回顾中英建交的历史时指出，在初期，英国极力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建立半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代办级代表的协议。英国人对此也很满意，他们立即往北京派来了代表。毛泽东接着说，中国长期没有派代表去伦敦。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专门找周恩来商谈这个问题。因为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了比美国进步的立场(他们甚至同意在越南停火)，中国才决定派代表去伦敦，为的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同英国之间的矛盾。

然后毛泽东指出了英国对中国的前后矛盾的立场：英国一方面主张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的确，他们在表决时有时弃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因为他们不赞成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毛泽东说，我们一贯坚持，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在联合国应像苏联和印度那样去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才同意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毛泽东说，至于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我们不主动提出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同他们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时都提出一个主要条件：要求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由此可见，中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她承认问题上追求两个目的：使这些国家摆脱

美国并断绝同“台湾政府”的联系。

葛罗米柯请求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举行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谈判时，是否提出必须承认准许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个条件。

毛泽东答，主要的条件是断绝同蒋介石政府的联系和把它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他说，英国同意第一条，但不赞成第二条。因此，中国同英国只建立了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中国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原则立场。他同时举出最近在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坚决声明，在蒋介石集团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将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说，苏联在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代表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可以再等 15 年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到那时中国钢年产量将达到 4 000 万吨。据波立特同志讲，再过 15 年英国的钢年产量只能达到 3 000 万吨。由此可见，再过 15 年中国将超过英国，苏联将超过美国。他对葛罗米柯同志说，站在我们共同的这样的“钢的讲台”上，你的工作将会轻松些。这里还必须加上中苏两国众多的人口。

毛泽东通报了中国钢产量增长的极高速度，来证明中国达到钢产量的上述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他说，在过去，中国于 1943 年达到的最高钢产量是 90 万吨，其中大约 80 多万吨是在日本企业家手里，大约 4 万—5 万吨是蒋介石那里生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同 1943 年的“最高年产量”相比，钢产量大大减少了。目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年产量将达到 520 万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2 000 万—2 200 万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3 000 万—3 500 万吨，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4 000 万—4 500 万吨。毛泽东在强调了中国的钢产量增长的良好前景后指出，苏联的钢产量是高速增长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是如此。他说，在这样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苏联在最近的将来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毛泽东在谈论中苏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时指出，我们两国的市场的容量是无限的，不需要寻求外部销售市场。

葛罗米柯在谈话过程中谈到了裁军问题。他强调说，在裁军问题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美国的处境是复杂的和微妙的。葛罗米柯说，一方面美国拒绝同中国直接进行谈判，不同意让中国参加谈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回避涉及中国的裁军问题。因此，在谈判中讨论裁减大国武装力量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应当讨论四大国裁军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不能解决涉及中国的任何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在今后也是可以采取的。葛罗米柯想知道中国朋友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有何看法。

毛泽东指出，苏联拒绝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是讲原则的。他接着说，中国没有参加裁军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国放开手脚实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国感到比较自由，不受任何条约和协定的

约束。现在，如果邀请我们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或某个国际机构的工作，我们还要等一等，等他们邀请三四次之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值得参加。”不错，我们的这种立场很像“贫穷人的立场”，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有志气，有原则。

毛泽东接着说，在同任何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一贯遵守完全对等的原则。在这里，他提起邀请美国记者访问中国那件事。毛泽东说，去年曾允许一批进步的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搞臭坚决反对访问的杜勒斯的政策。后来，美国国务院禁止这批记者访问中国。今年杜勒斯试图组织另一批美国记者访问中国。毛泽东说，我们坚决要求遵守对等原则，随后在日内瓦大使级谈判时提出讨论这些问题。美国拒绝这样做，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防守的被动地位。

然后毛泽东谈及在中国关押的美国人问题。他说，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刑满释放。某些友好国家的代表曾建议我们释放所有这些美国人。其中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是莫洛托夫。毛泽东说，莫洛托夫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因此他劝我们释放在中国关押的所有美国人。我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刑满以后再释放这些人。毛泽东说，很遗憾，这种人在中国已经很少了(大约只有 10 个人)。如果有 400—500 人就好了。

葛罗米柯说，中国朋友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的原则立场日益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代表人物对中国的尊敬。

毛泽东问葛罗米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的印象如何，在他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接触时是充满信心呢，还是没有信心。

葛罗米柯答，他认为，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最近时期不如以前有信心。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增长。由于苏联最近在科学技术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就，他们的这种心态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表面上还很自信，装腔作势，神气十足。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于 12 月前来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满意，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毛泽东接着简要地表述了他最近在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对国际问题的某些想法。他强调说，从 1946 年起他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多。毛泽东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指出，当时中国革命还未取得胜利，希特勒灭亡了，欧洲建立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他说：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比西方强大。希特勒被打垮后，美国人来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比苏联强大，特别是他们投过原子弹。当时我写了篇文章，强调说，如果美国进攻苏联，他们不会赢得任何胜利，只会付出巨大牺牲。

毛泽东说，必须强调指出，美国最怕死人。如果打死几百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他们伤亡 200 万—300 万人，那就等于美国的灭亡。因此，他们不敢进攻我们。对他们来说，最好是他们能够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付出任何牺牲和代价。毛泽东说，他认为，美国力图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依附于他们，占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的领土。他们想

不通过战争去奴役这些国家，在那里建立基地，同这些国家签订政治、经济和军事条约。他们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反苏反共的旗号下进行的。美国的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矛盾：

1. 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恢复了英国和法国的国力，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现在他们说，美国的所作所为不是反对苏联，而是反对他们。毛泽东说，这些国家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他们同美国的矛盾对我们有利。据此，在兄弟党会议宣言中，有意识地没有把美国同英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某些兄弟党的代表，如波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同苏联同志协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的打击目标应集中在美国身上，从而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深。

2.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前殖民国家和美国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有13亿，其中7亿人生活在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等)。

毛泽东还指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取得独立。前殖民国家在那里还保留了自己的利益。

毛泽东举埃及为例。他称赞了纳赛尔把西方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银行资本实行国有化的勇敢行为，他同时强调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铁路和其他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实行国有化。仍然保留了英国和法国垄断资本在苏伊士运河的某些利益。毛泽东接着谈到埃及的财政困难，他说，纳赛尔本来指望，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完全弥补经营和完善运河的开支，并提供建设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但现在可以看出，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毛泽东随后指出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说，纳赛尔在对所有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还不够彻底和坚决。他预料，美国会利用埃及的经济困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葛罗米柯通报说，埃及人现在还向苏联请求提供贷款。

毛泽东指出，“请你们提供贷款，这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很难指望，埃及在经济方面会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尼赫鲁对外国在印度的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同样也不彻底。虽然他已大张旗鼓开始干起来，但后劲不足。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印度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比其他中立国家强大。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说，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钢产量只增长30万吨，而中国增长了330万吨。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说法，即印度在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英国资本，有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在继续发挥他的想法，他说，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主要靠自力更生。不错，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2亿卢布贷款。毛泽东指出，这批贷款一部分已经偿还，大部分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偿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还清苏联的债务。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三分之一用于经济建设，购买各种设备；三分之二用于朝鲜战争，购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中国将用自己的国内积累逐步偿还债务。今后我们打算“避免从苏联取得贷款，因为除我们以外有许多国家向苏联请求援助”。他说，中国不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借一分钱。

毛泽东接着再次叙述了他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已经谈过的关于如何满足中国政府的各

种请求问题。他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态度：

1. 满足中国方面的一切要求。他说，苏联同志的想法是这样做可以不得罪中国人，不会搞坏同他们的关系。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恶化同苏联的关系”。还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部门领导人并不经常了解本国的全部情况，总想依赖别人过日子。需要教育他们，使他们一方面依靠苏联，但同时又不力图依赖苏联。这里他又指出，不仅我(毛泽东)依靠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同志，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我。“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2. 对我们的请求持较严格的态度。“对我们的请求也许只需要满足一小半，或者至少需要减掉30%”。应当做到，使中国有关部门“不因吃得过饱而感到腻烦”。对中国方面的请求持这样严格的态度，可以迫使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更认真地考虑如何解决内部困难。这里我们不应忘记苏联人民当年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大家都知道，“只有在困难中才能锻炼人”。

毛泽东在此讲述了中国经济部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项建议。他说，前年中国的棉花大丰收，使得去年的棉布产量大大增加，因而提高了居民的棉布供应量。每人棉布供应量定为12米。他强调说，对于中国人，这样高的定量是空前的。但在确定这个定量时，没有考虑到以后棉花歉收时如何办。到1956年，棉花收成不好，我们的经济部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棉布的缺额。因此，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提出了今后5年平均每年从苏联购买5万吨棉花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北京讨论过，当时我在杭州休假。我们的同志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还没有向苏联政府提出，因为那时你们正开展反对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斗争。

在回到北京后，我反对我们经济部门领导人的这个建议，向他们指出：“不应再麻烦苏联同志，因为苏联不仅要满足国内的棉花需求，而且还要满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棉花需求，此外还要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必要的外汇。”最后我们决定不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个请求，为了解决困难，把每人的棉布供应量由12米减到9米。的确，这个决定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毛泽东在谈及棉花困难时还说，去年播种面积减少了20万公顷。他指出，这项临时措施是因粮食作物面积太少而采取的。从明年开始，中国打算重新恢复原来的棉花播种面积，并采取措施提高每亩棉花的单产，并增加合成纤维的产量。

在会谈中毛泽东广泛地谈论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意义。他说，应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大规模的慷慨援助，把它用在主要的工业项目上。他强调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中国提供过这么大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德国、捷克、波兰)也向中国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远不能同苏联的援助相比。苏联同志公正地指出，在中苏两国经济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当前这样大的贸易规模。

然后，毛泽东在谈及中苏两国外交部的工作时强调了这样一个特点，即中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是通过两党中央解决的。苏联外交官的主要精力看来需要集中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他接着说，我们给我国外交部提出的任务是扩大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对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目前尚未认真对待，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葛罗米柯指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联系确实具有党的性质，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领导下，苏联外交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苏中关系，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同时通过某些对外政策措施动摇帝国主义阵营。

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任务同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吻合的。

葛罗米柯赞扬了中国朋友对印度、印尼等国进行的大量的有益工作。苏联代表在国外的活动中经常体会到这些工作的效果。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兄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原则上不同于兄弟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前一种关系主要是在党与党之间发展的。兄弟国家的外交部在发展和巩固这些关系方面也发挥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毛泽东预祝苏联外交部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他说，很明显，"没有莫洛托夫你们的日子也过得去"。

葛罗米柯说，没有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更好些，因为他妨碍了苏联外交部及其在国外机构的工作。他是党肩膀上的沉重包袱。尽管他本人认为，没有他天会塌下来，会落在地上。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毛泽东赞扬了上述说法。他说，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很危险的。大家都会因此而遭殃"。

葛罗米柯列举了一些事实，如：莫洛托夫实际上曾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和东德让给帝国主义，他曾建议把这两个国家排除在华沙条约之外。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莫洛托夫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接着，毛泽东回忆他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那时他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半月。他说，在此期间，"我同斯大林吵过几次"。斯大林憎恨我。在一次会见中，他(斯大林)组织了对我的"攻击"。第一个开炮的是莫洛托夫，第二个是贝利亚，斯大林最后作总结。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大体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人，但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说，他们还表示担心，在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铁托"。毛泽东指出，当时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是这次谈话的见证人。参加这次会见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极力使斯大林等人相信，在中国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毛泽东说，在这次谈话中，我基本上保持沉默，只是"内心里讥笑他们"。我不想反驳他们的说法，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毛泽东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不敢扣押我，最后为了挽回局面，才签订了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条约和其他协定，把中长铁路还给了我们。

毛泽东强调说，对于争论的问题，斯大林不愿倾听我的意见。有一次他甚至扔掉了电话筒，中断了同我的谈话。另一次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已委托米高扬同我谈话。毛泽东说，当时曾想"让我们吞下两个我们不愿意吃的苦果"。第一个是所谓合营股份公司问题；第二个是最难忍受的问题，即在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叙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说，当时蒋介石组织了对上海的疯狂轰炸，企图摧毁那里的工业企业。我们请求斯大林派一两个空军师

去保卫上海，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空军。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莫洛托夫问："我们能否把新疆和满洲看作是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原来是这样，只有在我们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苏联才会派两个空军师去上海。

关于这两个"势力范围"问题，是指在上述地区只能允许中国和苏联公民居住，禁止第三国公民在那里居住。毛泽东接着说，在谈判时我问莫洛托夫：对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人如何处理呢？在东北有150万朝鲜人，而且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莫洛托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此外，在哈尔滨还有相当多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新疆南部有巴基斯坦人(大概200—300人)，他们在那里经商。我们根据同斯大林达成的这个协议，不得不把巴基斯坦人赶出新疆。

从前只有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过这种做法。我认为，斯大林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东北和新疆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事件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搞坏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骂铁托是法西斯分子，是刽子手。

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功劳占70%，错误占30%。或许，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将作出另一种评价。也许认为他的错误占10%，但即使在这10%的错误中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苏共中央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错误，这是非常正确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做法好像揭开了我们身上的盖子，消除了宗教式的迷信"。毛泽东说，在个人迷信问题上，我们不完全同意你们，主要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初期，没有适当地确定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的范围。不错，在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明确些。"由于这个补充，我们双方的观点接近了"。

葛罗米柯问毛泽东：是"接近"，还是"一致"?

毛泽东答：是"一致"。然后他说，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劳比较大，还是错误比较大，讲得不够明确"。这个问题不仅同斯大林本人有关，而且同苏共全党、同2亿苏联人民有关，因为在斯大林生前的30年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功劳是同苏联人民、苏共、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相联的。这种联系正确地反映在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议上也公正地谈到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在此强调说，苏共中央、苏联领导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不止一次地谈到斯大林的活动，实际上既谈到他的功劳，也谈到他的错误。他说，他本人认为，确定斯大林的功劳和错误的准确比例和用比例来表述是困难的。采用这种方法有陷入机械主义的危险。既肯定他生活和工作中的正确方面，也认清他的错误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即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因为确实"不能用斤两来衡量功劳和错误"。他表示相信，历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但他接着又说，在中国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或许历史学家将来纠正我们。总的来看，在评价斯大林方面，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

毛泽东接着说，苏共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同时他强调说，这个问题是在同中共中央密切协商中解决的。他援引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来莫斯科商谈的

经过。

毛泽东说，中国代表随时准备前来莫斯科，以便商谈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如这一次，当需要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召开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立即来到莫斯科。

毛泽东强调说，今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许多问题，我们的同志，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陈云，任何时候都可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毛泽东在这里对陈云的评价很高，说陈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是杰出的“经济管理领导人”。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工作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说，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很好的措施。例如，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清除一切不愉快事件和积垢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我们吐出了当年强迫我们吞下的那些苦果”。他接着说，中国赞赏苏联同志的工作作风有很大改善。这种改善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国家。

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中央之间以及其他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称赞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兄弟党会议上。开会时考虑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尽量团结一切力量。毛泽东问：难道斯大林在世时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说，当时“兄弟党”仅仅是一句好听的空话。实际上斯大林是父亲，我们都是儿子。

中国对苏联国内的变化也很高兴，从前，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对他提出一句批评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志都向我讲过。

毛泽东满意地谈到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苏联时所受待遇的重大差别。他说，这次我于11月2日来到莫斯科，11月3日就同苏联领导同志举行会谈和共进午餐。在那次会谈中特别提到，斯大林同兄弟党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比作“父子关系，或猫鼠关系”。“你们苏联同志正确地指出，更像猫鼠关系，如果说像父子关系，那么就不是欧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而是封建专制和父权至上的亚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

毛泽东在回到斯大林评价问题时说，斯大林也有个优点，就是不固执己见。过一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同意他曾经反对过的东西。例如，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他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的革命。朝鲜战争开始后，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156个企业的协定等。对此，中国人民感谢斯大林，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

葛罗米柯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这些友好行动符合苏联人民热爱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毛泽东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相互热爱和尊重的。“我们和你们是全天候朋友，即使当年你们扣押了我，刘少奇仍然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

毛泽东接着说，我应当向斯大林在天之灵表示歉意，尽管在他生前我们俩吵过架。当然我们没有采取南斯拉夫人的做法。南斯拉夫人在回敬斯大林的谩骂时，指责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无疑，应当承认，当时犯的错误是局部性质，从全局来看，苏共和苏联还是正确的。在评价一个党的全部活动时，应当对这些活动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说，对中共的活动也需要进行分析。总的来看，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他在这里列举了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和高岗的反党活动。他强调说，“在苏联有个莫洛托夫，在中国有个高岗，高岗是个可怕的人物”。他指出，高岗在自己周围联合了100多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东北。在中国6个大行政区中，在4个大行政区都有他的代表人物。高岗的这些追随者后来承认，他们曾试图把陆军、空军、海军的领导干部拉到自己方面来。毛泽东说，高岗分子提出的口号是：“拥护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分子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分子清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该“打倒我了”。值得注意的是，高岗在最后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有一天，当他得知我的身体不好时，他立即从南方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说，高岗受到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看来还有马林科夫的信任。高岗曾背着中共中央向贝利亚集团提供秘密情报。毛泽东还说，贝利亚的代表戈格里泽①为此目的曾秘密到东北同高岗会见。

毛泽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早在1949年，刘少奇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曾经商谈：在兄弟国家不搞情报活动。斯大林同意这个建议，并于1951—1952年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发了文件，说在兄弟国家不再搞情报工作。毛泽东说，但这是一句空话。“其实，在贝利亚被枪毙以前，这种活动一直在进行”。

毛泽东说，我在这里所谈的一切都属于斯大林那30%的错误。中国有一切理由对斯大林不满。我们的不满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中国革命在1930年代遭受到巨大损失，丧失了90%的革命力量。在那些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伤亡惨重的长征。毛泽东说，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苏联治病的王明本人会讲得更清楚。不过，他本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2. 在1945年，“不允许我们革命”。当时斯大林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们一个指示：不要开始打内战。原来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过分工。罗斯福负责劝说蒋介石，斯大林负责劝说共产党。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在指示中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开始打内战，“他将袖手旁观，其后果不堪设想”。还推测说，“整个中华民族将要灭亡”。毛泽东指出，我们“没有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是蒋介石分子首先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妨碍了中共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开始夺取政权。

3.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本身受到怀疑。猜测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铁托分子，是亲美分子”。毛泽东说，对我们的这种怀疑直到朝鲜战争后才得以消除。

毛泽东说，确实，关于对斯大林的不满，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为的是不给我们的敌人以口实，使他们用来在中苏间制造分裂。在刚刚结束的兄弟党会议上，我们也不能讲许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帝国主义可能从这里了解到许多情况，并用来损害我们的事业。因

---

① C.A.戈格里泽，1951年11月10日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2年2月13日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兼第三局局长，11月20日升任第一副主席。1953年7月3日被捕，12月23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编注

此,在会议上我们只讲对斯大林的不满,但不讲为什么不满的细节。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即他回忆的这些具体细节如果公开讲出去,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关于中共中央的这种不满,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除中共中央委员外,中共一般党员也不知道。毛泽东指出,不错,由于国外发表了雅尔塔会议的文件,中国有人知道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也有人从杰吉耶尔写的铁托传略中看到这个协定。在这个传略中还有关于雅尔塔会议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材料。

葛罗米柯就此问题对毛泽东说,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引证的那个文件,说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似乎达成了协议。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经过查证,这个文件没有发给苏联,当然苏联也没有答复。葛罗米柯指出,在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通信集中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而且英国人对此解释也没有提出异议。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南斯拉夫同志应该注意到这个情况。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祝贺苏联外交部在加强苏中友谊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再次强调说,中国和苏联是"由永恒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表示希望葛罗米柯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О.Б.罗满宁

发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里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科罗特琴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毛希丁诺夫、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马林、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佐林、谢苗诺夫、费留宾、费德林、波采罗布、察拉普金。

文件3份,送:情报委员会、远东司、档案室

共印39份,1957年11月20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葛罗米柯

1957年11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0а,п.1,д.423,л.1-22

№24940

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

（1957年11月23日）

会议主席：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B. A. 热利科夫斯基。

杨显东(Ян Сяньдун)同志：我想谈一些总的看法。昨天我们对文本进行了研究。我们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机械化应该迅速发展，另一些人不认同这一点。中国农业机械研究所在8月份刚刚成立。该所的干部还很少，只有30名前不久才毕业的科研工作者，其中3人从事农业的电气化研究。由于中国缺乏干部，苏联专家很难开展工作。我们的农业工作者认为可以扩大合作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应该被逐步实现。另有如下5个农业方面的问题在被列入合作计划中：1. 化肥问题；2. 土壤改良问题；3. 棉花栽培问题；4. 养羊业问题；5. 家畜疾病防治问题。

如果4个课题被纳入农业合作的总计划中，那么机械化问题就占了很大的比重。

现在两国之间和两国的科学院之间已经有了合作计划。两国合作计划中列出的是首要的问题，而两国科学院合作计划中列出的是次要的问题。

汪道涵同志：机械制造研究所在3年前成立，干部的培养还不够。我了解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全面的。机械制造部要在农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因此，必须考虑到农业部的要求。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需要，还要考虑能力。我认为，为制造和研究一些新的机器并建立农业机械体系的类型问题值得研究。这是一项研究工作。很明显，主要的是前两个题目。在此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农业电气化的问题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虑到对中国的电力资源进行研究，需要考虑到对农业中电力的应用开展科研工作。

现在面临如下两个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把国家计划和研究所和科学院的计划相分离。现在必须对中国完成工作计划(首先是1958年的任务)的可能性进行思考，不能把国家的计划同研究所的科研计划混合在一起；也不能把五年计划同1958年的计划混在一起。

能否把4个问题合并为一个总的题目？在总的题目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合作形式。在此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可以完成这些计划。因此，需要把提出的要求和完成计划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讨论问题。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我们明白如下看法：机械制造部比农业部有更多的机会。从形式上来制定计划非常复杂。这份文件在保留其内容的同时，需要被制定得更加简单。我建议大家对其进行审议，并再次对其进行总的评价。

洛佐夫斯基同志：我们制定12年计划的原则的出发点是，要使科学能够解决的不是生产在今天提出的问题，而是其在明天和长远的将来提出的问题。

两国之间的合作计划可以像汪道涵和杨显东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制定，也就是说，部分题目应被纳入同列宁科学院签署的协议的草案中，而第二部分的题目应当被保留在国家的计划中。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最终决定，哪些题目应被保留在国家的计划中，而哪些题目应当被列入科学院的计划中。

考夫曼同志：我觉得，把五年计划同科技合作计划割裂开是不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科研计划要服从于一些主要的生产任务的解决。看起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的各领域大规模地推广机械化，其中包括推广最简单的机械。或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最初阶段将会依靠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得到的技术。我认为，机械制造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中推广技术以及对今后机械化发展的机器的类型作出正确的选择是重要的。在此方面苏联可以给予各方面的帮助，提供所拥有的各种资源：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作出指示，专家参与新机器的试验，中国专家参加苏联机器试验站的工作等等。

杨显东同志：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克拉斯尼琴科同志：中国的同志们同意，中国今后应当建立起对机械的系统使用。如果不能安排好机器的试验，如果不在中国的农田里对国外的农业技术进行研究，那么就无法实现机械化。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农业机械领域工作的专家的数量需要扩大。

布兹科同志：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农业发展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从1956年开始，机械制造部门、农业部门应当在开展广泛的试验和研究工作之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定出农业机械化方案。并随着国内工业的发展，逐步而坚决地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科技干部和试验干部，迅速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我们认为，举出的合作题目应当会促进所提出的任务的实现。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在苏联，新的机器的研制都以一些专门的学科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希望中国能够向我们一样发展那些基础学科。苏联关于机械化问题研究的所有资料都可以转交给你们。

洛佐夫斯基同志：或许，三个问题都可以合并为一个题目，名称为《新型拖拉机、农业发动机、农业机器和工具，其中包括适应中国各地区需要的供牲畜耕地使用的工具的试验、研究和设计》。第二条可以分为三节：1. 新机器的试验；2. 耕作机械的研究、设计以及理论问题的研究；3. 为机械体系的制定挑选材料。或许，要一一列举，需要就哪些机器开展工作。

杨显东同志：我们同意。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根据布兹科同志的提议，我们增加了关于农业电气化的条款。

国家拖拉机和农机维护工艺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谢利瓦诺夫同志提议把对机器的磨损和修理问题的研究列入合作计划。

汪道涵同志：机器的修理问题非常复杂，不应列入该问题。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我们委托洛佐夫斯基同志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制定新的文本，我们在制定完之后将在今年11月25日交给中方代表团。

杨显东同志：而对于专家的人数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在协议中指出？

洛佐夫斯基同志：我认为，关于专家的水平和数量这些问题需要另外解决，需要弄清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来解决问题，这样将更妥当一些。

汪道涵同志：我们认为，第一批高水平的苏联专家应当在1958年第二到第三季度派到我们这里。

洛佐夫斯基同志：这一点可以写下来。

决定：

1. 承认应当把最初的三个题目以及机器的磨损、修理和开工问题合并为一个问题。

2. 电气化问题应当同动力工程问题合并为一个问题。

3. 根据本次会议第一项和第二项决议，制定新的合作计划的草案的文本。

РГАЭ，ф. 9480，оп. 3，д. 1707，л. 33－37

№20609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1957年11月26日）

1957年11月28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26日

第286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11月26日

应邀拜会了南日。南日通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听取了金日成关于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之行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团所做

的工作。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对代表团领导的各种会见结果,特别是会见了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表示十分满意。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今年12月5日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听取金日成关于莫斯科之行,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结果和会议通过的公报和和平宣言等情况的报告。全会将邀请各相等中央机关的领导,各道的主席、各郡党委的主席和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出席,还邀请驻外大使参加。全会以后将召开祖国战线扩大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

初步研究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时间问题。常务委员会研究的结果认为,来访最合适的时间为4—5月间。

党代会看来将在明年2月份召开。

我问,金日成拟什么时候访问中国和越南北方?南日说,看来要到1958年10—11月间。

南日代表金日成邀请我,参赞克留科夫和舍斯捷里科夫、武官季亚科诺夫以及外交部工作人员托尔宾科夫出席于今年11月29日为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归来而举行的午宴。他还问,还应该邀请谁?

我建议邀请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博钦,南日表示同意。

在同我的谈话时,南日严肃而又表示信任地对我说,在莫斯科,金日成同毛泽东两次谈话时(有金昌满和他(南日)在座),对去年9月彭德怀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十分注意(见1957年11月27日我的第655号电报)。

在同毛泽东的第二次谈话时,金日成说,彭德怀到别墅去找他,同他谈了很长时间。毛泽东说:彭德怀去您那儿了,很好,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汇报同您谈话的事,但我要告诉您,彭德怀讲的不都是事实,所以彭德怀讲的不一定都是中央的意见。只有我(毛泽东)讲的才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南日还说,目前外务省正在草拟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8年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信件,还在草拟为建立高频通信一事给苏联部长会议的信件。至于苏联每年向我们提供500吨棉花的事,已授权目前在莫斯科的我们的代表团在缔结贸易协定的谈判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至于赫鲁晓夫在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请南日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也起草一封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式信件。

南日表示同意。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322-324

№20422

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

（1957 年 11 月 29 日）

摘自 Н. Г. 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 月 20 日
第 34/гк 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会谈记录

1957 年 11 月 29 日

应杨秀峰之邀，我们在中国高教部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杨秀峰部长谈了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高教部所面临的一些新任务的问题的决议。

会谈伊始，杨秀峰便谈了关于与中国高校里的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他说，目前中国共有 230 所高校，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其他部门的高校在内。高教部目前掌握了 112 所拥有 27 万大学生的大型高校右派分子的基本资料。在这些高校中右派分子近 9 400 人，约占学生和教师总数量的 3.5%。在北京的 81 所高校中右派分子比重为 4%，即略高于上述全国高校中右派分子的总体比重。在全国所有大学教师中右派分子比重为 6%，在教授和副教授中——10%—15%。在全国所有高校中共有教授和副教授 8 000 人，其中右派分子约 1 000 人。

与右派分子斗争的情况证明，近 2—3 年来我们在中国高校中针对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薄弱了。

关于在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社会出身情况，杨秀峰同志列举了 70 所高校的相关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显示，在这些右派分子大学生中 37.5%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此类右派分子许多都是被镇压者和反革命的亲属。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表明，在国内高校中我们在坚定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存在着不足，从而使右派分子的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青年中个人主义和虚荣心不断蔓延。青年人不懂得如何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问题，从而导致纪律松懈现象大量出现。部分青年公开对从事社会工作和学习中共政策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做这些事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以前我们在高校的教学和培育工作中只注重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必要性，而没有为这一思考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右派分子反对马列主义，并使大学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首先应当是一名专家，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与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针对青年政治教育工作的不足会导致其

立场上的不坚定,从而使一些地方的右派分子能够乘机对部分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思想施加影响,并将其拉到自己一边。

直到最近以来,高教部的领导干部们依然对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持续性问题没有充分的意识,虽然早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已强调过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右派分子的问题。尽管上级已发出了上述指示,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只是从业务(能力)方面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而对其政治观点关注不足。如果说在解放初的几年间许多大学教师们仍坚持政治学习、参加报告会和从事夜大学习等活动,那么在随后时期他们便开始逐渐放松了这方面的学习活动——对政治学习态度不端正,把政治学习放到次要位置等,这在那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各地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大学教师们并非都能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缺乏战斗的主动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素养不错,但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和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因而无法很好地完成高校政治教育的任务。社会科学教研室往往是独立于党委、自行其是,党委对其领导薄弱。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并不能只归罪于始终勤奋、诚实工作的高校教师和领导,也跟我们没有为其工作指明必要的发展方向有关。

大学教师们在课堂上只管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而根本不谈其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险阻。

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大学教师只说中国也应当建设像莫斯科大学那样的高校,但与此同时却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实际。苏联专家向我们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例如在实验室的装备方面,他们便建议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一些实验所需要的物品,但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建议走捷径——从外国购买所需设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想走捷径,但最终结果却是花了许多冤枉钱,买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良好普通教育素养和强健体质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应当是新型的、具有全面素养——尤其是政治素养的劳动者。

我们的政治学习应当与实际相结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学习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不能以牺牲政治学习为代价而只专注于普通教育课目。

应当培养我们的大学生热爱马列主义。如今,中共中央给我们提出的总任务——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培养红色专家的无产阶级高等学府。鉴此,我们党正打算采取一系列举措以加强针对高校的政治领导工作,其中包括:计划从党和国家机关中抽调2 000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到各高校、科研和文化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决定由一些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党委书记亲自承担一门社会经济学课程。他们还要平均每月1—2次到普通高校发表演讲和在以系为单位的大学生会议上作报告。

我们打算,在本学年原来4门独立的社会学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将由一门新课程来替代——"社会主义教育"。该课程学习将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为基础。

我们将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重新对所有社会学课程教科书进行审查。为了培养各方

面人才，我们将在高校设立拥有不同期限的教学模式。

1955 年，我们撤消了工农速成中学，但现在又产生了重新恢复这种教育模式的必要。从前，这些中学的教学目的——只为培养和帮助工-农青年考入高校，而如今我们打算部分青年结束了在这些中学的学习之后便可进入技术学校继续深造。从前，这些中学的学生在 3 年期限内必须学完 6 年的课程，但实践证明这一期限对于多数学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打算将此类中学的学习期限设定为 4—5 年。这些中学的教学模式将跟独立的高校一样，称作工农中学，类似于苏联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

与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知识分子的任务相联系，我们将对专业性的中等学校的工作进行重大的调整。进入这些中等学校学习的主要是企业中的优秀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如今，我们的高校和技术学校在接收新生时更注重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社会出身，并将与右派分子作斗争和工龄作为接收新生的参考。劳动阶级青年可以免试进入高校和技校。至于大学生的物质保障方面，我们打算给干部发放的助学金为原工资数量的 100%，其他类型来自工业和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原工资的 70%。

中央全会已确定了大力加强大学生劳动技能培养以及将许多教授和大学教师发往农村接受劳动锻炼的方针。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将到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参加为期 1 年的见习劳动。

与国家的财政经济总任务密切相关，各高校将压缩管理机构并对干部进行合理的调整配置。各级党委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鉴于中央全会所作出的相关决议，我们确定了扩大基层机关权限的方针，这尤其体现在财政、干部和一些教学-组织领域。

例如，中央所确定的教学计划只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给出一个基本的指导方向，至于细节问题则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必与高教部协商。中央所制定的教学大纲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各地方可以随机应变，只是必须遵照大纲中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在会谈最后杨秀峰同志通报道，国务院已决定增加科学工作者的食用油供应定额标准。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一等秘书 Н. П. 萨拉博金同志，中国高教部顾问 А. Я. 希涅茨基，以中国高教部翻译周同志。

杨秀峰同志允许(我)把会谈内容告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大学教师们。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 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分送：费德林、库尔久科夫、安德罗波夫同志各 1 份，档案室 1 份

经办：Н. Г. 苏达利科夫

1958 年 1 月 18 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1－16

№08873

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

(1957年12月8日)

机　密

文本第13份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外交部现有材料获悉，在中国大连、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和其他城市保存有沙皇俄国各种机关的档案材料。例如，在大连市保存有阿穆尔沿岸军区和伊尔库茨克军区的秘密材料和文件；在沈阳辽宁图书馆里保存有大量的俄国文件材料(近14000份)。

上述文件反映着俄国同中国、日本和蒙古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中东铁路的历史、在华俄侨的生活、白卫军将军首领的活动等)。

所以，比较稳妥的做法是，通过苏联驻华使馆从中国朋友那里弄清这些俄国档案材料和文件转交苏联的可能性。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指望中国朋友们会很好地对待这一请求，因为不久前苏联把满洲档案和涉及中国的共产国际档案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阅。

A. 葛罗米柯

H. 杜多罗夫

1957年12月8日

第2597/ГС号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3份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批准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草案)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归还俄国档案事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的电报

正如你们所知，在大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其他一些中国城市保存有俄国的文献材料和苏联机构可能对其有一定兴趣的出版物。

请从中国朋友们那里摸清将这些材料和出版物归还苏联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科学机关的愿望，我们准备为他们留下所归还文件的感光复制品。

如果中国同志对这一请求抱积极态度，请与他们商量我们派2—3名苏联专家去事先了解所说材料。

请禀告事情结果。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93，л. 29-31

№10497

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

（1957年12月14日）

为了加强中苏间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和紧密联系，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

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

二、讨论诸如务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不同的武器生产方式之类的问题；

三、讨论技术规格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

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和援助的步骤、期限及数量；

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和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达到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的目的；

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与加强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

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九、研究一方向另一方的生产提供的技术资料的担保问题；

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

在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中国政府将授权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驻莫斯科商务处负责日常事务及国防工业的交流和联系。在此期间，苏方由何机构负责此项事务将由苏联政府决定。

联合委员会在召开每一次会议前，每一方应向对方提供包括议程、事件表及补充材料在内的备忘录。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备忘录和记录都应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准备，并经双方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共同签字。

联合委员会讨论的所有结果供双方政府参考，若认为必要，政府将授权特定机构实施。

组织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费用均由会议的承办国负担，但是会议期间各个代表团的费用将由各自政府负担。

请考虑上述提议。中国方面希望了解苏联政府的反应。

АВПРФ，ф. 100，оп. 50，п. 423，д. 3

№08876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

（1957年12月16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已经查明，苏联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里保存的那些被缴获来的德国保安总局和德国秘密警察局(盖世太保)的全宗文件资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8—1942年期间活动情况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的内容有：关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关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关于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以及他们如何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等等文件资料。还有一些从德国杂志上剪裁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章，以及从一些反共产主义宣传手册和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苏联内务部认为，把附后的清单中所列出的文件移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是适宜的。

附文件清单共4页。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佩列韦尔特金
1957年12月16日

附件：

机　密

保存在苏联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里的关于中国共产党1928—1942年期间活动情况的文件资料清单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其内容是：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关于加强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恐怖政策的斗争；关于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建立中国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组织，以便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关于向人民揭露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真实面目等。该文件是由中文译成德文的，由盖世太保机关翻译的。

年代：1931年12月2日，文件馆藏：ф. 501，оп. 3，д. 232，л. 16－19。

2. 美国共产党下属的中国新闻局机关报——《群星报》(中文版)。

年代：1935年8月1日，文件馆藏：ф. 501，оп. 3，д. 232，л. 212。

3. 1930年在纽约开办的《中国先锋队》周报(中文版)。

年代：1936年10月31日，文件馆藏：ф. 501，оп. 3，д. 232，л. 242。

4. 中国出版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册，被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反共产国际"运到盖世太保(中文版)。

年代：1937年，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236－312。

5. 关于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内容的《中国新闻》传单(在巴黎用中文出版的)。

年代：1939年1月10日，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120。

6. 由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编制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名单。

年代：1939年1月，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48－74。

7. 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盖世太保和汉堡-不来梅经济情报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年代：1937年至1940年，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129－134；д. 135，л. 76－

82;д. 445,л. 102 - 127;ф. 501,оп. 3,д. 227,л. 124 - 136;д. 393,л. 104 - 106,110 - 133;ф. 1257,оп. 1,д. 5 - 6。

8. 驻中国的德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件,其内容是:关于1938年9—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关于在中国散发号召参加革命斗争的传单;关于中国妇女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关于加强中国的罢工运动;关于大规模逮捕和枪杀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

年代:1936年至1938年,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200,201;д. 135,л. 13 - 52;д. 444,л. 75 - 77;д. 445,л. 70 - 81,88 - 90,133 - 135,143 - 150,157 - 160;ф. 501,оп. 3,д. 232,л. 232 - 234,259,260,263 - 267。

9. 从德国的一些杂志和报纸剪裁下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章,例如,《世界报》、《共产国际》、《评论》、《红旗报》、《世界晚报》,其内容为:关于在中国建立全国人民抗日统一阵线,组建中国的志愿部队,开展释放政治犯的运动,关于中国人民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团结;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8年10—11月期间召开的扩大会议的决议,集结力量准备总的反攻行动,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斗争;关于中国大学生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加强中国红军队伍的力量,加强国际无产阶级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大团结,声援中国人民为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关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建立"中国友人"联合会以及在中国建立"苏联朋友协会",等等。

年代:1928年至1942年,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3,4,6,9,118,135,137,211 - 220;д. 135,л. 9,10,56,57,117,122;д. 136,л. 10,11;д. 444,л. 46,208,209;д. 445,л. 8 - 10;ф. 501,оп. 3,д. 227,л. 28,42 - 54;д. 394,л. 49;д. 232,393。

10. 国民党支部在德国出版的简报:《新中国》和宣传册:《共产主义在中国》、《关于远东战争新闻之声》、《中日冲突》,等等。

年代:1937年至1939年,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444,л. 21 - 45;ф. 501,оп. 3,д. 227,л. 210 - 221,277 - 280;д. 395,л. 3597。

11. 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手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由"反第三国际联盟常设局"出版)、《共产国际在满洲国的阴谋》(由"反共产国际"组织出版)和从反共产主义杂志《大陆共产国际》上剪裁下来的关于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容的文章。

年代:1932年,1937年,1939年,文件馆藏:ф. 500,оп. 3,д. 134,л. 100 - 115;д. 444,л. 2 - 14;ф. 501,оп. 3,д. 394,л. 54,55,59,71。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

Г. 别洛夫

1957年12月10日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93,л. 43 - 47

№2061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1957年12月17日）

1957年12月2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2月14—20日
第308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年12月17日

应邀拜会金日成。在谈话时，金日成向我通报了以下问题：

第一，今天我们通过中国大使向毛泽东同志转交了一封信。信中说，鉴于中国朋友提议将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提出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的程序。主要是：1958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要求于1958年内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致函联合国，要求美军从南朝鲜撤离。在1948年就是这么办的，当时我们致函苏联政府要求撤出苏军，同时致函美国政府撤出美军。苏联政府立即同意，并于1948年将军队撤离南朝鲜，美国的撤军拖延到1949年中期。朝鲜和世界舆论在苏联一边。我们认为现在也是这样，中国朋友接受我们的建议后，南朝鲜人民和全世界舆论都将给美国人以强大的压力，坚决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

第二，我们向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请他在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时间是5月份。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4－19

№2061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1957 年 12 月 20 日）

1957 年 12 月 23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 年 12 月 14—20 日
第 308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7 年 12 月 20 日

在我们使馆举办的苏中友好晚会上，我同中国大使乔晓光谈了话，是乔大使主动找我谈的。

乔大使说，在莫斯科期间，金日成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于 1958 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发出了正式邀请。现在收到了中国政府正式允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回音。代表团将于明年 5 月来到朝鲜，到达的确切日期以后再进行协调。周恩来将参加这个代表团。

鉴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这次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我也向大使通报了金日成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赫鲁晓夫在同金日成交谈时已表示同意派遣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随后，乔大使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大使说，金日成把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意毛泽东关于在 1958 年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的建议的决定通知了他。撤出志愿军的工作将于年底完成。乔大使继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离，从军事角度说，有可能很快地在南朝鲜和美国的侵略行为上得到反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无妨，因为军队只撤离到鸭绿江的对岸。这时大使又说，对朝鲜同志来说，在国防方面的确有些问题，因为东部的分界线从开城到黄海，西部从开城起，还有沿海地区，现在都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守卫。

大使认为，志愿军撤出朝鲜在政治方面也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可以使朝鲜居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之间产生的不正常情况得以结束，这是由于后者违反了军纪引起的；同时还可以让世界舆论更坚决地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

对大使所说的这一举措的重要性我表示同意，并说，金日成回到平壤后曾说过，打算在1958年1月同防务相一起亲自去停战地区了解军队部署情况。我顺便问乔大使中国志愿军在朝的大致人数。

乔大使说，志愿军大概有30万人。

乔大使最后说，金日成和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谈话时，毛泽东曾建议，要朝方派人到中国去，说服去年逃往中国的朝鲜人回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需要这些人。大使补充说，从某些朝鲜领导人处得悉，这些人已被开除出朝鲜劳动党，并已吊销了国籍。

谈话由大使馆随员 M.库尔巴茨基翻译。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20－22

№23033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

（1957年12月27日）

机　密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向您呈送与中国文化和宣传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沈雁冰、钱俊瑞和阳翰笙等同志的会谈纪要。这些会谈都是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的内容是关于改善我们对中国的宣传工作，协调苏中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委员会考虑了中国朋友所提出的意见和愿望，并在无线电广播管理总局、苏联新闻局和《苏中友谊》杂志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等方面也应当考虑（中国）朋友们所提出的意见和愿望。

Г. 茹科夫（签名）

1957年12月24日

第899号

附件：

与中国文化和宣传领导干部钱俊瑞同志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

1957年11月25日

Г.С.茹科夫同志与钱俊瑞举行了会谈。根据事先约定，他向钱俊瑞提出了关于中国反右斗争的结果的问题。

钱俊瑞同志的通报如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是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活动日益活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右派分子的积极活动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不满。钱俊瑞说，这只是内部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这还与国际形势有关。

由于苏共二十大开始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活动，国际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发动了反对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批评"的恶浪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也卷了进来。众所周知，在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认为社会主义还不够稳固，因而可以在中国与之开始斗争。以上所述便是中国右派分子活动猖獗起来的国内外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国内的形势，就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所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问题，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利用这一口号，他们攻击中共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在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的同时，右派分子提出了自己的口号："让所有花开放，让所有学派都争鸣"……①

众所周知，今年4月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口号。右派分子谴责了这一口号，并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诬蔑性运动。

中国右派分子包括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部分代表。在中国，老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估计有500万。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拥护与中共的合作，我们称这一部分人为知识分子的左翼；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间派；第三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并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部分人数较少，并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的右翼。在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的拥护者约占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人数的5%。

也正是这5%的知识分子右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原因在于，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右派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虽然少部分资本家也怀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但他们没有胆量加入到这一斗争之中。

---

①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意识到，自己暂时具备了精神方面……政治资本，因而便采取了反动的立场。他们认为，党在科学、教育、艺术、技术……等方面的领导作用是薄弱的。因而，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右派分子们对党的领导地位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右派分子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罗隆基、章乃器，右派分子指责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情况甚至连国民党时期都不如。

右派分子组成了联盟。民主同盟、工农民主党、“九三学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党派的许多活动家均加入了该联盟。他们还与共产党内部的反党分子相勾结。

这导致右派分子在国家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异常活跃起来。反党分子丁玲等人与右派分子一起，在文学战线上组织了对党的攻击。右派和反党分子还在文学和中国作协领导部门发表反党言论。他们断言，文学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公然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艺术应当为人民(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们认为，文学艺术不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关心的事，文学艺术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不应当为中共的政策服务。他们广泛地在中国青年作家中散布这一“理论”。

右派分子的思想在造型艺术(绘画、雕刻和木刻等)中也有所反映。这些思想的追随者们包括中国中央艺术学院院长、中共党员江丰。在与右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之后，江在该学院开展了反党活动。右派们极力败坏党在造型艺术中的威望，……并以此企图危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

……他们声称，党的领导方针似乎对中国的传统戏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右派分子还在……领域开展了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清华大学著名中国物理学家钱伟长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学院院长费孝通编写了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反对中共的10年经济发展计划。

……及其来自高级中学的拥护者们——多数都是以前曾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者，试图排除党的领导并在该校中占据党的地位。

学者常振海(Чань Чжэн-хай)、梅海忠(Мэй Хай-чжун)和陈达(Чэнь Да)等人在社会学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性。

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和集团也积极拉中国青年们——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民主联盟和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罗隆基和章伯钧等，虽然自称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他们实际上却是在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作对。从去年下半年起，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这些活动家均加紧了自己的右派活动。

在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开始后，右派分子的活动也高涨起来。起初，他们极力……到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以各种手段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威望。他们认为……他们极力

渗透到……领域,以便危害人民解放军。

……右派分子希望中国与美国亲近,并极力破坏中-苏友好。

……中共在广大劳动者层面揭露右派和反党分子们的思想本质,并允许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者们在报刊上发表反对右派立场的言论。

结果显示,90%的发言者拥护中共,反对者只有10%。钱俊瑞说,我们决定支持大多数群众。6月8日,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全面反对右派立场的进攻。这场斗争在全国人代会上也有所反映。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辩论。钱俊瑞说,我们在进行这场斗争的过程中主要是以事实为依据。该斗争的规模巨大,其间人们不仅可以进行口头辩论,而且还可采用任一形式的书面辩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大字报",即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一张纸上,或机关的墙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所反映的观点具体包括:

1. 中国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2. 由谁来领导比较好,是中共还是国民党? 3. 国家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4. 国家是需要民主集中制还是无政府主义? 5. 国家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保持生产和民族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6. 中国应当成为苏联的盟友,还是苏联的敌人和美国的朋友?

我们在会议和报刊上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事例以表明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复辟思想,并罗列了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典型案例。

……

……右派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复辟思想受到了批判。

……右派分子在中央所承担的职务被撤消。与此同时,在……会议上一系列右派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活动受到了批判。而以后,他们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自己的行动。钱俊瑞说,不过,我们在决定右派命运的问题上将采取宽大政策。我们公开宣称,右派与人民群众之间已出现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如果右派分子不再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那么他们将不会受到追究并保留其公民权,仍可以继续保留中共党员身份,调到其他工作岗位继续工作。钱俊瑞说,这样做将有利于分化中国的右派力量,但如果他们重新开始斗争,那么我们也会更激烈地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类教师:第一类教我们懂得马列主义原理;第二类——以自己的言论反对我们的右派,从而可以向我们展示其反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右派们的批评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地渗透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我们批判右派错误的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目前,我们所开展的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已进入了第三阶段。

……8年来,中国广泛地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钱俊瑞指出,中国在宣传苏联成就的问题上仍做得不够,例如苏共是如何领导苏联人民取得这些成就的? 这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似乎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些中国青年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成就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

因此，钱俊瑞说，我们希望在报道苏联成就的过程中，也要强调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也正是借此苏联人民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例如，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让全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同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我们必须说明苏联学者和全体人民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

钱俊瑞说，在访问苏联期间中国同志看到了苏联工厂和企业正在使用的那些老设备，看到了苏联人民朴素的工作条件。而我们，钱俊瑞指出，却存在这样的议论：什么时候能建起这样一个新企业或设施，并在其中安装上全新的设备，从而有一个富丽的工作条件。钱俊瑞说，我们必须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将有助于我们中国的新生活建设；必须让我们的人民明白，苏联人民在过去的40年间都是过着朴素的生活的。在上述这些事例中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展示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斗争历程……另外，钱俊瑞说，我自己也亲眼看到苏联工人在为中国生产设备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些事实都必须用到针对中国作家的宣传方面。

在苏联24所高校中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共计6 000人。苏联大学生像兄弟一样帮助中国朋友掌握知识和克服学习上所遇到的困难。在苏联各工厂，目前有中国实习生7 000人。关于这些内容都应当更多地在中国报纸上刊登出来。

苏联目前拥有一所中国学院，但关于这所学校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必须让中国读者了解这所学院的教学目标、任务及其活动情况。我们也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在中国不能有一所研究苏联及其文化的学院呢？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上报道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将有助于巩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参加此次会谈的有35人。

会议记录者 Д. 卡杜莫夫。

与阳翰笙和高……等同志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1957年12月1日

机　密

(我们)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接待了阳翰笙和高……等同志。后者即将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因而前来辞行。

阳翰笙同志说，自己逗留苏联的40天期间，在为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而举办的联欢节上他详细地了解了苏联戏剧团体所作的各种表演。这些演出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将作为他为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活动而在戏剧艺术方面所采取措施的基础。

据阳翰笙同志说，1958年中国同志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苏联戏剧和导演大师们的经

验，打算向苏联派遣8—10名中国戏剧和电影导演，让其在1-2个月的时间内每天都观看目前苏联舞台上所上演的戏剧，从而随后对所观看的戏剧及其作者、编剧和导演进行详细的筛选。

与此同时，中国同志也正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邀请苏联一流的导演们——奥赫洛普科夫、扎瓦茨基和普鲁切克等人在夏季时去中国度假，以便了解中国戏剧家和话剧家们——其中包括梅兰芳——的戏剧和表演艺术。

阳翰笙对自己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典之际，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苏联期间所看到的一切表示衷心的赞叹。他还对苏联朋友们——其中包括苏联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在内——为中国同志所提供的帮助表示真诚的谢意。

关于自己造访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要目的，阳翰笙说，除了在中国人民文化协会的工作……

……

……据阳翰笙说，中共中央目前正在研究关于把国内类似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对外文化关系的组织联合起来的问题。

根据阳翰笙同志的请求，我们向其介绍了我们设立这个国家委员会的目的及其结构，并提醒说，我们所通报的情况都是需要严格保密的，不应当泄露到中共中央机关以外。我指出，我们的这一委员会的任务之一便是协调我们的对外政治宣传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对外政治宣传活动。鉴于阳翰笙同志感兴趣，我们现在可以向中国朋友介绍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方面的活动情况。

在认真听取了我的解释并对所作通报表示感谢之后，阳翰笙也谈了如下一些情况：即至今中国没有建立任何统一的对外政治宣传机关，这方面工作由几个机构和组织同时负责，由于工作中经常出现失误，因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本人经常会对其发出指令。1956—1957年间，应中国各社会和贸易组织的邀请，日本各阶层代表……大量来中国访问。总体而言，这些日本人到中国来是有好处的。他们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好感的不断增加，有利于揭露美国和蒋介石在日本所进行的反对中国的诬蔑性宣传。尽管这样，中国负责对日工作的组织……例如，一个由前日本战犯——由以前曾积极参与了反对中国的战争的日本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来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对该代表团成员表现得极其关心，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都接见了他们。因此当这些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们回到日本后，便开始积极要求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揭露美国在宣传中所作出的判断，即中国似乎正准备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揭露以日本各种事务性和文化界代表团成员身份被派往中国的许多日本和美国间谍。

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急于问鼎政权的心理来从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工作和扩展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前不久访问中国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风见章便与中国同志达成了如下协议，即在1958年，社会党各分部将派遣由日本各府县代表组成的30个

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日本社会党提出的自己的主要竞选口号之一便是——要求恢复日本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一口号将有助于破坏美国在日本的整个政策。中国同志方面也对日本社会党组织此类访问中国的代表团的活动给予了必要的帮助。

在答复关于苏中两国间在对外宣传政策方面的重要工作的具体建议的问题时，阳翰笙同志指出……将有助于确立两国在针对日本和东南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

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
C. 齐赫文斯基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228, л. 197 - 211

№23034

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飞机

(1957年12月29日以后)

致苏共中央 H. C. 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真理报》于1957年12月29日公布的在中国生产第一架安-2飞机的问题，兹报告如下：

安-2飞机的设计者为安东诺夫同志，所安装的发动机型号为安-62ИР(我们的里-2飞机安装的也是此类发动机)。该架在中国生产的飞机的许可证是由苏联航空工业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6年6月29日第907—493号决议(向中方)颁发的。

此类飞机是在位于基辅市的第473号航空制造厂批量生产的。

1957年，在第473航空制造厂共生产安-2飞机360架，而1958年此类飞机的生产计划为400架。

安-2飞机的战术技术参数：

起飞重量——5吨

营运负荷——1—1.2吨

巡航速度——200公里/小时

最大速度——259公里/小时

安-2飞机的生产计划在中国南昌市的一座工厂里进行。

报纸上公布的飞机是安-2飞机的第一架样机，其零部件由中国生产，而飞机上所安装

的发动机是苏联生产的成品。

П. 杰缅季耶夫(签名)

手写批注：

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了解了，归档。

……①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228，л. 213

① 手写签名和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958 年

№09843

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

（1958 年 1 月 10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 月 23 日
第 22 号

机　密
文本第 4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谈话记录

1958 年 1 月 10 日

在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我提出请求，想同中国国务院某位负责同志就中国经济形势问题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赞同我的想法，建议同薄一波副总理谈一谈。

在 1 月 10 日举行的会谈过程中，薄一波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1957 年经济建设总结，1958 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

会谈一开始，薄一波指出，1957 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工业、农业、基本建设、外贸和内贸等领域所规定的许多任务都超额完成了。薄一波说，1957 年初，规定工业生产总值比 1956 年增长 4.8%；实际上到年底增长 9%。钢、生铁、轧材的生产指标大大地超额完成了。比如，1957 年的轨钢生产比原先计划的多生产 58 万吨。1957 年初，计划生产棉纱 440 万件（根据 1957 年计划，棉纱生产数额为 463.5 万件。看来，薄一波所说的计划是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实际达到 465 万件，即比规定的指标多生产 25 万件。计划采煤增加到 1.1 亿吨（根据计划，1957 年预定采煤 1.17 亿吨——不包括手工开采，实际上开采了将近 1.23 亿吨），实际达到 1.2 亿吨，即比计划规定的多采 1 000 万吨。木材生产比原先规定的指标多出 90 万立方米。

由于许多指标都大大超过了年度计划，薄一波说，不少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957 年的工业计划指标是不是定低了，这是否是保守的表现。所以，薄一波指出，《人民日报》于今年 1 月 6 日发表社论，号召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薄一波说，这一号召，意在反对领导经济

工作中的保守主义。

针对我关于超额完成计划总比完不成好的插话，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对此开玩笑说，如果说定1957年计划时犯了右倾错误，那么这一右倾让我们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让我们感到高兴，所以可以称其为“愉快的”右倾。

谈到新的企业投产和现有生产能力的使用情况时，薄一波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报刊已经报道，到1957年底，将有450个项目交付使用，其中57个在苏联帮助援建的156个项目里。薄一波说，实际上，交付使用的项目数字要比报道的数字大。

薄一波说，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已建成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能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长春汽车制造厂现在每年可生产3万台汽车，而如果再增添一些设备，便可生产4万—5万辆。但去年工厂仅生产汽车8 000台，1958年计划生产1.3万台。谈到工厂生产能力吃不饱的问题时，薄一波说，原因之一是原料不足，其中包括优质钢；另一个原因是工厂生产的汽车没有充足的销售市场。长春汽车制造厂只生产一种型号的汽车——“解放”(吉斯-151)。在中国，这种类型的汽车使用范围相当窄。长春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只能在城市里使用。在农村很难使用，因为那里没有好的道路。为了货物的长途运输，需要载重量为4—5吨和10吨的汽车。薄一波补充说，此外，如果我们把生产汽车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我们为此会缺乏燃料。薄一波说，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因此，当前很难为机器制造的同一类型的大批量产品找到销路。

薄一波说，在不久前开工的许多其他现代化大企业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按照最初的方案，鞍山无缝钢管厂应年产6万吨同一尺寸的钢管。尽管中国的工业需要无缝钢管，但是国家现在并不要求如此大量的同一尺寸的钢管，这些钢管找不到销路。因此，工厂对生产过程作了一些改变，用生产若干种尺寸的钢管来取代单一的品种。这使得工厂可以将产量扩大到生产10万吨无缝钢管，而且这些产品的销路完全可以保证，工厂的产品甚至供不应求。

薄一波说，专家们对类似企业转向扩大产品品种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人坚决地主张，既然生产一种产品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而且还导致生产设备不能完全利用，那么就必须让这些企业转为生产几种产品。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改造这些企业让他们能生产几种产品。其他人认为，在进行这种改造的条件下，新企业的现代化设备将得不到充足的运用。此外，企业的类似改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规模的某种下降。例如，如果长春汽车厂现在每年能生产5万台汽车，那么经过改造生产4—5种类型的汽车之后，汽车生产数量自然要减少。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问题，薄一波说，现在正在认真研究，但如何解决，现在还未彻底定下来。

谈到农业形势，薄一波指出，今年收成可望达到中等水平。1957年粮食收成为1.85亿吨(不包含大豆)，即比1956年略有增加。棉花丰收，达到3 280万担(164万吨)。薄一波说，1957年初预计中国棉花不够，必须请求苏联援助；但现在由于棉花丰收，靠自己的力量也可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大豆收成也很好。

薄一波指出，1957年全国农业严重遭灾。中国北方各省旱灾损失严重。由于去年农民增产不大，某些同志问，在领导农业生产问题上，1957年初是否有保守主义倾向？薄一波说，不过到年底，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生产高潮，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

薄一波说，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也超额完成了。原计划是111个亿，结果完成120个亿。这也给某些同志以理由，说1957年初在确定基本投资计划指标时过于谨慎，容忍了保守主义倾向。

1957年计划预算收入达到294亿元，实际收入超过307亿元。与此同时，预算支出缩小了。年初预计，企业原料供应和日用品市场将很紧张。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到年底，原材料和商品还有某些剩余。在确定零售贸易额计划指标时，其出发点是保障473亿元的商品，实际上所需商品价值比这要低一些(在1957年计划中，确定零售贸易额——包括服务——为473亿元。据掌握的材料，实际完成477亿元。而且，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减少和其他一些措施，对保障商品的需求有所减少)。结果到1957年底，仓库所存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将近2.8亿元。

所有这一切，薄一波强调，说明国家生活是稳定的，运行正常。1956年，生产发展很快，但到1956年底发现，由于某些部门发展过猛，导致某些货物和物资供应紧张。1957年考虑到了这些因素，作了某些相应的调整。这些部门的生产发展指标定得有些低。但在执行1957年计划过程中发现，年初所定某些指标过低，于是在1957年4月对计划作了某些调整。但总的来看，薄一波指出，可以说1957年是明显的经济建设喘息的一年。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指出了1958年经济发展速度有提高的可能性。

在回答我1957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问题时，薄一波说，1957年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在1956年的水平上，只比1957年的计划提高了2.2%。1957年的成本降低4%。1957年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的原因是，1956年工业企业招收了大批新工人。他们的劳动效率很低。他们许多人工作量不足。

现在全国工人和职工有2 400万人；其中生产工人1 300万，机关职工(包括国家机关)1 100万人。1 300万工人中有400万人，1 100万职工中有300万人是多余的，也就是说，企业和机关中有富余人员700多万。生产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也不合理。例如，在工业企业中，车间管理干部占35%—40%，而真正的工人才占60%—65%。很明显，薄一波说，行政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过大。对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薄一波说，这方面问题进展还很慢。实行经济核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还没解决。这方面口头上讲得很多，薄一波说，但实际上做得很少。企业里许多领导干部还有干部国家保障制度的余毒，还有所谓“供给制”观点。众所周知，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干部供给制在于，干部不必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保障，但对他们也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更好地工作。所以，薄一波说，干部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工作不工作，反正是二斤半小米。正是不少干部对事情的这种不正确态度造成了实行核算制的困难。一直到目前，薄一波说，企业还是将全部利润交给国家，然后从国家银行那里领取必要的资金，其数量同企业利润无关。这样，对他们没有物

质刺激,刺激他们多交利润。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现在没有经济核算制度,薄一波说,中共中央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口号和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这一方针目前包括以下基本措施:

一、从1957年起,派干部和国家机关职员参加生产,主要是去农村。计划最近派200万名行政干部和职员去农村工作。这方面,薄一波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派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生产问题。计划学生毕业之后将被派往企业和农村进行3年劳动锻炼。机关干部也将分批到农村工作2年。例如外交部,薄一波说,已派往农村一批干部。干部和学生下乡运动已收到好的效果。这一措施改变着干部和学生对体力劳动和农村工作的态度。此外,城市干部下乡阻止了农民涌入城市,农民看到,城里人已到他们农村来,这就打消了他们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念头。对招收劳动力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工厂未经中央批准无权招工。

二、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二项成果措施是整顿企业的工作作风。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在工人和职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基础上,对企业行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监督。这种群众监督,薄一波说,还将促进经济核算制度的实行。企业整风运动是从1957年8月份开始的,比机关学校开始得晚。薄一波指出,某些工作人员害怕企业开展鸣放运动,认为这将引起工人间的混乱。但实践证明,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整风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整个气氛的健康,对经营工作的干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过去,许多工厂经理独断专横,浪费严重,违反纪律,无所顾忌。现在他们最怕通过"大字报"以及通过《人民日报》批评自己。来自下面的批评帮助揭露和纠正了企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总的来说,整风运动和整风过程中广泛发表意见,薄一波说,促进了产量的增加和超额完成计划,促进了节约制度的贯彻执行。

大鸣大放运动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形势,而且改善了国家机关和党内的形势。在这一批评过程中查清了一些在日常系统学习中很难搞清的问题。例如,在浙江省党组织中揭露出了一些敌对分子,其中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沙文汉。广东省揭露出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在被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有两个是省委书记,他们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甘肃省在整风运动中揭露出了一些钻进党内的奸细,其中一个是中共省委的一位书记。利用一般的方法,薄一波说,不能在短期内办成如此重要的事情。正是群众运动,让所有人开始讲话,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这种状况,才使有可能完成类似的任务。所以,薄一波补充道,毛泽东主席说:"必须每年一次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对立的统一。"政法机关也揭露出了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

1958年3月,薄一波说,将召开中共八届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是讨论整风运动的总结,还可能讨论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

三、实现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三项重要措施是目前开展的反对浪费运动。由于企业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中共中央打算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今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上海"梅林"罐头厂浪费的事实,实际上这是全国广泛开展反浪费运动的开始。

最后,改善企业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完善工业管理结构。扩大地方政权机关对工业、商业和财政企业的管理权限,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薄一波指出:"现在我们正在认

真研究苏联工业管理改革的经验。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的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薄一波强调，因为巩固群众运动的成果最后只能体现在企业的管理系统上。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中国企业工资等级和劳动工资问题时，薄一波说，这方面也有不少还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是采用临时的和独立的劳动工资体系。但劳动定额和劳动工资上还有不少缺陷。生产定额很低，工人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在鞍山，现有标准规定，6级工资每月90元。但实际上，由于劳动定额低，许多工人工资达到180元。

许多工人仅用两个半小时便完成所规定的定额，剩下的时间为获得奖金而劳动。平均奖金占工人工资的25%，在个别企业，如电力和冶金，则占到35%。现有定额是2-3年前规定，已经过时，必须重新考虑。但这是一种非常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涉及广大工人的物质利益。增加工资很容易，薄一波指出，但要降低则很困难。行政机关企图提高劳动定额，但遇到了工会组织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指出，国家和工会之间存在矛盾。

这样，薄一波继续说，我们在组织劳动方面，碰到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生产定额定得低，必须重新审定；(二)企业里有一大批多余的工人和职工，但国家不能解雇他们，必须给他们发工资；最后，(三)在工人劳保和其他生活补充保障方面有许多过分的东西，与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符。

然后薄一波回答了有关公私合营的形势方面的问题。1956年上半年，薄一波说，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已全部完成。虽然形式上合营企业是独立的一块，但实际上他们已同国营企业没有区别。他们同一般国营企业的区别仅在于：(一)在某些公私合营企业里，还有资本家担任副经理或工程师，如果他们有技术素养；(二)作为他们交给国家生产资料的"赎金"，领取国家5%的保证金。在合营之前，私人企业设备的总价值，薄一波说，约为22亿元。从1949年到1955年底，按利润的形式获得13亿元。预计，到1962年底，作为利息，每年将给他们支付1.2亿元，7年共计8.4亿元。这样，从1949年到1962年，资本家将获得"赎金"近21.4亿元，即向他们几乎支付了他们企业的全部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薄一波说，国家彻底实行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赎买"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较好的结果，因为国家支付给资本家的资金得到了补偿——生产没有受到损失。此外，资本家毕竟主要靠工资生活，即主要靠定息生活(他们购买了国债券)。保证定息，薄一波说，这仅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尾巴"，它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

但是，尽管私人企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薄一波继续说，国内还存在黑市和投机倒把。一些城市，尤其是上海，许多日用品短缺，奸商们组织了非法的私人企业(大部分都很小)，生产短缺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同时，奸商们钻国家经济计划缺点的空子。国家计划自然不能考虑到所有细节，薄一波说，国家计划有时太死，不灵活。国家计划中的空白给了奸商们以可乘之机。例如，国营裁缝铺只能制作3—4个型号的服装，而私人可做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服装，自然价格高。居民餐具的供应也存在这种状况。黑市上短缺商品价格高，但居民还是买。

国家机关不急于取缔非法企业和二类商品奸商。同时，薄一波指出，奸商的活动在某种

程度上可帮助国家机关揭露和纠正计划中的缺点。奸商们使国家机关明白,哪些商品不足,这样在以后作计划时好作出纠正。在这方面,薄一波风趣地指出,可把奸商看成是国家贸易机关的一种特别老师。

1956年底和1957年初,薄一波继续说,国家允许有自由市场,这时自由市场开始发展。一些城市专门划出地方允许自由买卖花生、猪肉、蔬菜这类商品。但实践表明,自由市场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国家定购任务难以完成。由于自由市场的发展,国家贸易机关开始难以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因为农民都想以高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自由市场导致总的物价上升了2.8%。这一切表明,必须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监督,限制它的发展。

在转到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话题上来时,薄一波说,国务院已批准1958年的经济计划,1月25日将把这一计划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讨论。今年还将大体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但批准这一草案只能等来年开人大会议时。考虑到1957年某些经济计划指标定得有些低,薄一波说,今年我们打算提高相应部门的计划指标。至于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计划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15%。钢产量增加到600万吨。煤产量增加到1.5亿吨。1958年的经济计划草案,薄一波指出,已在各部代表会议上详细讨论过,他们都同意所提出的指标。

谈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薄一波说,1958年计划征购粮食3 900亿斤,即1.96亿吨;棉花3 500万担;生猪1.5亿头。农村现在出现很高的劳动积极性,农民积极兴修水利,大搞积肥。例如,仅安徽一个省,由于广泛动员农民群众,1957年底已完成土方1.6亿方。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薄一波继续说,例如,雇佣农民干这些工作,挖一方土仅支付0.5元。这样,完成1.6亿方仅需8亿元。这不算贵,薄一波指出。此外,农村兴修水利的基础工程,薄一波强调指出,主要是靠合作社的力量,国家只需给合作社不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为1958年获得好收成奠定了基础。

不久前,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全国时参观了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提高农业生产的途径问题同农民和地方党的干部举行了座谈。

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基础上,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国家预算收入比1957年增加近10%,达到335亿元。所以,基本建设投资将增加到140亿元(1957年为120亿元)。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820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485亿元),即每年投资增长13%—1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的财政收入为1 36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加560亿元,达到1 92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和机械制造。1958年和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重工业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企业的建设中,中国还将依靠苏联的帮助。至于普通机器、车床、石油设备、化学品生产的调整,相应企业的建设,薄一波说,我们试图自己建设。

谈到中国的外贸,薄一波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得不够积极,他本人对此也不满意。1958年出口总额与1957年持平,达到54亿元。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薄一波说,发展顺利,我们甚至出现了外汇剩余。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外汇则不足。苏联给

中国以巨大的援助，为我们提供成套的设备。当然，薄一波强调，我们努力做到在同苏联的贸易中进出口平衡，但现在中国是苏联的债务人。据不久前所作的初步统计，到1958年1月1日，中国欠苏联3亿一4亿元。1958年中国未必能偿清这一债款。薄一波同时指出，不久前他已同中国外贸部的工作人员们商量过，苏联需要什么货物，中国能供应什么。

苏联贸易代表И. А.叶廖明问中国外贸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何发展，薄一波同志回答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加大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将放缓。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将增加矿产和有色金属的出口。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对东南亚国家，将扩大机器出口。薄一波预先声明，他记不清所拟定发展出口的准确数字，到1962年，出口大致增加到85亿—90亿元，1957年出口额为55亿元，即增加60%—70%。

至于国内贸易，薄一波说，有充分的根据指望，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国内市场将是稳定的，供应基本上能满足需求。国家贸易组织手里有大批商品储备。收购的粮食，国家现在手里还有870亿斤(4 350万吨)。1958年将大大改善棉纱供应。如，1957年生产棉纱460万件，计划1958年将增加到526万件。

1958年企业和国家机关将招收70万新的工人和职工，但工人和职工总数没有大的增加，因为有许多机关职工将下放农村劳动。1958年工资总额将比1957年增加5.4亿元，达到158亿元。在工人职员数量没有大的增加而工资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工资总额却有了增加，其原因是，下放农村劳动的国家干部在一定的时间里还将从国家基金中领取工资。计划规定，与1957年相比，1958年劳动生产力提高2.5%—3%，而产品成本下降4%。

这就是1958年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初步安排，薄一波说。

在计划国家经济发展时，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特别注意工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比例，注意工业材料部门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精力放到了工业的发展上，而对农业关心不够。现在，在考虑新的需求和必须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一方针规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所以对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将有所变化。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占总投资的9%，那么1958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2.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的投资比例是7比1，而1958年将调整为5比1。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几年显现出来：煤炭、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落后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工业原材料的投入将有所增长。

在结束谈话时，薄一波再次强调了苏联援助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当然，薄一波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未来中国也可援助其他国家，因为中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非常巨大。但是现在，在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得依靠苏联的援助。中共中央提出了必须学习苏联的口号，薄一波强调说，这意味着不是从形式上，而是真诚地深刻地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对于中共来说，不仅要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研究苏联出现的错误、偏差和教训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苏联的经验可帮助中国人民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少出偏差和不走弯

路。现在,薄一波继续说,苏共给苏联人民提出了在生产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任务。毛泽东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号召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生产水平上超过英国而奋斗。这一号召,薄一波说,对我们具有巨大的动员意义。

我们两国的合作一年比一年紧密。薄一波强调说。他指出,他不是外交人员,但他经常同苏联同志们见面,他可以说,中苏工作人员的关系一年比一年好。任何力量也不能离间我们,薄一波强调说。这不仅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关,同所有党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关。继续改善我们的关系不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前几年不好。我们的关系以前也很好,薄一波强调;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更懂得苏联,更理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应该说,薄一波指出,以前中国某些同志不太理解苏共的措施。例如,许多共产党人没有立刻理解 1956—1957 年苏共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内部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谴责。一部分中共党员怀疑这些措施是否适宜。一些共产党员尽管知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错误行动,但还是说,对待这一集团成员过分粗暴,不该在报上公开此事和公开点名。薄一波同时强调,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没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考虑到部分党员中存在着类似的不健康情绪,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使全体中共党员对苏共中央的措施有了正确的认识。中共经常在群众中做这种教育工作,薄一波说,解释加强中苏友谊和合作的必要性,指出我们两国的团结和联盟——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对薄一波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给我们做了内容充实的谈话。我说,我们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感到高兴。国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某些比例失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发展中的困难。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在扩大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我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干部顺利地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同时我祝中国朋友们在进一步掌握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劳动经济等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经营范围方面取得成绩。

会谈进行近 4 个小时。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 И. А. 叶廖明;使馆参赞 К. А. 克鲁季科夫,Н. Г. 苏达利科夫,Б. Н. 魏列夏金;副经济参赞 Н. П. 布瑟金等同志。会谈翻译是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和使馆随员 Р. Ш. 库达舍夫。会谈记录是使馆二等秘书 А. В. 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文件 6 份,送:А. А. 葛罗米柯、Ю. В. 安德罗波夫、Н. Т. 费德林、И. Ф. 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执行人:А. В. 谢尔盖耶夫

1958 年 1 月 16 日,第 26 号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20－38

№09890

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

（1958年1月20日）

摘自K.A.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6日
第36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与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大使馆代表谈话记录

1958年1月20日

今天，在中国外交部，刘宁一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临时代办，举行了会谈。刘宁一向各位与会者通报了开罗亚非国家团结大会的情况。他在开始时指出，一些国家的大使馆请求中国外交部举行这次会谈。出席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章汉夫，各司司长和中国外交部其他领导人员。

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刘宁一说，参加会议工作的有49个国家的代表团。他指出，代表团成员中有许多国家的官方代表，也有不同国家的各社会阶层和反对派力量的代表。按照我们的术语概念，刘宁一微笑着说，我们称这次大会为“成员国联合企业”。代表团里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王子和王妃、王室成员、部长、国会活动家。这些代表代表不同宗教和政党以及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独立的和半独立的以及殖民地国家。应该指出，刘宁一说，一般说来，各代表团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政府有联系，在会议上相应地反映本国政府的立场。

开罗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尽管代表团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这种共同性表现在忠实于“万隆精神”，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议发言和会议决议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在我们看来，刘宁一指出，大家都明白，不含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原则的报告和决议是得不到与会者的满意的。当然，其中伴随着斗争。例如，在起草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的委员会里达成了一致意见，应该结束帝国主义，但也出现了争论：反对什么样的帝国主义，怎样反对。同美国有联系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反对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但回避提美国。刘宁一详细分析了关于在决议中应如何表述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的各种意见。刘宁一说，一些代表坚持在决议中提葡萄牙、荷兰这样一些殖民主义国家。关于决议中

的提法还有其他一些分歧，但总的气氛明显是反帝的。

在开罗，刘宁一说，聚集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记者。他们相信，会议上将有许多争论，出现轰动一时的报道材料。一位外国记者问中国代表，刘宁一说，为什么在这次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占多数的会议上，毫不客气地对待美国、英国、法国而不咒骂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在这次会议上，对待西方国家够客气的了，因为在不久之前，这些强国只用大炮和刺刀同亚非国家的人民对话。

在会议期间，刘宁一说，我们弄清了我们和埃及、叙利亚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的理解上有差异。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认为，殖民地国家应该"反对殖民主义"，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应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没有反对这样运用这些提法，所以他们在决议里经常出现。

非洲代表，刘宁一继续说，努力强调种族歧视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刘宁一指出，在开罗会议上，争取和平的问题占有应有的位置。

在我们看来，刘宁一指出，亚非国家团结大会同爱好和平大会的区别在于，这里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如此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发言在爱好和平的大会上是没有的。

刘宁一指出，在开罗，没出现敌视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没出现反共产主义的发言。相反，针对我们国家的发言带有友好的性质，许多人发言感谢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援助，感谢帮助他们进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代表们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谴责侵略集团，要求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不付诸武力。所有这一切，刘宁一强调说，表明了我们和平声明和和平宣言原则的正确性，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结论的正确性，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我个人觉得，刘宁一说，以前我们对非洲国家潜在的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估计不足。我们看到，在亚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其他一些国家退却了，对非洲类似现象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那里的反帝力量增长。在开罗会议上，我们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是王室成员也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在塞得港庆祝战胜英、法、以色列侵略的集会上，纳赛尔只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参加军事检阅的部队的装备，正如对我们讲的那样，全是最新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纳赛尔在讲话中强调，埃及忠于万隆十项原则，声明再过10年，所有非洲国家都将成为独立国家。刘宁一指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纳赛尔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予以注意，只是到后来才接见了他们。

刘宁一说，埃及人讲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美国人想收买纳赛尔的一名追随者，给了他16.5万美元。这个人把这事全告诉了纳赛尔，并把钱也交给了他。这是美国人颠覆活动失败的例证。纳赛尔在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会谈时声明，埃及信守万隆十项原则，将来也信守之。

刘宁一再次强调，总的说来，大会是在激烈的反帝气氛中召开的，但会议上也有"右派分

子"，他们有时发言也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但努力不涉及美帝国主义。苏丹外交部长就属这样的右派，他以同美国的联系而著称。他被选为种族歧视决议起草委员会主席，他很满意于这件事，研究非洲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性。自然，他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但他的参加对我们也有利。

然后刘宁一分析了大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当然，暴露出了观点上的分歧，但我们采取了措施，不把这些分歧带到会议上，只在会下调节。我们对待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的方针是，刘宁一说，把不利于我们团结的东西放到一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同他们的团结。我们同他们的分歧表现在，我们比民族解放运动者反帝更坚决更彻底。我们认为，在反帝斗争中必须依靠人民。至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人民，但也有担心。他们害怕发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害怕人民过分坚决地起来斗争。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表现出动摇。

开罗之行，刘宁一说，对我来说是很有兴趣的。比如，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主人埃及当局在组织会议过程中，事事主要依靠警察。多次听为我们代表团服务的埃及人讲，他们是警察机关工作人员。在群众集会时，真是隔十步就有一个警察，集会前几排站的还是武装警察，其后才是集会群众。更有意思的是，整个集会过程也由警察指挥：集会群众鼓掌按照最高警衔警察的信号进行，根据他的信号开始或停止鼓掌。而且，在会议开始时，在讨论工作程序问题和出现各种生活性质的问题时，埃及人也严肃地建议采取部队程序。一般说来，刘宁一指出，我们确信，埃及首领们相信群众，但也害怕群众。

至于与会者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刘宁一说，亚非国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分辨能力较差。例如，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埃及)提议按照类似"欧洲共同市场"的形式建立"亚非共同市场"。而这些代表不明白，"欧洲共同市场"得利的主要是西德，而"亚非共同市场"得利的可能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通过日本)。当我们向埃及人作解释时，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收回了提议。

据我们所知，刘宁一补充说，日本代表(尤其是自由民主党成员)给自己提出了在大会上进行宣传的任务，其计划可归结为，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美国的资金使日本向非洲渗透。自然，他们非常欢迎关于建立"亚非共同市场"的提议。是一名埃及代表机智地挽回了这种说法，他说，据说在印刷时出现了错误，结果这句话的意思弄拧了。

刘宁一接着说，美国人也采取了措施，企图在会上挑起摩擦和争论。例如，日本代表团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带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台湾自治运动"(廖文毅集团)的代表。但埃及人在机场就抓获了这名"代表"，而另外两名这样的"代表"在此之后完全放弃了进入开罗参加会议的企图。

总的来说，刘宁一指出，我们形成了这一印象，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欢迎我们参加大会，欢迎同我们接触，尽管担心"过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我们努力表示理解和尊重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代表的立场，耐心给他们解释一些问题，但都是在会下(为了不因批评使他们感到委屈)，努力做到让他们自己提出对自己的提议作相应的修改，顺利地说服

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放弃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从地图上“抹掉”这样的词句写进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草案的思想,代之以这样的词句:以色列——这是帝国主义的基地,表达了对以色列侵略政策的谴责。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刘宁一指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阿拉伯东方知道得很少。会议向我们表明,这一地区的反帝情绪是很高涨的,应该得到应有的运用。我们还相信,对阿拉伯东方各国需要严格区别对待,需要考虑每一个国家的特点。

刘宁一说,埃及人对会议的召开很满意。纳赛尔对中国代表团说,会议开得很成功,自始至终矛头都是对着帝国主义,在埃及人看来,它是亚非历史上,尤其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亚洲,这样的大会简直是首次。这次大会,按照纳赛尔的话讲,对埃及和其他亚非国家是一次很大的支持。亚洲,纳赛尔说,基本上获得了独立。现在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支持非洲。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民在10年的时间里也能获得独立。刘宁一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对待会议结果也是这种态度。对开罗会议不满的只有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总的来看,刘宁一总结说,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开得是完全成功的。这次会议同时表明,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促进潜在的反帝力量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更加广泛地利用这些力量。

刘宁一问,与会同志还有没有问题。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请求谈一谈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同其本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对开罗大会的认识,它是否是万隆原则的发展,它在国际范围内将产生什么后果。

刘宁一说,参加大会工作的有政府成员,但代表团被认为是非政府代表团。在谈到日本代表团构成时,刘宁一指出,这个代表团50名成员中,2/3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政府有联系,只有1/3是社会组织的代表。日本代表团开始时打算按照日本政府的指示行动。但在大会总的气氛的影响下,日本代表团最终采取了与我们一样的对待帝国主义和其他问题的立场,自然,这不符合日本政府给它下达的指示。

当然,刘宁一说,开罗亚非国家团结大会符合亚非国家万隆会议精神;它进一步发展了“万隆精神”,讨论了更广泛的问题。毫无疑问,开罗会议进一步发展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精神,它必将导致上述国家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估计在这次会议之后,根据亚非国家主动提议,将采取一系列国际措施。例如,还在开罗大会期间,埃及代表就提出了召开非亚国家青年大会和工会会议的愿望;印度代表提议召开亚非经济会议。科伦坡国家提议召开亚非妇女会议。刘宁一指出,这些会议的召开是完全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召开亚非会议的思想现在已很普及。

可能,这种会议将由全体亚非国家共同召开,刘宁一指出。召开会议的第二种形式是由某些国家集团倡议,其他国家支持。第三种可能是通过国际进步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召开,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将主要是亚非国家的进步力量,有许多亚非国家将不愿参加。此外,美国为了它的利益现在正在策划通过国际反动组织在其

庇护下召开"非亚会议"。自然我们将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刘宁一在同我个别交谈时指出，在开罗会议上，苏中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很好的事务性合作。

为会谈记录的是使馆随员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

K. 克鲁季科夫

文件5份，送：Н. Т. 费德林、Ю. В. 安德罗波夫、远东司、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1958年1月31日，第81号

ЦХСД，ф. 5，оп. 49，д. 136，л. 1－9

№25081

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

（1958年1月20日）

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的会谈纪要

1958年1月20日

（莫洛托夫）指出，蒙古-苏联边界谈判数度延期，原因在于谈判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态度上存在着分歧。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基本原则，蒙苏边界的划定首先必须考虑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居民的根本利益，并兼顾当地居民的民族构成和进一步巩固蒙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另外，苏联代表团认为，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依据历史资料来确定两国的边界线。

蒙古代表团则以"恢复历史公正"作为自己的谈判主要原则，即依据所谓"历史边界"来划分边界。可我们认为，蒙古代表团提供的历史资料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何英同志同意苏联的观点，并说，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缅甸的边界问题时也遵循了类似观点——在划界过程中兼顾了缅甸居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后者如今所居住的地区，如果依据历史地图资料以前均属于中国领土。

在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何英几次均对（蒙方代表）阿维尔齐德[1]的行为表示

① 阿维尔齐德，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编注

了不满。因为后者似乎总是有意回避就苏蒙谈判进程问题作任何交流,并始终坚持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

АВПРФ,ф. 0111,оп. 40,п. 252,д. 5,л. 232

№24030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

(1958 年 1 月 28 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送中文周刊杂志《苏中友谊》第二期以及该期刊读者来信汇总(二)。具体参见附录。

Г. 茹科夫(签名)
1958 年 1 月 28 日

《苏中友谊》杂志的读者来信汇总(二)
(从杂志第 33 期至第 45 期的来信)

1958 年 1 月 16—25 日

共收到来信 13 封。

来自中国的 8 封。

其中,来自河北、北京的,2 封,来自江苏、上海的,2 封,来自湖北、杭州的,2 封,来自辽宁的,1 封,来自四川的,1 封。

来自苏联的 5 封。

所收到来信的内容:

1. 读者对杂志的反响和建议,3 封;
2. 请求在杂志上签名,1 封;
3. 请求在杂志上刊载自己的作品,1 封;
4. 请求为杂志社工作,1 封;
5. 请求结识并建立通信关系,3 封;

6. 请求发送礼物，1封；

7. 请求翻译中文私人信件，1封；

8. 其他方面的请求，2封。

读者所提愿望和建议的简要内容：

上海金属制品厂工人从秀吉(Цзон Сюй-ди)指出，《苏中友谊》激励读者们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为祖国服务的劳动之中，并写道："我们希望《苏中友谊》杂志能全面而多角度地向我们介绍苏联人民在发展初期的著名劳动成就。我们国家目前已步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许多情况均与苏联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极其相似。因此我们希望能在该杂志中更多地看到这方面的相关内容。我们还希望，你们能向我们介绍苏联人民如何克服困难，以节约和……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的。这将非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苏联学习。"

一位来自杭州的名叫岳元(Юе-иань)的中学生请我们讲一讲关于苏联中学生、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一个位于北京的科学知识出版社请求我们立刻发送Г. 亚斯特罗波夫的文章《人造地球卫星》的原文，以便他们搜集并在专集上转载。

武汉市教师技校的一名大学生——关良超(Гуань Лян-чжао)请求我们：1. 定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新发行的邮票和美丽的信封；2. 在《苏中友谊》杂志上开辟"通信"专栏，以便在其中列出苏联和中国读者的通讯地址，从而方便后者通过信件的方式相互交流。

我们对来信所作答复情况：

在杂志上——无；

在杂志简评中——1封。

以书信方式所作答复：

1. 用俄语——4封；

2. 用汉语——4封。

给其他机构所发出的答复——1封。

目前准备答复的来信——3封。

未作答复的来信——无。

杂志编辑部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269，л. 18－20

№09889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

(1958 年 2 月 1 日)

摘自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2 月 6 日
第 38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纪要

1958 年 2 月 1 日

应周恩来请求，我去拜会了他(尤金大使病了)。

周恩来说，今天他想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提议的答复，该提议是大使于 1958 年 1 月 27 日转达给他的。

周恩来说，“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这一提议。

然后他说，苏联的这一提议可以和尼赫鲁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周恩来指出，尼赫鲁的建议当时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支持。按照我们的意见，他说，可以提在太平洋西部建立这样的区域，其中包括日本、中国(这时周恩来两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朝鲜、印度支那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锡兰、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总之，他重复说，这里应该包括南亚、巴基斯坦以东的所有国家。

在上述区域里，周恩来继续说，应禁止和储存核武器，禁止建立导弹武器和导弹基地。然后可以建议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签署相应的条约，其中载明，外国不能在这里建立上述基地以及实验和储存核武器。同时周恩来还指出，众所周知，这一地区各国现在还未生产核武器。

然后周恩来通报说，中国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应由印度倡议提出。

他指出：“印度已提出和平区建议。此外，尼赫鲁的最近发言也表明有同印度进行这种接触的可能，他发言反对巴基斯坦请求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为其提供原子武器和其他现代化武器。”

按照我们的意见，周恩来说，关于建立无核区的提议，应先同印度协商，暂不急于告诉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看来，需要尼赫鲁自己决定，是他先提出还是与这些国家一起提出这一倡议。”

周恩来说，印度未必会完全否定我们的建议，应考虑两种可能性：“一是印度同意提出这一倡议，一是它表示应由其他国家提出。第一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印度同意提出建立无核区倡议之后，才可以同它协商解决这一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因为印度和这些国家很可能在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在尼赫鲁不同意提出这一倡议的情况下，可以就此事与苏加诺或吴努协商。

周恩来说，中国同意苏联同志们的意见，关于建立无核区的问题，由中国政府去同尼赫鲁说。

对于我要弄清楚的问题，周恩来对地区国家之间签订条约作了一些解释。他指出，条约应规定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应承担的义务。所以，在签订条约之前，各国政府应原则上同意建立无核区。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们支持它，而日本，比如说，不承担这些义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承担这些义务。”所以，他说，在签署相应的条约之前，需要所有国家有一定的表示。

很可能，周恩来说，美国不允许日本和菲律宾支持建立无核区的思想。这一建议还将遭到澳大利亚，可能还有巴基斯坦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指出，正如苏联政府所正确指出的，我们的倡议将给我们带来一定政治好处。至少我们在宣传方面能达到有益的结果。周恩来然后专门叮嘱说，在同印度和其他国家开始接触时不涉及条约问题。开始时，他重复说，重要的是弄清原则态度和吸收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政府一致行动。

我对周恩来说，大使馆将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和他在会谈过程中所说的意见报告中央。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代理司长李汇川，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使馆一等秘书 О. Б. 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克鲁季科夫

文件 5 份，送 Н. Т. 费德林、Ю. В. 安德罗波夫、М. В. 齐米亚宁、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执行人：拉赫马宁

1958 年 2 月 6 日，第 107 号

ЦХСД，ф. 5，оп. 49，д. 139，р. 8893，л. 10－13

№20423

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

(1958 年 2 月 5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第 29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 T. 费德林同志
苏共中央 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
苏联远东司司长 M. B. 齐米亚宁同志
情报委员会：

兹发送给你们(我驻中国)使馆从中国外交部得到的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共计 9 页。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克鲁季科夫(签名)

机　密
1958 年 2 月 5 日
第 29 号
译自中文

台湾(基本情况)

一、居民

根据蒋介石台湾省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1957 年 4 月台湾居民为 940 万人以上。其中，近 20 万人为少数民族，其余为来自福建、广东和大陆其他省份的移民。

包括蒋介石的军队(计 52 万人)以及分布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居民(5 万人)在内，蒋介石集团所统治的总人口数量约为 1 000 万人。

二、基本政治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作用和缓和国际关系紧张的大趋势的影

响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更加处于风雨飘摇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在中国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之后，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幕后斗争发展得尤其迅速而尖锐。

美国担心，蒋介石或其周围亲信中的某一个人会与大陆举行和平谈判。美国的这种疑虑在处理与蒋经国的关系方面表现得尤其强烈。鉴此，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加强自己对台湾的军事控制(如在台湾部署装备有导弹的美军等)，另一方面极力加强胡适、廖文毅和台湾各地方亲美反蒋派分子的活动，增强其影响力，以迫使蒋介石听美国的话。

蒋介石对美国所采取的加强对台军事控制和推动台湾内部政治分裂的举动特别不满。他正密切关注着美国人旨在形成"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1957 年 3 月，蒋介石发布命令，据此今后严禁任何人涉及上述现存根本性、重大关系问题，必须奉命保持沉默，但遇到攻击时也要以牙还牙。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民族主义情绪也在迅速增强，反对美国在台湾肆无忌惮、干涉台湾"内政"和要求捍卫台湾的民族尊严的言论广泛传播。1957 年 5 月 24 日，台北市突然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游行的突然发生充分反映了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和台湾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

前不久苏联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和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自己的卫星发射领域遭受了失败。这一切都对蒋介石集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此，香港亲蒋报刊写道："我们并不急于知道，未来将属于艾森豪威尔时代还是赫鲁晓夫时代。"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实施自己的建立"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加强对蒋介石的压力。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一些方面：

1. 美国向台湾增派了导弹部队，在 1958 年度减少了对台经济援助规模(缩减数量超过 2 000 万美元)，以极力迫使蒋介石压缩自己的军队规模(主要是陆军)并放弃不现实的"反攻大陆"的企图。

2. 美国鼓动亲美反蒋派分子在台湾发表关于建立"反对党"的言论，以便该党在建立后能够与台湾岛外的李宗仁和其他"第三势力"代表们遥相呼应　共同从事反蒋活动；美国人要求蒋介石"公开权力"，鼓励亲美国分子参与台湾的"建设"。

在与美国人的这种极其不友好的活动展开斗争的同时，蒋介石倾向于全面抵制美国人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其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 坚持"反攻大陆"口号，提出所谓"将反攻与革命相结合"的"政治路线"。

2. 积极在国际上展开活动。在这一领域该路线的内容如下：

坚决维护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维护和扩展自己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地位，全力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会议和一切国际活动；极力巩固和加强与那些已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关系；为了摆脱孤立的困境，建立和扩展与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等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文化、经济和贸易关系。

3. 积极巩固自身在台湾的地位,促进内部团结,安抚台湾岛内、外所有丧失信心者。上述举措在1957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八大上明显表现出来。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反复强调了"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一些象征性的决议,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国民党内部和外部那些丧失信心者、心怀不满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4. 强调在继续依靠美国的同时,自身也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确定台湾今后的"外交政策根本原则"是:"坚决拒绝在附加某些政治条件的情况下获得美援"。

总之一句话,蒋介石今后将执行这样一条总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自己的福祉、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坚持观望态度。很难预期美蒋之间的矛盾会得以缓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

台湾内部的分裂和动摇仍在不断加深。

在过去的一年间,台湾岛内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纠缠不断,斗争日益激烈。这场为了扩大自身权力的斗争主要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两个派系——蒋经国派系和陈诚派系之间进行。这两个派别都得到蒋介石的直接支持,并都拥有一定的势力和掌握相当一部分实权。得到美国支持的"自由中国"活动家们在愈演愈烈地从事着反蒋活动。而那些丧失了自身权力的国民党军政官僚们则对蒋介石及其儿子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

1. 长期以来,蒋经国和陈诚都在积极地扩展自己的势力。

他们两人都极力想使自己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并一直都在为今后能够成为台湾的主人而准备条件。

蒋经国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党(国民党)的基层机关和保密单位。蒋经国已基本确立了自己对整个国民党的控制权。通过其所建立的"反共救国青年联盟",他确立了对大学生群众组织、中学生和青年组织的控制。蒋经国攫取了保密机关的领导权,并在这些机关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通过在军队中独立运作的党-政系统,蒋经国对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尤其是陆军)实施着相当严密的监督。军队中一部分高级军官也是蒋经国的人。例如,蒋介石的现任陆军司令便是蒋经国的心腹。蒋经国在政府部门——如居留海外和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事务委员会等——中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陈诚的支持主要来自行政、财政-经济界和陆军。与从前一样,陈诚现在依然在执行机关和陆军中拥有重要影响力。近年来,他在财政和经济领域的权力得到了很大扩展。陈诚在国民党上层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并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人物和失宠的政治家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

蒋经国和陈诚之间的矛盾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决定任命陈诚为党的副主席,从而象征性地确认陈诚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其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打消美国和台湾内部对蒋经国的疑虑。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为将来在他去世以后,维持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合作"作准备,以便表面上看是陈诚执政,但实权仍集中掌握在蒋经国手中。

2. 宋子文所实施的政变失败后，美国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把陈诚拉到自己一边，另一方面又全力支持"自由中国"活动家——胡适、雷震等。美国人打算以这些人为中介把那些失宠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拉到自己一边，并以建立"在野党"为口号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力量。

另外，美国还煽动在香港的谢澄平(注：谢澄平，在1945年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参加了旧金山会议；自1947年5月至1949年1月任农林部次长；1948年10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年会。1949年，他逃往香港，并通过这里的美国领事馆与美国国务院建立了联系。此后，他开始以"第三种力量"代表的身份积极展开活动。其在1957年的活动最为积极，当时中国内部正在从事反右斗争运动。谢澄平在香港依靠美国人资助的金钱办了两份杂志——《中声晚报》和《自由阵线》，但这些杂志的影响力都不太大。由于当年曾与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私交甚密，谢澄平现为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人团结"第三势力"，以便促使"第三势力"再次积极活动起来。美国人依然对如今在东京的廖文毅傀儡集团给予支持。

3. 伴随着困难的不断增长，台湾岛内国民党人的没落情绪也在日益增强。多数国民党元老们均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并处于被压制状态。国家机关中的普通公职人员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由于看不到任何前途而精神萎靡，心情倍感压抑。各阶层公职人员的生活条件极其窘迫。例如，一位国民党官员便曾讥讽地说，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还不如根据人们对被服、食品和住宅的需要将台湾省政府各司部改组为"食品司"、"被服部"……，以解决大家在服装和食品方面的迫切需求。

蒋介石曾多次发出"心理建设"和"道德动员"等口号。其目的就是想缓解党内严重的、无法根除的精神抑郁病，但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使情况有所好转，反而使病症继续蔓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中国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之后，蒋介石起初为防止其影响的扩散，曾试图禁止这一消息在台湾岛内传播。但该政策相关内容很快便在岛内广泛传播开来。部分国民党员也发表言论，支持中国提出的关于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致对外的口号。其他国民党人也宣称，"可以与共产党人一起通过不同道路走向同一目标"。甚至在(台湾)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人"赞成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现存问题"。其依据是：既然目前谁胜谁败的问题业已解决，那么再继续拖延(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只会有益于美国的军事利益。去年，台湾岛外已有关于和平谈判的传闻。这些传闻在台湾和香港曾三次引起了比较大的骚乱，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至今蒋介石仍禁止其周围的亲信们提及这一问题，但在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作用下国民党内部的反美情绪已逐渐发展起来。国民党的官员们可不愿意在台湾养老送终，他们的唯一意愿是："只要能顺利返回故乡，即使死也不可怕。"这正应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黄金鲁(Хуан Цзи-лу)曾说过的话，台湾国民党人的"身体在台湾，但灵魂却在大陆"。

三、经济状况

台湾的财政和经济目前仍面临着严重困难。

过去,美国每年向蒋介石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正如美国驻台湾前大使兰金所言)为3.25亿美元。但即使这样,台湾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并没有得到缓解,依然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蒋介石的军费开支极其巨大。1956年,这方面开支占到中央(财政)预算的85%(其中并不包括从美国军援中直接向台湾军队提供的军事装备在内),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其逐年增长导致台湾的财政赤字从1953年的6.5%,增至1956年的10.6%。财政开支的增长导致税收的增加和通货膨胀。截至1956年,台湾的税收比1949年增长了33.9倍。税务占到了居民收入的36%,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台湾目前流通的货币数量已比1949年增加了50多倍。而随着美国缩减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2 000多万美元,台湾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更趋恶化。

台湾的主要农产品为大米、白糖和香蕉等。台湾的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加工工业产品占到台湾工业品总值的60%以上。

通过从事外贸业务,台湾平均每年出口的商品价值为1.2亿美元(该数据为近三年来的平均值)。由于生产缩减和商品匮乏,近三年来台湾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为3 600万美元,而其他隐性贸易赤字每年还有1 000多万美元。自1951年至1955年上半年,台湾的国际贸易收支负债为4.9亿美元,而该负债的85%得由美援来填补。

翻译:P. 库达舍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H. T. 费德林、Ю. B. 安德罗波夫、И. Ф. 库尔久科夫等同志各1份,中央委员会1份,档案室1份

经办人:库达舍夫

1958年1月22日,第38号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情报已经报告给苏共中央(1958年3月2日)。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年4月21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1 - 31

№24943

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

(1958年2月5日)

与中国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1]会谈

1958年2月5日

根据范长江的提议，同他举行了会谈。

范长江谈论了中国为了保证苏中新的科技合作协议的顺利完成而打算采取的一些措施。

范长江说，到现在为止，中国方面已经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进行是按照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制定的政策进行的。至于科学规划委员会，那么，在这一工作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122项共同的科研项目，特别是那些预计在1958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开始进行的项目。此外，上述122个项目的2/3以上都已经制定了1958年的具体工作计划，并同相关的组织进行了协商。其余项目(不到1/3)的计划或者尚未制定，或者还没有协商。现在正在对各委员会进行的准备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这一检查将促进那些尚未制定的计划的制定工作的进行，计划应该在今年第一季度制定出来。122项中的每一项都有相应的负责部门——科学院、部，在一些情况下负责的部门则是科学研究所，有时确定了2—3个，有时甚至是7—8个组织作为具体的执行者。负责每一项计划的组织根据它所开展的科研工作的状态，向苏联方面的相关组织通报关于自己的准备情况，或者不准备接受苏联科学家。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根据同苏联方面相关的组织达成的协议，苏联科学家到中国的时间可以延期。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特别的机构，以便开展同实现协议相关的所有的组织工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该组织的一项任务将是准备各种决议的草案，收集并综合意见，为政府准备材料等。

以什么样的形式对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进行具体的领导更好一些？委员会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聂荣臻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曾经指出，中国方面，这一任务应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完成。同时，现在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设立一个主管科技工作的职务；第二个方案是，设立一个主管贸易和文化工作的参赞职务，或者把相关的机构扩大。委员会认为，根据第一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和可行。

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顾问Б.Р.拉扎连科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谈。

---

[1] 原文如此。范长江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编注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随员 В. И. 沃先金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Н. 苏达利科夫
1958 年 2 月 5 日

РГАЭ，ф. 9480，оп. 3，д. 1722，л. 31 - 33

№2186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

（1958 年 2 月 13 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Н. Я.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Н. Г. 伊格纳托夫、А. И. 基里琴科、А. И. 米高扬、Н. А. 毛希丁诺夫、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А. Н. 柯西金；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 13 项　关于就国防问题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

米高扬、科涅夫、布尔加宁、乌斯季诺夫、赫鲁晓夫、柯西金、赫鲁尼切夫。

上次决定——是何时作出的？

在 3 月份准备问题。

与人民民主国家约定：我们将转交带有火箭技术装备的部队。

提供空对空。

С - 75。[①]

我们将不再购买飞机。

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并提交建议。在 10 天之内。

在下一次会议上听取切洛梅同志的汇报。

在我们完成“要害”问题的时候，乌斯季诺夫同志就应该汇报了。

委托国防部：关于人民民主国家军队的问题，汇报自己的构想。

期限——10 天之内。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8，л. 49

---

① 这里指的是地对空火箭装置。——原注

№24050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

(1958 年 2 月 14 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兹发送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已修改的指令草案，以便其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上述修改是依据苏共中央主席团 2 月 13 日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

A. 葛罗米柯(签名)

1958 年 2 月 14 日

第 490/rc 号

附件：

机　密

优先(急电)

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令性草案

请通知张闻天同志，我们已指示苏联驻埃及大使向纳赛尔转达如下内容，即苏联政府认为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问题纯属友好国家——埃及和叙利亚的内部事务，苏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打算。

在就该问题与我国大使所进行的会谈中纳赛尔断言，似乎他也没料到现在会发生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的事情，而他原先预计这一联合至少在 5 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纳赛尔预测，敌人会利用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的事件，以离间埃及和苏联，或至少破坏两国的外交环境。纳赛尔强调，西方报刊所谓的——纳赛尔攫取叙利亚，目的在于不使后者继续加强与苏联的友谊——是杜撰出来的。纳赛尔声称，埃及和苏联的关系是在不可动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埃及既没有签署任何协定，也没有服从任何“学说”。与此同时，纳赛尔还对如下情形表示了担忧，即叙利亚的那些不满意解散所有党派的共产党员们可能会对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发生曲解，从而导致埃及和苏联之间发生一些误会。

由于在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导致叙利亚和埃及目前出现了

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建议我驻开罗和大马士革大使——苏联官方代表,保持谨慎态度,不要让埃及和叙利亚人有任何理由说——苏联大使干涉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内政。我们的观点是:绝不能忽视苏联与该联合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景。

在2月21日——届时将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之后,根据埃及方面的意愿和所发表的言论,我们打算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问题采取一些礼节性的举措。届时,我方打算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出贺电。……①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通报关于苏联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联席会议,并责成苏联驻开罗大使在收到委任书之前行使苏联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的权力。

我们已通过了如下决议,即任命目前苏联驻开罗大使Е.Д.基谢洛夫为苏联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给该大使的委任状已发往开罗,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后便可立刻走马上任。

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全民表决相关,苏联报刊也将发表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相应文章,纳赛尔总统的照片和关于该联合国家建立的官方资料。

我们已通知苏联驻开罗大使,如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关于不允许在大马士革保留外国使馆和领事馆的决议,那么苏联政府就打算对苏联驻大马士革使馆和总领事馆进行重组。关于苏联政府的上述打算,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通过相关决议后便立刻对外公布。

关于我们针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打算采取的那些礼节性举措,苏联驻开罗大使现在就可以向阿里·萨博利作出通报。

请电告执行情况。

手写批注:

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没有意见。

Е.А.福尔采娃同志没有意见。

……②

РГАНИ,ф.5,оп.30,д.272,л.3-5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译注

②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0614－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15日）

1958年3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15日

同使馆的人员一起出席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向苏军抗击日本解放朝鲜纪念碑的敬献花圈仪式。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献花圈时穿着元帅制服（抵达平壤时和在群众大会上陈毅穿的是普通服装）。

应金日成的邀请，陪同代表团在牡丹峰山上俯视城市全景。这时南日向我通报说，为了会谈，已组成以金日成为团长的朝鲜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南日、金一、金光侠和朝鲜驻中国大使。今天就进行会谈。今天在招待会以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就去兴南化肥联合企业。陪同代表团前往的有：金日成、南日和李光武（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2月16日代表团将参观兴南化肥厂，然后去元山考察国防工程。代表团从元山乘火车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从元山到银平（Инпхе）站以及以后的行程都乘汽车。2月17日、18日代表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活动。金日成和我方的其他同志都不陪代表团去司令部。

我问南日，出于怎样的考虑作出这样的安排？

南日回答说，周恩来邀请他们一起去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但是看来，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团员是想处理一些私事。南日补充道，的确，代表团去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地要做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南日说，签署会谈结果的公报安排在2月19日上午。签署公报后，周恩来将在最高人民会议的大会上发表演说。

南日向我提出要求，是否可以通过苏联外交部了解一下各国对公布的公报的反映和评论。公报将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期间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

我对南日说，您的要求，我将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向朴正爱提交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件。转交的信件是封好的。(金日成要求将信交给朴正爱,因为他整天都忙于有关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事。)

在见面时,朴正爱扼要地介绍说,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见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昨天的群众大会安排在市剧院,而不是像通常接待来访的各国政府代表团那样放在广场上,这是中国朋友坚持要求这么办的。朴正爱还简要地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晚上,政府内阁举行招待会,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招待会上,金日成和周恩来先后致辞。周恩来热情地赞扬了朝鲜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带头作用。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35 - 37

№2521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事宜

(1958年2月16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译自中文

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致以敬意,并由衷希望得到如下援助:

从工作需求出发,中国相关部门决定在1958年聘请281名苏联专家来华。专家们在中国展开为期多久的工作,他们何时到来,以及协议中涉及的其他材料都包含在照会文件中。

我们要求使馆将上述要求转交苏联政府,并予以答复。

中国外交部对大使馆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1958年)2月16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д. 1,п. 431,л. 1

№20614－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

（1958 年 2 月 20 日）

1958 年 3 月 24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1 日
第 53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 年 2 月 20 日

拜会南日。

向他介绍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月 5 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 2 月 7 日的声明的声明，并将文本交给他。

南日看了声明的文本后说，声明写得很好，很有力。南日还指出，在苏联政府的文本中首次将南北朝鲜称为“两个朝鲜国家”。

我问南日，是否他实质上不赞成用国家的称呼，还是他有别的想法？我说，在朝鲜的土地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我还提醒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所及的领土上进行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了这一点。

南日回答说，实际上，这样的称呼不会引起什么反对和怀疑，事实上，在朝鲜的领土上存在着两个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会正确理解这一点的。只是有一点使我们感到不安，朝鲜人民会正确理解吗？

接着，南日对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如果两个朝鲜国家缔结了和平协议……”这段话说，这一点不为理解：如果联合国认为是在同北朝鲜打仗，而南朝鲜自己又不愿签订和平协定，那么怎能同南朝鲜签订和平协定呢？

我对南日说，如果是说南朝鲜政府的立场，那么它直到现在都不愿进行任何谈判，更不用说签订和平协议或条约了，当然它是不会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协定的。但在朝鲜土地上形成和存在的两个国家间签订和约，承诺不用武力来解决一切争端，从实质上讲是完全正常和正确的。

南日对通报苏联政府的声明一事表示感谢，他说，现在金日成大概有空了(他原来忙于

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事),他会马上看声明文本的。

由于苏联外交部的要求,朝鲜外务省对在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ЭКАДВ)的大会上要审议的提案提出一些建议,其中有吸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的建议。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令,我向南日通报说,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大会没有决定吸收成员国的事。这类问题要由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来决定。我对他说,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的大会上发言时将会提出,不吸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是错误的。我们的代表团会介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代表团在发言中还会表示赞成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这将会促进朝鲜两个部分的相互接近。

南日对通报这些情况表示感谢。

我对南日说,我使馆的武官将于2月23日举行招待会,庆祝苏军建军40周年。我请他将我们的邀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请他们出席招待会。

南日表示感谢,他说,我和金日成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已转达了举办招待会的事。金日成和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会出席招待会的。

我问南日,在内阁举办的最近一次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为什么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金枓奉没有出席?这如何解释?

南日回答说,近期不邀请金枓奉出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不邀请他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通常出席的招待会和见面会。

因此,我征求南日的意见,是否该邀请金枓奉出席2月23日的招待会?

南日说,鉴于上述情况,不宜邀请金枓奉出席招待会。

我问南日,对2月16日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南朝鲜客机和飞机上的乘客的处置,是否有了决定?

南日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归还飞机和乘客的事还未最后决定。美方于今年2月18日向军事委员会秘书处提出讨论归还南朝鲜当局飞机和乘客的建议。朝方代表回应说,这一问题不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南朝鲜政府必须直接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交涉。南日说,我们已经有了说法,有关归还飞机和乘客的事,南朝鲜当局应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向我们提出。如果进行这样的交涉,我们会送回非军事人员的。至于如何处理飞机,这个问题让南朝鲜政府直接同我们政府交涉。

最后,南日谈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访的印象。他说,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对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发展工业和提高农业水平方面的巨大成绩。兴南化肥厂给代表团的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当时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化学工业方面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面,他表示要派中国化学工业人员代表团来我们的化工厂学习经验。元山地区的国防工程给中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中国朋友参观了建造在山里和隧道内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周恩来在参观这些工程时说,这些设施既结实,又方便。这时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说,在国防设施方面应该学习朝鲜同志的经验。代

表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产品生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在访问肃南(Сунан)郡的三亚(Санян)农业合作社时，周恩来对用营养罐培育棉苗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了解。南日说，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棉花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大概有可能每年提供 1 万吨(在商讨五年计划草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向朝鲜朋友每年提供棉花 8 000 吨)。谈到提供焦煤问题时，周恩来询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多少才能满足要求，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提供焦煤方面将给予援助，待回国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讨论后再通知提供的数量。关于宗派主义和逃往中国的政治叛逃者的问题没有提出，也没有讨论，因为这一问题，金日成和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已取得完全的谅解。

我对通报以上情况向南日表示感谢。

过了一会儿，南日用政府专用电话告诉我说，金日成已看了苏联政府的声明文本。用南日的话来说，金日成表示十分满意，他说，声明是有力的，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措施。金日成要求转达一点，如有可能，则在声明的文本中，将“……两个朝鲜国家……”中的“国家”一词改为“政府”，或者说：朝鲜的两个部分——南方和北方。南日说，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在我看到声明的文本时已谈到。这时南日再一次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理解已形成和存在两个国家。

我告诉他说，要求将会转达。这时我再次表示，在朝鲜的土地上事实上已存在两个国家，未必有太大的必要作这样的修改。

(金日成的这一要求已用电话向远东司的负责人齐米亚宁同志转达。他说，他将立即向葛罗米柯部长报告。另外，齐米亚宁还说，对转交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还将有补充——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 2 月 19 日的联合声明。)

注：在公布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中，把“两个朝鲜国家”改成了“两个政府”。

晚上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招待会上我向周恩来通报说，今天晚上电台将广播苏联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2 月 5 日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 2 月 7 日的声明的声明。这一声明将于 2 月 21 日见报。

周恩来对通报这一消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41－46

№20614-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22日）

1958年3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22日

朝苏友好协会在牡丹峰剧院举办纪念苏联武装力量建立40周年的庆祝会，以金日成为首的党政领导出席了庆祝会。我和武官季亚科诺夫在主席台就座。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泰根(Ким Тхэ Ген)中将作报告。报告后武官作了简短的讲话。

在交谈时，金日成谈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的印象；自己对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生的态度；还就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南朝鲜飞机事件交换意见。

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的印象时，金日成说，周恩来和代表团的成员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和同工厂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的会见十分满意。他们高度赞扬工业发展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进程；完全同意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政策；他们注意到人民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政策的支持和居民良好的政治情绪。

金日成说，在会谈时，我们要求他们研究可能提供棉花和焦炭的数量。周恩来回答说，最近几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每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1万吨棉花(以前是每年8 000吨)。至于焦炭的数量，代表团回国后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研究后再告。

金日成说，在会谈时周恩来向我们建议在鸭绿江的水丰水电站上游修建功率为50万千瓦的云峰水电站。我们回答说，目前我们缺乏资金建造这个水电站。针对我们的回答，周恩来说，他们可以出资建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后再支付自己的投资部分。我们没有表示异议。事实上情况是这样，花一年时间用来勘查，一年用来设计。几年后电站才能动工修建。

接着金日成说，他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安德罗波夫部长就在莫斯科就读的8名朝鲜大学生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问题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的意见。我向南日建议，要大使馆转告安德罗波夫，不要采用强制手段迫使这些学生返

回朝鲜。这样做对苏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来说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会带来损失。金日成说，我不知道今年2月初内务省已派了两个人去莫斯科，想要强行把这些学生送回平壤。(我倾向于认为这件事金日成是知道的，但他现在却佯装说内务省派人去莫斯科未经他的同意。)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46－49

№1382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

(1958年2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2月27日会议第14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毛希丁诺夫、柯西金、卡伦别尔津、科罗特钦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

第18项　关于王明同志的健康状况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电报草案。

米高扬、布尔加宁、库西宁、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委托库西宁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邀请刘晓同志，并向他说明王明同志的健康状况，说：他并没有放弃斗争，不珍惜友谊；库西宁同志还应该讲述一下共产国际时期的事实。①

交换了意见。

什么也没有寄出。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9，л. 1－2

① 指的是在1930年代的一个阶段里，王明被从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并在共产国际里工作。后来，在返回中国之后，王明和中国共产党里"莫斯科派"的其他代表，与毛泽东和一直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原注

№09888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

（1958 年 2 月 28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3 月 15 日
第 74 号

绝　密
文本第 2 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 年 2 月 28 日

受中央委托，今天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并向他阐述了苏联政府在高峰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向他通报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消息。

毛泽东满怀兴趣地听取了高峰会议的消息，并且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新闻中阐述的苏联的立场，他补充说，"是积极的和完全正确的"。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说，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支援印度尼西亚的措施。毛泽东说，中国也支援苏加诺①棉布和大米。此外，众所周知，中国已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了 2 000 万美元的贷款。

在会谈中，毛泽东几次强调，必须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援助是它所必需的"。他指出，近几天，印度尼西亚内阁作出了重要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反对暴乱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支援苏加诺。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他继续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尤其是苏加诺和哈塔，正遭受外来的巨大压力，军事方面有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行动，经济方面有经济封锁的威胁。毛泽东援引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决定邀请苏联军舰进行友好访问。"我认为"，他指出："如果苏联军舰这一访问不伴随什么危险，那么绝对应当实施这一访问，这将是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在菲律宾地区行动的一种对抗。"毛泽东还谈了艾地②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

然后，毛泽东赞许地谈了他对苏联政府想就印度尼西亚问题同尼赫鲁接触的看法。尼

---

① 苏加诺，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编注
② 艾地，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赫鲁，他指出，也许能想出什么有益的东西。从经济援助的观点看，印度可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船只。的确，印度不能提供粮食，因为他现在还从美国购买大批粮食。

于是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印度的经济形势。指出，印度农业苦于经常遭受自然灾害，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印度没能力自己解决这些困难。被迫求助于外国援助。

然后就我通报的两则新闻概括地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效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他说，“我们在中国高兴地关注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

这些措施，毛泽东继续说，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相反，由于苏联的努力，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非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里，他指出，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资本主义世界，毛泽东说，处于被迫让步的形势之下，其中包括在裁军问题上。在某些地方，他指出，人们开始明白，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战争会导致什么。大概，要消灭比如说西德或英国，使用4个氢弹就足够了。

不能排除，毛泽东说，人类不能逃避这种状况，“资本主义阵营的疯子们会开始热核战争”。无论有多大牺牲，毛泽东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不会灭绝，可能得用100年时间才能恢复在这一战争中失去的东西，但资本主义体系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但也存在另一种结局，即资本主义体系被迫同社会主义阵营妥协。帝国主义者，他强调，可以同意禁止使用原子和氢武器，就像当年他们同意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样。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指出，双方都明白，在发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一阵营和另一阵营国家的人民将遭受什么样的牺牲。而且，资本家还将考虑到，在战争情况下，覆灭的不仅有他们的资本，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他们害怕原子弹和氢弹。“但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拥有普通装备的正规军”。这个问题现在特别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他们公开讲，在禁止氢弹的情况下，他们“面对苏联陆军和空军优势的兵力将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谈判之前，急忙建立自己的火箭装置和氢弹储备，而为了掩盖自己的计划和支持军事狂热，他们同美国人一起组织了所谓的“带原子弹和氢弹飞机的安全飞行”。帝国主义国家所煽动的军事狂热以及军备竞赛，毛泽东说，进一步促使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

谈到美国领导人的最近讲话，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的立场看来大大好于杜勒斯的立场，“杜勒斯的发言我没看，因为我清楚，他(杜勒斯)要说什么”。

谈到离中国不远的美军事基地，毛泽东说，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冲绳岛、菲律宾和中途岛上的基地。“台湾和南韩是次要的危险，因为这些地区集中的强大的军事技术装备较少”。

在座谈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朝鲜问题。他说周恩来朝鲜之行取得了积极成果。“朝鲜事态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是确定的历史条件和所有工作促成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莫斯科同金日成的会谈。当时我指出，毛泽东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活动中有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反帝斗争、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捍卫国际主义原则。除此之外"我还指出，在党的活动中也有缺点，不能认为整个工作从头到尾是绝对正确的"。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时承认他们党的作风和地方工作有不少缺点。

在莫斯科，毛泽东继续说，我还向金日成证明，中国志愿军必须从朝鲜撤出，因为"国内几乎驻有百万外国军队，这种状况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然后毛泽东还谈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电告中央。

我们对朝鲜同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说，开始产生积极的结果。"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回来之后，讲了许多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作风的新气象"。总的来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讲得是对的，朝鲜问题，尽管复杂，但毕竟比波兰问题轻。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提到以往几年的形势时，他指出，1955 年冬季以前，"无论是我，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现在这么高兴。只有在中国农业、私有工商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我们才切实感觉到有可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但之后不久，从 1956 年 6 月至 1957 年 6 月，"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又进入了严峻的时刻"。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这是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反共，尤其是反苏的行动。我们国内 1957 年春天出现了右派的疯狂进攻。

涉及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他们应成为一次很好的教训。说到这里，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他同布克就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内形势会谈的情况。① 在其来华期间，毛泽东说，布克谈了匈牙利事件过后不久党内出现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共产党的形势。莫斯科会议之后，美国共产党中央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丹尼斯这时期发生了动摇。②

现在，他继续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事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比如在中国，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继续说，在中国以前历次政治和思想运动中也进行过，尤其是在揭露胡适、梁漱溟、胡风，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和对经典著作《红楼梦》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但所有这些运动只涉及个别的或部分问题，涉及的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个别方面。

毛泽东指出，对总的资产阶级思想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是从去年开始的，当时解决在中国是要无产阶级自由还是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众所周知，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阶级的自由观。在资产阶级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自由便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比如在波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那里有过多的资产阶级自由。

---

① 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编注
② 尤金·丹尼斯，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毛泽东接下来谈到了中国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拖延，没给小私有者留下“生根巩固”的机会。所以在土改之后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合作化进程。

在完成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开始了思想领域的革命。众所周知，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概念包括：1. 所有制关系，2. 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 物质福利的分配。”现在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第 2 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解决群众和干部之间，工人和农民、工厂和农村领导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中国采用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乍看起来，可能认为，他指出，这种方法“会损害党和国家干部的威信，但实践表明，并不是这样”。批评和批判少数工作不好的干部的同时，群众又保护多数好的干部。

解决生产中人们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还帮助我们解决物质利益分配问题。例如，在整风运动中，工人们自觉宣布，“在未来 15 年内，他们不要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增加工资，发工作服和给予其他优惠，因为现在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光辉前景和目标——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以便赶超英国”。以前，他指出，工人们常常看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即“在某种情况下，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定数量的工资或得到某种供给”。工人有时说，以前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所谓的“五大件”，即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

在大辩论之前，毛泽东继续说，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共青团)同工人之间经常形成不平等关系，即“老爷和劳动者的关系”。人民群众有时把干部称作“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官僚”。

由于在运动中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势开始得到好转：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工作中的缺点得到了克服。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干部勇敢地彻底地开展自我批评，为群众作表率。

由于最近的运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机勃勃。看来，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指标要比规定的期限大大提前完成。全国兴起水利建设，水浇地面积大大扩大了，只要 3 年时间(1958—1960 年)就可抵御一般的水旱灾害了(特大灾害除外)。原来计划完成这一任务需要 10 年。农业生产增长指标实现也无需 10 年，5—7 年就可实现了。现在我们碰到自然灾害，毛泽东补充说，我们得需要外援。但再过 3 年，“我们就会打个小的翻身仗”。毛泽东指出，不久前，他到各地走了走，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措施。毛泽东说，有时候，外国朋友不理解这些措施和工作方法。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些措施和方法，需要注意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国家的传统和条件是不一样的。

然后毛泽东说，最近几个月，他到过山东、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两周前，他刚从东北回来，他到了抚顺煤矿和铝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长春汽车制造厂。在高度赞扬长春汽车厂时，毛泽东指出了它的不少消极方面：“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个工厂似乎太大了；由于缺乏原料，它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工厂许多零件自己不能制造，还需

要进口。"看来,类似的大工厂,毛泽东说,中国不需要很多。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多建设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需要投资不大,而在短期内便可建成。

会谈中毛泽东热烈称赞了苏共中央最近(2月)全会的决议。他指出:"苏共中央在全会上制定的措施是前进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进一步加速发展农业,给生产力发展以一个广阔的空间。"苏联的这一经验,他说,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们和毛泽东详细地就机械拖拉机站改组的有关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赞成这种思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没能正确地看到机械拖拉机站的前景,所以作出了匆忙的、不正确的理论结论。

涉及斯大林时期苏联事业的整个形势,毛泽东说,工业当时进步很快,而农业却非常落后,"就像一匹瘸腿马一样,不能正常前进"。他接着说,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民不正常的高税收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斯大林在工业上也犯了错误,例如,对工业管理过分集中。但毕竟,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其他错误现在可成为我们有益的教训,"我们不会再重犯这些错误"。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困难。"事情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毛泽东说,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他同意我以下补充意见:对于苏联来说,严重的困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缺少有技能的干部。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同在莫斯科时一样,重新谈到"苏联哲学界有一个好的风气,苏联哲学很活跃"。他说,近来他想了解苏联哲学家的一些近作。他请我给他说出几个作者的名字并给他推荐他们的几本著作。

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从东北巡视回来之后他患了感冒,病了两个星期。一般说来,他指出,我在北京比在外地感到累,在外地我有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近。现在中共中央,他继续说,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规定中央委员,各省委区委书记一年得下地方4个月,了解情况。这一规定只对那些身体不好不能下去的同志例外。这一决定,毛泽东说,能帮助我们克服领导地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

会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邓小平参加了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86－96

№20379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

(1958年3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递有关台湾情况的简要介绍。相关资料均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3月1日

第15-Д-242号

关于台湾的局势

(情况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北京使馆转交了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其中涉及该岛的人口、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中方情报中说，据蒋介石分子所统计的数据显示，台湾人口共计94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军队(52万人)以及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上的人口(5万人)在内，蒋介石集团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共计约1 000万人。

关于台湾的政治状况，该情报指出，过去一年中国际紧张局势的日益趋缓更加动摇了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内部斗争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由于担心蒋介石或其亲信中的某一人，如蒋经国(蒋介石与前妻所生的长子，精通俄语，妻子为俄国人，1925—1937年间在俄国居住，化名叶利扎洛夫。他曾在孙中山大学就读，后转学军事-政治学院，并曾在苏联军队中当过兵。他于1937年回到中国，现任"反共救国斗争青年联盟"负责人和主管侦察和反侦察事务的国防部政策司司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人极端仇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暗中与大陆举行谈判，于是便加紧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展阴谋诡计——积极支持亲美分子胡适(国民党反动亲美活动家，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科学博士学位。1938—1942年间，他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职务。目前，他居住在美国，是亲美、反蒋分子的领袖人物)、廖文毅(现居住在日本，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此人既反蒋又反共，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傀儡)等组建"在野党"。而后者则与身在台湾岛外的李宗仁(国民党老一代反动活动家。当年曾为中国军阀集团领袖人物之一，并从事过反蒋活

动。1949 年 1 月,他曾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国的副总统。1949 年 4 月,他前往美国至今)和"第三势力"的其他代表在反蒋行动中遥相呼应,内外勾结。为此,美国人蓄意策动桑晨斌(Сэн Чэнпин,国民党活动家之一,1949 年逃亡香港。美国人利用其以达到自己的反蒋目的)发表了反蒋演说。另外,美国还积极采取措施拉拢陈诚(国民党老一代反动活动家。1950—1954 年间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54 年,他被"选举"为所谓中华民国副总统。而在 1957 年 10 月举行的国民党八大上他被"选举"为国民党副主席。目前,实际上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在上述人等的帮助下,美国人极力将拥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强自己对台湾的军事控制。例如,其向台湾增派了导弹部队,以迫使蒋介石放弃自己"反攻大陆"的幻想;1958 年美国缩减了对台湾的援助,数额比以前减少了 2 000 万美元。

蒋介石不满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自己所采取的不友好举动。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反对美国干涉台湾内政的民族情绪也不断高涨。

为了破坏美国所谓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蒋介石依然坚持自己"反攻大陆"与"革命"相结合的口号,并在国际上积极展开活动:为维护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而斗争,在国际关系领域扩展自己的联系,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会议,与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英国、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等建立或加强文化、经济和贸易诸方面的交往。

蒋介石还采取各种措施以稳固台湾的形势。例如,在 1957 年 10 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反复强调"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这里,他无疑指的是所有台湾内外那些对国民党的胜利丧失了信心或表现欠佳的党员们。

因此,很难想象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会缓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2. 在过去的一年中台湾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分歧也在加剧。其中争斗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集团与陈诚集团之间为争夺蒋介石(蒋现在已经 70 周岁了)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这两个集团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并得到了蒋介石的直接支持。

蒋经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包括:国民党基层组织和保密机关。他通过自己一手组建的"反共救国斗争青年联盟"控制了台湾所有青年组织。通过在军队中独立发挥作用的党务-政务系统他还对陆军、空军和海军等各军种实施着监督。部分高级军官(如陆军司令彭孟缉)也是蒋经国的亲信。另外,蒋经国还在政府部门(如境外中国人事务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支持陈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政府行政部门、财经界和陆军范围内。另外,他还在行政院和国民党上层中享有重大影响和威望。

为了消除美国和台湾内部对蒋经国的疑虑,在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建议选举陈诚担任党的副主席职务。此举象征性地表明:陈诚将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蒋介石采取上述举措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持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便在他死后政权表面上由陈诚掌握,而实权仍集中在蒋经国手中。

广大国民党员中低落情绪的不断加剧也对台湾政治产生了巨大消极影响。多数国民党老党员都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他们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前途，精神状态倍感压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推行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也对国民党内部反美情绪的高涨和矛盾的激化产生了直接作用。在大陆方面宣布了上述政策之后，部分国民党员便公开表示响应并宣称："(国民党人)可以与共产主义一起殊途同归"。甚至在掌握着政权的集团内部也有人赞成"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的理由是：如今谁胜谁负的问题业已解决，而如果继续拖延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其他好处，只能有利于美国的军事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试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影响力的扩大，但至今也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关于台湾的经济状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提供的情报显示，以往美国每年都向蒋介石提供价值 32 500 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此举并没有减轻台湾岛内的财政-经济压力，后者状况反而是每况愈下。蒋介石的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例如 1956 年此项开支便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 85%(其中不包括台湾所消耗的从美国直接军事援助基金中获得的那部分军用物资)。军费规模过大及其逐年不断增长导致台湾财政赤字从 1953 年的 6.5%增至 1956 年的 10.6%。财政开支的增长致使税收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加剧。截至 1956 年以前，台湾税收幅度比 1949 年增加了 38.9 倍。如今，台湾的货币流通量比 1949 年增加了 50 多倍。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7－21

№23035

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

(1958 年 3 月 8 日)

机　密
第 136 号

参与会谈者包括：

苏方——Н. П. 布瑟金、А. Г. 阿金佛夫和 О. С. 基谢廖娃等同志。

中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薄一波同志。

翻译——Г. Г. 马纳耶夫和宣森等同志。

会议伊始,薄一波同志便说,И.В.阿尔希波夫[1]同志曾请求李富春同志通报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8年经济建设领域所计划的最重要举措,但由于李富春同志目前正在出差,因此只能由他来负责通报这方面情况。

薄一波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和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给予了高度关注。

最近,中共中央详细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其中尤其是如下几个时期:1. 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下半年;2. 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下半年;3. 从1957年下半年至今。

通过分析上述各时期的经济建设,表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按照如下曲线运行的:一个时期——快速高涨,而另一时期——发展速度又相对缓慢。

例如,1955年工业品(不包括家庭手工业在内)总量增长了8%,1956年其增长已达到31%,1957年增长速度又下降至8.6%,而按照1958年的计划(目前该计划正在制定,并将作为动员性计划)增长速度将重新升至32%—33%。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从1955年10月1日至1956年10月1日,中国土地的灌溉面积增加了1.1亿亩(740万公顷),而从1956年10月1日至1957年10月1日——只增加了4 500万亩(300万公顷)。

根据计划,从1957年10月1日至1958年10月1日,原计划土地灌溉面积增长9 000万亩(600万公顷)。而实际上,截至今年3月1日已完成了1.6亿多亩(近1 100万公顷)。如今,该计划已增至2.6亿亩(1 730万公顷)。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摇摆不定的原因,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众所周知,1955年末和1956年初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提出了"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群众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表现出了巨大的劳动积极性,因而国家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半年以后,即自195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的一些同志在是否有必要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上产生了疑虑,一些人甚至说国民经济发展得过快了。其结果便是导致我们减弱了对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口号的关注。

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下降了。而《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所刊登的题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不正确社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上述情况起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该社论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旨在缩减计划的保守观点;而另一方面,也应当坚决反对冒进。该文章的重点在于批评"冒进",即加速发展,也正是这一点起到了负面作用,从而压抑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些倾向和观点一直存在并持续到1957年中共9月中央全会以前。在全会上这些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情况才有所好转。

对此,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1955年下半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一

---

① И.В.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编注

些人怀疑是否有必要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而另一些人则坚持高速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坚决地批判了那些对高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并制定了由40条纲要组成的著名的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此后，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入了决定性的转折阶段，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也急剧加强。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文章集所写的序言在批判和揭露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主义观点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与对待"多、快、好、省"方针的态度相类似，一些同志又对是否能够顺利落实40条纲要抱有怀疑态度。这些同志又开始认为40条纲要步子迈得太快。因此，在1956年末，尤其是到了1957年上半年，他们又放松了对40条纲要的重视。只是当召开了坚决批判……①

当然，与对待"多、快、好、省"的方针一样，并没有人公开反对40条纲要，但个别同志对落实这些举措所持的怀疑态度滋生了工作中的消极情绪，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国务院部委、部门、办公厅和机关单位工作缺乏以前的干劲，没有了应有的执着和高涨的热情。

通过分析过去三年间的经济建设结果，中共9月中央全会详细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并要求党和人民注意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1) 坚定不移地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落实"多、快、好、省"的方针；

(2) 坚定不移地落实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发展40条纲要，就是说，要提前完成这一任务。

(3) 改善工业、贸易和财政工作，完成这些部门的管理，就是说，要使各部委和部门成为能够促进和发展群众积极性的机构，与此同时还要扩大地方机关管理工业、贸易和财政的权限。如今，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全会作出的这些决议的巨大意义。

现在我们的报刊均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都存在的新高潮以及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跃进情况。

当前，国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运动，目的就是要反对经济计划的保守主义倾向，搞清国内资源储备，坚定不移地落实"多、快、好、省"方针和提前完成农业发展40条纲要。

与此相应，中共中央通过决议：1958年的计划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第一个计划，已被全国人大例会批准，此为最低计划。

第二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作为动员性计划。其中，各经济部门的发展指标均大幅提高。根据该计划，在1958年，工业(不包括家庭手工业)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将达到32.33%。该计划将成为所有部委和部门必须承担的义务，并依此作为评估其工作的根据。只是该计划将不会对外公布。

第三个计划，由各部委、部门、省、企业和建筑单位等根据利用当地现有全部资源储备的最大可能性自行制定，其计划指标将比上两个计划更高。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有4行字迹不清。本文件以下多处字迹不清，均以"……"标示。——译注

薄一波说,以上是他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阿尔希波夫同志问,在经济建设出现新高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中国领导人目前如何评价1956年所出现的情况——当时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得到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迅速增长,从而导致国家在商品保障方面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

薄一波同志回答说,1956年在一些领域,其中包括在劳动和工资等方面,(我们)的确存在步子迈得过快的问题。

例如,根据计划,1956年我们原打算增加的工人和职员的数量为80万人,可实际上其增加了250万人。同时,工人和职员工资也提高了14.3%。人数和平均工资这样增长当然是有点过快了,这自然会加剧居民商品供给方面的困难。现在,乃至今后,我们将极力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也正是出于这一点原因,当各部委和部门由于工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而要求增长人数时,我们则表现得较为谨慎。不过,就1956年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情况而言,该年度我们的发展步子迈得还不算过快。

接下来,薄一波同志又谈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如何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在中国条件下利用这些经验。

他说,1958年和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将继续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后每年都要跟1958年一样——达到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是,我们也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应当像过去的近三年那样——出现急剧下滑的情况。当然,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并花大力气改进各经济机关,尤其是计划机关的工作。目前,后者的工作仍存在严重的不足。

当前,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在中国条件下更合理地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以便更顺利地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能体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原则,又能反映只有在中国条件下才具备的那些特点,即创造性地借鉴苏联的经验。

我们认为,中国的当前情况在很多方面均与苏联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类似。中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技术发展水平低。农业人口占到了国家总人口数量的80%以上。我们国家的这些特殊条件均要求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要持谨慎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省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在当前中国正实施的经济建设领域中所存在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该讲话以前未公开,而近期将对外公布)。

薄一波同志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摘取了如下四个问题:

(1)关于国家工业化时期工农业发展的关系,关于轻重工业发展的关系;

(2)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3)关于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

(4)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以及维持行政管理机关等在预算资金的支出上的关系以及关

于利用国防工业企业生产民用产品的问题。

薄一波说，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详细研究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授给我们的。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绝不能忘了农业。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即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以前，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同——只重视发展工业。因而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农业是重工业发展的主要积累源泉。我们应当使农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地；成为国家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资金积累源泉。

如果只重视工业发展，而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那么国民经济就像一个瘸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薄一波同志指出，在高度集中管理的情况下将导致中央的高度集权，这会减弱地方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并最终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将物资和财政资源集中到中央的情况下，其目标只针对直属中央的大型企业建设，而中、小型企业就得不到充分的建设和发展，最终导致国家经济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与苏联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工业过分集中于某些区域，而对其他以前落后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够，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对的。

例如，山东省拥有5 000万人口，几乎与英国的人口相当。四川6 700万人口，约与德国的人口持平，而湖南和湖北的4 000多万人口也几乎是一个意大利。但在工业方面，这些省份则根本无法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相提并论。

如今，我们提出了全力在所有省份发展工业尤其是地方工业的任务。毫无疑问，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将在国家内陆地区进行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建设和扩展在老工业区的那些现有企业。必须认识到，在原有工业结构上停滞不前和只在位于沿海地区的现有企业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是很不合理的做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反复研究而确定的经济建设、国防和维持行政管理机关的预算资金支出的比例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鉴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当前国际形势，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把军事和行政管理的预算支出压缩至20%，而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30%以上。

在国防和民用工业的和谐发展关系方面，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今后将不再加速生产常规武器，而将精力只集中到特殊种类的现代武器生产方面；把剩余出的国防企业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民用产品。

薄一波同志接着强调，过去我们在实践中没有认真解决上述四个问题，在工业上所花的力气比农业多。大量资金和权力集中到了中央及其机关，而各省份只得到少量资金并在权力上受到限制，国防企业的发展有时会以压缩民用产品的生产为代价。

这些偏差给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且无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如果我们只重视工业发展，就只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而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利用不够，因为我们对

农业发展的关注较少。在发展中央直属工业时,我们只依靠了大城市工人的积极性,而各省份居民的积极性和各地方的可能性就利用得不够。

近期,国家正在对工业、贸易和财政管理机构进行改组。许多工厂(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在内)将转交各地方管理。目前,各省和各县都在制订工业发展计划,此举将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地方将积极地挖掘内部潜力,从而为1958年实现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工业管理体制的改变将使我们在大型、以及中型和小型企业的建设方面都能集中精力。

如今,中央,即各部委和部门将关注所有大型和部分中型企业的建设和管理问题。大部分中型和所有小型企业将完全由地方管理。与此同时,各地方还要负责这些企业的建设事务。

这样,各地方的巨大能力和他们的积极性将被吸引集中到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方面,以确保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加快一系列新企业的建设,从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发展。

目前各部委和部门的任务有两个:

(1)管理所属大型和一些中型企业,为此他们将集中自己精力的30%以上。

(2)帮助各地方发展……

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在今后的15年内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赶超英国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已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领导同志说过。我们知道,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在积极动员民众所有力量的条件下该任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落实这一计划,中共中央给每个省都下达了如下两项任务:

(1)各省必须在尽量短的期限内确保工业品总量取得对农产品总量上的优势;

(2)在最短期限内,根据各省的特点完成农业发展40条纲要的计划。

目前,除辽宁外所有省份的农产品总量均超过了工业品总量。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任务,所有省份如今都在积极开展工作,寻找各种可能性来扩大工业生产,发展新的工业领域,利用全部现有资源,以便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况下尽快改变农产品和工业品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进而使各省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

至于设定期限为10年的农业发展40条纲要所提出的那些任务,许多省份都认为自己可以提前完成,而个别指标甚至可以在不到5年时间内便彻底实现。

各省在落实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将受到严格的社会监督。每个季度有关部门都将对各省的工作进行总结,而到了年终将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作出整体总结。至此,薄一波同志结束了自己关于第二个问题的通报。

针对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问题,即如何确保第二个和第三个最高生产计划与……由最低计划所决定的物质-技术供应相互结合;现有资源以及所开采的各种原料和物资是否能够保证按照第二和第三种计划方案完成1958年的既定生产计划。薄一波同志答道,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一下过去数年间我们实施物资-技术供给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

1958年,(我国)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一些计划机构,尤其是那些从事

物资-技术供应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开始传出这样的议论，即原料和物资不足，有必要降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等等。而当我们刚刚降低了发展速度，他们又开始抱怨说原料和物资过剩，商品积压，而解决的办法只有增加这些物资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这就是1955年时的情况。

1956年，我们极大地加快了工业和建设的发展速度。于是，又有一些人抱怨原料和物资不足。1957年，发展速度放缓，物资剩余又开始增长，而关于商品积压的埋怨又起。

我们前不久认真检查了国内的物资技术供给情况，了解了这方面的积极经验和诸多不足。过去年间的经验表明，关于个别种类物资不足或者过剩的那些抱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此类抱怨即使现在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已出现了这方面的些许征兆。

我们认为，在物资和原料供给方面所产生的困难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原因首先在于：

(1) 生产的增加，并为此而广泛利用一些小型手工业企业。

例如，1958年我们计划把生铁生产数量增加到800万吨，钢700万吨。

又如，今年由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出现……与此同时，优质的名牌水泥将用于建设工、农业大型设施。

(2) 动员现有的大量剩余物资和储备。例如，截至1957年底以前，剩余的黑色金属为250万吨，而依照常规能用90万吨。

(3) 增加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

另外，通过开展反对挥霍浪费的斗争和节约原料、物资的运动，也将有助于我们成功克服所产生的困难。

薄一波同志把话题转到第三个问题，即关于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他说，我们目前正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整顿工作作风运动在现阶段的特点是：大规模地开展反对降低经济计划的保守主义倾向的斗争，揭露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尤其是大规模地展开反对挥霍浪费和提倡节约的斗争。这一运动的主要形式便是贴大字报。

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计划于今年5—6月份结束，并打算于4月初或中旬召开全国党代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讨论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结果。

自1958年下半年(7月1日)起，将在国内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技术革命运动。该问题目前中共中央正在全力筹备。该问题本身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作细致的准备，因为当前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技术方面赶超一系列先进国家。

与此相关，中共中央在干部问题方面所提出的口号——“又红又专”……极其重要的意义。“红”的意思是注意培养干部的革命性，“专”指的是要获得专业知识。

做到“红”，仅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优秀专家。只是“专家”而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知识，则意味着其工作没有光明的前途。我们正在为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而斗争。当前，中共中央已向广大干部提出了如下任务，即从副部长起直到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都要在5年期限内学习一门专业，或某一部分科学技术，以便成为一名熟

练的专家;与此同时,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掌握一门外语。

技术革命任务的完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各地方上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是成功解决这一任务的保证。

薄一波同志接着通报了关于根除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打倒官僚习气"的口号的问题。他说,这一斗争也是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干部中仍存在这样一些人:满身的官僚习气……行贿受贿……喜欢自吹自擂;脱离群众,害怕群众的批评;不去工厂和建筑工地,农村和高校,而是待在办公室里;认为革命工作只是写文章,作决定和编指令。

中共中央提出了根除官僚习气的任务,要求坚决清除官僚主义,从而巩固与群众的联系。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已局部地实施了如下举措:

(1)派遣所有人——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参加劳动锻炼,即到企业参加实际劳动锻炼和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目前是要求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去企业或农村工作不少于2年,截至今天派去参加劳动锻炼的人数已达到160万。

(2)中共中央全会成员和干部——从副部级开始,每年在地方上,而非中央,工作的时间至少4个月。

在结束自己的通报之时,薄一波同志说,中国对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加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抱有浓厚的兴趣。

中共中央的同志们认真研究和高度赞扬苏联在清除个人崇拜,迅速振兴农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扩大联盟共和国权限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团结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关于这一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曾对我们所说——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以中共中央名义对赫鲁晓夫同志所说过的话。这里,薄一波同志强调,坦诚地说,他本人和其他自己的同志们一样,即在刚听到了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之后,都在对批判斯大林错误问题的认识方面存在着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因为斯大林在中国人中是非常有声望的。只是在稍后,我们才清除了这些疑惑。

阿尔希波夫同志感谢薄一波同志所作的上述通报,并询问:薄一波同志是否知道,中方打算何时和如何完成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哈萨克斯坦城镇)铁路线的建设工程。

薄一波同志答,与以前计划的工期相符,(中国政府)目前正计划加快这一铁路线建设并尽快使之投入使用。不过,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更完整情况他将委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我们作出答复。

此后,阿尔希波夫同志简要地向薄一波同志介绍了(苏方)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划管理局的工作进程情况,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明确苏联在1959—1965年间将为中国一系列成套企业——其中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批新企业在内——供应的设备规模。

阿尔希波夫同志说,这一工作的结果显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各部委打算由苏联援建的新企业、车间和设施有100个以上,其中多数均包括在苏方早在1956年9月已原则上表示同意援建的109个项目之内。鉴于上述中国部委一些企业打算于1959年便获得

苏联设备，因此双方最好能在近期就这些企业签订相应协议问题举行一系列谈判。

与此同时，阿尔希波夫同志请求薄一波同志敦促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尽快起草关于根据1959年有效协议苏联向正在为中国援建的企业提供设备的数量的提案。该协议是今年4月份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期间就这方面问题所签署的。

薄一波同志承诺将研究阿尔希波夫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至于加速筹备关于(苏方向中方)分批供应1959年的设备的谈判的问题，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已经下达了必要的指令。薄一波同志接着提到，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库兹明同志就1959—1965年间中国远景计划双方开展联合工作的问题给李富春同志所写的信。中国国家计委不掌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终控制数据，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初的计划草案中任务制定得过低。目前，我们正在重新研究这方面问题。与此相关，薄一波同志本人支持李富春同志所提的看法，即把中国国家计委的初步草案和从苏方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委联合工作的结果中所获得的资料，交给苏联国家计委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薄一波同志还通报道，中国国家计委将继续就这方面问题开展工作，要把必要的问题明确下来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阿尔希波夫同志指出，苏方目前正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委一起工作，以确定苏联在1959—1965年间将向中国供应的、用于苏联援建的企业的成套设备的数量，而库兹明同志在来信中所提到的只涉及其中的一部分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阿尔希波夫同志向薄一波同志转交了经互会在莫斯科出版的《1959年经互会成员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指南。

会议记录：A. 阿金佛夫

1958年3月8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272，л. 58－75

№09887

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

(1958年3月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3月15日

第78号

绝　密

文本第4份

与朱德同志谈话记录

1958 年 3 月 9 日

星期天,朱德主动来到我家里。

在会谈中,朱德除了共同涉及的问题,还与我谈了几个其他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弄清了我的看法。

同毛泽东上次座谈一样,他也说,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与刘晓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朱德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英镑区'相对抗的一种形式"。他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现有的实际上是以美元为基础进行贸易的做法未必是正常的,于社会主义阵营未必有利。"

"建立卢布区,"朱德接着说:"我们认为很有前途。这一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

在这方面,他分析了中国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他简要指出了双方在互相贸易时运费过高的问题。"运费高达 30%或更高,这大大提高了我们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出口货物的成本"。帝国主义国家,他指出,非常重视类似的问题,在降低外贸费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什么我们,他指出,不研究不解决类似的问题。"为了缩短货物运输里程,不仅可以考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出口,还可以考虑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不同地区广泛组织协作以生产出口商品。"

朱德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或向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贸易时,价格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划一。在价格较有利的情况下,他指出:"像波兰和南斯拉夫这类国家,大概就不会面向资本家了。"

朱德还涉及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问题,尤其是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贸易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指出,有时争相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以不同的价格买卖一类商品。"地理上中国离这些国家近,所以,比方说从捷克斯洛伐克往这些地区运商品就不利,不合算。"

总的来看,朱德强调说,上述因素和其他因素说明,解决"卢布区"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是有利的。

我向他指出,为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经济问题,经互会正在做一定的工作。朱德同意我的意见,但指出:"经互会只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对我的建立"卢布区"的态度感兴趣。由于我没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我只是泛泛地对他作了回答,说在共同努力制定这一措施时,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创造了这一经济合作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变得更强大了。这特别加强了我们阵营的立

场，我补充说，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朱德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他接着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应由苏联负责。"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带头人——苏联来做。"

然后朱德问，1930年代经济危机对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回答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同苏联发展贸易，在经济上同苏联靠近。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还谈了中国国内形势方面的几个问题。他谈了国民经济的伟大成就，说这是党的政策——"为全面提高中国人民生活"创造条件——所带来的结果。

谈到农业，他说，今年农业生产，其中包括经济作物可望继续增长。为了增产，今年注重了发展化肥生产。如，第二个五年计划，将生产化肥1 000万吨，而现在才生产100万吨。

现在，朱德继续说，正在重新审议八大制定的重工业目标。其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定每年生产钢1 000万—1 100万吨，现在改为1 500万吨以上，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将生产3 000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的任务是达到目前苏联钢的生产水平。朱德指出，"有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修改我们以前订的保守计划"。

朱德在会谈中又一次回到中国铁路建设问题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说，计划共修建铁路15 000公里—20 000公里。其中，兰州—阿拉木图干线占有特殊地位。"今年这条线可能修到乌鲁木齐"。另一条，朱德说，宝鸡-成都-宜宾-云南-越南铁路也将有重要的经济和国防意义。

在会谈中，朱德简要谈了中国建设干部的培养问题。他通报说，现在全国有一百多万建设工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的50个师，这些师的全体人员现在已转业从事建设工作，而且获得了相应的技能。这些干部，他指出，在国民经济中表现很好。

然后朱德谈到了中苏经贸合作和贸易方面的几个问题。

同上次和我会谈一样，他又提到了苏联利用中国劳动力问题。朱德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以前的苏中协定有一定缺点。"现在，当然是如果苏联同志们同意，可以改变以前的做法，即主要把中国工人派往苏联远东，而且不是长期，仅在该工地开工期间待在苏联。"我们准备研究这个问题，朱德继续说，让这些工人自己负担一部分往返路费。"由于中国扩大经济建设，我们利用机会在苏联培训自己的干部很重要，同时他们也可给苏联建设提供实际援助。"他还说，中国东北生产发达，有一定的建设储备(砖、水泥等)，这些"中国可以提供给苏联用于远东建设"。

在会谈中，朱德不止一次指出苏联援助的重要意义，说中国长期需要这些援助。我们，他说，在确定我国工业发展规模和方向方面急需苏联提供咨询援助。"同时，由于在苏联帮助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骨干力量成长起来了，现在在设计和建设领域，我们可以独立做许多事了。"

然后朱德谈到了中国大批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他指出，中国赋予包

头、武汉两大型冶金企业以重要意义,这两个企业第一期工程竣工后,每个企业生产能力将达到150万吨,以后将达到300万吨。朱德向我请求,请求采取措施,加紧给这两个企业提供设备,完成其他各项工作。

我答应朱德通过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核实一下对这些企业的援助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再告诉他。

接下来,他简要谈了中苏之间的贸易问题,说中苏贸易很有前途。其中,朱德通报说,中苏贸易额,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看来要比现在增长50%。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谈到了中国由于石油短缺所经受的严重困难。他对与中国接壤的苏联东部石油勘探表示出兴趣。"我们对你们将来能在远东找到石油感兴趣,同地也对萨哈林石油感兴趣。因为通过黑龙江、松花江往中国运送石油费用不会太高。"

同上次会谈一样,朱德又一次强调,在发展我们两国经济时,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和相互联系,他同时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点。

我告诉了朱德苏共中央最近在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朱德说,在中国,人们完全赞成这些措施。

在会谈结束时,朱德通报说,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现在已离开北京到各地去了。

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赵仲元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О.Б.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97-103

№24035

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

(1958年3月13日)

致苏共中央:

在委员会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张映吾同志。后者受北京的委托了解将于今年3月25—28日举行的会议的情况。此次会议是应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倡议举

办的，开会地点在布拉格，将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宣传问题。

我们向张映吾同志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以及苏联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名单。张映吾同志也随即通报说，中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参加此次布拉格会议，其代表团人员组成如下：

1. 赵毅敏(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目前已在布拉格)。
2. 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
3. 王力——中共中央联络部处长。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3月13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48

№24037

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问题

(1958年3月21日)

绝　密

与中国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的会谈纪要

3月21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教育部杨秀峰同志。

杨秀峰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与1958年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落实苏中合作计划有关的问题。随后，他又提出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主要涉及在最新国防技术手段方面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专业骨干。

据杨秀峰同志说，他应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将在莫斯科商谈如下事宜：关于增加(中国)专业骨干的培养，其中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火箭技术、特殊钢材和合金的生产、电子和其他科学。在指出已就这方面问题向……[1]同志转达了具体的建议之后，杨秀峰说，他很理解该问题“事关国家的既定法令法规”，因此不可能迅速解决。中国方面也愿意按要求等到问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题依程序解决的那一天，不过，中方仍希望苏方能够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杨秀峰同志补充道，目前在中国国内已挑选了70名年轻的研究生和大学教师。这些人现在都在等着，并将从1957年9月起被派往苏联，专门从事上述诸科学领域的学习。

杨秀峰同志说，在这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他想向苏联高教部了解如下情况：该部的哪些“保密专业”可以接收中国的年轻专家来学习；需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才能够解决这方面问题——通过中国和苏联中央之间谈判的方式，在哪些专业领域苏联无法接收中国的年轻专家来学习。

杨秀峰同志接着说，目前已有一部分中国年轻专家在苏联从事“保密专业”的学习，但此类学习并非是中国目前急需的……①

……在先前与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采夫同志的会谈中，杨秀峰同志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使目前在苏联的部分中国年轻专家的所学专业——在其结束了在苏联的生产实践课之后——均转到“保密专业”方面。

与此相关，杨秀峰同志还提出了关于根据1958年苏中合作计划向中国派遣苏联高教部代表团的问题。其希望该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能够与以前计划的略有不同。与以往普通的代表团不同，中方希望这次在该代表团中能有如下一些苏联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德罗夫教授，莫斯科能源学院院长奇利金，莫斯科钢铁学院院长基金同志，以及工程-物理学院院长，物理-技术学院院长，等等。

杨秀峰同志表示，希望该代表团能够在中国逗留两个月时间，并在专门科学领域帮助组建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政府希望将该代表团的成员人数从5人增至15人，以便其能够全面(配套，综合性)地开展工作——根据相应专业形成多个由2—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关于该代表团的团长，中国同志希望由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С.В.鲁缅采夫同志担任。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3月2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50-51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有3行字迹不清。——译注